

震旦
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二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二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P. Henri BERNARD, S. J.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 — 1610)



Tome II

准 惠 教 主 海 上

印 館 書 印 灣 山 士 匯 家 徐 海 上

利瑪竇司鐸傳目錄卷二

上編

萬曆皇帝的「主顧」	一
第一章	四
第二章	一六
第三章	三〇
第四章	四八
第五章	六七
第六章	八五
第七章	九八
第八章	一一八
卜編	一三五
第一章	一三八
第二章	一五二
第三章	一六八
第四章	一八三
第五章	一九八
第六章	二一二
第七章	二二六
第八章	二四〇
結論	二五七
逢凶化吉還復自由	一六
荊棘地帶的開拓	三〇
教會組織的輪廓	四八
新教友的訓練	六七
中華民族的風俗和禮儀	八五
一六零四大比之年	九八
中國國外的反響	一一八
西儒利瑪竇	一三五
中國海中的歐洲商船	一三八
范禮安會長功成身死	一五二
明史上的一頁	一六八
秘密會社的禍害	一八三
西洋曆法的介紹人	一九八
肩摩穀接的北京城	二一二
聖化大行	二二六
種下了基多教化的根	二四〇
利瑪竇司鐸在歷史上的意義	二五七

利瑪竇司鐸傳 卷二 上編

萬曆皇帝的一主顧

利瑪竇司鐸入貢的當兒，那幽居北京深宮，度着單調生活，統治中國的元首，名叫朱翊鈞，廟號神宗，萬曆兩個字是他統治的年號，通常稱爲萬曆皇帝。（註一）他在十歲上入繼大統（一五七三年）起先似乎有一點治國的天才，即位後，最先幾年中，曾寫了一篇座右銘，內容包括敬承天命，選賢任能，擯斥奸佞，信賞必罰，平衡預算，慎言行，節飲食，治心身，照良心做事，嘉納忠諫，節用財物等十二事。這些格言果然是好極了，可是對於那地位特殊，一輩子幽閉深宮，差不多時時刻刻和一大羣婦女太監們混在一起的皇帝，能有甚麼效力呢！（註二）看來，他受到那些算來竟有一萬六千人（註三）的宦官們的薰染，過不多時，便已變得腐敗了。他即位後十八年（一五九〇）臺官雒于仁便直言進諫，責備他酒色荒淫，多欲好怒。萬曆帝羞憤之餘，便大發雷霆，若不是廷臣拚死論救，雒于仁的生命，就難保全。後來，翊鈞越發荒淫無度，不問朝政了，身體衰弱得像鬼物一樣，說話的聲音，離開兩步，就聽不到。（註四）

翊鈞荒怠後，久不臨朝，除了太監宮女，和幾位內閣大臣外，誰都不能和他見面；要描繪他的御容真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在位四十七年，倒有近三十年不理朝政，老躲在宮裏，窮奢極欲，酒色荒淫，尤其是愛玩珍奇，曾在一年中，命景德官窯特製茶盞二萬七千套，酒杯六千五百隻，酒甕六千隻，養金魚的大缸七百隻，成爲如今全世界陶器收藏家紛紜聚訟的對象。（註



五)

除了這賞鑒藝術品的怪癖之外，他的一生不見得有甚麼大國君主所應有的治績。朝鮮征倭之役，糜餉喪師，他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滿清兵力強盛，形勢日見險惡，他却似乎毫不覺得。他所注意的無非是宮裏的事情。我們講到太監的專橫，也曾說起後宮妃嬪對於國運的盛衰，有極大的關係。他們的左右，全是那些嗜好，昭儀，宮娥侍妾之類，以及種種執事人員；紫禁城中所有一切人物，都想邀恩固寵，於事大家鉤心鬪角，廣結與援，來滿足一己的欲望，發洩個人的恩怨。這樣，宮庭中陰謀詭計，層出不窮，也就可想而知了。凡是被選入宮的女子，惟一的目的，便是希得皇帝寵倖，誕生皇子，立為皇儲，好確保富貴權勢。實在，當初中國的君位，不是傳給子孫的，依據史籍，從夏禹時代起，君位才不傳賢而傳子，那時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初葉。可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會完全消滅，在原則上，皇帝仍可自由選立儲君，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兒孫中隨意選擇（承嗣子和親生子，在法律上有同等地位）而且便在皇族以外擇人禪位，也無不可。因此，后妃們為了立儲問題各結黨與，競爭得非常劇烈：一朝生下皇子，便想出種種陰謀詭計，使皇帝立為太子；儲位既已奪得，一旦皇帝薨逝，或是害了重病，又必多方佈置，嚴密防範，來維護他們已得的權利，使他久保不失。

利公這回到北京，正當那為了建儲問題，十六年來綿延不絕的紛爭，暫告結束的時候。這種紛爭，是因皇后沒有生下兒子，王妃生皇長子常洛，鄭妃生子常洵，周妃生子常浩；可是這當兒，王妃已年老色衰，鄭妃却很得翊鈞寵倖。朝臣們堅請依照成例，立長子為皇儲，但翊鈞概不聽從。於是言官和閣臣們一再上疏，極言進諫，自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十六年中，朝臣們因此獲譴，遭受貶責，或自請罷去的，不知有多少。直到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翊鈞才冊立常洛為太子，其他諸皇子都

封了王。(註六)

萬曆時代，有兩個婦人有左右這庸主的勢力，一個就是他的寵妃鄭氏，還有一個便是他的母親，慈聖太后陳氏；這是一個佞佛的婦人，曾於一五九二年受過菩薩的「法戒」。專制時代，惟有僧尼可以入宮庭，所以中國有一句俗諺叫做「宮裏敬和尚，外省敬官府」。至於萬曆帝個人，當時會有人講他的宗教觀念是這樣：「他只尊重自己，不敬神道。他雖然遵守祖宗遺制，敬事天上掌管萬物，至高無上的主宰，看來只是隨便做做，全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註七)

這麼一位容顏憔悴，人格凡庸的元首，除了因為誕生在帝王家，才承嗣皇位外，其他的價值一點也沒有。利公既到北京，不久就可看出來了，可是多虧萬曆皇帝酷愛珍奇，利公才成了皇帝的「主顧」，這就足以使他安居中國，得到了保障。

第一章

利公在自己的筆記中，曾講他這回在天津遭遇困厄，怎樣絕處逢生。（註一）他說：「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事情弄得壞極了，壞到出乎意料之外，此行能否獲得成功，真教我們懷疑莫測。天津地方，到了冬季，冷得厲害，天津衛城的屋子又極簡陋，住得很不合適。可是天主却肯俯聽司鐸們和本會內外，無數忠僕們的祈禱；他們如今在全世界各地，都把這件事托付給天主，天主便安排下使皇上突然下旨，（萬曆二十八年，即一六〇一年一月八日）命利公等親自攜帶貢品，立即起程，並着地方官陪送進京。原來這件事情經發交禮部核議之後，隨即由禮部擬具意見，奏請依照接待貢使成例辦理，因而下了這道諭旨。」

這事擱了六個月之久，皇帝怎會突然頒下這道命令，這是誰都不能懂得明白的，但我們以為這未嘗不是天主鑒於這個廣大國家中，有無數靈魂行將失落，才親自安排，以資挽救所致。據本會司鐸們所得的消息，一天，萬曆皇帝獨自在宮中，忽然想起曾有人奏稱有幾個外國人，要進貢一座自鳴鐘，便突然喊道：「這座自鳴鐘，怎麼他們不給我？」在旁伺候的太監便回奏說：「馬堂的奏本，萬歲爺沒有批，這些外國人不得欽准，怎敢進京呢？」於是皇帝在馬堂的奏本上，下了硃批，立即傳諭馬堂知道。馬堂雖則萬分不願，却不得不做好奴才，便命人把教士們所有的貢品如數發還。」

利公的行李，在被馬堂搜劫的時候，有幾件東西被竊去了，有幾件被馬堂公然沒收，或則給了天津兵備道。仔細一查，缺少的東西，還在教士們意想之外。（註二）他們的聖物匣，一經收回，便連夜揭開，看是不是只放着幾塊從聖地覓來的石子

和泥土。他們把所有聖物一齊取出，特別是那聖十字匣裏的聖骨，拿出來歸在一起，放在個大一點的十字匣裏，附一張西洋文字的字條，意思是說這些聖物，即使重到了奉教人手裏，也不當因之而自負。

還有一件，在中國傳教史上有極大關係的事情，教人更能明白認識馬堂的惡意。事情是這樣：「利公收集了許多算學書，預備皇帝要他襄助北京欽天監修曆時應用。那時，中國有一條久已廢止的法律，禁止人民不得皇帝許可，擅自學習算學，違者論死。所以馬堂有意把這些書列在貢品之內，另外用一隻箱子裝好，貼上字條，寫着：『監收皇上關稅，太監馬堂，在外國人利瑪竇行李中，查得的書籍；這些書專講算學，按國法是違禁的，故當存放天津衛官庫，候另奏請旨定奪。』這件事，教士們一點都不知道，只以為書籍不在貢品之內，便向一個差役索還。這差役不識字，便把這箱子拿來送還了。後來馬堂爲了繳解稅款，押送別的東西，又爲安排教士們動身進京，回到天津，起先不曾留心到這些小事情，可是教士們動身之後，他才發覺這些書不見了，便對守城官大發雷霆。他說得好像皇帝要追究這些書一般，大罵那誤事的差役，要他去找回來。這差役嚇得魂飛天外，就此一溜烟逃走了。馬堂自己却也心虛胆怯，一句也不敢再說。這件事，利公真有幸，因爲這些書籍後來幫助他在北京傳教，真是寶貴得很呢。」

教士們從天津到北京，趕了四天路程，趕得再便利沒有了。他們有驛馬八匹，民夫三十名，都由公家徵用。每到了一座城，就換馬，換挑夫，這是天天預備好的。夜裏過宿，便在府縣官的衙門裏。他們到得京裏，已是陰曆年底了。（一六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註三）便在城外一個太監家裏下榻寄寓。皇帝既把他們入京朝貢這件事，下禮部核辦，他們就得趕快向禮部接洽，當下便檢點貢品，開具一紙清單（註四）又預備好一張奏表，略稱（註五）「臣從大西洋來，敬向陛下上表納進，貢呈本

國徵物等語：（查原文照錄）

那一道筋將入貢的外國人護送來京的上諭，是由主管外國人的衙門，轉飭馬堂遵辦的。馬堂只怕這回入貢所可撈得的一注大財，要被人剝奪，便處處提防着，（註六）到京後下一天，一清早，就督率着大隊人馬，捧着奏本，抬着貢品和稅銀，急急入城進宮。

這當兒利公等住在馬堂心腹人家裏，不能隨意出入。他這回到北京，可說是捲土重來了，只聽北京這兩字，便覺得有一種令人奮興的絕大力量。上一天，他已在那沉寂灰暗，寸草不生的大地，從那枯樹林中，望見了那座顏色灰黯的巨大城垣，在十六世紀的歐洲人眼裏看來，高得足以驚人，這天，他便在離那築有雉堞，雄視城門的敵樓不遠的地方，過了一夜。

他上次來京，曾住過幾時，所以北京情形，他能略識一二。描寫這中國首都的作品，多到有幾千篇。我們且揀一篇，似乎把所有對於北京的思想傳達得最好的，摘錄如下（註七）

「我們西洋的京都，一個也沒像北京一樣，按着舖排盛大儀仗，尤其是在皇帝擺駕出宮時，要有一種嚴肅氣象的主要思想；憑着整齊畫一，大胆的計劃築成。這裏，皇帝的寶座，是在全城的中心。這座城市，整齊得像一個幾何圖形一樣，據說，全是要光榮這做四萬萬人主子的天子寶位，使他幽居深宮而創造的。：外城的南門直達皇城，有一條長約六公里的林蔭大道；車駕儀仗，由此出入，進了皇城，便接着走廓大殿。從南門進去，將近內城，便見大道兩旁有兩座規模極大的祭壇，天壇和先農壇，再走半里，便從正陽門，進了內城，城牆比外城更高，更雄偉。城門上有一座大城樓，兩條大道穿過城門，直通到那血紅色的皇城。這就走進了第三道城門。進了皇城，依舊一直進去，却離開那皇帝的寶座還遠。皇帝在這寶座上宰制着一切，（從前

誰也不能進去看看)但看四週的景象，便知御座已相去不遠了。從這地方起，便多白石的大建築物；幾隻巨型的獅子，高踞座上，張口狞笑，左右兩邊，有許多蟠龍的大石柱，柱頂上坐着望天狗。還有一道道的宮牆，截斷去路，這些都是三十公尺厚的紅牆，牆頭上蓋着做成彎角的頂瓦，有三道門通出入。皇城脚下開着護城河，架的白石橋，也和門一般，有三道。這裏，地面上又鋪着壯麗的大石板，鋪得像屋子裏有花紋的地板。進了皇城，走了有一里光景路，就忽然變得荒僻了，却是更寬闊，道路兩旁，有一長塊晦暗的廊廡，如今由軍隊和守兵住着(從前是太監的住屋)。鍍金的小屋子已沒有了；小店舖也沒有了；從前的熱鬧不再見於今日了；人民的生活，已不再受着從這座皇城中發出來的壓迫了。如今，在這座冷落的深宮裏，只有那石柱頂上的望天狗看着，大家可以到這宮禁森嚴的北京中心來參觀了。這座紫禁城，一宮城一四面都立着守望的城樓，裏邊的宮殿，屋頂蓋着黃色琉璃瓦，脊角彎起，做成尖角。我們從極深的城門洞進紫禁城，便見一片廣大的白場，都是白石做成的台階；中間大殿，便是皇帝的朝廷，有蓋着黃色琉璃瓦的屋頂，朱紅漆的大殿柱；來朝的，便是極體面的大臣們，也該在品級台間，俯伏跪拜。從許多有石欄夾護着的石梯，走上石台，有一條御道通到正殿。這條御道用整塊白石砌成，路面微斜，只供皇帝行走，從兩座大石梯中間起，直達御座，兩邊有槽，從上到下，刻着五爪金龍。但萬曆皇帝臨朝受賀，不在這皇城內部的正殿，却在那前面的大殿。

在這莊嚴偉麗的正殿後面，便是禁城最幽僻的深宮，是內廷中最神秘的部份。建築師的名字，一個也找不到。工程師的姓氏，他的天才，和他的偉大設計，一齊墮沒了。天子便在這面積足有兩方公里的深宮中居住着，這地方惟有這一位擔負着天下大任的男子——人稱孤獨的男子——可以住得。他的宮院全不像歐洲的王宮，不像凡爾賽或是漢浦墩 Hampton 的離宮，

是一座整個的建築物，却是一座小型城宮殿零落，大抵隔着圍牆，正合着皇城兩字的意義。重重疊疊的紅牆，把這宮城隔成數部，足見中國人愛好幽靜，崇尚古制。

利公的奏表，最後就傳進了這紫禁城的內廷，奉呈御覽。皇帝一看罷，便命呈上貢禮。據說：「他展開天主像，瞻仰一番之後，便放到特別寶庫裏，謹敬收藏。」（註八）他初次看到了這些畫像，便大喊：「這是一位活菩薩。」這句話，出在他嘴裏，就等於說：「這幅畫上，真是活天主！」他雖則不知道，說的話却是千真萬確，尤其是這在中國，是句流行話，因為別的中國人所敬拜的菩薩，都是死去的神道。從此以後，這些畫像，就保存着這個名稱，這回來京的教士們，就被稱爲「進貢活天主的人。」這幀聖像，使萬曆皇帝留着極深刻的印像。甚至不敢留下聖母像，把他送給了太后。太后見了也很敬畏，便命入庫收藏；因此，太監們得引許多交好的朝官進去瞻仰。據太監們講：「看來皇帝會對這些聖像上香，行大禮下拜，蒸爐焚香；又在便殿中，供着那救世主小聖像。可是這些話，不見十分確實；而且太監們的話，慣常總是不很可靠，不該深信的。」

利公進呈的貢品中，有一件東西，似乎他事前不會想得周到，這便是那聖骨匣。可是皇帝雖曾問起這東西有甚用處，這無非是出於一種異教人的好奇心，不該認作一種宗教上不安情緒的表示。恭敬「聖人的骸骨」在中國人聽來，真是不堪入耳，莫甚於此了。中國人大都相信人有三魂六魄，一兩種靈魂。（註九）魂離了肉身，魄却仍能保存不散，不過時間久暫，不是一律的罷了。這些沒有魂但有魄的形軀，便是那愚蠢凶殘，可怖的殭屍。一具枯骨骸，一個骷髏，或者不拘甚麼殘骸零骨，年代一長久，便能成精作怪，做出種種害人的事情。因此，中國人害怕死人的骸骨，總要使他和他居宅遠離。」

萬曆皇帝對那威尼斯玻璃製的三稜鏡，也不見得十分在意，却幸那自鳴鐘和八音琴，後來反做了他消閒解悶的東西，

打破他幽居深宮的單調生活。利公又講：（註十）皇帝一見那大時鐘走得不對，到了時辰不響了，便命人帶馬，傳利公等趕快前去。教士們便馬上趕到。皇城分作四部份前面的兩部份，稱爲外朝，除了僧道和婦女們外，白天誰都可以進去。但那後面兩部份，稱爲「內朝」，只許當差的太監們進去；夜間，宮城裏面，惟有內監和侍衛值宿。利公等由太監們引進，直走到第二道宮牆（在南部的外朝）那大時鐘便在那裏放着；就有許多人跪來觀看，使太監們不得不用棒打，才趕開。」

皇帝派一個禮數還細到的親信大太監叫李濟農的來招待利公；有兩百多小太監簇擁着他出來接應，講的話很客氣。他問教士們來京進貢，有甚麼目的，要些甚麼，聽說他們並不想求甚麼差事；他們原是修道人，專務奉事天主，虔誠度日，世界上的東西一點都不要，便表示十分滿意。講到自鳴鐘，利公便說明這鐘用響鈴和指針，教人知道時辰，不分晝夜，又請皇上派定幾人，學習調整的方法，他可以在兩三天內教他們完全學會。

皇上據李太監回奏，便命內廷學習算學的四個太監（總計有二三十人）去從利公學習，三天後把鐘帶回內殿。這幾天中，利公等便住在學算學的太監們那裏，由馬堂的心腹貼付膳費。因此，宮中便傳馬堂得到西洋人的大宗財物。馬堂便不得不化上至少好幾百元，求皇上親信的太監們替他洗刷。四個從利公學習的太監，個個學得十分用心，牢牢記住，把利公所講的話完全寫出來，一字不漏，只怕有一點兒忘掉了，就不得活命。他們知道皇上十分殘暴，往往爲了一件極小的事情，就把太監宮女杖殺處死。教士們要他們懂得，好不容易想出種種話法，如輪盤，軸梗，鑰匙，彈簧等，各樣的名稱來說明一切。

在這三天，和以後幾天中，皇帝不時派太監們來問關於教士們，和歐洲方面的各種事情，他所要知道的，是西洋地方的風俗，人情，衣服，飲食，婚嫁，皇室的喪葬，以及宮殿，房屋，珍珠，寶石等，連教士們喝幾次水，吃幾個小包子，也要問過。利龐兩公便

乘機給他表明自己的志願，說他們不願授職，也不要甚麼東西，只願在北京居住。三天還沒有過去，皇帝已問起那自鳴鐘，怎麼還不送來。教士們便急忙修好了，趕緊送去。他看了非凡滿意，便賞四個太監，晉級加俸；其中有兩個還奉命每天進乾清宮，照管那小時鐘；這時候他已十分寶愛，晝夜不離了。世俗中，不願意常在皇帝身邊的人，大概一個也不會有；在這異教國人中，那尤其是沒有了。因為其他的人們只怕他要趁此機會，在皇帝面前說長道短，壞了他們的事，見他和皇帝這樣親近，就要怕他，不住餽贈財物孝敬他。

乾清宮裏的屋子雖則很高爽，可是要把那大時鐘安置得使鐘錘可以盡量伸展，還嫌不夠，所以下一年，工部便奉皇帝命，依照教士們的圖樣，特地起造了一座鐘樓。這座鐘樓，是用木料製成，規模不大，却修飾得很美觀，有窗，有迴廊，有梯子上下。（註十一）皇帝又命鑄造一座洪鐘，鍍金彩繪，雕刻得十分精細，需費一千三百元。後來，他又命蓋造一座高閣，安置這座洪鐘，這座閣造在內城外面，那滿佈珍奇，供他時常去遊憩的花園裏。

這樣，便是自鳴鐘，活動小木人，和西洋時錶開始輸入中國的情形，在天主教傳教士和外國使節，來華傳道聘問的遺聞軼事中，到處給我們留下當時士大夫對於這些東西驚奇讚歎的記載。現在北平故宮某大殿中，還陳列着帝制時代一般收藏家所定造的，瑞士或是英國製的鐘錶。（註十二）

皇帝的思想一經啓發，只因不會見過這些外國人感覺不滿，便命兩個最好的畫工，來描繪教士們的立像。龐迪我司鐸曾記這件事說：「這當兒，我的鬚已留得兩掌長，我便穿着博士衣，雖然樸實，却和我們的博士衣完全不同。」（註十三）利公又說：「實在這些像，連我們自己都認不出來。」（註十四）據說，萬曆帝一見畫像，便喊：「這些人是回子。」但那伺候的太監

告訴他，這些外國人却吃豬肉。他於是更要問歐洲各國君主的服式裝束和宮廷了。龐鐸會記：「這些情形，我們不能曲曲折折，給他講明白。但我們中，不知誰想起了諸鐸行李中，有一尊雕刻的小型耶穌像。前面跪着神人，魔鬼，題着：『天堂上，人世間，地獄裏，一切衆生，都因耶穌之名而下拜。』在人類中，有教宗，帝后，和王公貴爵。這就使教士們想出一種方法，教他知道應該恭敬這聖名。利瑪竇便做了一篇簡單的中文說明書，和這聖像一同送去。無如這像太小了，中國人又不懂得畫陰陽面，教士們便奉皇上命，去幫助那供奉內廷的畫師們兩三天，教他們把像放大，加彩着色。」（註十五）

至於歐洲的宮殿，利公把一張新從愛斯古利寄來的一幅圖畫進呈御覽，（註十六）但這幅畫須附詳細說明，所以由太監暫且收下。利公只得另外進呈一幀「威尼斯的聖馬爾谷」像，上面附繪着宮殿、廣場、和爵士用的盔甲。據說「皇上聽我們的君主住在有樓的屋子裏，便哈哈大笑，因為在他看來，住在這麼高的王宮裏，不但危險，且也不便。但大家聽說他們從小就住慣了，也就不以為奇。教士們為使皇上明瞭歐洲君主死後怎樣殯葬起見，便利用他們接到的書信，講述那奉教國王斐理伯二世出殯時，所舉行的盛大喪儀；所用的棺柩，是用貴重的木料製成，裏層澆鉛，葬入用白石砌成的墓穴。」（註十七）

三天修鐘的日子快滿了，太監們已向利廬二公道賀，說這回他們有了勞績，皇上定必賞他們官銜：「這原是中國人所認為最大福樂的。」但教士們却聲明不願得官，「只要一座房屋，好讓他們在京裏居住。」馬堂的手下人於是設法在宮城附近租下了一座屋子，那裏有兩座屋子，是他們的住所，可以監視教士們的行動。利公等依照馬堂本人的意思，又添送了一張西洋的弦琴，本來這是不預備送給他的。當下，便有四個在太常寺學弦樂器的太監，來見教士們請教就學。這些學音樂的，要比那些學曆算的太監看得起。那時，龐迪我新從郭居靜學會這琴，不但會彈，還調整音節，所以利公派他担任教授，「他便

由藝徒一變而爲師傅（註十八）。上學第一天的情景，竟是非同小可：四個學生，先恭恭敬敬，拜過兩位司鐸，說請師傅費心耐煩，教誨他們，不要因爲他們遲鈍而灰心。隨後，他們又對那樂器拜了幾拜，好像這是活的一樣，求他幫助學習，禮畢，才告退。四個學生每天設下盛饌，請老師。但有幾個聲勢煥赫的大太監，却不肯紆尊降貴，來相訪問。後來，教士們漸漸和宮裏的太監們個個相識了，以後便小心在意，和內侍們保持熟識的關係。

於是龐迪我繼續給學生們上音樂課，可是所教的並不十分高深。這四個學生中有兩個年紀還輕，學起來快一點，却因其中有兩個老前輩，一個年紀已有七十歲了，不得不給他們留些面子。所以表面上只好裝做進步遲緩，就這樣混過了近乎一個月。樂器是一種放在台上，裝匣子的鋼絲琴，有四十個音，發音細銳，在聽慣的中國人聽來，聲調雖簡單，却覺得幽雅悅耳。但西洋音樂的音階聲調和東方音樂的截然不同，無怪這些中國樂師雖肯用心學習，總嫌格格不入；學了好久，只能學熟一曲，而且大概也和後世紀中的康熙帝一般，只用一指彈奏了。

利公原以傳教救靈爲職志，遇有絲毫的機會總不肯輕易錯過，這時候，便想製歌譜曲闡揚道德真諦，使全國人民聞風興起；當然這是仿照羅馬當斐理伯納利在世時代所流行的頌讚歌曲撰製的。他用文辭製成了八篇歌曲，脫稿後，爭相傳誦，先則抄錄，後再付印，便添上了一篇序文，附有羅馬字註音，題名不久就人手一篇風行全國。一般正人君子見他這樣微言諷諫，導君上修德行仁，無不樂爲稱道。將近二月底太監們便向教士們探問來意。利公等知道這時候還不宜立即說明來華傳教的本意，也不宜要求准許同志們來京，因此只要求「撥屋安居」。利公此番捲土重來，却仍不得安居，所以他只想設法脫離馬堂的掌握。因爲萬曆帝得了利公的貢禮，照例頒賜的銀兩，一部份被馬堂從中吞沒了以後，這個奸闖便想趕緊把利

公等打發回南。馬堂手下的爪牙羽黨，因此也嚴密防範，不許利公去拜訪京裏的官紳；他雖則奉了理藩院的正式召命進京，却絕不得和這招待外賓的衙門中人見上一面。但利公終於想出巧妙的方法，跳出了這個天羅地網。起先，他每天陪羅迪我進宮回來，總到下處裝作不再出門的樣子來。後來有馬堂派來監視他們的人，陪着那位司鐸，一位助理修士同到街上私行遊覽，他就趁此機會，依照本地人的風俗帶上黑網巾，出外微行，一來為擋街上的灰塵，二來為防遇到熟人，不勦要有一番客套耽擱工夫。

他於是先到吏部衙門拜會一位名叫祁光宗（？）的堂官。這位堂官不是科甲出身，却因他素日居官清正，得蒙逾格超升；一班小人都對他十分畏懼。他不知怎樣知道了利公等來京的消息，便着手查訪馬堂把他們藏匿的處所，又被他訪到了。他就先來訪問，而且來得非常突兀，誰都料想不到，却又對利公很有禮貌；因此，利公和他就攀了朋友。那天，利公出了吏部衙門，又去拜會幾個由李贊和濟寧州官介紹的官紳；反是一班南京方面介紹的人物，差不多個個不敢和他相見。『這就可知利公等此番北上，落到了馬堂手裏，正是他的幸遇，因為要是馬堂不給他申奏，就誰也不敢出頭嘗試。利公也就不像初次來京時一樣，一事無成而返。他想到這裏，便明白天主教上的安排，不禁感謝天主的無限恩慈。』

三月二日，因着禮部衙門突然出頭干涉，就終止了教士們在奸閹竊柄下所遭半羈押的狀態。禮部轄下有四個機關，第一個便是那專管招待外藩入貢的理藩院。那時理藩院的長官是福建人蔡正卿。他知道利公等被閹黨匿起，不來報到，深恨馬堂專橫恣肆，侵犯他的職權。可是他不敢開罪馬堂，却把一腔怒火移在教士們身上發洩，便發下命令，着四門提督立即拘拏究辦，更小題大做，說利公等犯着「越奏皇上，復敢潛藏隱匿，不向本衙門報到」的罪。當下便有十來個禁衛軍突然闖進

利公的下處，把他拘捕。利公等起先以為這班人冒充敲詐，深怕無端吃了眼前虧，還想和他講情妥洽，後來見他們把僕人們綑綁，又給鍾巴相修士套上繩索，便懷疑到這件事或許是由一班大官僚授意。他自己被拏的時候，雖沒有受到虐待，却想給那時還在皇宮裏的龐迪我司鐸通個信，好教他轉告太監們奏明皇上，可是他辦不到。一會兒龐迪我不知就裏，從宮裏回來，一進門，就給拏住了，去和利公押在一起。禁衛軍的長官向他們說明被捕的案由，利公等也不加反對，尤其是因他們的貢禮已經進呈皇上了。他們就被押在這位長官的公館裏，把門反鎖了。但馬堂的羽黨某太監一得訊，立即趕到，把鎖擰斷，還說官兵們劫奪了西洋人進貢的寶物，把這班官兵嚇得個個都逃走了。但利公的案件還是銷不了，只得同太監商量教他明天帶一匹馬來送他到理藩院聽審。下一天太監先進理藩院，傳萬歲爺的聖旨，教他們不要干涉馬堂的事情，還說軍警盜去貢品，要請追究，來恫嚇他們。但理藩院蔡正卿和同僚商議後，却堅決地回說，一切事情務必依法辦理。

那時，外藩入貢的很多，好一會，才問到利公。利公便對長官的責問，很痛快地，一一答覆。他說自己一路備受太監馬堂的虐待，他的橫行不法便是中國的大官僚，也沒法抵抗的；到了北京奉皇上命在官裏當差，只因落在馬堂手裏，所以不能來院報到；再則自己曾在中國居住多年，北京也曾到過一次，其他各處地方也曾到過，不應把他當作外國人看待。審問經過了一點多鐘，利公受審的時候始終跪着。

蔡正卿到此，也就無可詰難了，便教利公好好等候着，還教他不必害怕，許替他奏明皇上，使他的事情有好結果，却不能讓他住在城裏，教他和同來的一行人住在外賓館，一切費用概由公家供應。

這樣，天主就憑着上智的安排，使利竇諸公獲得意外奇緣脫離了好閹的掌握，但澈底的救援，還得等待幾時，因此利公

仍覺滿懷恐懼，只怕結果不免仍被朝廷遞解回南。可是他這回來京，皇上既已明白知道，也就大有希望，說不定禮部官僚的策劃要歸失敗。後來大內的太監們便通知他，說萬曆帝一聽到理藩院不肯把教士們釋放的話，便勃然大怒厲聲呵斥道：「他們竟把這些人拘禁起來了，難道這幾個是賊嗎？咱們倒要瞧瞧理藩院的手段咧。」

第二章 逢凶化吉還復自由

利公等的新下處是一種極卑陋的旅舍。它的名稱是四夷館（註）佔地極廣，四週都是很高的圍牆，開着許多門，通出入。中國人非奉旨不得進去；外國人下館安頓了以後，除了到理藩院接洽公務，朝貢時覲見皇上外，直要等事畢回國，才能出館。那裏屋宇極多，可以容納一萬多人居住；可是這些屋宇簡直是牛棚馬廄，那裏是人住的房間，沒有門，也沒有椅棹牀鋪。這地方便是中國朝廷招待一般冒充外國使臣的下處。那時，到中國來的外國人，往往濫用這種職銜，希圖獲得朝廷的禮待。這種惡習由來已久，據說遠在希臘商人航海來華的時代便已如此。中國朝廷因他們自極遠來他朝貢，總是曲予優容，故示寬大，免得着四方臣服的藩屬再起叛變，當他們留駐國內的時候，一切費用概由公家支給。他們的貢品中，時常有所謂寶劍一項。實在這些寶劍不過是一片頑鐵，打得又粗又劣，再把隨地取得的樹枝略施斧鑿，便裝上做柄。此外還有所謂護身鐵甲，質料也很粗劣，是用麻綫穿起了小鐵片做成的；更有那名駒駿馬，到京時，已瘦得太不像樣了，餓死病斃的便有許多。當利公搬進四夷館居住的時候，便在那裏遇到十來國的代表，和他們相結識，特別是西方某回教國的使臣。他們知道歐洲印度波斯有許多事情，如威尼斯人，大蒙古，奧默茲 Ormuz 等的情形，因此，對於天主教的事情，他們也不會不知道，他們帶了翡翠來進貢，但這却是璞石，不是琢成的翡翠。最好的可得賞銀八十兩，次的可得五六十兩。這一次回子還帶來了從中國邊境買來的大黃，在北京轉賣，每磅不滿制錢二文，回去的時候就帶了一千箱綢緞，和麝香等許多中國貨物。他們在北京居留的時候，每天所得的食品簡直是車載斗量，除了被四夷館的吏胥剋扣外，剩下的還是那裏富足有餘。他們來的時候，理藩院派官

員設席接風，收拾動身的時候，又給他們餞行，席間還有戲劇和音樂；他們帶了粗大的棍子進館，作防身器，不讓下人們剝奪他們名下的生肉或是熟肉。

理藩院的官員們曾吩咐特別優待，但教士們對於這種奇特的住所却毫不感有興趣。館裏的主管人員還騰出幾間官舍讓利公等安頓；床鋪，桌，椅等，應用傢具，色色俱全，還有簇新的綢被。教士們也可以設立一座小堂，作為誦經舉祭的處所。大家對他們表示尊敬。那看守館舍的長官還教他們見面時免行跪拜禮，請他們同桌吃飯。利公等為表示感謝起見，便替他製造幾種曆算儀器，如羅列全部星象的渾天儀，地球儀，和四分儀等。他們進館的時候，沒有請他們吃接風酒，因為他們不是經由禮部衙門的正常途徑來到的。果然，未嘗沒有人要替他們接風討賞，但利公婉言謝却，說他們修道人不是要吃這種酒席的人，情願給些賞錢，免了酒席！

過了兩三天，就有人帶他們去正式謁見皇上，說得更確實點，是去朝謁皇帝的寶座。天還沒亮，利公等就奉召到了皇城。的南門天安門，等到東方發白，才跟着用御象開道的儀仗大隊，到了正中的前庭。地方大得了不得，可以容納三萬餘人。他們到了這裏，抬頭便見那金碧輝煌的五鳳樓，在午門上而矗立着。這裏有五道城門，用象守衛着，進門便是大內和設着御座的象大殿。凡是奉旨入覲的人，都要把姓名履歷在一個手摺上寫明白，又該穿上紅色的朝服，雙手捧着一塊兩掌長四指寬的象牙笏，遮住自己的嘴。上朝的禮儀莊重遲緩，有贊禮官在旁發令指揮，弄錯了就得責罰。大家先跪下，俯伏叩首碰着地，然後彼此相對鞠躬。這一切做起來十分複雜，利公等就預先演習一番，由館中執事給他們指派幾個中國回子，供他們演習。『因為他們把教士們認作回子的同胞。』

朝罷回來利爾二公便去謁見那時署理尙書職務的禮部侍郎，可是他們晉謁的時候聲明自己在本國原是讀書人因此要求准予按通行的布衣禮晉謁。這位侍郎總算賢達，當下就准許了，接見時十分客氣。他們兩人告退後便回到宮裏去了。四夷館的主管長官也請他們去正式拜會，相見時，他很恭敬地鞠躬答禮。這是個異數，因為他對於外國人，便是有大權的使臣也從沒有這樣做過。

這幾天，和以後幾天中，理藩院派來的信使絡繹不絕，因此利公等忙得不得開交。他們來查問教士們帶來的貢禮，但適當兒利公等除了幾部書幾樣小東西之外已是一無所有了。蔡正卿又派一個書吏來問他們到中國來的本意。『這回他依法向教士們提出質問。利公等也就不願再加諱飾了。他們於是據實直言，更用書面答覆，說他們奉了長上的命來華傳佈天主的誠律，他們進京納貢是要向皇上表明臣服，因為他們已在皇上的國境內住了多年；他們不想做官，也不要賞賜，只求皇上加恩准他們依舊住在中國，或者住在北京，悉聽皇上處置。他們又為說明自己的意志起見，送去了一本華麗的經本和所著中國文的論道書。蔡正卿便收下了這本教理書，却把經本送還。』

以上所引的原文，可見得是特別重要的引據，因為這些記載，證明利公和他的同志們，不願意處於稜稜兩可的地位。不料那姓蔡的聽到了這些話，便上了一本極不利的奏章；他雖然關防嚴密，可是奏本的內容依然被利公知道了，大致如下：

『利瑪竇看來是個遊方養的人。他自稱大西洋人，查禮部會典上有西洋瑣里國，沒有大西洋。這地方的真偽不可知。他寄居二十年才來進貢，則與達才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他又不遵國法假手馬堂內監入貢。查國家定律，凡是外國人，來到後該先向本省督撫報告，再由督撫奏聞，請旨定奪，然後准其來京。但此輩既是外國人，不習中國禮法，尚可從寬不究。再則他所

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像，既屬不經，所帶的東西又有甚麼神仙骨在內。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那裏還有骨，這正是唐朝韓愈說的「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的東西，因此，我們以為這些貢禮不應收納，也不該許利瑪竇留住京師，却該把他遣回廣州。該處地方官相機打發他搭船回國。皇上不妨賞他冠帶朝服，再加幾匹綢緞，龐迪我也賞他幾疋綢緞。他們的貢品不妨估計價值價付銀兩。」（註二）

皇上看了這本奏章，並不回報。這就使理藩院的官長叫着不逮因而懷疑到利公有太監們從中相助打得通宮裏的關節。官場中便起了紛紛議論，對理藩院大加指摘，說他們待利公太不客氣了。於是理藩院堂官只得在利公前大獻殷勤，央他轉求皇上息怒，使這件公案早了些了結。四夷館的長官也一反常例，讓利公隨意出入，却常派四個人跟着他名爲保護實則監視偵察他的行動。利公便得和朋友們重行相見，向他們請教求助；有幾個一聽到他在四夷館還先來拜會。那位吏部堂官焦謙叔接見利公時，更見得殷勤親密把他留住了三四小時，使他的僚屬門客稱奇納罕。一個月過了，皇上還沒有批下。理藩院長官便覺惶恐，只得再上一本，請旨核奪。這回的奏本就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了，語氣緩和得多，不敢再說太監的不是，對教士們不該逕自納貢一層，也替他們辯白，不再根究了。利公也得到了一份抄本；奏章上的話大致有利，只是沒有提起那主要的事情，沒有奏請皇上准賜留在北京。

奏章上措詞的用意，在說明利公在京日久抑鬱思歸，再住下去就要害病，好比「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又說利公本人只願奇跡山林，區區禮物，不足道。因此，具奏人的結論是請求把他遣送到江西，因爲住在那裏高山幽谷的人，大抵都能享高壽。」（註三〇）

據太監們說，皇上要利公留在京裏，也許是因怕他洩漏朝廷的機密，比方這個突厥人，自從來京進貢獅子以來到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皇上却仍不准他回國。一班管自鳴鐘的太監也怕利公走開，因為皇上還酷愛着這幾座自報時辰的鐘，只要稍爲出了一點小毛病他們就該倒霉。他們曾對利鹽兩公講，皇太后要看那小自鳴鐘，可是皇上把它帶在身邊晝夜不相離，怕太后要留下自己使用，便命曆士們把它送到她寢宮裏，却鬆了發條不准擰上。這鐘在太后宮裏放了幾時，太后便差人送還了，說：『我原想這鐘自己會發聲的呀。』太監們懂得皇上的意思，便不敢把其中的秘訣告訴太后。

這樣皇帝和禮部臣僚間就起了一種暗鬪：皇帝沒有部臣依法題奏，不使下旨准利公留在京師，部臣幾番具奏請旨，雖則對利公越發恭維了，却總不提一句准他留京的話，因此連上了五本，都給萬曆帝留中不報。利公想到自己久羈夷館，大失體面，便決計乞助友好，請他們居間斡旋向禮部堂官說項。末了，那位祁光宗便挺身出馬，仗義執言對四夷館館長嚴辭切責，問他爲甚麼還沒有把教士們釋放回寓。這位館長原由光宗保舉得官，不敢對他唐突，推說利公等來京納貢原該由禮部題奏，不應假手內監進呈。姓焦的聽了便勃然大怒厲聲說：『誰不知道馬堂這人當路殺人，通國大臣們一個也奈何他不得，你們何苦拿這個無告的夷人出氣？他要經你們的手給皇上進貢，却不能抗拒馬堂呀！』館長於是不敢違拗了，便命人通知利公，教他提一個稟帖只說：『身子不適必須出外治療。』經過了這番手續後，館長便發下一張准狀，准他自去賃屋遷居，每隔五天，派四個差役給利公等致送同樣食物供給五天的需要，酒肉，米，鹽，蔬菜，木柴（每月的供給約值八兩多銀子），另外派一名公役，去給他們當差。一六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利公等一行人就安然出館了；從此他在中國不但可以自由安居，還因着享受公家的供應，得到了一種半官式的保護。這是在他到北京後四個月被羈禁後第三個月中發生的事。

他一朝脫出樊籠便打算以後不致再蹈覆轍的方法；恰好有一個在南京時候認得的老朋友此刻已陞任到北京管着呈遞章奏的職務，利公便趁此機會，上表懇求皇上下旨正式批准。他表章上的大意是說：『外臣仰慕上國風光遠道來到中國，在上國安居已有多年。是以臣等於去年進京貢呈微物，又特進呈天主像，藉恭祝國泰民安，皇朝康樂，用表敬愛陛下之微忱。』臣等乃世人沒有子孫，故不求官職，不願邀賞，倘蒙在京城內外賜一容身的處所，於願已足。』

皇帝的批答依例應由禮部轉示，因此不便批回。但大大監們却已告知利公，說萬歲爺不願意他動身。利公聽了如奉到了聖旨一般，便在城內最衝要的區域租下了一所房屋。看來這就是在西城南門，離開宣武門（那時的順承門）不遠的地方。這一帶有幾個大衙門，如吏部等，沿着那直達天安門的宣武門大街夾道林立，正是個最熱鬧的去處。

這就應了大詩人的話：『你盛時就有許多朋友。』多虧朋友們竭力幫忙，利公就這麼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夷館的牢籠，還要由公家替他按月付租供應，這種光景對於那多方作難他的禮部衙門，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勝利。以前對他反眼不認朋友的人，這當兒，便也趨炎附勢，替他揄揚稱道了。那時北京雖有偉大宏麗的宮殿，寬敞的街道，勝過南京，却因人口稀少，不及南京的富庶繁盛；不過北京是全國的首都，行政的中樞，一班朝覲述職，候委銷差的官吏，和駐防徵調的軍隊特別多，當然爲南京所不及。利公久居中國，走遍南北，相識的人着實不少，這時候，他的朋友們便個個齊來向他道賀。理藩院的蔡正卿也就順應潮流，差人通知利公，請他們去拜會。他接見二公的時候竟客氣得異乎尋常，並表示『無論如何，偌大北京城，多個把外國人，總可以容納！』從此，他就做了利公的好朋友，不再作難。因此，教士們便以爲從前在南昌和南京時候的好風光，重現於今日，而且比那時更風光了。史家李葛蒲曾記着：『這一年，邀請利公赴宴的特別多，有時候一天要有兩三席；利公應

接不暇，却又不能謝却得罪人。宴會的性質中西一律，凡是知道歐洲情形的人誰也不見怪。但作者曾一再聲言這種宴會往往爲討論正事而設，又這地方的規矩，席上的餚饌，不容大嚼，賓客們大抵在家裏吃了飯才去赴宴，（龐迪我說這些宴會要經過五六小時才能，可是我們宴罷回來，還覺得肚子餓）然而利公等也知長此徵逐太無聊，便漸漸托故辭謝；到如今除了偶然因有重大緣由，非去不可外，便不再應邀赴宴了。在這異教國家開教的時候，教士們要在中國地方上立足，就不得不和當地官紳周旋酬酢，因此，他們自應有這種適合權宜的自由行動。且不說利公這樣耐着悶氣，去敷衍一班大人物，心裏究竟願意不願意，是不是想趕緊擺脫，可是他總不能教人家不來邀請呀。

這時候，他真可謂盛極一時了，每天來拜會他的大人物絡繹不絕。車馬大轎，塞滿了一街。最初四個月中，各部院的長官都來和教士們攀了朋友。利公也分別給他們餽送些西洋小禮物，沙漏，各式嵌貝的小匣，洋刀等。當朝首相沈一貫（蛟門）位極人臣，爵高權重，他也得到了利公的餽贈，其中有一件是烏木精製的日晷儀。當利公登門謁見的時候，他接待得十分和藹，還留他吃飯，席間利公談起歐洲奉教國家的風俗民情，講到一夫一妻的制度，沈閣老便大加讚歎說：「別的事情也不用問了，單講這一點，就足見貴國道德極高尚，政治極昌明啦。」利公告辭後，他便差人餽送幾疋綢緞和幾件很珍貴的皮貨，共計值銀四十餘兩，作爲答禮。他的公子也和教士們等非常要好，利公便送給他一個三稜鏡。以後沈閣老又做了八九年首輔，對教士們妥爲保護，始終不渝。這樣就應驗了利公在韶州幽居晦跡時對黃明沙修士所作的預言：「有一天，你要見我們和閣老們相對共座呢。」那曾在韶州做過官的某教友，這時候已上了年紀，却能自視利公在京受人尊敬的盛況，便說：「吾主天主因着神父在我國勞苦功高，飽受凌辱，備嘗艱苦，才許他享受尊榮，這些話說得真有理啊。利公當忍受一切艱難時最是

使人注意的，便是他的勇氣和毅力。雖則時違運乖，障礙重重，却仍專心一志，尊守着他當初廁身中國社會時所定的方針。他從澳門到肇慶，再從肇慶到韶州、南昌、南京，都是抱定宗旨，始終一貫地這樣做去，每到一處，便憑着以前的經驗，借助着以前的朋友，急起直追，補償因往來酬酢而損失的光陰，使他所有的計劃從速實現。

他到北京後的情景也正是如此。因着南京刑部侍郎王某來相訪問，利公便認識了北京刑部尚書，後來轉任兵部尚書的蕭某，以及那名滿京華賢而好禮的名士吏部侍郎馮琦。這三位大人物在某次席上和利公締交便發生了很密切的友誼；以後就常見他們到利公寓所來訪問。尤其是那位吏部侍郎馮琦，更見得和利公情投意合。他「喜歡和利公論道就學，得了該怎樣恭敬天主的正道真理，以後他更孜孜不倦地轉授他人，把所有種種謬誤的理論力加駁斥。」他和利公一朝相識，便趁他陞任禮部尚書管轄着理藩院的機會，明白核准教士們遷出四夷館，另行賃屋安居的前案，又因「館中執事們不懷好意把所有應該供給教士們的酒肉弄壞了才送來，便命改折現銀，因此每月的供應，就加了五六兩銀子。京師物價騰貴，又和澳門相距很遠，匯款不易，此舉却使利公等受到了實惠。至於教士們受朝廷供養，因此聲望及於全國，那更不消說得。」利公爲答謝這兩位尚書的雅意起見，便製造兩個地球儀，連用石板做成的日晷儀分贈他們。此外又有一位年高望重的吏部尚書，是湖南人，也喜歡和利公論道，彼此相見，往往要談論多時，講論着「世人所當敬畏，和希望於身後的事情。」利公便把自己與這位尚書和馮尚書的談話演譯成爲兩章，編入自己著述的天主實義。

來訪問利公的有名人物還有許多，其中有兩位是南京的老朋友顧明龍（？）和楊景淳。他們都是飽學的名士，不時奉旨晉京，先後陞任了禮部侍郎。利公會給他們製造地球儀、日晷儀和其他曆算上應用的儀器。他們也不住向人誇耀着利公

操守謹嚴，學問淵博。有些人還因利公博通中國學術，說他堪膺教宗職位。楊景淳原有一個奉教的兄弟在廣東做官；他見這個兄弟有幾天守大齋，便開始對天主教表示景仰，那時，有一個文人做了一本書，其中有幾處對天主教妄肆譏評；楊景淳給他解說，教他改成讚頌；這件事他竟沒有對利公等提起。後來利公從別方面知道了，便從這有心的舉動，看出他真是個知心的朋友。於是這班提倡道德，維持倫常綱紀的官紳名士都來向利公請教了；那些下流俗子，經過他的門，就差不多連看都不敢看一下，要等到教士們諸事妥貼，可以有閒傳道的時候，才能領受福音，因為那時傳教是不禁的，便是最微賤的平民也可以學習，利公的寓所雖則和大人物的公館一樣，常開着大門，却沒有一個鼠竊狗偷，敢冒險混進去。

利公門庭若市，來訪問的不僅是一班官紳，也有幾個皇親國戚，帶着護衛儀仗簇擁而來，還有本城的武官和其他各色人物，以及那和教士們相熟識的太監們。幾時宮裏的自鳴鐘出了岔子，管鐘的太監，便拿到教士們的寓所，請他們修理。這就得放着兩三天，修理時，那些和教士們要好的官紳，便約會了朋友，齊來看這西洋奇物，一廣眼界。後來，皇上知道了，就不准再把这些鐘拿出宮廷，有了毛病，必須召教士們進宮修理。這就使大家知道皇上對利公等眷顧特隆，待遇是何等優異呢；因此，京中便起了一種謠言，說神宗久不臨朝，閣臣們極難一見龍顏，教士們却能隨時奏對。這種謠言一經傳遍全國，就不容易闢除了。漸漸教士們就得到了皇上的欽准，每年按時入宮四次，不必專等奉召修鐘才許進去，太監們也格外優容；他們進宮的時候，不妨隨帶順便來京的神父們，和手下同事們，同去參觀，教士們却不曾利用這屢進深宮的機會，給我們留下一篇描寫禁城情狀的詳細記載，但利公在自己的筆記中，講到北京的情形，說來比較直捷一點。他記着：

「京城南面，築起兩道崇垣，寬二十尺，可容騎兵十二人並列馳驅，都用大號城磚砌成；底下用大石堆壘做城腳，城基並

不深厚，中間填滿磚瓦泥土。城牆極高，比了我們歐洲的城牆要高得多。城頭上常有官兵守望着，像在戰時一樣；各城門都派着太監收稅，北面只有一道城垣。

宮城在內城裏面，從南門直通到北門，似乎佔着內城的全部，把全城分作東西兩城。人民也就在宮城兩旁，東西城分隔居住。這比南京的宮城小一點，却華麗得多，因為歷年修繕，更見巍峨宏麗，金碧輝煌，南京的故宮，却已年久失修日趨頹敗了。

利公還注意到北京泥濘的街道，說：『常有塵土泥漿，又因雨水稀少，泥土乾燥，稍為有了一點風，就到處塵土飛揚，刮得滿街滿屋都是土，教人沒法躲避。因此，人們一出門，慣常頭上總得蒙着黑紗擋灰塵。這也省得我們沿路遇見了熟人要打躬作揖，不住招呼問訊，免去了許多麻煩。這樣，神父們就可以隨意上街遊覽了。』凡是繁盛的地方，差不多到處可以僱車，租驢馬，那趕車馬的，在偌大都市中來回往返，竟不會走錯路。坊間也有印製的京師地形圖，測繪得很完備。僱用轎子，費用要比南京大，一般生活費，也不低廉；木柴缺乏，却多白煤。到了冬天，家家戶戶，都能燒坑取暖。本地人不像江南人文雅，北方人體格魁梧，善於作戰，可是文章學術的天才，却差得多。利公的筆記中，還講着那時京裏所有種種政治陰謀，和朝臣各立門戶，互相傾軋的情形，這在我們要比這些關於風土人物的記載重要得多，其中遺聞佚事，很值得我們珍視。他也許見過魏忠賢，那時他還是個無聲無聞的小太監，後來却做了攪亂朝綱權傾人主的大奸慝。這原是件事中事，因為那時忠賢已仗着太子常洛的親信太監魏朝一手提舉，做着東宮王選侍的總司膳了。魏忠賢生於一五六八年，出身的地方，便是那專出太監的河間肅寧，家裏窮得甚麼都沒有；大了以後，却生得相貌堂堂專會阿諛逢迎，又精於騎射，愛吃狗肉，愛喝酒賭錢，欠下了一身債，無

力償還，便逃到京裏，在二十二歲上，淨了身，到宮裏去當差做太監，想碰碰運氣。憑着他一副諂媚逢迎的手段，就漸漸得勢了。到後來神宗駕崩的時候，他的羽翼已成，不久便擅權竊柄，掌握全國大權，橫行天下了。

利公在京的時候，國家大事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一切正趨向着滅亡的道路進行。朝中的賢士大夫，守正不阿，便互相結納，開始和宦官相抗爭，却不能和歐洲的大政黨一般，有堅強穩固的組織。那時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提倡氣節，四方學子慕名而來，因此十分興盛。一班守正的朝士，便都歸附東林，成立黨派。其中有一位最有骨氣，也最有胆量的，叫馮應京，字慕岡，是安徽鳳陽人，中了進士後，先在京裏做過幾任官，後來外放，任湖廣按察司衙門督理（？）。利公說他居官清正，生平最恨貪污，提倡公益善舉，斷獄極公允，且又嘉惠貧窮，矜恤孤寡，這當兒，神宗派宦官到各省征收貨稅，和開礦，這班稅監就借此掠奪民財，到處橫行，肆無忌憚，人民受他們的荼毒，猶如遇到了地獄裏的惡魔。其中有一個最兇橫的是湖廣稅監陳奉。一般趨炎附勢，只重個人祿位，不顧民生痛苦的地方官，對這太監一味逢迎，任所欲為。却有幾個忠誠盡職，剛正不阿的人，不但不讓稅監橫行，還要在章奏中據實力參，大加指斥。應京更對稅監陳奉和他手下的黨徒痛加裁抑，從這班虎狼手裏，救出屬下的吏胥平民，又臚列他們的罪狀，三次奏請皇上懲治。可恨陳奉橫行，激成民變，反在皇上前進議，說是應京唆使人民抗旨作亂。因此，這回決以死戰的結果，還是應京吃了虧，被萬曆帝下旨革職擊問，解京大受杖責；接着就下獄監禁，不准親屬人等探視交談。這場大禍，應京原是料得到的，一切苦難，他都勇敢忍受了，却因此人人敬愛，尤其是湖廣舊屬的人民，刊印了許多書冊，頌揚他任內的德政。一班受恩人家裏，供着他的肖像，恭敬他如聖賢一般；地方上還循例給他起造生祠，供着他的長生牌位，祭桌上擺着香爐燭台。民衆提起他的名字，沒有一個不讚美。當馮應京在湖廣做官的時候，利公正在南昌和

南京兩處。也許利公的「交友論」那時已由李贊傳到了湖廣，因此，應京聽人提起利公的名字，向他極力揄揚，推崇備至。他一生公忠體國，關懷的無非是國計民生，便想到如今曆政廢弛，謬誤百出，正該加以修正。他於是派他的門生劉應忠（？）前往南昌、南京兩處尋訪利公，拜請受業，却不料訪到南京，利公早已動身北上去了。後來應京解京問罪，帶着這個門生同行，到了獄中，便吩咐他們但等利公搬出四夷館，就敬備修金前去執贄請見，求他收在門下。利公也知道應京清正的令名，那時他還沒有定罪被禁，所以利公見了名帖，立即前去拜訪，安慰他。他們倆初次相見，便談了一小時，訂下了極密切的交誼，使全國士大夫知道了不禁稱奇納罕，交相稱道，以爲他們倆原是老朋友。以後，應京被幽禁的三年中，和利公互通音問，書信往來不絕，他雖然待罪獄中，仍把利公的事情當作自己切身的時候，利公也是如此。因此，他自動給利公的交友論做了一篇極好的序文，托人重爲刊印，把底版送給教士們保存；事前，教士們一點都不知道。接着他又做了幾篇序把利公的四象論和其他關於曆算的著作以及兩幅世界輿圖連別的作品一併彙集了，刊行問世，在序上稱利公爲西儒，更稱爲博學鴻儒。「這原是極尊崇的名稱，所以後來便有許多在著作中提起我們的作家，沿用着這個稱號，因爲這個名稱既經這樣有道德，有學問風骨凜然，功業彪炳，名滿天下的大人物用過了，就誰也不敢下一貶辭降級相稱咧。我們不圖享受這種尊榮，但我們爲耶穌會的令譽，和聖教會的聲名着想，也未嘗不引爲欣幸咧。」應京又教利公等繪製極大的星象圖，「長度有一步，寬闊相當」由他自己出資付印，只是後來，爲了某種緣由，不曾刊板付印，「最使我們的重視的，却是那後來印在利公的天主實義篇首的一篇序文。他憑着淹博的學問，典麗的文章，講出釋道兩教的許多不善，和天主教的種種好處。他在獄中，還沒法幫我們追回以前我們將到北京時遇險翻船後，被人掠奪的，那幟價值極大的鍍金大聖像。」他在獄中獨居無聊，便讀着天主實義。

一書和其他的教理書，從事研究天主教道理。却教住在外面的家裏人先行領洗，教士們會送給他一幀救世主像，他就每天對着這幀像恭敬朝拜。末了，朝臣們交章論救，他終於獲救出獄。可是他出獄後在京裏只得兩三天，來訪的人又那麼多，使他不能應接，所以利公等和他只見得一面，就分手了。教士們原想約他到城外村子裏給他付洗，可是爲審慎起見，還是等他回到原籍後，讓南京的神父們去見他，給他施行這件聖事。不料他回家後，就突然逝世了。「盼望天主因着他爲我們出力効勞，又懷着偉大的志願，對聖道竭誠贊助發揚，亟願歸依，就許這願洗的心代替領洗的聖事，因而救得靈魂吧。」

還有一位很替教士們出力保護的賢士，這便是我們前面說起過的杭州李之藻，他也是東林一份子，攻擊奸臣太監弄權竊政的清流。利公在北京遭遇困難的時候，他也來替他策劃援助。那時他官拜南京工部員外郎，却駐在北京，因此得和利公繼續討論學術。「第一，他把利公的世界輿圖盡量放大到一人多高見方，分刻六塊木版重新付印，預備印就後可以製成六扇屏風。利公也在圖上添幾個小國，又在空白的地方題署，並有某某三名士題詩誌盛。第二，他讀完了克拉維神父 (P. Clavius) 幾何學的大半部，又學得了測星高下法，自己也試了一次測繪工作。他把這兩門合併講論，刊印了兩本測星論。第三，他襄助利公翻譯克拉維神父的數學應用法，竟是過目不忘；他從事這一切的工作，目的只在替利公等揚名。他終於決定請求領洗了，却只差得一步，因爲那時他有幾個妾，成了一種無法補救的障礙；後來一直到一六零九年聖誕節前才受洗。可是這却並不妨礙他所有和教士們密切相契的關係。

利公也利用自己所處的地位，直接傳揚天主教道理。到了一六零一年六月十日，他就給兩個北京最先的新教友付洗。這時候他就不怕有人猜疑他組織秘密會社，設法在民間創立天主教會了。他的同志們更特別提起利公常把這件事掛在

心頭，百忙中總要揀一個平民百姓留住深談似的，故意和他計議，談得比和別人更長久，更客氣。這未免要惹幾個不懷好意的人說長道短，但他全不放在心上。他在自己的筆記中曾講：「的確，便是在北京，有些人因為妒忌我們叨被皇恩，或因恨我們公然攘斥釋道兩教，或因怕我們假名傳授新宗教，聚衆危害國家而有意加以干涉。這全是一班大人物的事，平民百姓那敢反對我們。兩三位最有力的達官顯宦會力排衆議，說我們教士們許多的好處，以及我們所講的道理，不論是屬於宗教方面，或是屬於學術方面，也就都說是好的了。再則有許多人見我們不時奉召入宮修理時鐘，就覺得心虛胆怯，總以為皇上待我們很優異；有人得罪了我們，皇上就要震怒的。」這樣，利公等在中國一朝得見天日，就利用他們所有的自由環境，開始進行傳教救靈的宗徒事業了。

〔註一〕四夷館原址在今東交民巷東方匯理銀行附近。

〔註二〕萬曆二十九年庚午二月（一六〇一年三月卅一日）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及行李，禮部奏皇中有「自稱天主及天主母親既屬不經，而所攜又神仙諸骨。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四續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况此等土物未經臣部譯驗逕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請審朝貢例有回賜，使其臣必有賞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等語奏上不報。

〔註三〕是年八月（一六〇一年八月八日）禮部，又奏：「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輪音，毋怪乎遠人之鬱思而病也，察其情詞懇切，真有不顧尙方賜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茂谷，寄跡怡老。」

第三章 荊棘地帶的開拓

利公獲得了這樣有利的效果以後，華南的禮華民傳教士已乘機利用，不過把利公的方法酌加變通罷了。當初利公定下方針，努力進行孜孜不倦，雖則迭遭挫折，可是他自出心裁的傳教方法，却沒有人加以非議。澳門和印度的神父們，見利公定要打破這打不破的難關，却能忍耐着，笑他固執的，諒必很有幾個。他的同會羅道夫亞瓜維伐奉了上峯的命令拋下了大蒙古王亞克巴，後來在薩爾賽德（Salcedo）島上得到了致命的光榮，不見得是個更好的主意嗎？耶穌會中很有幾個必以為從超性方面看來，還不如教利公丟開了這堅拒基多福音的中國，到別處去効勞努力。比方在日本，教士們大有收穫，領洗入教的，動輒數千人。想不到利公此番進京，成功出乎意外，種種情景大非昔比，便是那最倔強的遠東教士們見了這些事實擺在眼前，也就不得不換上一副正經面孔，把以前目為愚駿無聊的舉動，重新估量一番。

可是基本的問題又在另一方式下發生了：如今能不能按着利公所用先求接近的方法進行呢？貝克氏（Becker）曾論：『一般真正的基多信友們，深知天主教教化的種種好處，對於沒有真宗教的國家民族自該認為一種最大的禍害。所以不拘那一個都容易懂得只要有人昭示信道真理，必然要引這些沒有信仰的不幸人民誠心向化；他們一朝出暗入明，得見自己擺脫了那聖經上所稱的黑影，真是再喜歡沒有了。對於這些採用講道傳教的方法，表面上，看來也許太講本性，太重人情了，慣常至多能發生一種虛偽的歸化，只講外表，却不能深入人心；他們心理還是和以前一般，依然是異教人的心理。』

有人要說！而且竟有人說過了『純屬人類本性的方法完全不合於傳教的精神對於真宗教得益少而遺害多』一遇到艱難，所有成績便烟消雲散；教士本人也因此失却了信仰，和依恃天主的信心，反去靠托自己，依賴人爲的方法。做教士的萬不應獵取權勢，如同積財致富，講究體面排場，和世俗大人物周旋結納等事。這原是聖教元首的意旨，即使用了這種方法，確有廣揚聖教的希望，也所不取。』顯然我們不能責備利公用了這些只重人情的方法；那些不全是講人情，也可以說是兩可的方法，他也未嘗不會同樣應用過。如果傳教士的宗旨在拯救人靈不多耽擱，那麼他先設法和人接近，怎見得不是一種好策略？如果傳教士所用的方法確然是很正當，很光明的方法，我們也承認他原該循着這種方法，按部就班，緩緩進行，那變，他入朝納貢，希圖獲得異教君主的禮待，締交賢士大夫，和他們周旋晉接，給他們教授天文，地理，曆算，諸學，這難道不合他遠度重洋的初旨，免得他虛此一行麼？

利公在華開教時代，却有一位著名的傳教士堅持着這種反對的見解；他的成見，在他以後在華五十餘年傳教救靈的工作上，多少蒙受影響。這位便是利公的同會龍華民司鐸。他是義國西錫蘭人，出身貴族，可是家裏却窮得連他姊妹進會修道時應繳的一筆生活費都繳不出，所以他小時候，和大了以後，不會上學讀書。後來他到了二十六歲上，才於一五八二年，去見梅西納的初學院院長額思格略神父請求收錄入會，在他的指導下受訓學習。過了兩年，他便在巴勒默公學中在薛拉古薩神父前初次發願，便又補習了兩年拉丁文。他匆匆晉陞了鐸職，便在母校教授拉丁文法，差不多又過了五年。也許羅明堅司鐸從中國回到歐洲和他談起中國教務，因此，他就表示了傳教遠東的志願。到了一五九零年，他的省會長斷定他的體格和熱心神火都很好，又估量他不難循例讀完四年神學，却只要他攻讀兩年。事實上，他對這種高級訓練不過稍爲下一

點工夫，「因為他已屆壯年，不能再考博士學位只得竭力自修，以補不足。接着他在梅西那初學院完成第三年卒試，做了兩年初學院副院長，又在某公學做了一年理學，自恨幼時失學，忙中偷閒潛心誦讀，專門研究聖經，勤攻先輩聖學神師的著作，到了四十歲，他終於經葡國副省會雅伐來神父保舉，得亞瓜維埃總會長核准，派往海外傳教。一五九六年四月十日，他和十八位同志，便由那後來繼續范禮安做遠東教務總巡閱的畢蒙達神父率領，分乘三船出發。他們在海洋中遇到了大風浪，三艘船就此飄流失散，一艘竟飄到了巴西。龍氏搭乘的船行駛了將近七個月，才到印度；他在途中害下了一場大病，病勢沉重，看來沒有希望了，便領了臨終聖事，以後，一連十二天昏迷不醒，可是據他自己說，他「蒙主垂憐，要他等那極生的果子成熟。」那時，他正當年富力強的時代，「身材超過中人，頭大顛圓，軀體相當長大，四肢壯健有力，額廣眉展，兩眼極大，鼻高而合度，兩頰豐腴白淨，却易臉紅，神色溫和愉快，頭髮豐厚，色如金粟，發音寬洪響亮。」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歐亞登陸，差不多一到就在古林和浮那兩地方的各會口，開始工作。因此，他的傳教事業先在那薩爾賽德島上所採用的特殊方式的啓迪下，着手進行。這裏，地方官長對天主教徒往着實贊助，因此惹起迷信回教徒和佛教徒的仇恨，終於釀成了流血慘劇。

龍華民住在印度的日子並不久；下一年（一五九七）他奉派前往日本傳教，便開始學習日本言語，於四月二十三日和范禮安自歐亞乘船出發。七月二十日，他到了澳門，正當中國方面需要教士的時候，所以他就奉命留下了。他曾說自己這回調任「只覺十分欣慰。因為這全是天主親手安排的；到這裏來傳教真是再好沒有，教人那得不願意。從前沙勿略方濟各多麼願意攻入這個緊閉的堡壘啊！」

天主教上智給利公打發來的助手便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大家看得出這位助手和利公大不相同，他已有了處世的經驗，

恐怕全憑自己的見解，把煩雜的事情看得極簡易，始終抱定樂觀主義，後來要在中國幹下一番大事業，活到九十八歲才去世，晚年，一般人，比方一六三一年的高麗使臣們，見他銀鬚白髮，道貌岸然，好像活「神仙」，都不禁肅然起敬，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初到中國，正在壯年時代，不久，便膺繁劇，却能勝任。不落人後，他於一五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趁着廣州互市的機會，由鍾巴相修士陪着動身，過了九天，便安抵韶州。他到任後，便和兩位初試修士多明我孟台（Dom. Mendez）和安多尼李道（Ant. Leitao）從事學習中國言語，接着便設中國經書，用利公所著的拉丁文註解，和譯成華文的拉丁書作為指導，要讀四年畢業。他初來時，正當冬季，對於歐洲人特別相宜，他住了幾個月就有信到歐洲，說：『我進會後，從沒有這樣適意，空氣，飲食，風俗，人情，看來都很相宜，教我適應這種環境，一點不覺得為難；總之，這地方，和在歐洲教友中一樣，和平安靜，不但和外界往來是這樣，便是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中國人奉教極虔誠，這裏也可以像在奉教國一樣，做恭敬天主的神工；：同會諸公只要會講中國話，就可以到各城市各鄉村去宣講聖道，上自朝上的王公大臣，下至鄉村裏的農夫工匠，都可以一一勸化。』這些話，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教士嘴裏，不免要令人發笑，可是像龍華民這樣一位平心靜氣，作事努力的人物，也作這樣的估計，那就不得不鄭重加以考慮了。而且他在先後寄發的許多書信中，一再發表了這種樂觀的論調，（其中有幾篇暢論中國教務很有些真知灼見），還嫌不夠，不久，更把他的理論，付諸實行，做起來竟和利公所有審慎周詳的明智卓見，大相逕庭。

當龍華民在一五九七年底來到韶州的時候，澳門當局以為韶州教務既難發展，這地方又多瘴疫，傳教機關本當裁撤，所以暫時保留的緣故，不過是因前往內地的教士們，可以借此駐足罷了。六個月後（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郭居

靜司鐸 (Citrano) 便趁王忠銘進京路過的機會，率領羅如望司鐸和鍾巴相修士動身北上，去襄助利公。於是龍華民神父就留在韶州單獨主持一切，他學過四個月的方言，覺得自己可以對付得了，便到離城十四五里的鄉間，替一個臨終的病人行終傳。

他雖欣然講起自己初次出馬的情形，說：「我也像初次聽葡萄牙人告解一樣，不帶翻譯去終傳。我在那裏，遇到了極殷勤的款接，料理靈魂上的事情也極容易，好像在奉教國旅行一樣，我們到了病人家裏，便知他的父母還沒有奉教，家裏還有佛堂供着裝金的泥菩薩，我便對他們說了四句話：『這些是魔鬼，只能作惡不能爲善，只有一個天主是創造萬物，掌管萬物的大主宰，我們只該恭敬一個天主。』他們聽了並不答辯，却把這些偶像親自移開了，換上天主像和聖母像，照他們的樣子恭敬朝拜。拜過了以後，我們就分給他們一本教理書。他們當着我們讀了一遍，又問我們天主的誠命是怎樣說法，怎樣遵守等話。隨後他們就去找自己的親戚朋友，不過那時正當收成的時節，沒法教他們齊來會集，只有幾個人來學習道理。」

龍神父在中國住了一年後，便在十一月四日發了一封信，也許是因這回得到了好印像，才敢顯顯亮亮，指摘利公所用的簡接傳教法。他說：

「你們該寄下大批教理書和聖像：因爲使我們在中國人跟前獲得合着我們宗旨的聲譽的，正是這些東西；這不是僅僅拿出幾個三稜鏡和這一類的東西所能奏效的；所以這一類的東西，以後可以不用了，我們不應再向歐洲方面要求進貢中國皇帝的禮物，設法打通門路，我們所要的只是這些教理書和聖像，這些原是最適合我們本分的東西，而且還可以吸引許多中國人，因爲這些東西直接給我們講道誨人的機會，這原是我們要他們知道的。」

這封對利公所用的方法嚴加貶斥的書信是在利公二次北上前寄發的，但便是在利公再度進京以後，龍華民神父還是極力反對給官場中人製造天文儀器，描繪輿圖，和他們往來酬酢，以及其他只重人情的方法，後來，他自己碰了壁才相信。但我們不該誤認他始終一貫地，一味反對着利公的策略，但我們看了他於一五九八年十月十八日寄發，後來在歐洲公開發表的那篇沉長的報告，便知他也曾完全贊同換穿儒服，攻讀中國經書的決議。不過那時他一則不肯採用這簡接傳教的方法，二則還沒有夢想到後來使他到處受人掣肘的種種困難，完全想不到利公所採應付中國讀書人的策略是怎麼一回事。這裏我們不妨把這篇報告中所有表明他在原則上贊同利公意見的各節，摘錄如下：

「我曾於一五九七年十月間，從澳門寫信給亞瓜維伐神父，說明中國人對我們的意見和對於天主教的傾向，以及傳教的方法。我們的名譽很好，尤其是從我們換穿儒服以後。中國人的學術並不過薛舍龍時代羅馬人所有的學術，他們極力在章句間用功夫，用簡約巧妙的詞句來發揮議論，可是他們推論哲理，竟可以說有如亞烈斯多德論梅里索斯一般，『誤在形式上。』」新近有一個儒士勸我讀大學中庸，這兩部書其實不見得比薛舍龍或是諦德利物的著作更難懂。他們說除了中國人以外，誰都懂得，利神父却回說誰都不及歐洲人懂得更清楚。中國人見我們能洞澈玄微，不禁大為訝異。

「我們的朋友們中有一位中試成名已有四十年了，却仍和蒙童一般，在文章上繼續下工夫。他們的品行大致不差，有幾個還行着修省工夫，每天省察自己的良心：書院裏還收女學生。

「中國要守好六條誠律，孝親，敬長，睦鄰，教子，盡職，慎過。但他們不提第一誠，是不敬真神的。一天那位統轄韶州南雄兩屬的道台，到我們寓裏看見了天主像，覺得詫異，便問這是甚麼。我們回說是「上帝」。這原是中國經書上稱呼天主的名詞，

就是說人人都該認識欽崇的，至高無上的天帝，不然，就犯了極大的大罪。道台又問我們這種說法有沒有書籍可看。我們說現在還沒有譯出印行。他就表示遺憾，要求我們等道理書譯出後，快快送給他一本。郭居靜神父在這裏的時候，便已有鄰縣某官員一連兩天同樣要求過我們了。

這封書信滿現着一種樂觀的熱情，要促進他所稱爲「獵獲人靈」的大業，却教人覺得其中隱伏着一綫危機。自從麥安東和石方西兩位教士相繼謝世之後，龍神父便以爲嗣後派遣教士來華，只宜揀那精明練達，在耶穌會中受過完全訓練的人；要在遠東讀完神哲學的青年會士，決不能抵抗這種惡劣損人的氣候。便是他的長上們也是這樣想。然而這種見解個個都反對。要在中國傳教，就得研究中國語文。教士的年紀大了，還讀得上嗎？且看一八七四年羅瑪某會士等給鄂神父的信上怎樣說：「你比我明白讀很深的中國文。多麼乾枯艱澀，令人厭倦啊！是年紀已到三十歲或是三十二歲的人讀過了七九年長久累人的書，一朝見到了神長的園地擺在眼前，收獲豐盈，却沒人工作，這當兒，還要教他們再求兩三年新學識。我說這不是要他們做最難受的祭獻嗎？長上們也知道本省區的教務的需要一天大似一天，他們手下既有準備成就的工作人員，但求從事工作，且又自告奮勇，一再堅請，做長上的怎好拒絕他們呢？在這需人佐理的時候，又怎好不讓他們直接參加，贊襄合作呢？」

以前利公諸事忙碌，又隨處留心，在沒有進京前，不使一班守舊的讀書人感覺不安，因此拒不招徠這些躍躍欲試的青年會士。那位和他志同道合的郭居靜司鐸也抱着這種見解，他們的主張也就得了勝利。但龍華民司鐸却不然。他來華後，過了一年半，便對教士們常聽慣的那句「召赴荊棘地，不得不答應」的口頭禪，表示退讓了；再則，他採取這種傳教法，經過的

時期雖然比較不長久（一五九九年六月至一六零三年六月底）却已學得了許多有益的教訓。因為他也曾試驗出，凡是讀過中國書的教士，便是讀得不完全，不能學到談吐文雅的地步，總能在民間做得「好本行」。以前，教士們對於中國婦女們的心理，知道的很淺薄，却虧這位龍神父打起精神，設法去接近這在中國社會中極難接近的一部份。他也是譚譯，刊行小本經書聖傳的最先發起人。這一切，他要受人贊許鼓勵，加以稱道；便是他的長上，利公本人，也要仿照施行，並聲明自己只因身在朝廷，不克充分從事於這種救靈工作而表示遺憾。

因此，我們從以上種種看來，把當初所有傳教民間的嘗試加以考察，未嘗不足以資借鑑。看來龍華民神父的最大功績，便是迅速覓得穩固的立足點，使民衆同登衽席。前面我們講過他指出六條誠律，多按着平民所有道德觀念的大綱。法國名作家賈伐納氏（Chateaux）會論「皇帝的任務不但在確保人民的生計，還該把倫理上的原則諄諄教誨他們。因此他自任人民的教師把各種基本觀念教訓人民。：我們不能期待鄉野村民有這種卓越的概念，這原是一班自命高雅的讀書人所稱爲愚民的，那會有這些高尚的思想呢？：這些誠律，（明朝時代便是所謂「洪武聖訓」）沒有說明絕對的原則，教人知道爲甚要這樣。這不過教人立身處世之道，使人知道該怎樣在社會上做人行事罷了；至於這樣做法，究竟有些甚麼好處，一點都不說起。其實，中國有兩種渾渾分明的道德觀念，一種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一種是屬於被統治階級的。皇帝和各級官吏處於發號司令的地位，才配照大學中庸上的教訓學做完人；這兩部書上講的道理實在好，至於一般平民百姓，他們的本分只在閉上眼，跟着大衆行動，好像一部鋪排好的機器一樣，開了就轉動自己却不知爲甚要這樣行動。」

「洪武聖訓」中的六條誠律是這樣：對父母要孝順；對長上要敬重；對鄉鄰要和睦相處；子女要教訓；要各自安居樂業；不

要爲非作惡。」這種生活規律的弱點一望而知，賈伐納氏也不會略過。他說：

『民衆的全部德行總括說來，便是做好兒子，好兄弟，好父親，好鄉鄰。這樣規定個人的天職，一方面箝制了人的思想，不讓他估量一下，自己的光景，只教他做一個公衆福利的公具，一方面又禁止他想到有關人類全體或是國家的大事。這種做人的教訓只等於規定義務的法律，好比割了一個圈子教他站在裏面；而且這也並沒有更高的原理做根據，看來不像在謀發展個人的德性，却在引他甘心情願的服從。我於是想到一羣蜜蜂如果要制定一種風紀，也必給工蜂們立下同樣的規律，只教他們爲了蜂巢或是爲了全體蜂巢的福利工作着，無緣無故寫出一大篇幅言，規定他們每天的工作，惟有蜂王才明白何以要有這使社會歸於統一的約法，像中國皇帝一樣。據我們看來，戴（Mieer）神父的議論，足使我們更明瞭天主教傳入中國後所有的益處範圍。他曾論：『大家每每嗔怪中國人所有那包括全部倫理的「五倫」，何以少去了一個頭。五倫說明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關係，却絕不提起天主和人類間，造物主和受造物間的關係。我也承認中國人果然沒有在五倫中規定這第一重要的大關係，但我看來，他們却已把這層意思包括在「天子」兩字的名詞中了。這原是中國皇帝最適當的名稱。中國皇帝和教會元首一般，代表「天下」人民站在人類和天主中間，用全體人民的名義恭行「祀天」大典，感謝上蒼的恩佑。我以爲有了這「祀天」的大典，就可以使全國人民對於人和天主間的關係獲得圓滿解決。』

可是這些話說得還不明白，中國教訓平民的道德倫理，其中有一個漏洞，不免使人在良心上深感不安，便有那神道教教的教門尤其是大正佛敎來填補。龍華民神父看出了這種人心的需要，便着手進行他的宗徒事業。他在韶州城外相距不遠的馬家（？）村（註一）開教，事前派鍾巴相修士先去佈置，向村民預報不久就有一位西方遠來的傳道師，來開講宗教

事理。龍神父到了以後，大家就齊來聽講了。神父坐在一張桌子前，先說自己從極遠方來，傳授天主真教，世人可以因此自救；接着便講天主十誡，在一處清靜的地方，敬供救世主聖像，說：「這麼好道理，正是天主親自教訓我們的。」他命人在聖像前焚香燃燭，大家就一齊跪下了。來聽道理的人許願以後，便要棄棄佛像，只認得創造人類的天主；末了，神父便給那讀書識字的分發幾本教理書；他們也答應自己去學習，要在神父下次再來前學畢。他們朝朝攻讀了好幾天，便領洗入教了。神父給他們付聖洗，又分給他們銅聖牌和「天主羔羊」白蠟像，給他們做精神上的武器；「有幾個新教友參加這領洗大典禮的時候，還帶了許多驢從，備了鼓樂，前呼後應地簇擁而來。這種光景便是龍華民神父在「荆棘叢中」所度近四年活躍生活的開端。曾有一位去世極早的耶穌會青年會士講起這位頭角崢嶸的傳教士，所有這些令人仰慕的事蹟說：「這位教士生平有一種外行和內修，而且「有諸內，必形諸外」，總是相與表裏」的，我們看他表面上極活動；不住下鄉奔走，舉祭，聽告，付洗，行終傳，講問答，又不時要到陌生地方去找機會開教；出門不管冷熱，吃飯不問好歹；有工夫才睡覺；冒了不少危險；常保心神愉快，和世俗相隔絕；不惜殫精竭力，實踐獻身奉事耶穌的志願。因此，我們總可以看出他所有灼然可見的心境。那些不得不極力活動的人，不難從他的精神生活，學得加倍効勞，捐離世物的方法，不致有縱情逸樂，崇尚虛榮，和專講人情的危險，這原是我們本國一班度着這種生活的修道人所易有的。這位傳教士一生專以竭誠奉事耶穌為職志，正因他了解這種生活便是完全歸向基督最穩當的方法，才自告奮勇接受了。這樣，我們看了這位教士的內心生活，便知他把一生完全獻給耶穌，一心只想做些耶穌為我們做過的事情，因此實現了他所有獻身事主的志願。」這便是那吸引着許多青年，專務榮主教靈崇高卓越的理想生活，也就是龍華民司鐸所度的生活；它的效果實足令人驚訝。利公和郭居靜羅如望兩位司鐸十餘年來三個

人合併工作，還不過勸化得二十三五個新教友；龍神父一個人在三四年中却已勸得三百多人，領洗入教。他有這樣的成績，足見他所有極深的內修工夫，怎樣形諸外表了。他度着克苦的生活，只有主日上才有一點肉下飯。保守教友拿東西送給他，他一概謝絕，教人明白他不是那專想募化的和尚。他個人常在韶州四鄉傳教；城裏的住院只算得偶然駐足的處所。他傳教的地方便是數百年來傳教士們所慣稱的『荆棘地帶』。『荆棘地』這句話，表明那裏有人跡不到的森林，蔓草叢生，榛莽遍地的地方。如今我們稱爲『荆棘地』，究竟對不對？我們聽到了這個駭人的名詞，不禁要聯想到赤道地帶照在芭蕉葉上的烈日，江河中的急湍，和鸚鵡的羽毛等等。這句話也要像猛獸的吼聲一樣，令人震駭。然而地勢平坦的中國，山野中的荆棘要比不拘甚麼地方少。那裏沒有森林，幾乎連樹木都沒有；沒有高山，也沒有吃人的猛獸。可是這地方雖然沒有荆棘，却遍地是荆棘。這就是說這個相距遠遠的國家，甚多的教化甫經傳入，在神職人員種種冒險的嘗試和單調的日常工作中，西洋教士既須拯救人靈，又須應付世務，使人事兩方面共向着最新目標進行。我們幸而找到了當時的函牘，才知道龍華民司鐸在這荆棘地帶傳教時所有的遺聞佚事。在許多函牘中講起種種可喜的事情，使我們對於中國的開教情形，也可以像日本印度一樣略知梗概，他的信札中講起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挨了同玩孩子們的打，却記得天主經上的話，便對他們說：『我寬恕你們，好教天主寬恕我。』過了幾天，他的小妹妹和他淘氣，也挨了他的打，便把他說過的那句話照樣奉敬他。又有一個四五歲的女孩子叫依爾斯，事事很留心，一次出廟會的人，要把神像抬進她的家裏，她決定不許；這班人沒奈何，只得依了她，過去了。有一個教友住的地方都是教外人，一天他的屋子着了火，鄰居們都喊：『讓這些狗燒死吧，他們是我們菩薩的仇人啊！』豈知龍神父領了教友們來救火。大家給他把屋子重新蓋起來，蓋得比從前的好。有一個鄉下的讀書人，曾把一星的福音，從馬家

村帶到了別的三處地方。第一個領洗的是一位七十歲的老頭兒。他起先有些爲難，因爲他想自己記憶力沒有了，不能學道理。他的洗名叫薩爾伐多，他得到了另一教友方濟各的幫助，勸得了幾個和他年紀相仿的老年人來學習，又常和一班外教的老朋友辯論。有一個年輕人手裏一拿着教理書，便渾身發抖，一連三次都是這樣。他的母親便問神父要些藥。龍神父教她把家裏供的菩薩都毀壞了，其中有一個很小的，是他們的愛物。那小夥子就不抖了。勸教的又教孩子們競爭，誰把木偶砸得最碎。

這地方的人民迷信極深，傳教非常費力，一班學習道理的人不容易懂得爲甚一定要棄絕他們的偶像。他們說：「神道菩薩沒有做下惡事啊！」龍神父每每說起打破這些祖傳風俗的困難。一班和尚道士也羣起和他作對，這不是爲了宗教關係，却是爲了他們手掌中的善男信女從此不再佈施的緣故，這正是基多信徒和財魔黨徒的奮鬥。神父和城裏的官府相熟識，他們就奈何他不得；但看某教友爲了要勸化某姓婦人的緣故，被她教外丈夫控告的，案件就可以知道了。那時，龍神父出了一封信替某教友辯護，仇人們就不敢再向巡按衙門控訴了。當中國人過新年作樂的時候，新教友們都不肯去參加，却熱心過立名瞻禮聖灰瞻禮，直到聖枝瞻禮。他們完全信任神父，比官府還要信任，有了爭執也不去打官司。」

百姓們敬神的事情，也算是一種對於社會的義務，不得規避，否則就要被衆所擯棄。比方迎神賽會照例大家都得捐錢出份子。一天那三隻眼的菩薩出會，有人把儀仗隊領進了神父寓所。龍神父勃然大怒，因此惹起了羣衆很大的驚訝。又有一次，他命人燒燬觀音像（他們奉爲保佑生產的菩薩），換供聖母像，教信衆念七遍「在天」，七遍「亞物」，慶祝聖母獻堂瞻禮。因此，便有幾個和尚和他們的黨徒造起謠言來了，說：「外國人在澳門打發教友來迷惑婦人們咧！」萬公（？）村的

兩個起碼讀書人就這句話逢人告訴。龍華民神父聽了便加駁斥，說天主教道理是經韶州官府准過的。他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依舊前往各鄉傳教，每天早出晚歸，在萬公村（？）過宿。當利公北上進京，在路上暫遭羈禁的消息傳到韶州以後，龍神父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這當兒，那姓鍾（？）的秀才正從臨清南下回來，他雖則還不敢公然學習教理，却會聽說教士們在南昌和南京兩處備受尊崇的情況，因此向人稱道。只是他再三央告龍神父廢除耶穌受難的苦像，說：「這像極慘酷，教人見了毛骨悚然。」但龍神父給他痛痛快快說，他寧死不能答應。這句話就使他起了一番深思熟慮：不久，他就願意同他的祖母和母親一齊學習了。這年八月五日，他和他的十歲兒子維多斯同時領洗了，洗名喬治。後來他的姪兒也不顧母親的反對領了洗；結果，母親也覺悟了，受洗入教，洗名保辣。喬治的哥哥原是被人下毒謀斃的，因此，他常想報仇雪恨，但奉教後得聞吾主愛仇的聖訓，便立下一個好表樣，當眾寬恕了這大仇人。三位太太不能和男教友們同做瞻禮，他的祖母亞納便在家中設立經堂，邀請鄰家和鄉下女教友們齊來誦禱，不論貧富，不分階級，一律歡迎；後來，她認經堂靠近廚房，很不適當，便把聖堂移到別處。那給神父們給役的一個童子給她們教經文。她們領聖洗的時候，照例該擦聖油，龍神父便覺這件事大有困難。范禮安神父便准他援用教宗恩准聖禮部的新法令，「遇有婦女們領洗，或是領終傳的時候，准予免除某種聖事儀式。」

那時，龍神父又勸得一位讀書人歸依聖教。這人是韶州城裏首屈一指的紳士，所以這回的成功更見得可貴。他姓白（？）生平專喜歡做好事，凡是地方上造橋補路，修廟裝金等種種善舉，總是由他首先倡導。她和教士們來往了十一年，彼此很要好，可是他有些志高氣傲，總不肯研習教理。他聽說龍華民神父下鄉奔走，拯救人靈，便問他何以如此，神父回說：「城裏人既然不肯學道，我只得帶到鄉下去看看我的道行不行。在天主前，大家一律平等，全沒有那出於人爲的種種區別。」這些話，

就像以前一樣，進了他的心坎裏。以前，他曾到過北京，眼見利公在京的盛況；他的事情，利公也曾給他幫過忙。那時，韶州方面所得關於利公的消息，都不確實，大家聽了，也就以訛傳訛了。他回來後，替利公竭力闢謠，把以前虛偽的傳聞加以糾正。然而，他還是不能決定採取確定的步驟；他想：「天主怎會容許天主教遇到種種的非難呢？再則，我要是領洗入教，是不是必須和學生對先生一般，對神父們俯首順命呢？」某天晚上，便有一位洗名路加的教友——也是個讀書人——給他解說道：「你爲甚怕人見了苦像要笑話呢？孔夫子生前不是也歎『吾道不行』嗎？」隨後，又對他切實申明，神父們並不要誰低頭服小，唯命是聽。這位姓白的紳士聽了非常滿意，便留路加吃晚飯，和他暢談聖教道理，直談到深夜才分別。下一天他就正式報名，預備奉教了；到了聖日羅尼莫瞻禮（一六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便取名斯德望領洗入教，這個聖名已由利公擬定多時了。

韶州城裏歸化的新教友並不多，城外的新雄（？）鎮却有百來個，已於一六零三年四月二十日成立了一座小經堂，開堂那一天，奏樂鳴號，非常隆盛。當下有二十名新教友領了聖洗。教外人來看熱鬧的也不少。彌撒後，神父便對他們說明天主教聖堂和寺院廟宇的區別。以後，龍神父就派一個要理教師常駐在堂裏，又給各村鎮的教友們派定了四個領袖，教他們領導衆信友。照利公編訂的瞻禮單按期會集，公行禮拜。那時新雄（？）鎮東鄉有一個熱心教友洗名瑪里伍正向隣近各村開教，曾在下坡泥（？）與一個教外人和一個和尚，正式辯論過兩次結果和尚輸了，便有下坡泥的村長領洗入教，洗名保祿，又帶了他的老母，一個媳婦，三個兒子，三個孫子，兩個孫女，齊來歸化。那時萬宅根（？）有人來找神父，說新雄保守的某教友病了，要求付聖洗。這地方和下坡泥只隔得兩里路；當下龍神父便去了。這原是件意外事，不料這一遭，却給了他意外的代價。萬宅根人同時歸化的有三十人，其中有一個老婆婆，病得只剩一口氣，似乎只等神父來到了，才肯安心死去。但龍華

民神父這時候，所有下鄉傳教的工作，要是沒有韶州官府的贊助，或者至少是默認，那斷乎是辦不到的。當利公在臨清受馬堂干涉後，不久兩廣按察衙門便派了兩位官員到韶州來查問，但其中的一位，便是韶州知州，另一位是前任雷州（？）知州。韶州的知州和他的佐貳早就知道「教士們決不會違法犯罪的。」這位知州更極力稱頌天主十誡，曾當眾承認：「凡是守十誡的人就做不得官吏。」那一位雷州前任的州官，雖則和龍華民神父不相識，却和利公交好，以前在京城裏的時候曾來拜訪過；這回，他從京城來到韶州，一到就差人送一席酒，給「利公的同事」還說：「只因公務繁冗，不克即來拜謁，很爲抱歉。」過不多時，他就來過訪了，和龍公談了好一會，提起北京譚利公在京諸事順利；末了，又說：「你們待人一視同仁，這就可見你們是體面人了；你們作事，只求引人歸認天主，教人恭敬天主。」地方長官這樣開了口，頓使一班存心和西洋傳教士尋釁的吏胥平民，啞口無言。

其次值得使我們仔細審量的，就是還有人特別責難十九世紀中和二十世紀初葉的傳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神父們，聽到了那些人的謾謗，連幾個平時對他們比較有些善意的人也是這樣說；表現起傳教救靈的神火來，慣常總不免有欠斟酌，勸教的心太熱了，往往要惹起中國官府的反感；尤其是當屬下教友或是被保護人，和人涉訟被人欺侮的時候，西洋教士就代抱不平，插身干涉，更使地方官發生惡感。現代中國的史家們竟把這種指責的話當作口頭禪，而且說起來，還要引西洋作家的話做憑據。比方一九零二年出版的勒克召的（*Reclus*）著作上會這樣說：「天主教教士們雖然有率真誠篤，心地良善，主持公道專心盡職的人，却老做着中西兩方不和洽的導火綫，而且由來已久。他們控制着教友的家庭，許多棘手的案件，把教士牽涉在內；這些教友，他們極信任，却又不全是安分守己的人，這一切全成了新局面，使勸化人的，和被勸化的，在一國中，

另成一國，正如人們說的『弱國中的一個敵國』。

如今我們看了龍華民神父的事例，就不難探本窮源研究一下。那時候，離歐洲人在中國取得治外法權，成立領事會審制度時代還遠咧。這件事我們要是尋根究底，便知遠東各民族對於法律的觀念和西洋民族的觀念截然不同，而且有幾點更是完全相反。那位專門研究比較法學的埃斯格拉氏（Eschsch）對這件事講得很明白。他在『中國律』一書的序文中曾說：『講到實在，東亞歐西歷代相沿的衝突，最顯著的，是在法律一方面。西方先進各國的人民對於法律一門多少具有希臘羅馬人的觀念，這種觀念已有些被甚多教化加强了，這種大羅馬精神不但是拉丁民族的主要遺產，還啓發了回教各民族，和盎格魯撒克遜，日耳曼，斯拉夫各民族，所有大部份的律法。這些民族遵重法律，大抵把它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看得極高，稱爲『神人之后』，認爲人人都該服從的命令，無形中確定了人類立身處世的條件和後果。歐洲各國都有司法衙門，法官的職務不但在依法執行，往往還得解釋法律條文；在原被雙方的律師公開辯論終結後，有時候法官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說句話，斷定是非曲直，做法官的行使了幾年職務更該綜合各案加以分析，闡明精湛的法理，使司法機關的原則日見精良，制度益臻完備。這種特點到了東方就漸漸磨滅了。亞洲極東的中國素稱禮教之邦，數千年來毗隣各國如高麗，日本，安南，暹羅，緬甸，都崇尚中華的禮法，所以中國皇帝對於民權憲法，素不重視；法官審理訟案，都講天理人情，只重綱常倫教懲戒用肉刑，又很嚴酷，用意在使民知畏。朝廷和代表朝廷的地方官長，因見土司會長團總會首，紳董族長等，勢力膨脹，有礙自己的威信，又常受到封疆大吏的掣肘，便一面劃清權限，一面按照正道正理，參酌當地風俗民情，舊時成案，來處理民間的爭訟。』

這種情形未免令人扼腕，我們不妨說句笑話。便是中國如今頒行了許多改良新律法以後，一般民衆和行政人員的頭

腦還得讓那位刑名家的祖師韓非子來療治一下，依着他的主張，恢復國法原有的尊嚴，使處於「太上皇」的地位。天主教士初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所有倫常綱紀的大道理所依據的原則，果然和西洋各國大不相同，但無論如何，一般先進教士們，既然曾把中國比作伯拉圖的理想國家，那時的中國也行了。所以那時，非但誰也沒有，因為見教士們插身干涉，要求府縣官處理有關教民的案件，該全照法律條文不該講情理，而目為詫異，大家反而要怪他們為甚不去伸冤求直，那時中國官府並不怕他們要「在中國另建一國」，只怕他們傳教授徒使百姓們有創立秘密會社的機會。

教外人對於教友們的責難也全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得到的。中國人素重文獻，那時大家正想重印三藏佛經，格外珍視各種圖書典籍；所以教外人對於天主教教士教友們表示不滿，却在傳教全憑口授，不用經典一層。往往有人譏笑新教友說：『貴教教理全在四頁紙上講完了。那裏比得我們所有的經典符咒呢？』龍華民神父知道了，便教教友們回說：天主教中也有極多的藏書，都是鴻篇巨帙，不過沒有譯成漢文罷了。教外人聽了，都說這是遁辭。於是龍神父因着教友們的敦促，就和教中某名士合作，着手譯述聖教經典，盡力滿足教友們的願望。他先刊印了幾種經書：一本瞻禮經，是從格勒那神父作品選譯彙訂的；一本送葬新唱的聖咏，是拉丁文的譯音，使教友們雖則不懂經中的意義，却可以看着經咏唱；一本告解要訣，還有一本聖母靈蹟論。後來他又加上了幾本聖人行實，因此，那被人看作荒土的韶州住院現在却變成中國最發達的傳教機關了，所以每當耶穌會負責當局把這有礙健康的駐所應予裁撤的原案，重新提出討論的時候，在華傳教的司鐸們就沒有，一個不反對。利公也因龍神父在韶州傳教大有功勞，呈請上峯准其宣告四大誓願，更給他加上了這樣破格揄揚的按語：『設若因為這個傳教機關不在葡人轄境以內，因此照例只得派葡籍的神長管理，設若有這樣的話，那麼，據我看來，他滿懷

神火，又作事謹慎，持躬謙下，教他管着這裏的教務，在本會各住院中，就沒有一個能比他管得更好的了。」（註二）

（註一）本書所記龍華民傳教詔州的情形，大抵根據利傳，卷一，四〇三——四三〇頁，但比照當時的函牘事實頗有顛倒出入之處，作者力求調查事實，却苦史料不全，幸而賈列克司錄（P. du Jarric）會就蓋勒樂司錄（Guerrero）所刊佈的函件多所援引，使作者得藉此以補不足。

（註二）龍公於一五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發三顯願。利公保薦他做自己的後任深願和他在北京相見，不料他進京就職時利公已去世了，所以他們倆彼此始終沒有見過面。後來龍公於一六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了四大顯願。

第四章 教會組織的輪廓

龍華民神父所倡導的這種運動，也和利公在京所有的進展一般，非得立刻着手組織一種集思廣益，羣策羣力的機構不可。這正如亞里埃氏在他的著作「歸化的心理」一書中所論的一般，是天主教的一種特殊的要務。亞氏書中所研究的教人歸依基多的情形，完全根據着誓反教各教會所供給的資料。但真確的事實使他不得不承認這種只限於片面的調查，實在不合着他最初的意旨。他經過一番研究之後，就懂得很明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原該嚴加注意，不爲一二事實所淆惑，這些事實往往表面上不甚懸殊，實則頗有出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雖則抱着同樣的目的，使異教人歸依基督，却彼此各有立場，往往各行其是，因此所採的方法也就大有出入了。（見亞氏原著卷一一五，一六頁）

他又論，「第一個異點就在對於教會本身的觀念上。天主教教士，一到了某地方住下，即使一個教友也沒有勸得，也必在這地方憑他個人，當天立起了教會，行使職權，然後出去勸這地方的人來進教。這教會是獨立的，和教友們不相干。「基督教」教士却不然。他在本國加入了宗教團，出去傳教，總要等到歸化的人數够了，才和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團體。他和幾個男女教友做基本，成立了這個團體，這些教友要一齊立誓，守好幾樣公共原則，要真正有信仰，依着信仰身體力行，也許這位男士召集了這些教友以後，還得經過好幾年，才肯認定他們配得上和他共同創立這種志同道合的團體。天主教教士另有一種看法，當然他勸人進教，至少要那人誠心誠意，聲明棄邪歸正做起點，但究竟該怎樣歸依奉教，自有天主和聖寵的佑助，不妨讓他漸漸發展。」

這兩種方法所有相反的直接效果，天主教教士對於在華的教會組織正和誓反教士所具的見解不同等時顯出來了。單就天主教而論，這位主持韶州教務的范禮安司鐸，到任後，雖則一個教友也不會勸化得，却已打算怎樣劃分教區，想在大城市設立一位主教和參議會了；後來利公一經去世，便立即派遣金尼閣司鐸前往羅馬，請求任命四位主教，三位駐在中國地內。

凡是熟悉聖教創興史的人，見了這種舉動，諒必不以為異。這種舉動便是出於所謂「教會絕對主義」，就是相信在世聖教會，常得有天主聖神的啓迪。聖神的引導是不能錯誤的。所以天主教教會就認為憑着這種秘訣循循善誘，引導一般很幼新進的教友團體對他們諄諄訓誨，把聖教會中各級神長和傳統神權的原則明白昭示。聖教會從來不容任何人自以為得到了神的啓迪，發起甚麼運動，想開創一種新教會，駕乎基多的教會之上；同時使立教者抬高自己做先知的身份，自命為古聖祖大先知們所不及。這在聖教初興的二三世紀是如此，現在也未嘗不如此。羅馬公教教會，每見有人自稱救世濟人，或者假托有甚非常大功德，出頭反抗聖教神長，定必嚴加裁抑，便是對於那些忒明白，因而想入非非，熱心過度，反致陷於邪道的人，以至那些妄稱蒙主默啓的信衆，竄職陰謀的主教司鐸，也必毫不留情痛加貶斥。自從舉行了脫利騰公會議以後，聖教會的地位更見得鞏固了。利公會對一班中國儒士們講起過這回公開集議的情形，由教宗親自主席，各級神長自樞機，總主教，總會長以下都出席與會，各端道理和各項法令，都由教中博學鴻儒詳加審核，經全體一致通過後才決定；聽講的個個嘖嘖稱奇，十分欽佩，他們聽了利公的一席話，以前對教士們到中國來組織秘密會社所懷的疑懼就此烟消雲散了。聖教會也曾屢遭艱難，風波平息後，歷任教宗便仿照奉教國成例，在異教國任命各級神長，設立教會系統，通常有一批傳教

司鐸，便有一位或是兩位主教；在這些新開闢的地方，差不多一起頭就設立了正式主教區。近代傳教教會自十五世紀以來，這種制度沿襲了好久。那時，西班牙人每到美洲開闢了殖民地，就急急設立主教職位，可是葡萄牙人却似乎有些不很願意把他們所得廣大的土地劃分出來，隸屬教會神長管轄。我們本不願根究其中的原因，但看了那時中日兩國教士們的函牘和條陳，便知他們渴願有主教，而且他們的確還願意在傳教人員中選任主教，不願意在羅馬神職界中遴選委任。到了十七世紀中葉，西班牙方面更提倡所謂「王家代牧」的理論，幾個担任保護的強國又紛起競爭，羅馬教宗便不得不分別任命「教宗代牧」和「宗座代牧」兩種主教，免致羣羊有失牧之虞。

那時，還沒有合着聖教法規的組織，傳信聖部也沒有成立（該聖部成立於一六二二年），遠東各屬的教務，便由各修會尤其是耶穌會負責主持，全權處理一切。所以這過渡時代一班專任傳教的會士就組織團體，由本會長上督率管理，受駐在國現任主教監督統轄。比方在中國，便是澳門主教。再則那時不像現在一樣，把傳教區域劃分清楚，指定某省教務，歸某修會担任，甚至一位主教所管轄的區域往往要有好幾個修會派遣的會士在境內傳教，而且彼此各不相謀，各行其是。但事實上，中國境內惟有耶穌會士担任傳教職務，直到一六零三年沒有間歇，其中的理由，我們曾明白講過，而且這也和耶穌會士們的心願毫無關涉（見教士傳二六七—二七零頁）。

然而一個主教的轄境非常廣闊，傳教人員散處各方，交通又極不便，主教公署的辦事人員也很缺乏，要主教親自行使管轄權，實在是件非常困難，而且幾乎是辦不到的事情。因此耶穌會長上，雖則依法處理教務應受澳門主教節制，在事實上，和習慣上，却能自由行使職權。做了主持全區教務的第一神牧，既要忙着辦理重要公務，又往往缺席派人代理，一切事務，只

得讓修會長上們，和代權司鐸們一般，自行裁奪，不過該用主教的名義頒佈施行；遇有重要事件只須照他的大政方針辦理就是。中國的情形尤其是特別，地方長官對於教首教主非常疑忌，怕他們聚衆圖謀不軌，如果教主是外國人那更防得厲害了，所以主教出巡這件事簡直辦不到，也行不得，惟有委派合格神長做代表，前去視察本區教務，或是和教士們互通音訊，指授機宜，由該會長向主教報告所屬各教區的狀況，和他商議重大事件，聽取他的命令。因此，耶穌會總會長除了委任遠東省會長以外，又給中國添派了一位副省會長，位在當地會長之上，使在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們獲得更週密的照料，和更妥善的指導。

傳教機構的組織便是這樣週密，主持閩屬教務的省會長仍難兼顧一切，所以省會長范禮安司鐸和副省會長高默斯司鐸只得分工合作，在這幅員遼闊，關山阻隔，又往往因萑苻不靖，無法通行的中國，分別巡行視察，以便自己對於中國的事務認識得真切一點。因此便在那幾年創立了一種習慣，往往由總會長親自委派專員，或稱「臨時視察員」，前往各處實地調查當地教士的需要。在以後一百七十八年中，共計在中國視察了四十四次，平均每四年一次。這樣辦法，還嫌不夠，有時候供應員還得奉派前往羅瑪，直接向總會長陳訴請求。

這當兒，主管當局已覺得必須着手組織比較有系統的教會了，至少該使它粗具規模。耶穌會士們在華所有四處住院，南從廣州起，沿着直達北京的水道，可以互相呼應，貫通了中國南北，每處相距，却有數十天的行程，正和從羅瑪到馬賽，琶塞，龍納瑪德里，里斯本一般遠近。教士們在各處設法開教，即使所用的方法，並不抵觸，個人的意見總不免有些出入。比方龍華，民司鐸和利公意見相左，並非根本上彼此不能諒解，不過龍神父傳教救靈急於見效，便對於利公所採深入而迂緩的辦法，

表示不滿。我們如果只求從速拯救人靈，利公所採光和士大夫接近的方略，果然不是上策；反之，如果傳教異邦必須先謀立下基礎，那麼，利公所採緩進的策略『猶如匠人造屋必先掘地打樁，不住校以繩墨，正足以見他的智慧。』

一六零零年副省會長高默斯司鐸去世。他做了中國和日本兩屬的副省會長多年，當羅明堅司鐸初到中國內地，備嘗艱苦的時候，他在澳門對羅公極表同情，多方援助。他的繼任人便是和利公同時來華，又同在肇慶創業的巴濟範神父。他對利公的開教事業非常關切，幾乎同來參加工作了。那時，范禮安專任中日省區的省會長，不再過問葡屬印度和摩六甲羣島的教務，便和巴公商定指派臨時視察員，代他們出巡，使在華的四處住院彼此有了聯絡。担任這種視察任務的人物最適宜的便是利公，無奈他在京所處的地位很重要，又沒有人可以代理，只得改派澳門學院的院長李瑪諾巡視南方的三處住院。以前李氏曾想把當時在日本傳教，後來為主致命的史比諾拉神父調到澳門，（因為他在羅瑪公學時曾從格拉維神父學習過算術）却不會如願。這回他奉派做視察員來巡視向來上峯不過問的中國教務，就未免有一點偏見，存着他遺下的院長職位，由澳門公學神學教授賈伐祿（Valentin Carvalho）陞任。

那時，郭居靜司鐸正在澳門養病，病愈後，李瑪諾便於一六零二年也許趁廣州春市的機會請他引導，起程踏進中國內地。大家見他一路前行非常高興，願意終身盡這職務。他先到韶州，那時龍神父初得成功，彼此互相慶幸，可是他們也已覺得地方上不但是僧道，便是一班讀書人，也已羣起阻撓了。和尚道士們反對教士是怕奪去了他們的衣食父母，原本說，那些讀書人大都是鄉村中的老學究，頭腦冬烘，讀書不通，只得聚徒教讀混飯吃，他們口誦孔孟之書，侈談先王之道，讀書斷章取義，思想頑固守舊，心地又偏私狹窄，却自命為聖門子弟，如今忽看見外國先生來說甚麼教，傳甚麼道，那得不搖頭

歎氣，要大喊「小子鳴鼓而攻之」呢？因此，龍神父下鄉開教時，這些人心裏就很不舒服，要不是利公在韶州早已有了聲望，名滿士林，進京後又蒙皇上禮待，爲賢士大夫所景慕，使同會們和信徒們得到他的蔭庇，那麼，龍神父的活動，一起頭就要受他們的阻撓了。說不定他和李瑪諾神父談起教務表示志在急進的時候，這位觀察員要對他提起利公創業的功勳，使他知所感荷吧。

要是藉口過去習慣，來遏止現有的進步，或是杜絕日後成功的希望，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如果我們不該怪人故步自封，那麼，要怪過去爲甚沒有像現在一樣，猛着祖鞭，兼程並進，那更是不對了。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方法和展望，賤視天主過去的神工，這就是幫助天主聖神的措置了。這種論調，胡公氏（Hogg）會切實伸說過。那位斐列濱耶穌會會長賈西亞神父（P. Garcia）初到馬尼刺履新後，曾急急來書，請范禮安省會長加以指導。范公的覆書（一五九九年十月十三日）中，便有這樣的話：「來書堅囑陳述鄙見，幫助你善盡會長的本分第一。我因得見吾主賜你這樣的謙德，覺得十分欣慰，不但是因謙德使人大受裨益，更因有了謙德就少不了要有天主的光照，引導做長上的助他們管理屬下諸人。此外，我竟不能担水益衆，反該就泉汲水來解渴；再則，貴處和敝處的環境相差太遠了，這裏的辦法不能適用，但我們從歐洲來到這些地方，有一個必須共同注意的要點，這就是我們先輩所用的方略，即使看來十分特別，要有絲毫的改革，也必等我們在這地方有了多年的經驗才行。不這樣，我們就容易犯錯誤；過了幾時，我們就會知道有許多事情，我們起先看了詫異，實在却是少不得的，做長上的要是貿然有所改革，就要大失威望咧。」

龍華民司鐸只因把前任的方略判斷得太鹵莽了，後來就不免要受到這樣的恥辱。而且不久他就要佩服利公的高見。

咧。到後來，他看見自己手創的事業，只如曇花一現，一會兒就枯萎了。他但信任他的前輩兼上峯的方略也許要向這位比他有經驗的先進人物請示就教，來祛除他的疑惑。原諒他的理由，一生從不會有過和利公面談的機會，一切事情只能憑函牘往返磋商，相與討論。我們且不問人們怎樣批評龍華民神父，只諱龍神父憑着在韶州傳教的經驗，也曾獲悉許多新貢獻事理，用以解決在華傳教的困難問題，不無裨益，使利瑪竇司鐸視察韶州教務後，發見了許多意外的事情，因此，決定種種妥當周密的辦法。至於南昌和南京兩處住院，却不能給他貢獻這許多意見。南昌的情形更不容樂觀。第一，利公在那裏開教未久，便匆匆趕到北京，不及給幾個上流人物教畢要理；再則派駐南昌的教士屢經易人，羅如望司鐸剛到就動身，只算得是個過客。那裏，也有一班無聊士紳與風作浪，令人感覺不安。這些人大抵是落第老童生，想弄飯吃的窮秀才，革職的官吏，還有那閒蕩好事的宗室皇親，這班人背後有一位告老還鄉的閩老，專喜歡提倡一切迷信舉動，來消磨他的暮年歲月，發起創立一種儒釋道三教混合的新教門。一六零零年金公廟焚燬後，他就發起募捐重建大殿，屋頂上所用碧琉璃瓦全由他一人捐助。異教人的聲勢這樣囂張，南昌的天主堂自必黯淡無光了。領洗的寥寥無幾（一六零一至一六零二年一年中不過二十人）而且都是平民。教堂傍着各衙門設立，雖然地勢得宜，屋宇却十分湫隘，又逼近一個池湖，大雨時，湖水泛濫，常苦被淹。這一方的人很刁滑，要教士們給公衆當差服役，比方夜裏守望街道，關閉柵欄等等。蘇如望神父是荷蘭人，在倭大省城裏舉目無親，又不懂得中國人的規矩風俗，就被街坊欺侮，弄得不知怎樣才好；過年節時只有一人來看他，派他白當差。他的身體素來很衰弱，害着肺癆病，病根已很深了；慣常一年四季，上床的日子多，起坐的日子少，可是他非常謙遜聽命，諸事忍耐，樂守神貧。他獨居異地，舉目無親，雖則困苦難堪，却從不訴艱道苦。他連一個同伴都沒有，三年中，他的同會弟兄們一個也沒有來。

探望他。這當兒，他需要援助很迫切，正該有人來幫忙。

但蘇神父聖德的光輝却漸漸燃起了屬下信眾的神火。南昌的教友雖然不多，却都是虔誠的，有幾個住的地方離堂一里多，可是每逢大瞻禮，大家都來與彌撒。教友們有了疑惑，便來問神父，向他訴說自己的心境，也不怕向人承認自己是教友，吊喪送殯，或因別的事情和教外人來往，也不肯行異教禮儀。我們讀了當時的書信，便可以看到幾件足資矜式的事情。比方那時有一個教外婦女，向道士求籤問卜，要知道丈夫何日回家，後來那魔鬼附在她的身上了；道士們發符念呪，全不靈，有一個冷淡教友給她念經，求天主，也不中用；他教這婦人畫十字，魔鬼便對她說：『我不怕你，這個教友我還有一點害怕。』末了，給她灑聖水，才把魔鬼趕走了。

一年中，只勸得了一個七十歲的老醫生進教。某年新年裏也許是因為利公的大名傳到了南昌，有一位王爺帶了十八九個宗族來訪問，還有幾個學老師，也來登門造訪。蘇神父在南昌忍受了五六年艱難困苦，才得到了一個最切實的效果。這便是他譚譯出來的，一本教授要理的小冊子。這本書是一個八十多歲，洗名保祿的老秀才幫他譯成華文的。『這位老秀才奉教後，就盡他暮年的心力，專務譯述聖教書籍，度他的殘生。龍華民一接到這書的抄本，就命付印，分發給保守教友學習，由那洗名喬治的紳士替許多人出了一筆錢，捐助印刷費用。』

總之，南昌的教務還得由許多後來的教士繼續努力；那裏至少在承平時代，沒有甚麼艱難，這使後來的教士們可以放心，却也使他們得到了錯誤的印象。舊禮教的中國，很委婉地拒不受福音，教士們還該在平時學得怎樣廣揚聖化的方法。但這當兒，蘇神父吐血症又發作了，覺得自己力盡筋疲，再也不能支持了，非派人前去襄助不可。眼前李瑪諾神父雖則到了

南昌，却不能久留，便又啓程上道，向南京進發。

利公在南京住的日子多些，所以他在南京的傳教工作，也有了相當結果。當他北上進京的時候，（一六零零年五月十八日）已添了好些新教友，一部份住在漢西門，一部份住在江通門，只算姓秦的這一家，便已有了十二人領洗了。那位接替利公的郭居靜司鐸也像龍華民一樣，是個大有作爲的人。他出身貴族，家住在日內斯城附近，二十一歲上進了耶穌會，過了四年，便在羅馬奉派到遠東傳教，先在臥亞住了幾時，便動身到澳門（一五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讀了一年文學，三年哲學，和兩年神學。前面我們已講過，他怎樣到韶州襄助利公，安慰他的孤獨，（那時利公的同伴已相繼死亡了）後來，又曾陪利公到過北京。他身材高大，體格壯健，作事活潑，又留着一綰長鬚豐姿飄逸，令人起敬不認識他的人，只當他是一員大將，誰知他這麼一個好體格却隱着一種哮喘病，不時要發作，使他一生受到極大痛苦。一五九七年，上峯已認他「害着一種危險的病症了」。到了一五九九年（七月底或是八月初）他不得不初次回澳門養病，再來的時候，便帶了龐迪我同到韶州。他病假中，上峯便派一位葡萄牙青年司鐸羅如望（de Rocha）來代他的缺。羅神父身體也不堅實，不過比蘇如望好一點罷了。這兩位教士體質欠佳，雖則利公已替他們立下了基礎，南京的教務也只好緩緩發展了。郭居靜司鐸在南京還担任着和外界接洽的要務，那時，又不得不到澳門走一遭。這回他帶了李瑪諾神父同來，便見又添了幾個新教友。到了一六零二年年底，羅神父已授洗五十人，其中有一個是城防的管帶，還有一位有名人物，決定拋棄了他的妾來進教，也有幾個是夫妻倆同時領洗的。神父們要教友行告解，便遇到了够大的困難啦。教友們以爲，這是件丟臉的事情，要服從外國人的規矩，未勉太卑鄙了。還是那七十四歲的老頭兒秦保祿開了端，給他們立下好表樣，大家才肯跟他學樣。那時有一個種田的鄉下人素來信

奉着一種秘密教，吃素吃了三十年，又常去朝山進香，某年春夏之交，曾來見過神父一次以後就不再來了。後來羅如望神父到他家裏去看他，見他的妻子正害病，女兒又害水臌脹，便給她們付了洗，她們的病就都痊癒了。這鄉人却死不肯進教。一天他請神父來家吃飯擺上了一桌子魚肉。羅神父說主人不吃，他也不吃。主人再三推托，不肯破戒，後來被神父逼得沒法，才破戒吃了一口；吃的時候還發抖。這個難關一打破，他就肯同兒子一齊領洗了，學了道理，轉教給合家大小。還有一件事更教人動心，不得不把他全部照錄出來：「一次，神父去拜望一個新到南京的朋友，便見有幾個賓客在座。這個朋友對他們讚美天主教道理，座中有一個做醫生的教外人是官家子弟，便問惡人歸信天主，使得使不得。羅神父說使得。下次見面時，他就拿出一張紙交給神父，紙上寫着：「余知識淺薄，虛度三十四載，一生罪過多端，自少時以至弱冠，即習於爲惡；行年二十，置身黑暗中，昧却真知，誤從二人所創神道設教之說，不求甚解，遂如投身大海中，隨浪浮沉。昨日得讀論真主宰一書，始知天主乃至尊至上；余未生時即賦以靈魂，既生之後，復賜以諸般恩佑，人與萬物同受覆載，而人獨能明理。此誠確切不移之真道也。余常以捨左道而從正道爲幸。今余既遇賢師開我茅塞，誨以大道，敢不謹敬信奉乎。竊願賢師大發慈悲，引余列於門下，俾得晨夕隨侍，暢聽輿論，則余之素願遂矣。」

不久，便發生了一件事引起那關於喪儀的問題。秦保祿奉教一心只想傳揚聖道，便在家裏造了一座經堂；等到將近落成的時候，他忽然病倒了。開堂那一天，他病得很厲害，却仍想掙扎起來，到堂與祭；那時他已好幾次領過告解聖事了，結果安然逝世。他的兒子瑪爾定也是個好教友，父親去世後一切喪葬儀式，都按教規辦理。這個好表樣非但是很要緊，而且是很不容易立的，因爲照他家的門第論，出喪不用僧道，簡直是新奇的。從另一方面講，那時正當開創時代，未便就由神父們出去領

葬，公開舉行宗教儀式。因此，便有一班人罵秦家的兒子大逆不孝，死了父親，竟不捨得化幾個錢；親友們勸嚇他的也着實不少。可是他一概置之不理，可見他是怎樣勇於爲善了。他恨人纏繞不休，便喪脾上貼了一個哀啓，說：「先父生前虔奉天主教，遺命喪儀不用僧道。」過了幾天（大約在郭居靜陪李瑪諾回來後），神父們到秦家私堂裏，按教規給亡者舉行追思禮，孝子便約會了教友們穿着喪服，齊來與禮。

我們看了這件事，便知開教時代常有種種難題需要着適合實際的解決方案了。李瑪諾神父到南京的時候，大約是在一六零二年初春時節，到了以後，便去信通知利公，利公答覆他，請他進京，好轉達所有本會傳教士們的意見，共同加以討論，擬定一致的方針。那時，李瑪諾帶了一個西洋畫師正在南京那座新堂裏畫一幀聖母像，沒有完工就把這件事就擱了。這個畫師名叫雅各伯倪槐（Zeig）生於一五七九年，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在日本進耶穌會做助理修士，在修院時曾從那名家畫師尼各老司鐸學西洋畫。尼各老神父曾於一五八六年給中國傳教士們畫過一幀基督像，說不定北京神父們就因此要求他，或是他的弟子們來華服務，倪槐就奉了范禮安會長命來到澳門；在澳門的新聖堂，畫了一幀聖母升天像，又畫了一幀吳蘇拉等一萬一千位致命聖女像供在祭台上。

他原是奉派到北京服務的，這當兒，便和李瑪諾神父相偕由水道北上，路上毫無阻礙，於一六零二年八月十日到了北京。李神父在北京住了兩個半月，天天和利公討論教會組織問題，利公見他對中國很關心，便覺十分欣慰，在他寫給龍華民的書信中，曾說：「李瑪諾神父有很多的事情要辦理，一時不能就回到你那裏。我想他實在是天主揀選的人，教他在中國傳揚聖化，因爲我們見他只想着這件事，便是在夜裏，也做着勸化中國人信奉基督的夢。他的神火使我麻木的心，大爲灼熱。」

李神父方面提起利公會說：「他有他的出身地，比采農人所有的一種可喜的本性，有克制自己的好功夫，既堅忍，又熱誠，作事不辭勞瘁，却不肯過激舉動（因此，他嚴禁信眾搗毀偶像，每到一處見有善事，總是樂聞，喜歡稱賞）。可見他對於利公所到之處受人尊敬的本領，還沒有看得真切，和利公共事的青年龐迪我是西班牙人，當然免不了多少要受着那在斐列濱傳教的耶穌會士桑采芝（Sanchiz）的影響；桑氏的事情前面我們已講起過了。顯然，利龐二公的脾氣，既不相同，所受的訓練又不一樣，利公對那些人稱「格拉維神父的算學家」，在學術上主張用實驗法的前進派，備表同情；龐公却是屬於那講解亞列斯多德學說的保守派，就是所謂古音勃爾的新士林派。看來他對於中國的水土也有些不服，還覺得常吃不易消化的大米飯不合口胃；當他進京的時候在路上害過胃病。利公的真心話似乎表示他們度着共同生活，非有忍耐和互助不行，後來，利公去世後，便發生了幾件可謂遺憾的事情，證明龐迪我不免有一點過失，足以加重風土問題的劇烈爭執。

可是那時（一六零二年三月）龐迪我曾給多萊德省會長葛思孟司鐸（P. Guzman）寫的那一封長篇書信，却表明他是個觀察深切，批評透澈的人。他在這封書信中，還糾正了那在西班牙出版的幾本書籍的謬誤，他說：中國人「慣常並不如人們說的穿着華麗的衣服；兒子必須繼承父親的行業是不確的；皇帝派的欽差必須喬裝改扮，私行察訪，是一種風傳。只有幾個親王裂土分封；以後，皇帝再派宗室去留心監察，沒有這回事。有人請招待各國欽使要在四大殿大事鋪張，按各人的資格舉行盛大歡迎，這簡直是絕對不實。這裏，不重人權，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但龐神父並不因此而失却他對於這偉大中國的仰慕，目前他手頭還沒有參考書，可以詳細說明中國的那縣，人口，資源等等，但他一朝獲得，就要着手編著咧。他講起自己住在宮裏，和太監們交好的情形，因此述及了幾件珍聞秘事；比方某大臣力爭建儲，寧受刀鋸鼎鑊，不肯迎合上意，毀壞祖

宗成法等事。那時，朝臣各樹黨派，爭鬥很爲劇烈。利公和一班士大夫周旋晉接，極力抑制自己的情感，避他捲入漩渦，應付得面面俱到，真是頗不容易呢。事實上，皇長子常洛和鄭貴妃生的皇子常洵，雙方羽黨暗鬥多時，相爭不下。這一年（一六零一年）萬曆卅立皇長子常洛爲太子，常洵也受封爲福王，便大張聲勢，使人懷疑到他有奪儲的異志。到了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京中爲了立儲問題發見了許多匿名傳單，宰相沈一貫便乘機賈禍於東宮太傅，牽涉了詹事府許多人，因此，這些人便對沈閣老的門下加以報復，尤其是那達觀和尚。這和尚也是和利公相熟識的。

朝中的暗鬥竟會牽涉到宗教，演成教理上的筆戰，朝臣們有幾個見外國人公然排斥佛教，不勝憤恨。那時有一個太學生叫韓恢（？）四川人，拋下了妻子和許多同志專心修道，他托四夷館的守吏求得了利公所著的教理書，和其他的漢文作品，却不肯逕來求見；只在某次宴席上，偶然相遇似的，請教利公，提起利公的著作，便和他高談闊論，刺刺不休。後來，他知理藩院蔡正卿極力反對利公，不願他留住京師，便以爲得到了一個好幫手。蔡正卿有個胞弟也是進士出身，在兵部做官；這太學生便和他相約，把利公的著作加以批註。蔡正卿兵部用紅硃批，他自己用墨批，他們讀到利公暢論輕視世俗，說人世間富貴榮華全是虛幻，便加圈點，可是一見他攻斥神仙菩薩就加×加豎，來洩憤。那姓韓的讀到了這兩句話，我們靈心中明明有一個主宰，『太陽大於地球』，更大肆譏評；姓蔡的還想設法在天主教道理和自己的主見中，尋出一個中庸之道，所以他的批語要客氣得多。利公不難對姓韓的痛加駁斥，却知從事這種筆戰未免要留後患；這班太學生不認高低，原是惹不得的。因此，他只把那姓蔡的評論略加糾正。便是這樣，也不無二三大臣參奏皇上，對天主教和教士們大加攻斥了。

那時，又有一個朝臣叫李督（？）出來給他們做聲援。他說天上如果有天主做主，那麼地上做主的便是神道了。這話的

意思，便是說：官府保障三教，有權力管得着外國的教士。可是事情出於他們的意料，不久，便見那位利公交好的李贊繼續貶黜着「古聖先賢」，反把那人們所視為「危險人物」，備加揄揚。因此，當他從近畿某縣進京的時候，便有一個御史奏呈皇上，劾他侮謾聖賢，妖言惑衆。萬曆帝就下旨把他下獄拘禁。又命查抄他的著作，把底板加以銷燬。李贊懷喪之下，憂憤難堪，便在獄中伏劍自刎了。

佛教徒的受辱還不止此，那做過主考贊成利公持論的馮夢禎（？）更上本殿斥「那些儒士們捨棄先師孔子之道，信從佛老之言，在京大招物議。」萬曆雖然屢有偏向佛教的表示，在重刊三藏經及佛經時曾命錄入北派高僧的作品十五篇，却仍降旨說：「禮佛應在山林，臣下有願說教者，應即辭官前往，毋再欺人惑衆。」於是韓恢和其他兩個反對教士的人，不得不辭職歸田。馮主考更澈底做一番，禁止在考卷中有稱道佛法的論調，不奉命的，就攆斥。

那時，北京有好幾座大寺院，不但平民常去拜佛燒香，便是后妃公主也喜歡去佈施，做功德。和尚中有兩個最有名，一個叫寒箱（？）還有一個便是那老和尚達觀；宮裏的幾個妃子，尤其是鄭貴妃，對他都敬重得了不得。鄭貴妃更把這老和尚的袈裟當作法寶一般看待。達觀作事很能幹，學問也不差，他有心結識利公，便請利公前去謁見，免行一切禮儀。利公婉言謝却，只請他有便光臨。這當兒，有位御史上了幾本劾他不法，他却安然無事，便益發傲慢了。妖書案發生後，京中便掀起了絕大風波。這是一種匿名揭帖，說：皇帝鄭貴妃和幾個大臣們要把太子廢立，改立常洵做儲君。萬曆帝知道了勃然大怒，便命閣臣澈查嚴究主犯，但一時不要領，只得冤枉了幾個官，被累下獄。這當兒，教士們兩個月不敢出門拜客；因為理藩院想把這件事牽涉到他們身上，教一個新從南京調任的禮部堂官來請他們，同那幾個「高麗使臣」一齊回到四夷館居住。但這位禮部

堂官却替教士們極力辯護，因此利公等沒有受影響，反是一班和尚們爲了這件事大大吃虧。因爲在查辦時，竟發見和尚中，有一個在各處養着十二個婆娘，便有一個叫汪鍾（？）的，奏劾達觀，說他用陰謀詭計，替他的門下羽黨謀官職，已查有實據；又查出了一封信，信上誹謗皇上敬佛少誠心，對太后不恭敬，這個誹謗君上的罪，就達觀挨了八十下大杖，當場斃命；而且他送了命，還惹人笑話，說他平時大言不慚，總說把這個肉身不當一回事，却不料挨打時，也像庸夫俗子一樣，大聲叫嚷，喊救命。他葬了以後，官府還怕他有妖術，把他的棺柩打開，看他究竟死不死。同時那寒霜（？）和尚，也被驅逐，發解韶州，不准在京師逗留；後來朝廷又把他放逐到更遠的瓊州，使他的黨徒沒法再和他通聲氣。李嘗（？）的一個親戚（也有人說李嘗本人）便是無故獲罪丟官的。他才教明白天主實在是天地的大主，李嘗（？）所說的神仙菩薩，原不足道；非但救不得人，且也不能自保。

這場大風波，臨了還演出了一齣極慘酷的慘劇作結束。因着太子的竭力營救，他的師傅崔德才（？）得保性命，可是那奉旨查辦匿名揭帖案的某大臣又懷疑到順天生員曠生光身上了。他原是個生性陰險的人，做得好文章，只是愛管閒事，專敲竹槓，因此被削去學籍。他熬不過酷刑，便招供了，承認這揭妖書是他所幹的勾當。案子耽擱了好久，有一個叫秦端（？）的太監替他說項，可是他仍不免被判極刑，按例把他凌遲處死。他被剮了一千六百刀，渾身的肉都削去了，却不殺他，一根骨頭也沒有動。他受這苦刑將畢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闖進法場，砍下了他的頭帶着就拔腳飛逃，一路跑，一路散錢地上，使追他的人顧了拾錢，就不顧得追趕。大家都以爲這人必然是曠生光的家屬作出來的。這件大公案，鬧了好幾月，到此才算結束了。以前，京裏的官紳士庶，都過着恐怖生活，滿朝文武，誰都不敢提起這件事；一般平民百姓也相戒不談國事。大家都

怕被偵探聽見了，要惹下殺身大禍。風波平定後，佛教的勢力就此一敗塗地，一班和教士們交好的人，便說天主教一傳到北
京佛教就漸漸不作臉事。

李瑪諾神父沒有在京看到這件公案的結果，但風波初起的時候，他正在京中，離京後，也能在外省看到這些事情逐步演進。那時，他會有信說：『京城裏有一位極有勢力的大人物，以為皇宮裏安放自鳴鐘的鐘樓造好了以後，神父們的事情就真正的算是妥當了。』他在京裏的時候，也覺得傳教事業有了進步。龐迪我在短期內學會了中國文，念書講話都還過得去，可以教一班踵門造訪，自願歸依的人學習要理；至於倪槐修士，只能『教他和兩個中國教友暗中工作，因為如果皇帝知道了他是個西洋畫家，一定要召他進宮，供奉內廷，便是一班大臣們也要互相爭奪，不但自己的事情不能做，而且他一身決不能使衆人滿意，就不免討好了一個得罪多人。』

據當時的統計，短期內歸化的有七十人。又據李瑪諾神父於一六零二年十月間寫給澳門院長的信，說有六個人自願進教，其中有兩個定於聖瑪睿宗徒瞻禮領洗（九月二十一日）（他們的本意先是為來學算術的。）還有兩個是秀才。第五個是鄭貴妃的妹夫。第六個是太醫院陸院長的兒子，是一個溫文爾雅，且又多才多藝，因此極受人敬愛的青年。

那時，還有幾個棄邪歸正的人，我們如今還查得出他們的略歷如下：（一）依納爵是刑部尚書的親戚和幕僚；（二）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是上述刑部尚書的孫子，得到了他祖父的許可才領洗，不幸領洗後十四天便去世了，可算得『一朵中華之花』；（三）崔安多尼六十歲，原籍河南，做過幾任巡撫，這回進京候陞要職，奉教極虔誠，領洗前來院學習教理，研究兩三小時；領洗後，天天與祭，從不缺失，使人畫聖像，製聖物消遣光陰（註一）（四）一個專繪仙佛神像，聰敏穎慧，素來有名的青年畫

家（大概是爲了佩服倪槐的畫藝，才來研究教理的）過了幾個月，便領洗奉教了，立誓以後決不再畫這些迷信的畫像，又把所有的許多作品一齊焚燬了。可惜他雖有這種好心意，却不能始終如一。後來，天主罰他，使他不能再在北京住下。

李瑪諾神父所指出的那些領洗的第一人，的確給這新誕生的中華聖教，增光不少，在當時新教友中，要算他首屈一指了。他的名字叫李應試，他承襲他父親的世職，在京裏某衙門做官，他原籍湖廣具有不完糧的地，却生長在京師。他的父親便是那時朝鮮一役（一五九三）帥師平倭，赫赫有名的李如松。如松戰歿後，他奉母和妻子兒女留住京師，他擅長星象學，不是個星相家，也是個有名的堪輿家，會看風水，揀好日子，好時辰，上樑造屋，替人占婚喪喜慶諸事的吉凶。這樣的人，要說服他，使他明白這些事情全是虛妄，那真是難極啦。他先從利公學潛算，就種了歸化的根苗，後來利公給他解釋，有時候魔鬼可以用教人看得出的記號，預報未來，但這總是邪道，才教他恍然大悟，便如大夢初醒，終於棄邪歸正，領洗奉教了，洗名保祿。他領洗後，費了三天光陰清理他的書庫，把一切聖教禁止的書籍，特別是那許多占卜的書，其中有幾部是用重價收買的抄本，一齊理出來，裝了三大箱，扛到大庭心裏，舉火焚燬，又把餘下的扛到利公住院裏，當面燒掉，表明他的誠意。看來北京新教友們所有這種習慣，領洗前要寫一張誓願書，表明信仰，或者在祭台前高聲朗誦一篇宣言，把這誓書留下給神父們做憑證。這種習慣便在李應試領洗的時候開的端，他的誓願書現在還保存着，書上的日期是一六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末段的話是這樣：

「我棄絕一切有背聖教規誡的事情，決不反悔。仁慈的大父，全善的天主啊，我如今只求一件事，我棄邪歸正剛起頭，只是一個新教友，還不懂得甚麼是最完美的，所以我求你不棄愚頑，開明我的心，使我懂得，賜我聖寵，好教我知道了就去。」

我更求你允許我把聖道宣示給他人，這原是你很願意我懂明白的主啊，求你憐視你僕人謙恭敬上的誓願。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

那時李保祿年紀四十三歲（照中國的算法）奉教後，便專心一志，傳揚天主聖道，他的熱忱有時候還該稍加節制。他孜孜不倦地勸化他人，要等他的母親妻子兒女連他的西席和僕婢們，全家都領洗了，才歇。有一個男傭人被他勸得惱了，便拿起斧子砍下了一個指頭，表明他決不奉教，可是保祿還是把他勸得回心轉意，使他夫妻倆一齊領了洗。保祿不時要到利公住院，替神父修士們當差，做各樣的事情，給學道的教外人，講信菩薩的錯誤，他在外面揄揚教士們的德行，僕人們的服從和睦，又在家裏設立經堂，供着聖像，不時請神父們去行聖祭。他的兒子十四歲上幾時學會了輔彌撒，他就當作一件大事，舉行慶祝，『好像歐洲教友們慶賀新祝聖的司鐸一般。』

我們看了以上的事情，便知李瑪諾神父在京視察後，該有怎樣的感想。此外，他在京裏還可以隨意出外遊行，到了一六零二年十月十米左右，他就和鍾巴相修士動身回南，趕緊到南昌，好教那通年有病的蘇如望神父歇歇力。這件事是他的親上司澳門院長賈伐祿命他的，也是出於在華全體會士懇請范禮安會長派定他加入在中國傳教的結果。他帶了利公的訓令和函牘動身先到南京，交給羅如望神父；那時，郭居靜舊病復發，又須重返澳門休養，便在這年年底和李神父同時起程，到了南昌和李神父分手，由石州直抵澳門，向上峯報告一切，轉呈各處教士的報告。這回李瑪諾神父的視察，對於中國教務的發展意義極為重大，不過費了一年多一點的光陰，就完成了這重要任務，使四處住院不但彼此有了聯絡，不致因山河阻隔而各自為謀，便是和澳門印度的上峯也樹立了通訊的機構，不時陳報近狀，細訴衷情。這種辦法對於未來的發展的確是

一種成功和有效的保障咧。

(註一) 這位姓崔的也許做過吏部侍郎，一六一一年曾爲利公某書作序。又有名崔燠的，江東人，曾爲應迪我的七克作序，不知孰是。

第五章 新教友的訓練

李瑪諾神父這回視察在華教務所有最重要，也可以說是有創作性的效果，便是確定了上峯對於教士們應頒訓令的各要點。這項訓令以前已在「利公的就職通知」中，和他一六零零年頒行南昌教士們的指令中規定綱要了。那時頒行的新條例曾於一六零三年經范禮安會長加以批准（註一），但我們找不到這些條例的原文便是利公的覆文也已無從稽考了。這些文件大概已經失傳，我們惟有研究當時的情形來推想這些文件的內容對於教務前途有最大關係的事情無過於保守教友的訓練，因此我們不得不先從這件事講起。

我們知道在斐列濱莫三壁，巴西，墨西哥等處以及凡是教士們所用的方法不難加以控制的地方，在十六世紀中，教外人要求進教，只須誠心誠意肯守教規（立志棄絕一切異端，不再敬拜邪神，脫離姬妾，恪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歸還所得不公道的財物），便可以給他付聖洗，許他入教。新教友學習教理，往往只聽神父講過一次道理，因着這種直捷了當的方法，教士們不難同時給大批羣衆付洗，只須幾年功夫，就造成了幾個信衆叢集的大會口。

比方墨西哥，列格氏（Riego）曾加分析說：「假使我們把教會兩字的範圍縮小了，作爲一羣教友和二三司鐸的團體講，那麼，墨西哥的教會組織起來是極迅速的，因爲教士們來傳教，一開場就給土人付洗，並不耽擱；土人們要進教，用不着先學會了教中的道理才領洗。這種辦法算來是在比較新近的時代行起的，其實，從第四世紀到第六世紀時代早就行過了；後來，直到十九世紀中，才又在傳教國內行起來了。至於十六世紀中的傳教士，這種辦法簡直是聞所未聞的。比方印度，當聖

方濟各沙勿略來到的時候，便已有了大批付洗的習慣；事前，那些領洗的新教友，差不多沒有受到教誨。因此，異教人歸化聖教，可以分作三個階段：一心信奉聖教主要的信德道理，先聽人提綱挈領的講解一遍；接着便領洗；領洗後，繼續學習。便是聖人自己，也會給那些沒有受完教誨的異教人付過聖洗。

列氏的話不見得完全確實。聖沙勿略不過願意在印度和摩六甲羣島改善那時給異教人付洗的通行辦法，可是他一到了日本，換一句說，一到了推崇中國文化的世界，就把這種辦法完全改變了，在別處地方大抵新教友是先領洗後學道理的，可是在這裏，越看越見得必須先教誨後付洗才對。從前者乃格和瑪爾克奧萊爾 (Marc Aurel) 的弟子們所認為必要的要理學校，對於這些多少受到了孔子道德學說的影響的遠東民族，更見得是必不可少的。

這件事實，在預備教誨新教友的教本中是極容易看出的。在別的地方——比方墨西哥——簡易教理書譯得將就些還不妨事，到了日本，就非得加上一篇辯道文字做引子不可，或者先做一篇答客問。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的教授法加以分析，而在中國的要理學校的訓練，性質更是不同，尤當別論。

十六世紀初葉，班葡兩國各屬地所用的教理書可算得是一致的。我們可以把它分作很清楚的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經文，和主要的信道真理。這原是人人所當知道的，也便是神父們在聖堂裏不住諄諄訓誨的；凡是要領聖洗，告解，聖體，堅振，婚配，五件聖事的教友，都得考問明白，才准領；接着便是聖號經，信經，「在天」，「亞物」，「申爾福」；十四端信德道理，七端講基多的天主性，七端講他的人性；以後便是天主十誡，聖教四規，七件聖事，大小罪，七罪宗，和總告解。總告解放在書的篇末是例外的。第二部份，包括各端補充的道理，不是人人所必學的，只有在修院裏教養長大的兒童，才有人教授，要天天高聲背誦，但會念

書的成年人，便該各自備一本，在家裏閱讀，使他們在教理上求得深造。這第二部份講着各種主要的和超性的德行，哀矜、功夫（七種形哀矜，七種神哀矜）天主聖神的寵恩，三司五官，人的靈魂，三仇，真福八端，肉身的復活，以及代父母的本分等等。」（見列格氏一二四——一二五頁）

以上除了小小的改變外，便是那教理書上所有的一定不易的基本要理，附有詳細的解釋。在葡屬各處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大概都用着若爾日神父（P. Torreg.）所著在葡國印行的第一本問答體的教本。在華的教士們起先諒必也會用過，却因後述種種理由，這本書就擱置了好久，沒有付印。蘇如望神父編著的要理教本，便是屬於這一類的（註二）。聖沙勿略一生也用着這一類要理書的譯本，便在日本也是如此。他同幾個要理教師，在會或不在會的，担任教誨新教友的職務；因為這些教友，對於聖教要理實在欠缺得太多了。

但聖人到了崇尚中國文化的地方，就遇到了意外的困難啦。他不能再像在墨西哥的方濟各會教士們一樣，遇到的都是馴伏的人民，聽人說教講道理，就不問青紅皂白，盲然信從了，一句話都不說。他和他的同志們，聽到僧道們和一班篤信仙佛的百姓們，紛起詰難，不得不答覆，因此，覺得非編一本書做引子不可。這本書那時便叫那天主實義。不消說得，羅明堅在廣州，肇慶，和一班官吏紳交談了以後，也必遇到了同樣困難或更激烈的辯論，便也用同樣的方法應付了。因此，他和利公爾人都認要攻斥異端，闡明真道，一本要理問答，委實是必不可少的。這種情形使教士們明白在中國傳教，要比在日本更加審慎；因此，對於一般有志入教的人，學習的時候，就實施一種嚴格的訓練，作為定例，經過了三四百年的經驗，更見得這是最適當的辦法。巴黎外方傳教會與倍蕾（P. Anby）神父曾說：「遠東異教國，大批羣衆同時歸化是毫無價值的。教士們給大

批聚衆同時付洗，簡直是一種錯誤。要使中國人民棄邪歸正，該個別去勸化；他領洗前，該費一番心思教誨他，先看他要進教是不是真心，學習的時候，不肯聽教誨，相信各端道理，牢記在心裏；一舉一動，是不是跟着教友學樣；這樣，才好斷定他有沒有恒心，會不會半途而廢。這樣的試驗總得費上許多光陰，才聽完畢。」

只是中國人宗教思想很複雜；這些新保守，教起來却很費事。「往往有人說中國盛行着儒釋道三教，却分不出誰是儒教，誰釋，誰道，大抵人人都兼做着三教信徒。外國人對於中國每有這樣的觀念，可是這實在是不確的。中國人也像歐洲人一樣，決不能同時信奉着三種不同的宗教道理。比方依着和尚們的話，宇宙間沒有掌管世界的大主宰；神道權力有限，有生，死地位不高，惟獨佛法無邊，位在諸神之上；依着道士們的話，掌管世界的是三清，三位全能永生的人物；依着儒教中人的話，掌管世界的是天，天有無上權力，能知一切，却不是人物。三教道理這樣背謬，怎能教人同時相信呢？不過讀書人盲從陋俗，迷信舉動成了習慣，所以死了人糊裏糊塗的請了和尚，又請道士來超度，那裏有真正的信仰呢？只因這種風俗年代久遠了，三教就漸漸化成了一種民間的混合教，弄得非驢非馬，連讀書人自己都不明白，也不相信。」

利公把教外人的星相占卜術加以研究，便能用比較的方法，來闡明天主教基本教理的奧妙無比。他和中國人慣熟了，聽人講起種種的神話，和推斷吉凶福禍的方術，便努力設法激發教外人的宗教信仰，把三教道理分辨明白。他下功夫把三教道理個別研究，看在精神上究竟有沒有甚麼價值，再把好的留下，或加修正。他研究的結果，只見儒釋道三教的道理彼此大不相同。

三教中最低的要算是道教。利公以為道教的道理一無可取，不過這是指着通俗的道教說，不是說形上的道教教學說。他

曾記着：「老子在母腹中過了八十年才誕生；他並無遺著，看來也不想創立新說。但他死了以後，有些人便把他奉爲道師。他們又捱拾各派荒誕不經的傳說，和憑空捏造的虛話，用很好的筆法，著了幾部書。道教中有一派學道的道士，住在寺觀道院裏修道，不娶妻，買幾個童子做徒弟；他們大都是和和尚一般，卑鄙醜陋，心術不正，却不剃頭，把頭髮留長了，挽到頭頂心，用竹段束着，打成一個髻。也有些人終止了婚姻關係，便勘破紅塵，在家修道，比較守戒律，要按時爲自己或是爲他人念許多經。」

「道士們說他們除了拜神仙外，也敬拜天主——玉皇大帝——却很愚頑地，執定說這是人身，又給他編上了許多本地風光的佚事。他們說玉皇大帝姓蔣，以前的玉帝却姓劉；一天他騎了白龍下凡，到人間，那姓蔣的原是個未卜先知，便把他迎接到家裏，請他吃酒，姓劉的正在吃酒的當兒，他就騎着白龍上天了，便佔據天宮，把姓蔣的驅逐到下界……」

「除了玉皇大帝以外，他們又捏造着三位天尊；撒謊的祖宗依然沒有放棄相似天主的野心；他們又指出些地方，作爲賞善罰惡的去處，可是道家上天堂，是靈魂肉身一齊飛昇的。他們的廟宇裏還塑着幾個據說是這樣白日飛昇的神仙。他們要得到這種大福份，便規定了幾種功課，各種打坐的方式，幾遍經咒，還要用幾種藥物，打算煉成長生不老的仙丹。」

「捉妖除怪，是道教法師的專門任務。這件事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用墨筆在黃紙上畫着可怕的妖魔鬼怪，教人掛在廳堂上；一種是用粗暴的呼聲說不清道不明喊叫，好像有魔鬼負着似的。」

「道教的教主是世襲的，到如今已有一千年了，大約是由江西龍虎山的一個魔術家遺傳下來的；我會聽得幾個新教友說這幾代的天師，簡直那麼沒知識，連嘲笑自己的詩詞，罵自己的現成話，都不懂得……」

民衆所信奉的便是這樣的道教，在宣揚甚多聖化上，可說得是全無用處；再則，道教無非是佛教的旁門，講的道理和佛

教大同小異，講得還不好，不值得加以的駁斥。釋迦牟尼的佛教，却和道教大不相同，講的道理「似乎不但帶着西洋哲學的意味，還掩映着聖經的餘蘊。」據利公的推論，「佛教講的三世佛，也含有三位神道合成一尊的意義，又講着天堂地獄作為賞善罰惡的報應；崇尚獨身主義，婚嫁相似應廢似的。和尚把廟宇寺菴托付給皇天保佑；到各處去朝山拜佛，沿路化緣。禮佛誦經，形式上很像我們聖教會裏舉行的儀式，幾時你去聽他們做功課，你就要說他們唱的正和我們咏唱所謂大額我略時代的日課經差不多。他們的寺院裏也供着佛像，禪師穿的衣服，竟和我們的衲衣不相上下。他們誦經的時候，往往提着某人的名字，這個名字據說連他們自己都不認得：」

「可是這一點真道的影子竟被一大堆烏烟瘴氣似的虛言妄語掩沒了。他們把天上人間併作一談，認為都是身後賞罰的處所。他們不主張靈魂是永遠不滅的，不論是在天上，或是在人間，却說有三千大千世界，過了幾時靈魂又要投生到這些世界中的一個世界上來了，那時如果能改過遷善就算做了補贖，可以消除罪孽。依着佛教的戒律，和尚和信徒們非但不得食肉，還該戒絕一切葷腥，因為殺身是佛門的大戒——但守戒的少得很，而且他們犯了這種罪，或是別的罪，要得赦宥也很容易，只要做一點佈施就是。他們還說和尚們的經懺，法律無邊，便是下地獄受苦的亡靈，也可以超度出獄。」

中國的和尚被人輕賤，當初教士和尚服式不分明，教士們便受了極不良的影響。別人仍認為天主教和佛教相同。會有人對利公說：「要是你講有天堂地獄，使人死後受賞罰，這正是佛教的道理哪。讀書人誰都不愛聽這一套。」利公便駁他說：「為甚呢？佛戒殺人，儒教也禁殺人，我們不能就說這件事把儒釋兩教混雜了？老鷹能飛，蝙蝠也能飛；真天主的誠律由來極古，佛生在東方不約而同的也這樣說了，各派教祖要創立基本教義，自必借幾條真道來掩飾他的妄語，否則誰肯信從？」

呢？」

因此，以後利公對於保守教友的訓練，在消極一方面，決計先行着手消除他們因着沾染佛教思想所有謬誤的心理，同時，揭穿道家捏造的神話。這樣釋道兩教的障礙就掃除了，只剩儒教，且看該怎樣應付。人們每說儒教是「孔子立的教」這句話實在說錯了，孔子實在不是宗教家，無論如何不能把他比作穆漢默德，更不能把他和耶穌基多等量齊觀。釋迦牟尼還可以稱為佛教的祖師；說老子是道教的祖師，這顯得是後人牽強附會，是道家的狡獪伎倆。至於中國的儒教是數千年來古聖先王奕世相承之大道，孔子前早已有，怎能稱為「孔子之教」呢？孔子是倫理家，也可以說是史家，講到宗教他不過是個禮儀家而已。關於此節，有一位現代遠東宗教問題專家傳教安南的賈隸愛氏（Geley）曾經明白伸論：便是一般史家也都懷着這種確不移的信念。賈氏的見解無非重伸這種久成定論的信念而已。他說：

「我以爲把「孔子之教」認作宗教的人，他們的見解是錯誤了。孔子不應被認作宗教的創造人。他一秉熱忱，搜集千百年前古聖先王藉以表現信仰的著作，昭示後人，所以他不妨被認爲遠東全部神哲學的編纂人——名爲全部實則很不完全，只是些不相連續的斷簡殘篇；有些地方說得很隱晦，有些地方很淺近。後來，他的弟子們讀了他的書，便加詮註，有的割裂章句，有的更擅加竄易，私自增刪改訂。大家都照各自的意思，把老師的道理隨便解釋。宋朝的朱熹，竟把孔子原來的信仰全部推翻了，然而他不知弄了怎樣的玄虛，竟使後世儒生把他的註釋奉爲天經地義，在科舉時代作爲國家取士唯一的根據。結果大家尊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說他爲人完全率性守道而行，天地間的大道萃在他的一身；說他以德教化人，說他協贊天地，因此德與天地同侔。孔子便因這種名義受人尊敬，永垂後世了。可是我們却不能因此便說「孔子之教」是正式的

宗教。中國人尊敬孔子，但這種尊敬其實和尊敬一班在過去時代文事武功煥赫一世的名臣先哲無異；尊敬孔子，正如尊一班偉大人物一般，該歸入祀奉祖先一類的祀典，因此入於敬事鬼神的祀典。」

這樣看來，孔子不過是中國古代宗教的傳授人罷了。利公認中國古代的儒教其中有幾點對天主教道理是隱合的，所以他在北京開教的時候，不說儒教和天主教絕對不相容，却說古儒教今已失傳，天主教正所以補真儒教的缺陷。利公所以這樣說法的緣故，前面，我們已約略提起了；下章，我們還要詳為申論。

金尼閣神父會親眼看見過當初利公怎樣訓練保守教友，我們讀了他遺下的記載就不難明白了。他講：「每天有生客來看我們起先，我們總給他們講我們的事務，來華時的航行，我們的經本，書籍，學術等。他們便要我們拿出些東西，如自鳴鐘洋琴等，特別是救世主像，讓他們見識。我們就供出聖像，對全體來賓加以說明。大家對聖像表示敬意，我們便說：『這幀像和你們的菩薩不一樣，這是用以代表那萬物的大主宰，代表天主的。天主是萬有的真原，造物主，雖然無形無像，却會從天降世為人，所以我們用這個形像來表示。』」

這就做了利公在京開教的出發點：用這種方法來引人棄邪歸正。可是異教人並不就此歸化。所以金尼閣又說：「這不過是個前提，我們接着便講教外人拜的神仙菩薩全不是真神。不要以為中國人愚笨得只知道拜的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不懂得偶像代表着神道。他們聽我們證明宇宙間只有一個天主後，慣常就要反駁，說他們的神道，德教昭垂，至少應該認為天主的朋友和僕人，受人尊敬。我們於是立即答覆，說這些大人物從沒有提起過天主，却把所有的尊榮如人民的敬禮，四時的廟祭等都歸到自己身上。這樣一解釋，他們就頓口無言了。」

利公於是繼續攻斥謬理，痛闢釋道兩教所有荒誕不經的妄言邪說，尤其是佞佛的中國人所篤信的輪迴學說。教士們更暢論人是一切生物的主人翁，殺生自有權衡，因而又論及其他許多的事情。龍華民神父在詔州鄉間傳教，辯論到這裏，便適可而止；因為鄉下人不讀書，思想譴陋，又依着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原則，是素來不許尋根究底的。可是教士們和讀書人論道，就非得把自己對於孔子傳統學說所有的見解，明白曉暢的講論一番不可。因此，教士們對於讀書人所循的途徑截然不同，先對他們說明自己的理論，和他們的見解並不相悖；宇宙間只有一個真神，只有一條光明大道，却因這一縷光明，映入人的方寸靈台中，總不勉被陰霾暗霧籠罩着，必等神光一到，才把這陰霾暗霧一掃而空。講到這裏，教士們便提出天主聖子降世爲人的信道，把其中的緣由伸說一番，因而涉及人類原罪，靈魂不死不滅，和賞善罰惡等各端大道理。

這便是利公等通常和人論道時所採的步驟。每天，教士們遇有機會，便和異教人討論這些事情，講得又簡捷，又明白。當然，我們不論和誰談論這些道理，不是樣樣要講到，不過趁機會看光景講罷了。許多人聽了便不再多談，默然告退，却有幾個表示「願拜門牆歸依聖道」。中國人素重師道，拜老師要行一種特別儀式；做老師的南面坐，弟子便對他恭行四鞠躬，然後跪下叩首，表示尊敬；以後就終身執弟子禮，在路上，會場上，筵席上遇見了，必須讓老師佔先，不得僭越。神父們雖知道這種風俗全沒有異教意味，仍謝不敢當，說「他們既願歸依聖道，便是做了天主的弟子，這種尊敬該歸於天主，我們不過是天主的舌人，和傳令員罷了。神父們這樣謙讓，使中國人大爲納罕，却又很能體諒。據我看來，異教民族中只有中國人重視樸實，懂得「恭敬不如從命」的大道理。

教士們見中國人是好禮的民族，便創立一種收納教外人學習教理的儀式。凡是聽了神父們的話表示信服的人，就請

求賜一本教理大綱，拿回去研讀學習。神父便請他先去仔細思量，再許願；等過幾天，想明白了，意志更加堅決之後，然後擇日再來；往來要耽延了兩三次，才收納他。末了，神父斷定他意志堅定了，便引他進聖堂，堂裏祭台上，放着一本教理書，四週點着蠟燭。這個新保守便對那唯一的真師主行弟子禮，禮畢，才從神父手，敬謹領受這本聖道寶笈。

以後，他才算是正式保守教友了，但這不是說他就可以領洗。他回家後，該把這本書讀熟記牢了，然後再來鄭重領受教誨，正式學習聖教會所有各端奧妙的信德道理。神父們於是先把以前講過的道理再給他證明一遍，然後講到天主聖子耶穌基督降世爲人，代人贖罪，甘受苦難，被釘十字架而死，這端極神秘極深奧，極奇妙的大道理，要講許多時候，講得十分明白。不論是誰，必須先對這些超性奧理受過充分的教誨，才得領洗。以後，教士們便接講宗徒行實，祈禱天主經，聖母經，十誡七件聖事等，特別注重聖洗，告解，聖體三件聖事。這樣，教過了一次，兩次，往往三次以後，這新教友便領洗了。

上面，我們講收錄保守教友的儀式，其中的主要禮節便是授與一本教理書。這雖是小小冊子，可是在付印前，教士們却曾大費躊躇呢。利公來華後十五年，南韶道見了郭居靜在韶州住院裏所供的天主像，便問：「這是誰？」郭公回說這是「上帝」。他覺得這是聞所未聞，就要求給他聖教書籍看；一聽說沒有譯本，便悵然若失，說要等刊印後再來索取。後來，事隔多年，這本書還沒有刊行問世。這不只是因出版書籍必須先經臥亞審察部核准，更因有許多問題說不清，那時還沒有判斷分明，便是如今過了三百五十年，還是這樣。那時，教士們不諳漢文，怎能教他們把自己的意思和教中的基本要理寫成中國文字，講得一點不錯呢？當聖教初興的時代，宗徒們也不得不先應用希臘文。後應用拉丁文。第四五世紀中的聖教公會議，不是會釀成神學上的紛爭嗎？雙方都是爲了保障聖道，斤斤於一二名稱的正不正，就大起爭執啦。又如聖沙勿略於一五四九年到

了日本，便見有兩種方法對異教人宣揚聖道，使他們認識真天主：不是依着拉丁文或是葡文的讀音譯成本國文字，毫不改變，便是依着原文的意義，找最切貼的日本語譯出。如果他拘泥着西文的語法，當然可以保存信道的全部真義，決不至受人非難，可是這樣就要使異教人更難領悟了，還使他們覺得有些屈屈聳聳，難以學習。反之，如果用日本語講起來自容易使人一聽就懂，却不要冒着詞意含混，因而鑄下大錯的危險。我們一翻日本開教後最初五十年的教史，便見教士們對這件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當聖人在世時代，以至去死以後，還是朝令暮改，無法解決。

末了，利公便採取一種混合制；因着「中國文言」給極大的事物定名的時候，往往要加上一個番皇典麗的詞令，採用這種混合制就更見得便利了。聖沙勿略先用日本語 (Dei) 代表真神，可是這句話太俗了，不到一年，聖人便不得不擯棄不用。可是當初羅明堅司鐸所用的「天主」兩字結果却成了中國聖教會正式承認的名稱。

那時，還用過「天」和「上帝」兩個名稱，却因此引起了非常劇烈的爭執，終於由聖教會禁止了，不得再在聖教書籍內引用。近代漢學家對於這兩個名稱仍然論斷不一。賈伐納氏曾在中國古時所用的宗教名詞中，看出它的雙重的意義，如今這「天」字和「上帝」兩字也未嘗不如此：「天」近乎是物化殼神，主管自然界的現象；「上帝」近乎是人化先王，主管世間的人事。

中國人每說「蒼蒼者天」要是把「天」來代表宇宙真神，就不免要漸漸失却本意，成爲自然的「天」了。起先大家都認「天」和「上帝」各有不同，這兩個名稱是不能相替的。詩經上所說的「上帝」，實在和那物質的天，截然不同；這明明是說偉大仁慈「薄薄難名」的主宰，所以許多教士們毫不遲疑地認「上帝」便是聖經上所說的神。反之，我們看了近代的著作，

便知「天」字的用途漸漸推廣，「上帝」這名稱，跡近人物，所以大家漸漸不用了。可是「天」字也可作爲「天地」的天，犯着「物」的嫌疑，天和地相對立，天屬陽，地屬陰。

現代學者的批評還是這樣，各執一見，無怪當時利公抉擇難精，自信不謬了。天下事原是必須放棄空論，但求無過的前進，據利公自己說：「起先譚譯這本教理書的人，原是不很懂得譯文必須緊貼原文意義的，所以這本書每年必須加以修改，以至分居各省的教士們都有了各自修改的譯本，和別處所有的各不相同；因此，從一處遷居他處的教友們就不免要大感困難咧。」（註三）新訂的譯本不但要包括必要的經文，還該編入新教友們所必須明白的信道真理。」這本書是由利公和別的神父們合編的，所費的光陰不下二年。利公力求貼合原文，希望要比在日本用的那譯本好。

這件事非常重要，必須奉到了臥亞審查員核准後，才可付印，批准的公文頒到後，在北京最先刊印的，便是這本教理書。這書印竣後，教士們便把原刻的木版珍藏了，等須要時再添印。這書是贈閱的，便有許多教友捐助紙張，多多添印，便是教外人，也有樂輸的，其他三處的傳教機關，也各自翻印。

不幸這本開教時代的教理書，現在遺下的寶貴初版本似乎一本也沒有了，只有稍爲修改過的再版本，但我們仍能在利公的遺著中，看到這本書的綱目和原本教理大全（*Doctrina*）的綱目不甚懸殊內容如下：

一、天主經二、聖母經三、天主十誡四、信經五、聖號經六、論神哀矜和形哀矜七、真福八端八、七罪宗九、七德和七克十、肉身和五官十一、靈魂的三司十二、三種超性的德行。末了便是七件聖事的西文名稱，附有簡明的解說，和小字的撮要。

從此，中國的新教友就不再讓印度日本的神昆們專美於前了。教士們見中國文字不像羅瑪文字一樣，分着大寫小寫，

可以用大寫來表明專有名詞，便也依照中國人的體例，寫到天主，耶穌，聖父，聖子，聖神等這一類的字樣，用抬頭換一行抬高兩格，寫到聖母瑪利亞抬一格；遇到新名詞便用小字加入簡短的註解。

利公原想給這本教理書再編一本詳細的說明書，「使學習教理的容易了解，當教師的容易盡職，各處的教授法也歸一致。」但這計劃沒有成功。他又想翻譯聖經，或者自己講的道理，這件事自己道理的總會也沒有辦到。

可是利公和來客論道，引他們歸認真主的那部「天主實義」經過幾番校閱修改之後，終於刊行問世了。這本書至今中國人還認爲一種名著，因爲清代乾隆帝曾把它收入四庫全書。但當初脫稿後，推敲斟酌，又費了十年心血，才付梓問世。當初利公在韶州的時候，覺得羅明堅神父的作品頗不合宜，便利用暇晷，潛心攻讀中國經書，把四子六經完全讀通了，把書中的要點完全摘出；後來，他到了南昌，便着手編著一部論道書，題名「天學實義」，用手抄本流傳（註四）他把這本書一再修改，便於一五九六年呈送澳門長上作初度審查，但那時大概還沒有經過臥亞方面覆核，所以沒有付印。以後，他又把和讀書人的談話擇要編入（比方一五九九年，在南京時和三槐（？）和尚，以及一六零一年，在北京時和李晉（？）馮琦等的談話），便在那一年，馮應京（慕岡）替他在文辭上略加潤飾親自謄正了。這位馮先生雖受了利公的囑托，却把這件事看得非常鄭重，「在沒有和利公商妥以前竟不敢妄易一字。」利公於是呈報上峯，提付審查，却因函牘往來，費時不少，又擱了二年。但這當兒，他已倩人抄就了幾本，分送給南方各住院應用，然而馮慕岡那時在監裏已等得不耐煩了，便想自出費用，刊板付印。利公未奉命，只得勸他稍安毋躁，便說辭句未臻妥善，還得請他斧政，應京聽了，便對利公正色聲言，中國道德淪喪，危在旦夕，正如病人奄奄待斃一般，據他的意見，欲求療治，全靠此書；做醫師的既已開了方藥，決不會對病人說：「請你再等一

會，我還要把它這方子用絕妙好文章寫出來呢！」

利公把「天主實義」付刊的時候，那教理書已出版了，正在預備編一本詳細的註解。這部望眼欲穿的「天主實義」終於在一六另四年梓行問世了；卷前有一篇絕妙好文章，學識極淹博的序文，攘斥佛老，推崇天主教。這便是馮應京的大作。這位儒宗名士，這樣公然揄揚在華新興的天主教，還嫌不足，更捐貲添印兩百部，自己只拿了幾部，餘下的請利公隨意送人。這件事使神父們格外覺得稀罕，因為應京會欠人一筆款項早就要還，却找不到債主。他的左右有一個到監裏去看他，對他講起神父們教的道理，說領告解聖事必須補還所得不義的財物才有效；他雖然沒有進教，却願意守好這條規律，把這筆錢捐充善舉。

利公的這部論著——通常稱爲他的要理問答——不只是教外人領受基多聖訓，學習聖教道理的入門，和日本地方所用的格勒那氏要理問答一般，也使一般素信宇宙間確有真主的賢士通儒，得到了確切不移的印證，和可以實驗的憑據。使他們一朝得聞聖道，就恍然於立身處世之大道，備見思想行事的準繩。

利公在「天主實義」中，首論天主創造宇宙，亭毒萬物；次論世人錯認宇宙真神；三論人的靈魂不死不滅，大異禽獸；四辨明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一體；五辨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六論意不可滅，及天堂地獄之賞罰；七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八論西教士行品與來由。因此，這部書既可作爲要理問答，也可作爲教理大綱，前半部是引子，後半部可算是集聖道的大成。怪不得，利公雖然分辨得那麼清楚，却不料仍被許多注意利公行事，和聽他教誨的人誤會了。且不說中國的異教人只讀到印就的要理問答，沒有見過「天主實義」，因此分辨不出天主教和佛教究竟不

同在那裏，想不到十九世紀歐洲有幾個所謂有價值的史家，也是這樣模糊影響，以爲：「利氏講的只是純粹的自然神教……他的中國朋友們聽了他所講的這一切道理，只覺得這是一種佛教的特別宗派，而且這是和佛教極相彷彿的。」（見勒淮勒氏中國的宗教六七零頁）也有幾個以爲利公是在把「孔子之道」加以琢磨使成完善的。他們說：「利氏所以能得顯著的成功全憑着他所用的方法。他深知自己講的道理在中國是『聞所未聞』，要是不得上流社會和智識份子的信仰，決不能深入人心，所以他多方設法，力求儒士們了解……可是他不久便看出如果自己不附和尊孔祀祖的風俗——至少也該認爲中國的神聖習俗——便是拿出他曆算和物理學的本領，也必不能和中國人密切聯絡；從此以後，他就把天主教作爲一種改良儒教提出了，他自願容納祀祖的風俗了。」（見卜默氏）「耶穌會士」摩諾譯本，Bohmer: Les Jesuites (traduction Mond, P. 166) 這麼說，利公來華傳揚天主教竟把十誡中的第一條誠命廢除啦！那變，無怪結果他們要斷定「他在一個歷史久遠的文明古國傳揚甚多的聖化，不能用適當的方法來解決傳教一切難題」了。更有人說：「他突然制定的教學方法，並沒有造成一個中華民族的真正教會，所創建的只是個天主教和中國儒教的混合教，沒有天主教教友所有的信德力量，就是說一旦遭遇艱難，不能毅然不屈。」然而我們只看利公去世後五年（一六一五）他的信徒們，却甘心證道，毫不遲疑，不怕死在監裏或是死在杖下啊！

一般見解卓越的作家，却從利公力謀適應中國文化的側面看出他螞蟻似的，依着這荆棘滿途的懸崖陡壁，懷着極大忍耐心，緩步攀緣而上，起步的時候，雖然遇到了極大艱難，終於帶着聖教道理漸漸通過了。他的這部「天主實義」正是他表現全副天才的傑作；這一下，就很巧妙地抓住了中國人在神學上或是在倫理學上現成的某幾點，稍加修正便成正道，不妨

作爲傳揚聖道的入門。這不過是個楔子，却在征服人心上大有效用；憑着這種作用便有許多人棄邪歸正，在這黃種世界上影響非常重大。」（見貝諾維勒氏（Briouville）「耶穌會士」一九三四年版，二五零頁。）這些話，一六一五年史家李葛蒲氏便已說過了：「那時，已有暢論天主教道理的著作了，只是沒有付印，利瑪竇神父的「天主實義」大抵是爲這一個異教種族編着的。；因此，這部作品是從性理一方面立論，不是根據聖經立論的；書中簡單提出天主教規誡，不加說明，但教士們到後來不妨充分講明。」那變，凡是寫天主教教史或是傳教史的史家們就不必多疑了；利公和他的後人們未嘗不敢把其多的全部聖訓，昭示華人。他們並沒有隱起他的受辱受難，他們把聖教會的誠命和定例頒佈了，也把所有異教人的信仰加以斥絕了。只是他們把天主教初步合理的道理和基本信理，分別得微嫌突兀，有欠貫通。這原是不免要惹人訾議的。作者在上編講起利公等在天津被馬堂搜出苦像，認爲巫術一事，也已說過了。

所以，如今我們便是在傳教國境內，也更體驗得到傳揚天主教，必須作爲整個的神秘系統，一併提出，使人覺得禮儀上的一舉一動，都和天主教的基本信道密切相關，不宜零零碎碎的，把信仰、禮儀、規誡等，分別傳授，然後合成整個教會。曾有人講起公教教會，說：「他們相信天主爲救贖人罪的緣故，做了人，代人受苦。事實上，他們所說的降生便是他們全部信仰的中心，餘下的一切，都從這裏來。我也該承認我們如果相信了這端降生的道理，其餘的一切道理也必非信不可，甚至聖衣、聖水等，也必篤信無疑。」（見 Sullerot, *La Vie Chrétienne*）T. 1, 1930, P. IV-VI.)

但我們不該怪十六世紀末葉的中國人不能像同時代的西洋人一樣，理會得這種綜合的傳教方法。在目前的世界，大家不想仔細研究教理，斤斤於細節了，局部異同的爭執，已成陳迹，有人說眼前便是再有一個路德出現，也不會勸得五百

人相信他。現代的人們要是相信了，便完全相信，否則就完全不信。因此，我們不妨退一步，承認利公爲適合聽來的腦力起見，與其專講甚多信友的全部精神生活，還不如伸說天主教各端道理，一貫合乎理性，而且他在十七世紀的中國，用這樣的方法來傳揚聖道的確收得了極廣大的效果，要比不拘那一處都廣大呢。事實上，他到中國來開教，不像當時的全體傳教士一樣：向人先把天主教中所有的情狀約略說明之後，便問人：『你要不要進教？』却問把天主教所有各端主要道理詳細講過一遍，然後問人：『信天主有甚意義，你不知道不知道？』

有人說：『個別勸人進教，目的在吸引個人，增加的教友是看得見的；傳道化人，宗旨只在給大衆灌輸教義，點化人心。這和個別勸人進教不同，但使人信服天主教道理，正是趨向着個別勸化，成立公教教會的道路進行。個別的勸教含有實行征服人心的意味，好比在大海中撒網捕魚；傳道化人，含有和平播散福音的意味，好比擎起火炬，燭照世人。不消說得，這兩件事是殊途同歸的。十六七兩世紀中的傳教士們（除了東印度羣島的諾貝利神父外）大概都只知道個別勸教，便是他們所有的「引子」也是對那已經報名學習的人講的。傳教中國的耶穌會士却不然：在羅明堅時代，尤其是從利公來華以後，便已廣行傳道化人的方法了。這種方法，表面上，似乎把個別勸化增加信衆這件事擱起了，却把天主教全部道理和所有實在情形盡量灌輸給大衆，使中國人對天主教獲得廣大的認識，深切的了解；能這樣，就夠了。這傳道化人的方法，目的全在使聖教會的真道真光普照一方，不但使人認識真實的外觀，更要使人懂得聖教會固有的精神。到後來，不但信衆要日盛月增，而且甚多聖化也要深入人心，教外僉兆人民腦筋裏都要留着天主教的印像；那時大家就要認爲大有裨益咧。這種方法的原有目的，能不能達到，只須看當地大衆的思想知識，對天主教是不是相接近，可以使他們早晚歸依聖道，做真正的教友。播

種式的勸教法，原是針對大眾人民的把日後民衆的棄邪歸正，看作自然的結果，所以利公主張用這「祇宜晚成不宜急進」的方法，來傳報這玄微高妙的福音聖道。

明季的東林黨人，後來便成了接近基多聖化，可以使他們聞道歸依的大批羣衆；但要如願以償，利公就不得不容納幾種習俗，簡稱「中國禮儀」。不料後來竟致鬧出極大風波，成爲在華教士紛爭聚訟的焦點，這事的究竟且待下章分解。

(註一)畢嘉司鐸 (P. Giallani) 一六八〇年的手書 *De ritibus Ecclesiae sinicae permissis apologetica des sertatio* 曾提出各種文件 (原文現存徐家匯檔案)。范禮安會長一六〇三年的訓令澳門方面一六〇四年四月七日開會時，諒加道認。勃魯格司鐸 (P. Brucker) 書中也曾述及 (七七〇頁和註二)。

(註二)謝列克氏 (卷三，一〇〇九——一〇一〇頁)——大概蘇如望的這本要理問答和桑德司鐸 (P. de Sarte) 所提及的那本問答總有些關係。

(註三)這本問答一六〇三年還沒有印行，下一年，利公會把抄本送交李應試潤飾。龍華民用的要理問答譯本很簡略只有四頁 (利傳卷一，四二二頁)

(註四)此書初名「天學實義」一六〇三年尚存一部份。澳門神學家開了一次會議後議決「天主」和「上帝」這兩個名稱准予沿用但不得用「天」字，所以利公把這本書改名「天主實義」。

(註五)見勃特氏，「印度佛教講經問題」七八頁。

第六章 中華民族的風俗和禮儀

關於中國禮儀問題的爭執是在華傳教史上一件著名的大公案；參加爭執的雙方都想從利公的遺著中尋求他當時對這件事所有準確的論調作根據，却都不能如願。利公不論在他的筆記中，或是在他所有業經發表的函牘上，每講起中國的廟宇，聖人，祭壇，司祭，祭獻等，總講得很模糊，有時也稱爲殿宇，賢哲，供桌，主祭，祀典，意義便不相同，因此對於某些禮儀，究竟是不是迷信舉動，他總沒有切實說明，加以斷定。

利公暮年，曾記：「儒士們專有的廟堂，便是孔子廟，一稱文廟，建在人稱學宮的地方；文廟正殿的主位供着孔子神像，或是供着一個牌位，這牌位雕刻得極精細，上面刻着孔子的尊號，刻的字都鍍金。主位的兩邊，都是孔子的子弟們，供的不是塑像，便是牌位，這些也稱爲聖賢，每逢朔望，本城的官長和入學的生員們，都該到這裏來上香燃燭，行跪拜禮。到了孔子誕日和忌日，又一年中某幾日，他們還要來舉行大祀典，用三牲祭獻；祭畢，分食祭肉。他們用這一切典禮來感謝孔子在書中給他們傳下極好的大道理，使他們因此得以入學，中舉，成進士，受職做官，但他們並不念甚麼經文來恭敬他，也不向他求甚麼，和我們講起亡人時所說過的一般。」

如果有人問起：「這種祀典使人懷疑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祭獻？」龐迪我神父曾於一六零二年加以答覆，說是的。但一六零九年利公的答案，却不是這麼混統的說法。他把自己的原文加以修正，說：「這種祀典上香，用三牲上祭，原是一種祭獻，然而儒士們並不把孔子認作神道，也不向他求甚麼，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稱爲一種真正的祭獻。」

可是他在別的地方，却看出有幾種禮儀是一定應加指斥的，便是一般沒有信奉釋道嫌疑的讀書人所行的某些儀式，也未嘗不如此。他說：「他們還有那保障一鄉的城隍廟，和別的神道的廟宇，甚至官衙裏也有廟，每當上任接印時，他們也要在廟裏行禮設誓，就任後，誓必守法奉公。他們也上香跪拜，用次等的祭牲奉祭。他們對這些神道求庇佑，承認他有賞罰的權力。」

我們讀了這些記載，便知人們只因力求了解討論中國禮儀的緣起，便把利公的真意完全懂錯了。所以我們倒不如先搜集利公的手跡，（這是極稀罕的）加以清理，把他翻譯出來，要力求忠實，不必添上註解，又要悉心注意到原文的異同，不妨說是「神學上的疏註」，然後可以按着史事前後的次序，排好了，設法尋譯原文的意義。

利公綜述自己所有的經歷，說：「在這班儒士中，有一種最重要的儀式。這種儀式自皇帝以至於庶民，沒有一個不舉行的。每年大家都得祭祀已故的祖先，祭品是魚肉，果實，香燭，束帛（窮人用紙錠）。他們尊敬祖宗奉祀的用意，是要表明祖宗雖然死了，可是奉事他們，要和他們活着的時候一般。他們並不因此相信已死的祖宗會來享祭，或者他們死後需要子孫奉祭。他們解說自己這樣做法，是因他們不知道別的方法，用以表現自己對祖宗的敬愛，和感戴的衷忱。更有幾個向我們說，設立這種祭禮的宗旨，還是爲活人，不是爲死人。這就是說，好教做子女的和一般無知愚民，看了一班大人物對於父母，死了還要孝敬，就知道父母活着的時候更該怎樣孝敬了；再則，他們並不把已故的先人認作神道，對他們既无所祈求，也不有所期待，所以祀祖這件事，並不覺得染有崇拜邪神的嫌疑，而且也許可以說得其中並沒有甚麼迷信舉動。」

這些話原已說得很明白了，但利公的遺著中還有一段講得更切實，他說：

「或問：儒教實在不是一個宗教呢？答曰：儒教既不命人信仰身後禍福，讀書人又多兼信着釋道兩教的道理，因此我們斷定儒教，在正式上不是一種宗教，實在只是一種學會，為求國家長治久安而建立的。所以他們不妨入天主教做教友，兼入這學會做會友，因為這學會的宗旨，並不和天主教信德道理相背悖。」

那時，日本國內的情形，却和中國大不相同，我們很可以借此給利公的見解下一註釋。日本在十六世紀末葉，正當脫離外藩封建專政時代，虧着三巨頭先後統一，前仆後繼，才把跋扈專橫的藩鎮，和掌握軍權的僧侶，蕩平打倒了，同時，佛教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勢力，也因此日趨沒落，更因着中國思想的發動，佛教教化更見得漸漸陵替了。

然而日本的孔道還不能立見抬頭，直到一五八七至一五九二年間，才有一個尊崇孔子不做和尚的 (Fujiwara Seikwa) 初次出頭，自創一派。他的弟子 (Hayashi Razan) (一五八三——一六五七) 更一味推崇朱熹的理學，——這是利公所攻斥不遺餘力的——所有著述，專事鼓吹排斥基督多聖化，要求日本當局取締禁止。從此以後，日本的孔道雖則在思想上擺脫了佛教的羈絆，却仍不脫僧侶專橫恣縱的形跡，積習要在孔子只重道德倫理的教誨以外，更實現其出入主奴的妄想。這派中做師傅的打扮得和僧侶一般，新進的徒弟們，都得先到一種傳習所受戒領教；學畢，便剃去頭髮，敬拜神道教的古代神靈。日本的儒教是這樣要和天主教相容合併，顯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這實在是一種和佛教對立的「宗教」咧。

誰都知道利公在中國所見的儒教，和日本的截然不同，如果有人問他：「中國儒士們，是不是敬拜邪神的？」他就決然回說：「不是，」說着大概還得把當初發表過的一種比較嚴格的評判，加以改正。假使那人再詰問他說：「他們尊孔祀祖至少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做的這些事情是迷信舉動罷？」利公便說：「這不見得是一定吧！這些事在表面上看來，對他們是不

利的，我也不爭論，但究竟也許可以說這裏頭不見得有甚麼迷信的意義啊！這些話的後半段，前面我們也已提起過的，確是利公親自說過的話。我們聽了這些話，足見他的含蓄審慎，毫無武斷的意味。

但利公認定中國清儒士們習慣的行為，不顯然含有迷信意味的時候，這些習慣却是可以和其他民間習俗相融和的。天主教雖然全憑着和平的方法傳入中國，仍不免要因此引起種種困難。這些困難和聖教初興時代所遇到，使古羅馬帝國因以釀成真正革命的困難相彷彿，如今也和那時一般，有一個可怕的問題：「基多聖化將來如果如願廣揚了，那廢中國舊禮教所寄托的古文化要到那裏去呢？天主教是不是要和中國古文化謀協調呢？還是要像回教一樣，不願意或也不能和異邦人的民情習俗相融和，非把一切澈底毀滅不可？」

這個問題和中國的前途大有關係。看來利公也決不願違反先例，別謀解決。當初基多福音突然傳入西歐各國的時候，確曾惹起了非常劇烈的反響咧。

宗教史上說得好：「如果聖教會只顧熱心傳教，不曾看清楚種種事實，不憑真知灼見來觀察一切，就不免要自趨毀滅了。我們但看他對於奴隸制度的措施，便知這件事辦得再好沒有了。一般人妄想革故鼎新，以為只須頒佈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幾百年的制度習慣一舉廢除了，因此，責問聖教會為甚不像制憲當局撤消各種特權一般，不把奴隸制度突然廢除。聖教會却向逆轉的方向計劃進行，凡是有歷史意識的人們都懂得這正是基多教化所有一種最妙的景象，聖教會決不想趁混亂的時候在一堆瓦礫中起造一種革新社會的大殿；却要按部就班地緩緩做去，用賢明而近乎使人不覺得的方法漸漸進行，把現有狀況加以改革。聖教會一面教奴隸們服從主人，教主人寬待奴隸，更對信衆諄諄教誨，要切記基多對人一律平等的

聖訓，大家都同樣領受神恩，都能担任各級神職，先安定了大眾的心理，使社會上羣衆的見解咸趨一致，結果不須採取激烈的方法，自然而然地達到了廢除奴隸制度的目的。」

巴不得西洋文明和中國文化相接觸，不論在過去時代或是現在時代，都是憑着聖教會從中提挈，才溝通的。現代新中國的當局，追溯到當初在利公和他的後人們指導下，中西文化相接觸時所有友好的情景，未免有些覺得遺憾，這的確是不足怪的事實上，那時耶穌會士們遇到了那和古羅馬末世所有極相彷彿的種種問題，便不得不依着天主教傳統的原則，緩緩進行，尤其是利瑪竇神父孜孜不倦地和人論道，專務傳道化人，若見教外人感受福音的影響心裏動盪不安，當作一種革新進步的良好現象而表歡迎，可是過了好一會，依然影響全無，便不得不逐層逐級地，着手建築中華聖教的基礎了。這裏簡直是他從未見過的另一世界；這裏的人，和他以前在義大利和葡萄牙的舊相識截然不同。從前羅馬學院的老師們，只教得他判斷良心的原則，如今中國人的心境特殊，他得逐步加以分析，才能斷定；比方他初到中國的時候，便遇到不得解決的納妾問題；「新教友對於正配以外的妾媵，多有願以兄妹相稱，同居家中的，要他們實行遣回娘家，那真是中國人所不容的侮辱，究竟該怎樣解決呢？」利公對這件事却不肯通融，非教他們決絕分離不可，那時還有一種流行的習俗，把孩子過繼給他人，償還一筆養育費；這件事他却不加禁止。

其他更複雜的事情還多着。聖教規誡是不是必須一律遵守，沒有例外。比方：每主日該與祭；嚴守大小齋是不是該和別的地方一律辦理，放重利，開押當，這些事實究竟許不許；給婦女們付洗，那擦聖油，摩吐沫，吹氣等儀式，是不是該廢除？可不可以給她們行終傅聖事？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的問題，非經詳加研究，仔細調查，實在是無從答覆的；便是詳加研究以後，還

是多次說不清。

當教士們研究宣講聖道該不該援引中國經書的時候便遇到了這樣的情景。

利公在「天主實義」第二篇論中曾說：「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有聞其釋，固庶幾乎。」他的意思就是說：「儒家承認宇宙間有大造，講做人要正心誠意，這些道理我雖然還沒有完全研究過，看來却離真道真理不遠了。」論到朱子所說的「太極」又說：「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於天地之主宰，未聞有尊奉太極者。」以後他又引周頌：「上帝是皇」；明昭上帝；商頌：「上帝是禱」；雅：「昭事上帝」；禮：「上帝其饗」；「以事上帝」；湯誓：「吾畏上帝」；「惟皇上帝」；金縢：「乃命於帝庭」；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等，來證明中國經書上所說的「上帝」便是西士所崇拜的天主，因而歸結到古儒「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又說：「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己稱，南昌太守稱爲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爲南昌縣。」

原書舉例極多，不必贅述。我們讀了這些論據，便知利公所用的方法顯然是始終一貫的方法了。他希望先給中國儒士們開啓聖道之門，結果，一般迷信仙佛的平民百姓自會翕然風從，因此，他潛心研讀中國經書，尋求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一派相傳之大道，更探本窮源，旁搜遠紹，求漢唐以上經學家的疏註，和當代流行的習俗相對照，再去請教當世通儒，聽聽他們的意見，不知經過了幾番探討，多少深思熟慮後，才敢斷定中國人所有這種傳統古道，除去後世的增補，認爲信奉天主教的中國教友大概能習行全國通行的某幾種禮儀，只要依照古人的初旨，把這些儀式重行訂定，不使沾染釋道兩教的迷信意味就是。

這種遲緩而審慎地，循序前進的步驟，便是那些對利公深表景仰的人們似乎也沒有深切體味到。自然，中國的儒士們聽了利公的議論認了錯。依着宋子的學說，祖宗的靈魂便該認爲早已消滅了；他說人死魂散，譬如果實先生後熟，終歸腐化，生的果實還能保存，熟就不能保存了。……一個人活到壽限滿了，安心就死，他的形質就熟而腐化，這就完了，這種結局聖賢亦所不免。……夭折的人，死後陰魂不能即散，再則善養靈性的人，如參禪入定的和尚等，死後魂魄強盛，也不能即散，所以這些人的魂能暫時留着，因而有顯應作祟等事。人間的祭祀，所以延長他們靈魂的壽命使之不滅。所以祭祀可以使鬼神來享，祭祀一絕，魂魄就散盡了。『我們讀了這些理論，更可以明白孔子的靈魂該怎樣了，這正如戴神父所說的：『照朱熹的話我們知道人死，靈魂就消滅了，若是聖賢便消滅得更快，孔子現稱至聖，他的靈魂在二千三百年前早已沒有了。後人崇拜孔子，祀典懸延不絕，不過是尊崇他的名字，紀念他的德教罷了。』十六世紀的儒士們沾染着唯物觀念，只承認一種和他們以前服膺的唯理主義相矛盾的道理：這便是佛教學說。因此，他們以爲利公引經據典，來證明靈魂不滅，大概他所講的天主教，看來便是佛教的一宗。便是有學問的和尙也當他抄襲佛說，來攻擊他。比方，杭州雲棲寺方丈祿宏和尙曾寓書利公，說：『天主教剽竊了淨土宗的教義，這是佛教的旁門左道；教人留意慎防，在我是責無旁貸的。』當代士大夫大多數也懷着這種見解，便是一班和利公交好的正人君子也在所不免。十八世紀末葉，清代乾隆帝編訂的四庫全書中，也採入了這樣的話：『新傳來的天主教，和佛教道理大同小異，雙方都信人有身後禍福，按各人的功過行賞罰。天主教人所以駁斥輪迴六道，不禁殺生，無非要與孔子的道理謀接近罷了！』

利公在華所揭櫫的教義，當時中國人每當他是「佛教的胚子」，後來又被許多歐洲人認作一種「含糊滲入天主教

道理的孔子之教」尤其是在禮儀案爭持不下的時候。現代的幾個唯新派，却又隨即便竟把當作「不同信仰的熱心調和人」了。這些批評早先即有成論，其中的緣由不難一索即得。自從十七世紀開始以來，不論是在日本，當一六一四年教難以前，或是在澳門，當耶穌會士被驅逐以後，有幾個耶穌會士一見利公論證天主教道理所引據的話，竟是出於中國儒教的經書，便不勝驚惶駭異。在日本方面那時已統一了，便有人排斥朱子提倡王學，彼此相持不下，因此起了極大的混亂。政府便下令禁止王陽明心理學說，認為染着天主教色彩。」（註一）

各方面對於利公既然這樣意見紛歧，態度不一，便是一般爲利公辯護的史家，每想到這個關於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禮教的複雜大問題，說不定也要感覺賦煩：這原是不足怪的，這些史家我們不妨把他們分作兩派。一派注重在把確屬政治的，或是民情的禮儀，和確屬宗教的，或是迷信的禮儀，加以區別，這一派，大都是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史家。他們把這一點看得非常重大。但前面我們已說過了，這些事情要在利公的遺著中覓取確定的論斷是徒然的。另一派主張要是絕對認定這些典禮（祭祖祀孔的典禮一併在內）對於古制並無不合，那也未免過於武斷。因此，只說這些典禮中有許多大概沒有什麼不好（註二）這一派大都是在北京和中國內地傳教的教士們。我們以爲現在既沒有確定的文件可資證實，只好說利公沿用當時通行的成語，却沒有想到給這些成語下一個準確的解說。他說的話即使有幾句，可以使我們認他最初是屬於「或然論者」的一類，但似乎這也設法加以證實。他離歐東渡的時候（一五七八年）那首創「或然論」的多明我會士巴多茂梅迪那（Barthelémy de Medina）的鉅著剛在薩拉蒙加刊行問世（一五七七）四五年後，耶穌會士華司蓋氏（Gabriel Vasquez）又繼起立言，把這種學說詳加闡發。這當兒，利公先在臥亞，後到中國，重洋遙隔，音訊難通，對於這種新興的學說

自然沒有研究的機會了。

因此，我們縱觀一切，以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呂蓋（Luquet）教士對於本問題的評論，還不至有偏袒嫌疑，不妨加以採納。他說：「初次着眼，似乎耶穌會士們怎會容忍這些滿載着迷信色彩的習俗，實令人難以索解。可是在對他們的舉動遽下判斷之前，還有幾處極重要的要點，也該考慮一下。他們的成功，起先不容易覺得，又遭受了種種艱難，這在步武吾主芳蹤，從事傳教救靈的人是所不免的（按呂氏不知道利公等初到中國時讓人稱西洋「僧侶」，才得在肇慶容身）；却因這些熱心教士們有恒心，又有信德，才能排除一切障礙，創立了天主教會。這班教士中，有一位利瑪竇神父堪稱為一個最有聖德，也是最有才幹的耶穌會教士。他來華不久，便知中國人也許是全世界最自負的民族，他們自命天下第一的國家，（按說得更切實，是獨一無二的國家，正如古羅馬帝國對四週各小國目為化外蠻夷一般）要得這些人民的信仰，非用一種格外特別的辦法不可，據我看來，這樣的人民一見有人傳授一種外國的新戒律勢必羣起阻撓，如果憑着尋常的方法來排除這種阻力，那麼，除非天主發幾個聖蹟，這簡直是辦不到的。他又知道吾主從沒有許下把聖蹟作為傳佈福音成功的主要條件，所以利瑪竇研究中國人的風俗民情，要從此尋出一條最好的辦法，照着這辦法做去，來協助天主聖寵的施展。：他覺得一方面，該設法壓伏中國人的傲氣，教他們看看西洋學術的精微玄妙，而自歎弗如，因此消釋他們所有對外國人的嫌怨和藐視心理；一方面，却該悉心留意，讓過中國人驕矜自負的某幾點心理，知道那時，這些地方是不能攻擊的，否則他所有成功的全部希望，一下就給毀滅了。：不久，他就依着這個根據，定下了傳教的整個計劃，按步實行，這種計劃果然是看不慣的，可是聖教史上不乏先例，儘有充分的根據。」（見呂氏一八四二年前主教書一〇〇——一〇六頁）

從此，利公就以歷算家，輿地家，特別是大家所不會充分說明的道學家的資格，和中國人相見了。他所有最是膾炙人口的名著，便是那幾篇關於道德倫理的論文（交友論，二十五言，時人十篇等），中國人推崇他，還以湯若望南懷仁爲背境。

呂氏又說：「他也悉心研究中國人的經史和宗教信仰，選擇所有和天主教信道可以相容不悖的年表，因此他竭力追溯中國君主制度的原始，推究到極遠的時代，却不背我們聖經的記載（事實上這是利公的後人們推算的）至於儒士們所宗奉的孔子，他只推崇他的倫理學說（按，這不是宗教基本教義一般人往往頌揚得太過了）這全是按性律講的（按利公從沒有說過中國人在上古時代得到了神的啓示）他認爲不該立即斥絕對這位有大學問的明師所有過分尊崇的習俗，關於教外人，士所有過度尊敬祖先的這件事，他也採取同樣的權宜辦法。他見中國儒士們所有的各種原則，其中並沒有甚麼和天主教原則絕對相反的地方，便以爲暫時容忍了，將來更容易達到廢除的目的，不致發生衝突。」

最後的這句話，把利公的基本思想很適當的說明了。因此，利公不把一切喪儀，不分皂白，痛加指斥，却說「最好爲亡者靈魂賙濟窮人，來代替舉行這些儀式。」呂蓋上書後，那「異教形式依然存在」的問題，便因一位羅馬有高級職員的請求重行提出，由兩位聖教古典史專家巴蒂福主教（Mgr. Baffol）和白萊依（Louis Brehier）會同處理，對日本人民因日本政府所表現的態度（一九一九年）而發生的良心問題下一定斷。

那時巴蒂福主教的結論說：「大家知道羅馬教中實在沒有所謂鑲職階級，司鐸們不過是受任主持典禮的世俗中人。因此，他們在敬禮皇帝上也得去參加。都市中所有敬禮皇帝的司祭叫弗拉民（Flamen）省裏的加上本省字樣。……有幾個在本城，或是本省，很有地位的基多信友，能不担任這種司祭的職務嗎？可以許他躲避嗎？埃維爾（Evin）公會議（三〇三

年）沒有決定絕對禁止天主教信友，不得担任這司祭的職務。公會議說明崇拜邪神，和殺人兩種罪該受絕罰，而且絕罰後聖教會是不肯寬免的；但公會議對於只帶司祭禮帽，去担任這種司祭職務的信友極度寬容。這樣逾格通融，一百年前的戴多林一派人見了勢必要大聲呵斥的，戴多林沒有想到天主教和偶像教的分界線，是可以移動的，使崇拜邪神成為俗禮的事實。有一天，皇帝信奉了甚多，把這種祭祀廢除了，弗拉民的職務就要成為一種沒有宗教性質的民間俗禮，正如我們的騎士會只算是一種榮銜，全沒有軍事性質一樣。」

巴蒂福主教對於日本新教友的這件公案所援引的原則，便是這種應付使崇拜偶像通俗化的原則，可是他在依着這種原則進行解決的時候，便不得不提起歷任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禮儀案的通諭加以解釋。他說：「格肋孟多十一世（七一五）曾諭知凡是對死人表示尊敬的舉動不必加以禁止，但以不涉迷信及不染迷信色彩為條件，」我們該注意格肋孟多，比在德奧道削和儒斯底尼時代教會較嚴厲，便是染有迷信色彩的舉動，也必加以禁止。可是他也認純屬政治和民間的禮儀可容存在。我們也不妨以為這些禮儀，或因國家法令的宣告，或因民意的轉移，漸漸化成俗禮就把這些禮儀化成純屬政治和民間的儀式了，把原來的宗教儀式，就此變成了非宗教，虛應故事的儀式。」

據我們看來，利公和他的上峯澳門當局當時正處於這樣的地位。他們並不否認中國禮儀中有幾種至少染着迷信色彩，還有幾種實在是迷信舉動；但他們相信只要留心把其中所有屬於釋道兩教的儀式完全剔除（這確然是迷信舉動）未嘗不可把這所謂純屬儒教的典禮逐步移轉，完全化成民間的俗禮。

各方面對於本案的意見頗有出入，關係很為重大。可惜當時利公和范禮安會長商妥後給屬下信眾詳細規定在習俗

上遇到疑難，如祀孔祭祖兩事時，該怎樣應付而頒發的那道通令，如今已無從稽考了，使我們不得不引為遺憾。將來也許有誰微倖，要在檔案中找到這宗文件。但無論如何，我們以為眼前我們不妨引宜謙文多利神父（P. Tacchi-Venturi）的話作為結束。他說：『看來我們不能責備利瑪竇神父遠在未經聖教立法當局決定以前，便已斷定不宜絕對禁止屬下新教友所有對於孔子和祖先的某種舉動了。事實上，利氏在悉心考察，深切研討之後，才斷定這些舉動或者至少其中的某幾種，已經化成，或者有一天將化成，和其他許多完全失却宗教意味的禮儀一般的習俗。然而大犀神父（P. de Grandmaison）論得好，種種的舉動，文告，說辭，以及種種可以容許不致在新創的教友社會中發生危險的習俗，既經與異教邪道斷然分離，幾時認為有跡近迷信，或是敬拜邪神的嫌疑，就不可再事姑息，免得引人誤會，這原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傳教國的教會神長，也都是這麼辦着，更證實了這種主張的不謬。』

這一點說明了，我們就可以用教宗的定案做靠山了。事實上，教宗格肋孟多十一世曾在他（一七〇四年中國禮儀案）的通諭中取用梅格祿主教在他（一六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詔書）中加入的聲明。教宗說：朕的用意不在譴責一般前此別有會心，循行着一種和朕諭令嗣後當循的習慣不同的人。因為在這種事情中，教士們的見解各有不同，由於天主的安排，各自依着自己所認為最合真道的辦法做去，這原是不當引以為怪的。這些話就把曾經參加禮儀爭議的一切人物完全開脫了，因此，我們對於那些在世時代，遠在這些意氣之爭發生以前的人們，如利公等，只援引這一節論文，作為論據。他們的本意無非是在尋求這條最合着真道和愛德的道路，按照當時的情景，在可能範圍內，採取一切保障的方法，作為預防罷了。那時，耶穌會教士中又會發生一種和禮儀爭案很相近似的爭執，就是關於用以譯述天主教中所有各種名稱的辭令問題的

爭論。利公爲避免引起這種糾紛起見，曾不憚煩瑣，向澳門上峯和同會諸公請示商榷，但「字句不論用得當不當，不過用以傳達原文的意義，用得精當就審定，不當也該更正，和基本信理一定不易的性質並無關礙。譯文中有些字句在未經聖教會審定確認以前，只算是非正式的譯文，用以表示信道的概念，未免染着一種特色，有一點謬誤，有時竟帶一點異端邪說的意味。因此，用了這些字樣就不免要啓人猜疑，引人誤解甚至要被人斥絕。以後就該用一種詞意分明的譯法重伸原來純正的意義，免得一種通曉的典實。這裏，我們且不必縱談關於這些表明信道「體」「性」「位」的辭令怎樣幾經變遷，方臻妥善，但我們提起這一類的事情，就足見種種問題原是非常複雜，旨在引起一般聖教史家的注意罷了。現在我們不妨把這些問題暫爲擱置，繼續敘述正文。

(註一)近代日本（陽明）學大行，中國學者們研究陽明哲學的也日盛月增。可參閱最近上海耶穌會華籍司鐸王昌社氏一九三六年考取巴黎大學哲學博士的論文：「王陽明的倫理哲學。」

(註二)利氏原著中沒有在「政治儀式」和「宗教儀式」間加以區別後來金尼閣把利氏筆記譯成拉丁文論及利公的罪事才有了這樣的識別。
(見利傳卷一，六四九頁)。最近考大家研究中國的古禮，已漸漸證實了祀祖一事，的確含有迷信意義，尤其是在殷代事鬼的風俗，盛極一時，迷信意味再濃厚沒有了。

(註三)澳門神學家的會議，由澳門主教蔡基拉 (M^r Cerqueira) 和范禮安會長任主席，核准沿用「天主」和「上帝」兩種名稱。參照各方面的記載這一次的會議，諒必便是一六〇四年四月七日舉行的會議。

第七章 一六零四大比之年

在華傳教的教士們眼前認為最迫切的事情便是怎樣設法鞏固現有地位，至今，一切還懸在皇帝手裏呢。萬曆皇帝把利公認作他的內廷供奉，所有供應都由國庫支給，又命工部在皇宮中建造一座華麗的鐘亭，安放那自會發聲的自鳴鐘。一般對利公心懷嫉恨的朝臣們，知道他「聖眷隆重」的好地方，便沒法把他驅逐出京，但這位天子，幽禁深宮，久不臨朝，大家都見不到，便是朝廷大臣也難見他一面，和外界通訊，都得假手宮中近侍。這簡直是個徒擁虛名的君主，得到他的保護有甚麼價值呢！

利公原以中國皇帝必然也像西班牙王斐理伯二世一樣，是個獨斷獨行，絕對專制的君主，不料他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國的軍政大權，全是由少數官僚把持着。這種景象歐洲在十七世紀初葉時竟是無可倫比的，奧爾德（Du Harle）神父會記着：「這樣一個大民族，人民又是終歲勤勞，孜孜爲利，只想發財致富，却被各省的少數長官統治着，守規矩，盡本分，十分服貼，真教我們見了，不禁稱奇納罕。」大概有四萬人分掌全國重要職務，有極少數的進士分佔着首都六部職位，或者在翰林院供職，做着全國智識界的領袖。利公所謂「全中國」便是這班人，要入這種團體，必須經過科舉考試的途徑，逐步攀登。這班人的意見代表着全國的輿論，有左右民意的力量，教士們不能在中國立足，要看這班人是否歡迎，只靠皇帝的優容是不夠的。如果他們能廁身士林，和士大夫完全融洽，就不用惴惴恐懼，即使惱了皇帝，不再保護，也可以站得住。

利公從肇慶韶州推進到南昌南京，二十年來，苦心孤詣，慘淡經營，退則閉戶研讀經書，出則和士大夫周旋晉接，却不曾

達到這種完全融洽的境界。這班士大夫自命聖門子弟，儼然以「衛道黜邪」爲己任，凡是不合孔道的思想學說，一概當加排斥，對於新興的宗教，更恐人民聚衆作亂，防閑格外嚴密，因此利公審慎將事，在沒有晉京入貢以前，不得不隱約傳播天主教道理。他所以能得一部份智識階級的優禮，大抵是因他對人自稱大西洋人，只爲「仰慕上國風光」，才到中國，要傳授西洋學問，仰答隆情所致。但如今自從他的「天主實義」一書刊行問世以來，他來華的宗旨便已昭然若揭，不能再有誤會了。他用西儒的名義把他的自鳴鐘，萬國輿圖，天文儀器樂器，歌譜，連天主聖像，交友論等，進貢的進貢，送人的送人，使中國的朝臣士類都受下了，然而他所傳報的福音怎樣呢！中國士大夫究竟領情不領情？如果自己領情，別人領受了，容得容不得？

這件事那位視察中國教務的巴默祿司鐸曾於一六二九年借十七世紀初葉歐洲當時的情景作比喻，加以解釋。他說：「我們試想一想：比方有一班熱心傳教的回子，想遍遊歐洲各國，到處分設機關，從事傳教，有幾個在羅馬宮廷裏，有些在奉教國各大都市中，他們更想進一步造下教堂，給人講高蘭經，勸人投入穆漢默德的門下；此外還要和希臘，土耳其，和其他異教國函牘往來，常通音訊。那麼，我們假想他們陰謀裏應外合，是不是在情理之內？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疑，還要厲害得多，沒有一國比得來，而且要比歐洲各國疑忌回教徒更見得有來由。因爲澳門表面上算是中國的領土，却落在葡萄牙人手裏，他們鑒於四週的斐列濱摩六甲東印度各羣島被西洋人攘奪佔領的往事，那得不引爲前車之鑒？」

因此，這幾年來，利公所有當前的重要問題，便是他不但要維持自己做「中國皇帝主顧」的地位，更該竭力設法，使自己和中國的儒林士類，也就是中國的統治階級，融洽無間，否則，他種種努力勢必盡付東流，二十年來慘淡經營之所得，難保不盡毀於一朝。如今他在京取得的地位，使他和同志們所需必要的生活費有了着落，不必再遣人跋涉長途，到澳門去領取

接濟，這原是很可欣幸的。一六〇四年，正當大比之年，全國舉子來京會試的約計五千餘人，還有和他們同來的親友不下三萬餘人，此外更有大批官員分任主考、閱卷、監考等職務。利公的筆記上，曾記載着：「這當兒，北京的神父們便乘機去拜會這班考官，和他們聯絡情感。他們見我們享着盛名，很有聲望，一般大人物又敬重我們，對我們很優禮，便是那些懷有惡意，要和我們為難的外省官吏，也不免有所顧忌了。因為他們怕京裏的神父們不難對做他們的上司的朋友們，提起他們的壞處，這就使他們吃了虧啦。」

這樣就因着利公決定策動的方略引起一般好奇的史家，尤其是野史家，張大其辭，說得天花亂墜，講述耶穌會士們在各國的傳教事業，說甚麼「鐘錶和日曆是勸化異教人的工具」啊；「耶穌會士在北京宮裏做教授，和外交官」啊；「一種園藝家和出征的畫家」啊；「噴水泉和機械獅大奏功效」啊；我們但看這些題目，便不難想見這班藝術家和小說家所有想入非非的論調。他們的結論，更鄭重伸言北京神父們所有這種「驚天動地」的聲勢是不會終止的。後來，十八世紀在華傳教的錢德明司鐸（P. Amiot）講起乾隆時代皇太后六旬萬壽的盛況，末了曾說：「我們爲了聖教利益起見，才投効朝廷，以期獲得皇帝的善意，庶幾他即使不肯優待教友，至少不和聖教爲難，聽任司鐸們自由勸導一般願意聽從的人民歸認基督。」又有一位教士，在這教難期間，也曾記着：「北京的許多教友都能自由進堂誦禱；至於外省，本會神父們也不敢驟得教人找不到。地方官府只看不見，因為他們知道這裏我們和皇帝的關係。」又康熙時代的欽天監監副兼代監正的安多司鐸，在測定直隸經緯度的說帖中，末了曾伸說：「我們從歐洲來到這東方的極邊，旨在傳揚基督的真學識，我們現有的任務和我們的本職相去懸殊，願讀者們勿以我們分心務外爲異。我們在這北京的朝中，不啻做了奴隸，我們要爲基督服

務就得爲一切人做一切事：在中國這國家我們如果不得朝廷的優禮，宣揚聖道這件事就難以支持，也難有效果……必須把人事學術放在他們眼前，有顯著的功效，宣揚福音的人才能得人尊敬，使他們懷有善意，這些人心裏常輕視我們，正如我們歐洲人輕視美洲的野蠻人一般。既然教士們都跟着利公放棄了武力保護傳教的策略，誰還可以責備他用這種極和平而又極文明的方法呢？

會試那一年，來京的人很不少。從這一年起，利公又結識了許多朋友；這就使他得到了許多好處。第一，利公做着全國教士們的長上，便在李瑪諾神父奉派做了省會長的代表兼轄着南方三處住院以後，還是担任着會長職務，要聽取屬下諸司鐸的報告。這些地方每年有和利公相識的人來京公幹，相見的時候，利公便能從談話中得悉各該地方的情形，不但證實諸鐸的報告，還可以知道屬下的處境。比方韶州，雖則相距遙遠，却因此不啻近在咫尺。利公就知道龍華民神父依然度着極苦的生活，竟窮得幾乎分文無有。他漸漸做着教友們的公正人，有了爭執便請他判斷曲直；有時教外人和教友相爭，也肯請他仲裁。他的教友漸漸增多了；他和慈父一般照顧着。一天，他在講道中嚴厲斥責一個壞表樣的教友，講罷便見有一個長者來替這罪人代求寬恕，自願擔保他改過。耶穌獻堂，聖灰，聖枝主日，耶穌受難，等各大瞻禮日，教友們來堂與祭的很多，都按聖教儀式舉行典禮；受難瞻禮日，龍神父更創行朝拜耶穌苦難儀式，公念受難始末；教友們用了許多聖水。好幾個教友行告解聖事。教外人不曉得這是在人前承認自己的罪過，見了便大爲詫異，某教友更要當衆自訟所犯的罪過，龍神父却不讓他這樣做。又有一次，有三四個教友竟背經似的，大聲背誦起自己的罪過來了；神父便阻止他們，引他們到神工架上行告解。那時流行着做公補贖的習慣，那做官的喬治繼續用善表感化人心；某主日曾把他自印蘇如望神父的問答本，向衆人分發。又在

家中建立私堂，供婦女們公行誦禱，於光榮十字架瞻禮日（一六〇二年九月十四日）行奠基禮。有一個奉教老人聖名尼各老，他的妻子聖名桑福祿（Symphorse）連他的三個兒子，七個女兒，一家共有十餘人，不料一旦遇到了飛來橫禍，被人誣告。下獄打了幾十板子，把他的家產充公發賣，合家大小驅逐出宅。他的長子聖名伯拉濟德（Bartholomaeus）就此驚恐致死。其他的兒女也都凍餓成疾。他出獄後，備受教外人譏笑凌侮，辱及天主，他却效法吾主山園祈禱時的表樣，只說「願爾旨承行」。龍神父見他年高德茂，派他夫婦二人主管女教友的集會。他的已嫁女兒們有時不能來堂聽神父講道理，他就轉講給她們聽。他要是沒有空暇，便命他的兒子代講。有一個新教友去打卦起課，被龍神父責備，却仍不知悔改。一天他病倒了，才後悔起來，求神父去看他。神父不肯；他知道自己做差了，便把所有打卦的書送去了，表明以後決不再幹這些迷信舉動。神父就恕了他，但到了下主日，他得在彌撒中當衆做補贖。秋天慣常是容易害病的季節，龍華民神父和他的同伴黃明沙修士便不免都害了病，好幾時躺在牀上不能動彈。可是這年（一六〇二）年底，仍能給四十四個新教友付了洗，學習教理，保守的人數還要多。

到了一六〇三年，却有幾件事，使人大感煩惱。韶州城裏忽然起了一種不利的風聲，傳佈得非常迅速（有一個姓閔的小吏，大概是因勒索不遂，才故意破壞，不久便傳遍全城。）這回的謠言，大致是說教士們以前在肇慶時，曾被官府驅逐，教友們都遭責罰。後來肇慶有一個新教友到了韶州，謠言就消滅了。先是有了一個少年（是肇慶某官的兒子）路過韶州，對人說：「前幾年，西洋人曾在肇慶造了一座塔，塔下有地窖，他們就在地窖裏幹那駭人聽聞的壞事，據說後來被人揭穿了，關在地窖裏的人，才得救出來。這裏的西洋人，必然就是那肇慶的西洋人。」這些話，實在講得太荒唐了；種種事實就夠證明，這是無

稽譎言，怎能長久哄人呢！

還有幾件事情，更令人大感不快。一次有幾個江湖賣技的，從澳門來起市，冒充葡萄牙人，學他們的模樣，穿着不雅觀的短衣服，腰間帶着劍，手裏拿着刀，一路念着玫瑰經，在大街上公然行走，到聖堂裏跪地誦禱，男女混雜不分，教中國人見了要大罵無恥，因而對教友們羣起攻斥。可是這班做要戲的，對人講起「外國和尚」，却大加稱道，說要比中國和尚的學問德行好得多，因此，葡國官府對他們很敬重。所幸這班人的怪狀，並沒有影響到教士們的聲譽。平時官府和紳士們屢次造訪，如今便是在這班角兒扮演喜劇的大街上，遇見了教士們，也並不因此禮貌稍衰。一天有一位奉教的官員，洗名瑪寶，在街上遇見了神父們便下馬致敬。又有一次，另一位官僚也下轎招呼；更有一次，某官員下了轎，還陪神父們直走到街道中，使民衆大爲詫異。但民衆見官紳這樣優禮教士，却漠不關心，但看某年大旱，知縣和鄉老們迎神求雨，便可以知道了。那時南華寺的尊神羅祖也被鄉民抬出來祈雨，却毫無效驗，正合着民間俗諺：「羅祖老了，聽不到咧。」一次，井松村（？）人問女巫，她說：「觀音菩薩說，有人燒痛了她的腰，因此很不高興。」這話是對教友們燒燬了邪神像而發。於是教外人便謀殺害龍神父和他的要理教習。龍神父知道了，趕快跑去解釋誤會，到了井松村（？）却見教友們和教外人正在大開談判。教友們說：「既然我們燒了觀音，可見我們比她的力量大，現在她既然不能下雨，去年我們也曾燒痛了她的腰，她又怎麼肯下雨呢？再則那些地方沒有教友，怎麼也不下雨呢？」末了，雨下了，觀音當然不鬧了；那些教外人也就不安安靜靜的過去了。

中國南部的人民宗族觀念很重，這就成了傳佈福音的一大障礙。往往一村人都是一姓，從一個老祖宗傳下來，傳到十代，二十代，越傳越多，便造成了極大的勢力，便是府縣官見了也害怕。他們有祖塋，有祠堂，也有公產，家譜修得很整齊，規定着

特別的家法，族長的權力很大，族中出了不肖的子弟，可以按照家法把他處死。

可是龍神父所有最大的煩惱大抵還是由屬下信衆惹出來。起先他以為要保守教友棄絕邪神很容易，不料他們領洗後，有許多還是相信神仙，敬拜菩薩。他曾說：『不想要中國人棄絕邪神，竟比印度，日本人還要難。第一，到處有偶像，不但廟宇裏，便是家裏也供着。第二，佛堂，家堂，是家族的公有物，毀壞了對不起祖宗。第三，神像中也代表先賢的，不染着古羅馬人或是希臘人所有神像的色彩。第四，更因這些神像是古代帝皇所提倡敬供，到如今已有一千六百年了。要改變這習慣，非由皇帝自己發起不可。我們前書中，曾說他們不難棄絕偶像，現在應該加以解釋，說明「上帝」這名稱，他們解作至高無上的帝王。他們對於天主已叫慣了，對他的祭祀也做慣了，至於其他的神像，他們不過放在一邊罷了。我們對他們說這些神像必須銷毀，這句話，他們就不中聽啦。』他們『把上帝的神像放在正中的高位，其他的神像放在低位，或者放在角落裏，作爲臣下，却不肯讓人放在門外，更不肯讓人把他們砸碎，或者焚燬。』

然而障礙雖多，猶幸利公聲望隆重，名揚全國，所以韶州的教務仍能進行無阻。龍華民神父曾被入向州衙控告，說他教人銷毀祖宗的神影，這是認爲犯着不孝的罪名的。一天，他去見州官，知州便對他提起這件事，還說：『你停止吧，這是件極危險的事，尤其是出於一個外國人的主張。』龍神父就辯白，說他對於敬祖宗的肖像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的話不過及於神、仙、菩薩等偶像，這原是儒教的正宗所禁止的。知州便對這一點加以討論，却不敢禁止他宣講天主教道理。一六〇四年，那位義籍傳教士杜祿茂神父到了韶州後，教外人的仇視更深了。他到後不多時，那兼轄南雄韶州兩屬的觀察使，便正式來堂察訪。龍神父深恐教仇們挾嫌誣控，或是設詞矇蔽他，便親來拜見，把新印就的教理書呈請督閱。道台當着衆人，把利公在京的

近狀告訴他，又大聲說京裏人不讓利公回本國，替他代抱不平。龍神父知道他誤會了，便給他解釋，說教士們不願離中國，他們的宗旨在這教理書上說得極明白，請他撥冗過目。過了幾時，道台下鄉，到了龍神父寄住的村子裏，先到附近寺院中，召集村民訓話。知縣官受和尙賄囑，乘機入廟裏見叩安，當眾訴稱西洋人強借佛寺空地，聚眾宣講，形迹可疑。這當兒，龍杜兩神父還不知道這件事，正在某姓私堂裏率領信眾開會歡迎，等候光降。道台聽了知縣的話，當場大加申斥，說這些外國人都是知禮守法，德高學博的君子，說罷，便命伺候升轎，逕到天主堂，更傳諭教士以生員禮相見，使在場的官紳民衆個個震驚駭詫，舌橋不下。他到了書室裏，拿起一本西文書，翻開一頁，請神父解釋，這正是准予刊行的那一頁。龍神父便講給他聽了，說這是西洋管理出版事業的法律。他不禁大為讚歎。後來神父們陪道台和僚屬們進聖堂參觀，一時却找不到門上的鑰匙，想了許多方法開不來。龍神父怕因此起疑，就命人用力打開。道台見了，一切都感興味，也對天主像致敬，臨去的時候，還深恨小人陰謀陷害，把鑰匙都偷去了（下一天，才在園地上草窩裏找到）。後來知縣晉京述職，便去拜會利公，利公很客氣地招待他。絕口不提他在詔州幹過的這件事。

南昌也像詔州一樣，沾了利公不少光。在李瑪諾神父沒有從北京回到南昌住下，協助那體衰多病的蘇如望神父傳教以前，便已有一位瞿太素一類的人物，常出入於教士住院之門了。這位新客是福建人，姓林。林家原是福建的大族，世代書香，人才輩出，甚至有一句俗諺說：「有一場鄉試，就有一個林舉人。」這一位的青年時代，也像許多公子哥兒們一樣，混過了，更添上了許多風流韻事。先則縱情佚樂，把家產揮霍一空，隨後便四出遨遊，入山訪道，想遇到異人傳授仙家法術，可以點石成金，却不料一無所遇，卒至流落南昌，無顏回轉家鄉。他先在原籍娶過正室，生下了三四子女；到了江西，却又被南昌某宗室看

上了，不管他肯不肯，有沒有娶過妻，硬招他做了女婿，又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知道教士們會製造日暮儀，動了好奇心，便去謁見蘇如望司鐸，彼此相熟後，便談到了宗教問題。他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聽蘇神父講論聖道覺得親切有味，便願執弟子禮，拜蘇公爲師。蘇神父把自己著述的教理問答給他閱讀。這本書雖則篇幅很長，他却不嫌煩瑣，從頭到尾，親自抄錄，更不憚勞苦，每天步行半里許，到蘇公寓所，請他講解，聽到真諦妙理，便歡喜得手舞足蹈，樂不可支。蘇公和他講到第六誠道理，才發覺他有極大障礙，不能領洗入教。這件事實在極難解決，他先娶的妻室和他相隔千里，後娶的夫人因爲是宗室又萬萬不能離棄。這當兒，李瑪諾到了南昌，大家於是把這問題仔細討論一下。神父們研究的結果，以爲雖然姓林的不能給他付洗，他的兩個兒子，「美若天神」，却不妨讓他們領洗入教，只要孩子的母親同意就是。她滿口應承，毫不猶豫，可是她聽說要進天主教必須遵守一夫一妻制，便是妻子不生育也不得另娶妻妾，却表示詫異。於是兩個孩子便在聖瑪竇瞻禮那一天（九月十一日）連他們九歲的小弟弟，一齊領洗了。聖名是彌額爾，嘉俾厄爾，辣法厄爾。他們的父親雖則不能正式奉教，以後却也守好聖教會的規矩，和教友一般虔誠誦禱。

南昌的教友雖不多，却有好表樣，令人起敬。某衙門裏奉教的某師爺聖名葛思默，曾在他的辦公室內上貼了一副對聯，表明自己決不做枉法事。有兩個新保守先把他們的妾打發了，才請求付聖洗。過了幾天，其中有一個一夜失竊，銀子寶貝被賊偷得精光，却並無半句怨言。這真是極難得呢！因爲中國人銀子是性命哪！教友們繼續受教外人謾謗說：他們甘心讓這洋鬼子（指利公）勾引；他有點金術，弄得銀子，要用來奪取江山呀！這一年，全省大旱，（大概是和韶州的旱荒同時）府縣官在廟裏設壇求雨，十來天不得安寧。其次主日彌撒後，教友在堂裏虔誦禱文；下午就下了一場大雨。他們更求天主沛降

甘露，庶幾可得豐收，果然，又得了一場更大的雨。附近某村中，某姓婦自縊身死，有一個教友去相幫，把她放下替她求主，果然救活了，因此棄邪歸正。

北京新近出版的教理書，也開始發生好影響。有一個年前生下的小孩子，生下後，會由他的父親抱到他的隣舍家。這家人不敢替孩子權付，只給他灑些聖水，取名若望。後來，那一家搬到城裏，別處住下了，不久孩子便害了一場大病，睡夢中看見聖母（像路加聖史畫像上的模樣）喚着他的名字，「若望，若望。」他的病就此減輕了。他的父親便來求見蘇神父。神父要給孩子立刻付聖洗，但他很迷信，固執，定要揀好日子，結果雙方說妥了，此人又得了一部「天主實義」帶回去研讀學習，因此父子倆都歸化了。

南京的教務比南昌進步略見遲緩。一六〇二年李瑪諾神父從北京回南的時候，全年領洗的只有五十人。有一位姓周的老鄉紳，年紀已七十八歲了，家務早已交給兒子管，自己不聞不問；如今他一朝得聞聖道，要讓兩個老人家先受洗，隨後拋棄偶像自己也棄邪歸正，不料却被他的兒子再三反對，多方阻礙，竟不得不請羅如望司鐸協助他，才克勝了這重大困難。一六〇二年復活節，那位秦保祿去世了，喪儀都按照聖教禮規辦理，給南京的信眾留下了一個好表樣（註一）他的家屬也就相繼領洗，歸奉聖教城外鄉村中，也有幾個新教友，其中有一個在家中設立經堂，由他的妻子瑪爾大照管，每逢主日，要是不能與祭，仍邀集信友們齊來公行誦禱。一天，北京某教友帶了二十來個教外人，到南京求見神父，其中有一個是名醫，一個是某御史的公子。總之，天上的福音，以前似乎不得其門而入，如今却門路大開，教務日見發達了。但那時南京四郊却有一班吃素的清水教人，起先得聞聖道，似乎歸化很有希望，以後却冷落了，只聽得說空話，不見實行，教士們對這班人却遇到了消

極的阻力。

便在那時候，那位中華聖教的大柱石，明季一代名臣，大學士文定公徐光啓歸依聖教。他字子先，號玄扈，是那時中國道德思想，文章學術的代表人物，是頭腦清楚，富有思想而又最能通情達理的讀書人。現代人士誰都對他表示欽佩景仰，認他是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先進人物，對中國人的思想學術，有莫大的貢獻。在我們看來，他對中華聖教的豐功偉績更非等閒可比。他雖則位居臺輔，貴極人臣，却始終對教士們，謙恭盡禮，至於他衛護聖道，保障賢良，謀國的忠貞守正不阿的氣節，審慎明智，却又勇敢剛毅，實堪和同世紀的英國首相多默摩爾（Thomas Moore）後先媲美。他們倆同樣是文人學士，同樣讀書明理，同樣是朝廷重臣，又同樣是信德堅深，德表昭著，都是信道干城，都堪做我們的最好模範。當利公在南京行將北上的時候，曾和他見過一面。這當兒，他路過南京，行色匆匆，不暇深談細論，所以前書中，我們對這件事也不會加以重視。如今我們回溯前情，對於這位未來的中華聖教柱石，教士們賴他贊襄翼護垂三十年，才得在華奠定聖教會的基礎，飲水思源，自該把他的生平略歷綜述一下。

徐文定公出身士族，先世籍中州，南宋時代和一般士大夫避亂遷徙江南，便在這裏重整門楣，成立了文教之一邦。（丁文江氏會計有明一代，中國全國的大人物出在江浙贛皖四省的佔百分之四十四又八八，不知他是怎樣統計的。）文定的高祖竹軒公，從姑蘇移住在松江鄉間，十六世紀中倭寇攻陷松江，不得不攜家避難，因此再徙上海——那時，上海僻處一隅，不過是個濱海的小邑。大約文定於一五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誕生入世。他的兒童時代便在這清靜的世界中，安穩穩渡過了。這一帶地方水道縱橫，河流交錯，水上的消閒實在是最愉快的生活。每當春秋佳日，泛樟河中，但見兩岸垂楊，水

平如鏡，農村風景轉輾迎人，可以一覽無餘，大足令人心曠神怡。江南人善築橋樑，名聞天下，環洞石橋更造得美觀精緻，妙不可言。偶值天朗氣清，微風不動的日子，只見半圓形的環洞倒影水中，上下啣接，便成了一個全圓。這就象徵着中國人民生活的安和寧靜，而這種和諧的生活，便是中國全部文化的關鍵。在這土地肥沃之鄉，點綴着農民的村落，年代久遠了，便造下城池，成爲要鎮。徐文定也像民間子弟一樣，從小讀書識字，接着，便專攻四書五經，學做八股文章，預備將來應試成名。幸喜他天資聰穎，對於這種機械式的制藝，不難應付裕如。講他佚事的人說他八歲時候喜歡捉烏雀。他十九歲就進了學（一五八一）入泮後，父母便給他完婚，娶的是吳氏；下一年（一五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就生下了一個兒子。他仍孜孜攻讀，研究做文章，直到一五九二年五月八日，太夫人去世後，才暫時輟業。（他的父親死於一六〇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那時他已奉教了。）

他讀書並不拘泥字句，斷章取義。他很想從儒書中尋求那最深奧，却又講得最模糊的道理，這就是說人身後禍福和鬼神魂魄，等神秘奧妙的道理。（因爲中國各教門對於靈魂不死的道理都不絕對否認。）他在儒書中求不得，便又去研究釋道兩教的書籍，却仍不能覺得滿意。一五九七年，他去應鄉試，中了解元，下一年，便晉京會試，不幸落第。（後來他追思往事，才看出這回失敗是出於天主上智奇妙的安排，因爲他只有一個兒子，却不得抱孫子，勢必要娶妾，免得絕後。）因此，一六〇〇年他落第回南，道出金陵，便得和利公見了一面。事後，他記得利公和他談話時，但說天主是萬物之原，沒有提起靈魂不滅和身後禍福等大問題，因此依舊疑團莫釋。

中國人攷試落第並不灰心，竟有考一次失敗一次，頭髮白了，還要去趕考的。所以下一年（一六〇一）文定又晉京去會試了。那時，正當利公被人軟禁在四夷館，不能自由出入，因此不會和他相見。這回文定公的試卷原已取中了，列在第七名，却

不料依然被黜。原因是考官本該取三百名，却弄錯了多取了一名，成爲三百〇一名，不得不抽去一卷，就把文定公的一卷抽出了，不得成進士。這是他的惡運，但後來文定却認是天主的聖意，不過眼前，他還理會不得。他無顏回家鄉，便到廣東，在韶州做教官，却因此又得到了和郭居靜神父相見的機會。郭神父領他瞻仰天主像，他見了便和瞻仰其他的神像一般，肅然致敬。他一生稟性良善，作事很有決斷，所以到處受人尊重。然而他研究的只是些文章經濟之學，精神上依然覺得不滿足。他雖則學問淹博，却並不自滿，仍一志讀書，更求進益，對於科學也極感興趣：這無非是要增加學識罷了。但他特別注意的是身後的永福，專心一志的尋求着，要求得了才罷休。耶穌甚多俯察他的誠悃，已候在門外，來邀請他去赴天國的盛筵了。他和其他的人們不同，一經邀請，許他得享永福，深恐失之交臂，便毫不懷疑推托，欣然領受吾主的盛情。

本書中曾一再講起過幾個胸懷善願的人所有神秘的夢境，使他頓時豁然感悟，在進退維谷，狐疑不決的當兒，就此毅然決定了。一般研究異教人歸化問題的理論家，都熟知這確是事實，而親身經歷過的人，講起這種事實來，又都振振有辭。亞列埃氏嘗論：『每當緊要關頭，夢境和夢中聽到的聲音，就有很大的影響，使教士們不禁要聯想到這種情形，對於匡正世道人心的工作，究竟有其關係。做教士的多年辛苦，不憚煩勞，到處大聲疾呼，看來聽衆決不能漠不關心。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非但不見有人聞道皈依，而且有許多竟當作耳邊風，絲毫不放在心上。突然某人心回意轉了，願來受教爲甚呢？因爲他做了一個夢。』徐文定回到了上海後，也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座大殿，分作三間經堂，第一間裏有一位長鬚白髮的老皇帝，第二間裏有一位頭帶玉冠的少年人，第三間裏却是一無所有，（後來才知道這是表明天主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當下有人命他行禮，他就在第一第二兩間經堂中俯伏叩拜，却沒有在第三間行禮。後來他到南京聽神父們講起三位一體的道理，

想起了這個夢，才明白過來，却不敢說出。因為夢境無憑，神父們見中國人迷信重大，會再三叮囑，教人切勿相信無憑的夢境。直到一六〇五年利公說起有時候天主也能用這種方法來警醒世人，他才對利公講起了。

文定立志棄邪歸正是在一六〇三年。那時他有事來到南京，去拜會羅如望神父。羅神父便教他瞻拜聖童真像，把聖母的事蹟略略講給他聽。他聽了這一點就夠了，當下帶去了一本教理書和一本天主實義手抄本，整整讀了一夜，連經文都記熟了。一天早晨，便來見羅神父請求付聖洗。那時，正當年底裏，文定必須回上海過新年（二月十一日）。羅如望神父教他每天來學習，要學滿一星期。他就天天來，每天却要來兩次。有時，羅神父出去了，他遇到了疑難的地方，便去請教一位修士或是住院裏的幾個學生。過了一星期他領洗了，洗名保祿，當天動身回上海。他一回，就寫了兩封信給神父們請安道謝，滿現着他有信德；幾個月後，他又到南京來，一進城，就去拜見神父們。神父們留他住了兩星期。他每天與彌撒。一次問起犯了罪該怎樣，神父們便給他講明白告解聖事的道理。他一聽就向神父告罪求赦。然而三年一次的會試日子又近了，徐保祿便又北上晉京去應試；路過南京，就攔了幾天，仍和以前一般與祭行告解，給南京信衆立下了虔誠昭事的善表。他約了兩個朋友同去趕考，他們都已從他學過教理經文，預備日後領洗奉教。南京教友秦老先生的兒子瑪爾定，以前考武舉中了武解元，可是六次會試却失敗了六次；這回也和他同行。於是他們一行四舉人，便聯袂北上進京了。南方人吃慣了大米飯，喝慣了好河水，到了北方，吃麵糊，喝鹹井水，就不免有些不服水土。北京城裏雖則宮殿巍峨，也有人造的風景，可是到處塵沙飛舞，大街上只見許多漢滿蒙回的混合種人熙攘往來，風俗特殊，形容怪誕，更不免要覺得詫異。

這時候，北京城裏驟添了五千舉子和三萬典試、監考、辦差、送考的人，真是熱鬧非凡。他們四人晉京後，便也添了許多耳

聞目見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使他們驚奇納罕，却又快慰生平，便是利公在京中聲勢煥赫，名震士林；教士們的寓所車馬盈庭，忙於迎送。那時，馮應京雖然尚未出獄，却已把利公的許多著作刊行問世了。利公的世界輿圖，因着李之藻的囑托，重加校訂，也被委托刊版的書賈偷着翻印，整百的賣出去，還不够應市。李應試（保祿）奉教後，日見虔誠，以為這幅輿圖分刊六版還嫌小，便想擴大做八版，把圖上的說明略加修改，因此如今在京中流行的已有三種印版，其他被各家收入集書的還不算。李之藻又在利公指導下，着手編著幾種根據格拉維神教原本的應用算學書；這當兒，已盡他的力量，把這些著作刊行問世了。但利公的論道書更得士林的推崇稱道，要比這些算學書和他的世界輿圖或是西洋的珍奇物品，更見得重視。他的「交友論」更再版了好幾次，往往連利公自己都不知道；至於他的「天主實義」，這時候正在雕版，加入了馮應京和李之藻的兩篇序文，書中把中國儒士向利公提出的詰難，和利公的解答，全部錄入，用意是在使其他的教士們，尤其是新來的同會們，可資借助。這些道理原是不容易口講的。這部書印就後，便在各處廣為分送，因此，書中內容知道的漸漸多了，南方三處的教士們就得到了莫大的便利，感覺十分欣慰。

北京的教友雖不多，他們的信友生活却日見發揚光大；因為他們見了李應試的好榜樣，便格外奮發了。他一見天主實義中講着某一端道理，便想立即遵照實行；比方，那時神父們還沒有定下告解和守齋的規例，他却一聽到就要實行。至於聖體聖事，神父們不能立即答應他的請求，因為照那時歐洲的規矩，教友們每年領聖體的次數要比告解的次數少得多，所以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准他初領聖體。徐保祿和秦瑪爾定兩人到京後，每逢大瞻禮日，便到堂與彌撒，他們倆都行告解領聖體。徐保祿在領聖體前後，更見得虔誠恭敬，比衆熱心。他們的好表樣也使北京的教友們知所矜式。他們在赴試前，更悉心留

意，避免一切迷信的俗禮。一六〇四年四月十三日，考試的結果發表了；秦瑪爾定中了第四名，立即分發浙江上任；徐文定也中了，只因和考官一點沒有聯絡，中的名次不高，只得了一個都察院觀政的小官。他就不想上金殿覆試，希望點翰林，但他的親戚朋友和教友們，都勸他務必一試，果然入了翰林院，做庶吉士。利公見這兩位熱心教友會試都中了，不禁對聖教前途懷着無窮希望，因此他便在四月中給范禮安會長寫了一封極坦白的信，信上說：「我們和京中貴顯相過從，其中有大學士，尚書，侍郎，和近支宗室等；我們給他們講天分十重，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並講日月蝕的道理，又給他們製造渾天儀，地球儀等，繪製世界輿圖，答覆他們無數的質問。從此，他們不能再認西洋人愚昧無知了，因此，我們就漸漸得到他們的信任，教友們也知道駁斥教外人的神話和種種謬說了。」教士們見到處有人把他們的世界輿圖鄭重張掛着，便希望這些人既然肯聽信他們對於自然現象的學說，將來也要聽信他們所有超自然的真道真理。再則，教士們其他的舉動，也使人心懷向慕。他們揀幾句格言箴訓，寫了許多扇面，或是寫成對聯冊頁，附註西字譯音，分贈朋友。某年夏季，淫雨成災，京中貧民屋舍大都被水漂沒，無家可歸的不可勝計；大街上更有許多被拋棄的嬰孩。皇帝撥帑二十萬兩放急賑，除命趕辦平糶外，又設施粥廠救濟貧民，免作餓殍。這是君上愛民的好榜樣，也給了教士們表現聖教愛德精神的好機會。

這當兒徐文定已點翰林（萬曆二十七年六月）這件事對於中華聖教有極大關係。因為文定入了翰林院，且不說將來有拜相的希望，便是眼前至少也得在京師任職三年，月考考得好，便不難扶搖直上；再則翰林是天子門生，朝中大臣誰不尊敬。這些，對於甫立萌芽中的中華聖教，確有估計不來的益處。但這時候，文定雖已置身青雲，依舊謙卑誠樸，一舉一動，務必循規蹈矩，讀書供職，不敢稍有怠忽；考了五次，兩次取得冠軍，兩次第三，一次第四，他的地位就此益見鞏固了，以後不致黜降。

外調。利公見他年少英俊，才德不凡，且又熱心奉事天主，更如慈父嚴師般，對他倍加愛護。文定也常和利公講學論道，如對師保。每值公務餘暇，便去幫他譯著，替他潤飾文字。一六〇四年，文定回上海迎接他七十三歲的老父，到京奉養；他的眷屬也同來了。下一年封齋期中，利公因事務紛繁，無暇撰寫中國文的論道講辭，請他代擬。文定便把利公平時在住院經堂中講道的道理照錄出來，代替訓話。這一年，他的父親和他的夫人子媳等，便相繼領洗了。他的夫人便做了北京女教友領洗的第一人。

「天主實義」一書問世後，一班佛教徒便大為忿怒。文定每替利公策劃，教他不必較量。利公講起這部書，曾說：「從今以後，誰也不能對我們來華的目的妄加推測了；我們的宗旨表明了以後，各方的反響，很不一律。有些人說，我們的蓄意並不危險的，却有一班堅執成見的人，對我們表示厭惡，漸漸謾罵起來了。但這種結果，早在意料之中，我們惟有一心依靠天主的護佑罷了。照大概而論，一般有學問的人聽了我們的道理，驚奇不已；這是他們前所未聞的，却又講得鑿鑿有據。許多人會對我說，這書中佛教的謬說的確已被駁倒了。可惜那些人只逞意氣，不講道理，駁不過，便咒罵我們。」這當兒，利公的「交友論」已由馮應京添作一篇序文，重行刊印，因此膾炙人口，甚至被某名家列入名著集中。利公等為求平息風波起見，便想繼續刊行這一類的論著，作為天主教哲學家的作品，旨在諷世，不爭異同，不立門戶。

這些論文的第一種，便是那分作二十五章的短篇論說，因此由馮應京等題名「二十五言」。這本書，雖則篇幅不多，但在一六〇〇年還沒有完全脫稿，却被幾個讀書朋友看見了，就抄去；其中有一個，更把它編入利公的天學初函中付印了。後來，經利公略加修改，重新謄錄，送給馮應京加以潤飾；應京便作了一篇序，於一六〇四年底付刊印行。這書上也有文定的序跋，在跋中講起他自己奉教的經過。「二十五言」問世後，也很風行，受人稱道，想不到外國人竟能在中國發表高深玄奧

的學說。於是利公的友好中，便有人想到「天主實義」一書，何不用這種微言諷諫的筆法，除去了辯駁的問答體，而引為遺憾。各方面的朋友們，便都敦促利公再著幾部這一類的書，但利公諸事蝟集，實在無暇及此，所以隔了兩年，才又見那「畸人十篇」一書刊行問世。這部書是利公奉了副省會長巴範濟的命，才於一六〇七年編著的；脫稿前，有幾個讀書朋友便已見過利公的原稿，要替他刊印。這部書是搜羅西洋博學鴻儒，賢人哲士的遺聞佚事，至論名言，援引聖經上的格言比喻，彙集而成。利公只就他記憶所及，信筆拈來，彙編成書。然而書中的文詞筆法，却為一班名士所賞識；便有幾個翰林學士，願為作序加以頌揚。但利公只揀了兩篇刊入。後來某名士又在每篇後面做一首詩。到了一六〇八年八月初，這部書已再版了兩三次。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南昌。雖則北京的初版發行後，已分贈了好幾百本，仍有許多人爭來索取，亟欲先觀為快。

利公在寫給他本國同志們的書信中，講起這本書，曾說：「畸人十篇的話，對於甚多信眾實在極平常，只有異教人才把它看作不近人情的無稽之談罷了：你們不要以為在這地方可以和前人一般說法：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却該說：（一）人不能說我生還有餘年，因此，必須善用光陰；做好人，就該從今朝做起，不應隨俗浮沉，惟務虛妄，空費光陰；光陰易逝，時間是寶貴的。（二）人生不斷憂患，生不如死，此生此世，實非我們的本鄉。這件事中國人多不討論，我却斷定真正的本鄉是在身後，我們必須向慕天國的本鄉，那裏才找得到真正的安息。（三）時常想着死亡，並不是一種凶兆，反助人獲得這種真正的福樂；這一點，我會就我記憶所能及，提出許多引證，作為論據。不幸這些儒士們迷信極深，忌諱極重，總不敢說出個死字。幾年前某名士（大概是李應試）一見書上有「死」「畢命」的字樣，便加塗抹，竟把他父親的藏書破壞無餘。（四）常記得人要死，就可以發生五種好效果，我就趁此論及該預備善終，和天主審判世人的道理，又說天主賞善罰惡，不在現世，却在身後。中國文人們讀

了這三四兩篇所講的身後問題，和永福問題，怎樣惶恐不安，真是想像不來。他讀到了其中有好文章，又有許多典故，便愛不釋手，因此，有許多人便來懇求解釋。（五）人病在多言，極難守口如瓶，所尚的是才德，多言何益。儒家不講求這些事，但本書中博引旁徵，多所開發，某士人還想把這一篇抽出來，自作序文，另成一帙。（六）天主教人守齋不是為戒殺生，和中國信奉釋道兩教的人所做的不同。這裏就借題發揮，暢論世人縱情佚樂為不當，並依據聖多瑪斯的學說，伸說守齋是為補贖罪過的三種理由。（七）該怎樣每日自省良心，自加責備。這裏，我就推論到人但能不起惡念，不作惡事，還不足謂為有德，必心懷善願，多行仁義才可。（八）今世沒有天堂沒有地獄，也沒有幸福可言。這篇論說，旨在駁斥今儒謬說，開發得更為暢盡，讀者也多心折。（九）占卜的方術，不但是誕妄，且使人惶恐不安，多所疑忌。惟有那目擊中國有多少無知識淺之徒，受江湖術士愚弄欺騙的人們，才理會得本篇的要義；但看北京一處，靠占卜營生的已有五千多了。（十）慳吝的富人比貪財的小人更為不幸。總之，「畸人十篇」非但不當認作不近情理的無稽之談，却該目為全部智德的至論名言。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偉大民族所有的頹風陋俗了。」

利公撰寫這部作品的日子，正當他目擊許多友好蒙垢受辱的時期。因為一六〇四年，不但是大比之年，也是百官考績的年份，受到大小處分的不下三千人。李之藻也在這一年被劾「浮躁徵逐」，降職三年，連喜歡下棋，也成了被劾的一款。言官們受閹黨嫉使，借這考成的機會，來發洩宿怨，陷害忠良。士大夫新近成立了東林黨，準備和閹黨相對抗，無怪這回獲譴的這麼多。大概人說東林黨是在這一年成立的。利公的朋友們，大都不是清官，便是名士，却有許多人被劾受了處分。對於這班不幸的人們，辨學論道的作品，很有用處。從此以後，東林黨人竟算是利公的知己了。這不是因為黨人們都是贊助着天主

教，（有許多却反對得很激烈）是因明代末葉的這班士大夫，不論直接間接，對於利公所講的道理，都很注意，都是明白表現着從違取捨的態度。利公來華後所有成功的希望，也就無過於此了。

（註一）查一六〇三年年鑑似乎秦保祿心裏還有些疑慮，所以展期到一六〇二年復活節才領洗（李莫蒲氏，七九二頁）。年鑑中文記有一個教友原籍肇慶這時遷居南京，住在和教士住院相距約六里的地方，已十一年不見司錄了却仍併着救世主像常念玫瑰經不輟。一次隣家失火，他一心依靠天主護佑，果然得免殃及，便勸得合家人一齊領洗奉教。

（註二）徐家匯聖教雜誌（一九三六年卷二十五，五五五，五五六頁），載有「徐文定公毛詩大帖發現記」一文，這本書是他奉教前的作品；書中多述及浙江的寫作。

（註三）日期根據伯希和氏的記述通報，（一九二一年卷二十。三三——三四頁）蔡瑪爾定武科中試後，過了六個月陞任南昌要職，後來又數度陞遷。

（註四）這裏利公是以「薛羅的妄言」說。

（註五）參閱一九三四年燕園楨（）黨社運動考，中山文化教育促進社季刊，一九三七年卷四，九五——九六八頁。

第八章 中國國外的反響

利公所採取而精心擘劃的傳教方略，的確是非常新穎；他不但因此名震京華，聲聞全國，他的方略也就不能不遠及邊隅，在海外發生了種種的反響。可是我們要仔細查問，那就不容易了；因為路途遙遠，函牘往來又往往不免耽誤遺失。我們要加研究惟有按照地理形勢，來考察一下。一切消息情報，先集中在澳門，再從澳門分兩條途徑傳出：一條是經馬尼刺到墨西哥，或是到西班牙；一條經臥亞到葡京、里斯本，轉葡萄牙各處，然後再會合了，傳達到公教的中樞羅馬。這當兒，利公的先輩羅明堅神父正在和羅馬相近的奈泊爾斯，遠絕塵俗，一心契合天主，靜待主命，去世即在眼前了。

這些地方的人們都有一種主觀的見解，認為傳教該依着美洲、西班牙屬地和東洋、葡國屬地的教士們所採取的方法。不久以前，李格氏（Rezar）論及墨西哥教務，曾說：『看來大家都對於文明國家和異教國家把傳教士們所有兩種主要態度，也不妨說是兩種方法，加以區別：一種是絕對的除舊更新，另一種便是所謂『靠天主安排，先作一番準備』的方法。用第一種方法的教士，一到那地方，就認這地方的人根本上個個都是完全腐化了，他們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的機構組織，也全像個人的靈魂一樣，全是腐敗不堪，因此非用錐板法不可，把他未到以前所有的一切，一齊抹去，澈底革新，從頭做起；在新的基址上，用新的材料建築起一座簇嶄全新的大廈。新奉教的該和原有的環境絕對隔絕，把以前的生活澈底革除，使他的歸化成為全部的革新，不只是改善求精進。大概說來，這種方法，除了幾個應有的例外不計外，便是十六七八三世紀中前輩傳教士們所用的方法。至於第二種方法所依據的基本原則是：任何民族不論墮落到怎樣的地步，不論有怎樣的信仰，那種

的禮教，總不見得是謬妄到了極點，一舉一動，全是罪惡；便是那文化最落伍的民族，也有一絲一毫的眞道眞理，隱伏其間，他們的心裏也隱隱約約，懷着趨向光明美善的願望，所以傳教士們的任務，是在把這一點眞道眞理，發揚光大，在提醒他們，使他們覺得這種願望——往往這是很不容易的——就把這兩點用作根據，作爲傳佈福音的出發點。這樣，新教友就無須徹底改革以前的生活，他以前所有沿傳下來，本來是有道理的良好習慣，也不妨讓他留着；教士們不妨信任他。用這樣方法來傳教，教士們並不自居創立的地位，只把那異教民族已有的風俗搬到基多信友的基址上罷了。

我們把這兩種方法所有相反的各點說明了以後，就得趕緊加上一句，說彼此間並沒有劇烈的衝突。果然，不免有降格遷就的事實，和彼此極端見解的折衷觀念，可是誰都知道十六七世紀中在歐洲各國屬地傳教的教士們，如果認爲大概都是第一類的人物，那暨利公當然可算得是第二類教士中最傑出的，主要代表人物了。這不是說他沒有如聖沙勿略和羅明堅等的前輩人物倡導在先，却因他首先看出了上述原理的前提，大胆推得了這樣的結論，才說他是最傑出的人物。因此，尤其使我們注意的，便是他的新方法，如今，在我們看來果然不見得十分詫異，當時詫異的却很多呢！然而便是當利公在世時代，在華教士們既已歡迎在先，教內外的官紳士庶也都贊揚於後，究竟何以致此？

我們知道那時澳門是中國出海通外洋的唯一一門戶。這個商埠和荷國人其他的殖民地性質不同，情形也就略異。中國朝廷准許荷國人寄居經商，給他們自治權，却不容他們壟斷商務。因此，歐洲各國的人民，那時都可以往來無阻。再則，那時中國海禁未開，又因地大物博，並不注重和各國通商，商人們經商營業大都在日本集中，對於中國，不過一年兩次到廣州去趕市，用銀子去買些絲綢，麝香，磁器等，這一類的珍貴商品，到別處去販賣罷了。

但澳門的確是個天主教的「聖城」。任命主教雖然要得葡國政府同意，可是這地方的修會却非常發達，各處聖堂的鐘聲遙相應和。各處大街上都有聖堂，有味增爵會的主教大堂，有聖安多尼和聖老撈佐兩座會口的公堂，還有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公開的私堂，以及聖母聖聖堂、議會堂、中國教友的聖瑪爾定堂；其他澳門人私家建立的經堂聖所，更多不勝數。封齋期內首主日，舉行的那所謂聖婦物落尼加遊行，各處的教友都來參加，頗極一時之盛。

澳門中心地方有一座小山，聖保祿學院便造在山腰上，這是一五九五年建築的一座大樓房，可以容納六十名耶穌會修士。范禮安會長不願澳門院長賈伯樂和臥亞院長的反對終於在這學院裏開辦了一座研究人文和聖學的學府，造就的人才，比在臥亞畢業的還要略勝一籌。一六〇一年，學院聖堂被焚燬了，賈伐祿神父便請葡國熱心的商家捐貲重建，在他們從日本運來的貨物上抽捐千分之五，共計捐得了六二六零法金鎊，按照熱諾亞人嘉祿斯比諾辣的圖樣，重行興建。明史上會說同樣的建築為中國所未有。這座房屋完工後，嵌上了一塊石碑，碑上刻着把澳門全城奉獻至聖童貞天主母的話。這是希臘式的建築物，有十個柱子，下層是伊奧尼式（*ionique*）上層是高林多式（*corinthien*）第一層樓的正面分列着四個壁龕，供着四位耶穌會聖人像，後來其中的一個，換供了聖方濟各沙勿略像。第二層裝飾多一點：正面一個供聖母像的壁龕，做得很美觀，四週圍着石刻的天神跪着朝拜，還有清泉、生命樹、船和珊瑚樹（表示希望和畏懼）等，這些神秘的象徵物。最上的第三層，正面有吾主受難的標記做框子，框子裏供着一尊巨大的聖保祿像，上面還有白鴿和日月星辰，正中豎起一個十字。這些石刻花紋，也可以裝飾歐洲的大城市了。房屋的內部，分掛着尼各老神父的日本學生們的作品，當然也有倪槐修士的。

耶穌會的聖堂中，也一樣有教友們來與祭誦經，勸修神業，不但有葡國人和歐洲人，也有澳門的本地人，其中有好幾個進了耶穌會。聖瑪爾定堂的中國教友，增加得很慢，大概是因傳教司鐸不知道適應環境的緣故（利公和羅明堅神父會做過本堂）。郭居靜神父回澳門養病的時候，却曾在這裏經管過。據說曾有一個熱心教友名叫安德肋出外宣講聖道，聽講的竟有五六十人之多，講罷，便有一部份聽衆歸化了。可惜他回去了，他住的地方離澳門遠得很，有三十多天的路程，去了要再來，真是很不容易呢。但講起這事的人，又說他回去的時候，地方官許他帶一位神父同行進內地。

澳門的居民大都是西洋人，他們所接近的中國人無非是些平民百姓，所以他們對於利公在京裏的工作不能切實了解。他們只知道利公「住在中國內地，一處大城市裏」幹着些徒勞無益的事情；中國人很尊敬他，他也勸得幾個人歸奉聖教。那時澳門的教會當局差不多把全副精神貫注在日本方面的教務，幸而澳門學院的院長賈伐祿神父不違他前任李瑪諾的素志，對中國的教務非常愛護，甚至有人認爲過分，說他的措施有妨日本教務的發展；他却隨處留心，不使在華傳教的諸同會感受窘乏。然而澳門方面雖然不甚關心中國的教務，對於利公的傳教新方法，却不至十分不滿，反對得更厲害的，却是西班牙各屬殖民地的教士們。

大約自從一五九零年以來斐列濱羣島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有一種謬誤的心理，以爲中國人極爲執拗，對於希圖來華傳報福音的人，一概矍以閉門羹；只有馬尼刺的多明我會教士們還不失望，憑着令人欽佩的恒心，準備到中國來冒險幹一下。這裏，我們不妨把該近代史家皮埃孟氏（Biermann, P. 12-17）的記載概括敘述一下。

在西班牙人沒有征服斐列濱以前，便已有少數中國人到此經商了。一五六六年班人入主以後，這些華僑便雜在他國

的僑民中散居島上，直到一五八零至一五八三年間才由班國當局指定巴列盎（Parian）一處作為他們的居留地；一五八九年共計約有一萬人，一六零二年增至三萬人；這些華僑被稱為桑勒伊人（Sangleys）他們在島上自謀生活，精神上有一點也得不到援助，直到一五八一年多明我會的薩拉匝（Sala）主教蒞任後，才得叨賴庇蔭，使班國當局不敢公然虐待。這地方的教務起先是由奧斯定會主持的，却因中國僑民都不諳西班牙文字，又不懂得班國的言語，所以奧斯定會的教士們不能勸化他們歸依聖教。一五八七年，多明我會士們來到馬尼刺的時候，巴列盎的華僑已有二十來家奉教了，薩拉匝主教便委托多明我會士們担任勸化華僑的任務。他們就欣然應命，因為他們知道可以因此踏進中國傳教。當時便有多明我會的貝那維台（Miguel Benavides）和高博（Juan Cobo）兩位傳教司鐸潛心研究中國文字，又因曾經歸國的華僑買得了羅明堅神父編著的教理問答「聖教實錄」帶回來，更使他們得到了「他山之助」。但無論如何，他們學習中國語文真是一種極難的功課；馬尼刺一般有名人物聽了貝拉維台第一次用華語講道無不稱奇納罕。至於那位高博司鐸雖則留斐不久，却撰成了不少著作，使後人得益不淺。有好些華僑得到臨終付洗，那最先奉教的三人，却是在一五八八年三王來朝瞻禮正式領洗的。

一切傳教事業中最發達的要算那聖嘉傳厄爾醫院了，便是中國境內的人也有前去療養治病；教友也因此大見增加；因為病人們領了洗，病愈出院以後，就有了堅固的信德。不幸教務正當發展的時候，却因着主教的一紙文告而突然停頓了。主教的論文上，規定奉教的華僑必須改裝剪髮，可以和斐列濱的資格族（Fagel）土人結婚，却怕他們離了司鐸要背教，所以不准回中國。高博神父對於這種禁令很不滿意，他曾在書信中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例，華僑領洗的就有好幾百，甚至

好幾千。』

馬尼刺的政教當局還把奉教的華僑和不奉教的相分隔，教他們另外住在米農陶（Minondo）和巴列益隔絕；教士們在那裏造下了一座聖堂，按着規定的日子講道理，對男教友講中國話，對女教友講資格族方言。高博神父和他的同會們又用本性的方法來襄助天主聖寵的作用，設立油畫館，和擦銅作，使新教友得以習藝謀生。他們更特別照顧兒童們，開辦了一所小學校，教授班文、華文、和拉丁文。高博神父爲了這些「羔羊」煞費辛勞，希望造就幾個司鐸修士，「將來也要像他現在照顧他們一樣，照顧別人。」

不料他所有這些目光遠大的籌籌碩劃，却受到了種種的妨礙，因此收效非常遲緩，直到一六五零年才見第一位華僑祝聖了司鐸。自一六一三至一六三三二十年中，計付洗的四千七百五十二名，其中有二千六百九十七名是病人。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多明我會士們所以還能繼續這種艱苦的工作，是因他們認爲已經獲得了出發的據點，不難由此乘機滲入中國內地，可是事實上他們受着葡國人的掣肘，中國的海岸綫雖然那麼長，却有「不得其門而入」的苦況。他們曾於一五八九、一五九三、和一五九六年先後三次冒險來華，不幸一次遭遇颶風，兩次被中國海防兵截獲。福建的官府把他們當作奸細加以拘押，逼着他回到了馬尼刺才罷。他們的班籍會士們曾在澳門設立修院，却終於無法維持，不得不讓葡籍同會接收瓜代。馬尼刺的西班牙人不顧一切，費盡心機，要在遠東作「精神上的征服」，因此他們的船舶，或因遇到了風浪，或因水手們的叛變，便有幾艘被迫駛進了葡人勢力下的港口。那位班籍多明我會教士亞多額（P. Adante）司鐸奉命陪着儒恩柴摩拉（D. Juan de Zamora）來華，打算和廣州當局商訂通商條約，便是在這種情形下，到了澳門。澳門的葡國艦隊司令保羅就

乘機陰謀傾陷；據說竟要燒燬他們的船舶。至於亞多額神父會和耶穌會的郭居靜和龐迪我兩教士同往廣州，過諸聖瞻禮（一五九八年）可是他求某太監替他設法許他在中國傳教，結果依然不能如願以償。（註一）

這當兒，耶穌會教士們在南昌和南京兩處進行順利的消息初次傳到澳門；接着澳門人又知道龍華民神父在韶州勸化多人，教務日見發達，更覺得高興了；不久，利公和龐迪我司鐸聯袂入京，得在京中立足，而且很受士大夫尊敬；喜訊傳來，澳門當局尤感無限歡欣。於是，這些事情立即遍傳遐邇講的人勢必不免過甚其辭，說得天花亂墜。一班經商奉使的世俗中人，道聽途說，不明白個中真相，一朝離華返國，便把這些事情當作新聞一般，隨口宣傳，不但傳到歐洲各國，也傳到了羅馬教廷。竟有人說，全國大人物連中國皇帝都已歸化了；神父們也已得到了准許，可以在全國各處傳授天主教，凡是願意進教的，他們都可以付聖洗。

可是事實上，那有如此容易，但看一六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利公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報告，便可以知道了。利公的書信上說：『我們得進中國首都，得在北京住下，這些事情顯然是出於天主上智的措施。我每在許多困難中，每每要潛思默想，來鼓勵我自己。神父，且想一想極少數的外國人，要在這個有幾千萬人信佛的國家，沒法拆他們的廟宇，毀他們的偶像，該遇到多大的困難啊！依照中國的定律，我們進呈貢禮，領得了一筆優厚的價銀後，便該被遣回國，至多也不過給我們一個官，在京裏供職。那麼，我們就要被派在一個衙門當差，受管束，我們所負的使命，就不免因此大受妨礙了。禮部堂官的奏本上，便是這樣說法：奏請皇上把我們遣回本國，至少也不許我們住在京裏，只是皇上不肯。皇上又要給我們一個司職，我們就具奏辭謝，說明我們非但不願得官，而且也不願得俸。……後來我們受了俸給，却不當職司，免受諸官干涉。大家知道我們在中國勸人

奉教，却不來妨害我們。結果，我們知道皇上的意旨是要我們住在京裏，我們一說起要出京回國，就可以把人嚇退。近來某大官員會談起要裁撤皇上賜給我們的俸給。他說，受了俸，不供職，是違反中國定律的。我只教人轉言，請他把這意見正式通知我。因為果然如此，我就去見皇上，告訴他我離國多年了，就此告辭。這句話就把他嚇住了，便托人通知我，說本月的俸金照舊發給，等到年底，和他的同僚再行商議。這件事就從此沒有人再提了。」

利公的這封書信，仍不足以糾正失實的傳聞；這些人根據不正確的消息，講起中國人歸化的數目和品類，實在過於誇張了。在華教士們接到了海外來信，提起關於他們的傳聞，便覺得非常詫異。他的好朋友們還說他們不該假謙遜，瞞起自己的功業，不肯及早示知。李瑪諾神父也曾接到一六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從羅馬發來的一封信，爲了中國皇上領了洗，以及「南京兩位大官僚全家奉教，一時領洗的多至百餘人。」這兩件事，向他道賀。他就急急回信闢謠。（一六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的回信上說：「所謂兩位大官僚，其實不過是兩位小職員（徐保祿和秦瑪爾定）秦家領洗的只得半數，不過十一二人。至於皇帝，但願天主賜他真個領洗才好，便是他的胞弟也好啊！」

但在華教士們要糾正這些不確的傳聞也是徒然啊！相信的人益發多了。各國公教信衆，便發生了無窮的希望。便是在遠東傳教並不存心誇張的同會同志們，也不能獲知真相。比方金尼閣司鐸也曾於一六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臥亞寄發了一封信說：「本會的神父們已奉了皇帝命，宣佈他們入了中國籍，可以建造房屋，購買土地，執管產業，和中國人一律看待。因此，他們已蒙皇上欽賜皇城裏的一座房屋，使用極爲便利；教友共計有七百名，但大半是有名望有才學的人物，其中有幾個最有名的達官顯宦。這就不算少了，所以他們更該體面堂皇緩緩前進，不必急遽從事。」七百名的數字還算差不多，

只是說大半是有名望有才學的人就不免說得太含糊了。再則，這當兒除了北京的李應試做着二等衙門的長官外，那些最有力的達官顯宦，還一個都沒有歸化；要等過了二十二年才見徐文定做了文淵閣大學士呢！

這些無稽的傳聞使羅馬最高各當局驕形活動起來了。據利公說：耶穌會總會長「就討論派遣四十名會士到中國，協助這偉大傳教事業的進行」。其他各修會更派了幾名司鐸修士取道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出發。他們原「以為中國門戶大開，必通行無阻，却不料船近海岸竟是不得其門而入」。我們如果把當時遠東的一般形勢加以研究，便知那時葡萄牙人因西班牙教士侵入了他們的勢力範圍，因而加以種種妨礙之說，不是沒來由的了。（註二）

但我們的意思並非是要說明利公在華的成功，使西班牙王朝統治下的各屬地因此受到了這種反響。這件事情牽涉的問題極為廣泛，總是因為西洋各國和中國相距遼遠，情形隔膜，以致如此。

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所注意的，却是十五年來，歐洲各方面，對於遠東教務素來漠不關心，這時候怎的又移轉目光，表示非常關切呢？十七世紀前奧斯定會士公撒來孟道若（Gonzalez de Mendoza）氏專論中國情形的作品風行全歐，英，法，荷，德，拉，丁等，各種文字的譯本多至三十餘種，再版了不知多少次。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情形只憑着極稀罕的書信，傳到歐洲。這些書信中講的又大都是些瑣細的事情，如一五八八年羅明堅麥安東兩人遊歷浙江等事。一五九八年十月十八日龍華民神父在韶州寄發的長篇報告，展開了以後八年的新時期。是他以後許多函牘詳細陳報一切的開端。這些總算是可供借鑑的函牘。依照一般人的觀察，當時歐洲刊行的一切有關中國教務的記述，所有的資料，由韶州方面供給的特多。比方蓋勒祿（P. Garcia）司鐸在一六零三年的教務年報上寫了三章專講韶州的事情；講南昌的教務只寫了一章；南京

寫了兩章，可是上一章只講着南京城的沿革形勢。這在講論彼此大不相同的重要事件時顯見得分着輕重上下了。一六零二年三月九日，龐迪我司鐸在北京寄發的詳細報告，只把這種不平均的支配糾正了一小部份。龐神父在這封書信中，偏重中國的風俗民情，和利公等一路到京的情形，反把在華教務進展的狀況講得簡略了。至於利公的書信在表現他的明智卓見，可是大家都難得看到，直到二十世紀開始時代，歐洲各國的民衆才能得窺全豹。（利公的函牘在二十世紀以前發表的，只有一六零二年九月二日，一六零七年十月十八日，又十一月十二日，寄發的三件）。

除了這些爲數寥寥的文件以外，却有不少記載耶穌會教士們傳教概況的史記，但這些史記中所有冗長的篇幅，都是專講着日本，東印度，大蒙古（Grand-Mogol）等處的教務情形對於中國傳教教會的內部情形，實在簡略得令人扼腕。凡是講到中國教務的地方，比了范禮安神父在他所著聖沙勿略傳的手抄本中插入的「中國風土記」或是馬斐神父（P. Maffei）在自己作品中專講葡萄牙人在中國創業立足的一章，可說得如出一轍。便是一六零五年艾依神父（P. Her）在盎凡爾刊佈最近函牘，因此編成巨帙，詳述日本東印度秘魯等處的教務情形，只講日本一處，已佔着六百三十六頁的篇幅，蒙古一處，佔五十四頁，可是對於中國却只佔六十五頁，其中十五頁是特譯范禮安原著的幾章，八頁轉譯麥安東的來信（一五八八年二月），二十一頁是龍華民的報告（一五九八年十月十八日），一六零一年葛思孟司鐸根據桑采芝搜集的情報在瑪德里出版了「耶穌會士在東印度中國，日本，傳佈福音的傳教史」。這是一部五百五十六頁對開本的巨帙，其中有七十三頁專講中國教務，已經發表的文件却佔着六十三頁；末了，只提一提利公初次設法晉京的事情作結束，說道：「一五九八年中，有幾個中國商人先曾在北京和利瑪竇居靜兩司鐸見過面，這當兒，便到澳門，向葡國人報告，爲了奉事

吾主起見，願他們憑着這種方法，大開傳揚吾主福音之門。

末了，利公二次晉京獲得成功，和龍華民在韶州開教已有進步的消息，終於在顯願會士院的院長蓋勒祿神父的指導下，在葡萄牙全國相繼發表了，但詳載一般消息的作品依然久付缺如，要等散居中國各處教士們的報告彙齊了才能用作編輯中國教史的資料。這件事要等後來一位法籍耶穌會士謝列克神父來實現。謝列克 (P. du Jarric) 本想譯述葛思孟的著作，蓋勒祿神父和其他許多神父們却勸他不如重新編撰，便是許多明瞭真相的世俗中人，也向他表示同樣的意見。他在一六零八年，出版了第一卷；但我們只見他在一六一零年刊行的第二卷中，才有二百頁專講中國教務，根據孟道若的原著，和范禮安所講的中國風土民情，寫成了一篇很有趣味的傳教史；末了，依據幾位耶穌會士的函牘，尤其是龐迪我一六零二年三月的報告作結束。第三卷是補遺，大都是根據龍華民的來信，接講以後的事情，大約講到一六〇七年為止。在這部教史中，我們着眼的不是事實——這些事情，我們在別處，依據同樣的來源也可以看到的，却是當時歐洲人對於利公的宗徒事業，和在華教士們所處地位，所有的觀念。

當十七世紀末葉，尤其是當十八世紀開始時代，中國的情形和現代大不相同，我們但看謝列克神父所依據的史料，來源很有價值，又經勞遠紹豐富非凡，便可以斷定他的這部教史描寫當時中華帝國和開教時代的情形，的確是很忠實的。缺乏情報已足令人懷疑掛慮了！這實是極堪遺憾的！再加上遠方傳來了許多不盡不實的風聞，淆混是非黑白，這就使事情弄得更糟了。那判斷準確的范禮安會長對於幾位給聖沙勿略立傳的作家曾有很好的議論（一六〇三年二月後。）他說：「我曾讀馬斐神父的大著，都瑟利尼 (Tursellini) 的真福方濟各沙勿略傳……又在澳門見到了魯采那 (Lucena) 神

父（一六〇〇年）的作品前二部的著作對於日本民族沒有完全的認識；天主教智在日本的措施也無一字述及。許多事情都是根據接到的來信講述的；這些書信所供給的消息並不詳盡，所以在刊佈的作品中有許多地方講得很模糊，而且有些地方竟自相矛盾；誇張煊染更不必說。魯采那的作品文筆極精美，理論也很純正；可是這部書作於歐洲，作者又從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所以在許多事情上顯見得是因缺乏經驗，認識不清，有些地方言過其實——他有幾點，要求得正確觀念，或者要得到明白解釋，便援引了我所說的話。

范禮安會長說得真不差：「作者從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所得的消息又不詳盡」在歐洲編著的這許多講論中國教務的書籍，能有幾本不犯着這樣的毛病呢？

謝列克的傳教史顯然也免不了要有這種缺點；比方他講（一六〇二年九月間）教士們勸化了「一位朝廷大臣，一個皇帝的小舅子，和幾個有聲望的文士。皇帝雖然既沒有下令把神父們遣送回國，又不說教他們住下，也不明白准許他們在中國傳教，他們却已奏請欽准了，希望總能如願以償，便是官僚中，也有許多會對他們說，「但看皇上收下了他們的貢品很喜歡，他們諒必不致有意外」就可以知道他未免把這些事情看得太重了。

謝氏講論中國宗教的地方是書中最大的缺點。當然，他的話還沒有像葛思孟的那麼不正確，葛氏先講中國的佛像有幾個和天主教的聖像相彷彿，這些話，原是很無聊；末了，又說聖多默宗徒大約曾到中國來傳教，更以為中國的佛教和日本佛教相類似。但謝列克雖則有馬斐神父的著作和范禮安會長的記載可供參考，講起中國的宗教，仍講得前後不相呼應。而且他自己先就打退步了，說：「講到中國人的宗教看來他們沒有一定的宗旨，我竟不知怎麼說才好。因為他們大多數是

無神的，這就是說他們不相信甚麼真神，便是儒士們也是如此，他們講理學，研究做文章，有人對他們說廟裏的神道，便以為明明是沒有的，再則，他們既然不認得真神，他們的眼光就在無神主義的峭壁上定住了，不論真神假神，一概不承認。看來拜菩薩的雖然那麽多，却不像信佛的日本人一樣真誠。」

中國的神道多得幾乎不可勝計，謝氏就被這些「假神」鬧得頭昏腦脹啦。他說：「因為好些人敬拜日月星辰，連整個的天都要拜，以為下界的福樂都從天上來；但除此以外，他們還有無數的神像，佛像，各式各樣都有，據他們說，都是有名人物，在世時極聖善，或者有過許多講道德的著作。他們又把各種行業的祖師列入神道，凡是對他們有過公私恩德的人也是這樣；以致有好些人當作神道一般，崇拜他的父母親友，替他們造廟塑像，上香，奉祀以外，還要舉行其他種種，只該用以恭敬真天主的典禮。但更教人厭惡的，却是他們不但對死去的人行這種敬禮，便是活着的，往往也要這樣恭敬。」

這些便是謝氏書中的原文。這些話雖然講得這樣模糊影響，不免令人啞然失笑，可是後來在禮儀爭案中，却不料竟有人一再援引，資為論據，如果謝氏把中國人的喪儀和祀祖兩事，所有的迷信性質，彙譯得較為核實，那麼利公引證中國古代經書的原文對這些事情設法尋譯出或然的解釋，也就不致被人漠視了。我們不難就謝氏全書，舉出許多例子來，表明在歐洲方面一般人對於中國的真情實事，和利公等所採取的傳教方法所有的誤解，實在是非同小可。

可是在遠東方面怎樣呢？個中人能懂得明白一點嗎？日本教務因着政權的轉移而大受妨害，照最初的看法，教士們便該急急移轉目光，向中國尋求解決方案，來應付日本智識階級。因為受着朱子學說的影響，而突起的劇變了。果然，有幾位是這樣，一六〇五年奧剛底諾（Ogantino）神父會寫信給總會長說：「神父諒必聽人談起過，那位聖德宗徒利瑪竇司鐸會

在北京編著了幾部極有用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教理問答，照中國文章的格局，用極精鍊的筆法，闡發得非常明白曉暢。幾個精通中國文字的日本同會昆季們，都說但憑這部書，已足勸化中國人棄邪歸正，無須再行講道化人了。利公的上峯，中日省區耶穌會副省會長巴範濟神父，會一再要求多寄幾本這部名貴的著作，因此，范禮安會長便命在廣州翻刻重印，好供給日本方面的需要。可是不出十年，大家就察出同樣的字句，日本教友和中國教友的解釋不同；因此，不久就起了一陣反對的聲浪，說日本方面用利公的天主實義實在有欠斟酌，以後就遭遇了許多困難。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利公等在華的努力却已引起了日本教士的一種競爭心，當他們感覺自己在日本的地位漸見動搖，看來要站不住的時候，就着手進行宣傳文化的工作了。這種工作在外藩專政時代，看來是無足重輕的，直到十六世紀末年，日本教士們素不講究算學，和算學的應用法。那時，雖則會有四個代表奉派前往羅馬，覬見教宗帶了奧夕利烏斯的地圖回國，那並非是為研究學術，不過當作一件新奇的東西，拿回來賞鑒一番罷了。一五九六年，西京地方，曾陳列過一個地球儀，和幾幅世界圖表，到了十七世紀初年，才見教士們有改弦易轍的意向。一六〇二年的月蝕，是由斯比諾辣神父在橫濱觀測的。這地方便用作測繪日本與圖的第一基綫。一六〇五年七月間，教士們趁着那年天皇踐祚，全國貴族都進京朝賀的機會，「開辦了一座大學院，講授地理學，航海術，行星論，光亮，冰雪等物理學。」聖沙勿略生平的素志終於獲償，可惜這時候已嫌太遲了。一六一四年以後，日本的傳教事業就被連根掘起；歐洲思想只能借繼任利公的教士們所著中國學術書籍作幌子，在日本繼續流傳。

倒是那在葡屬印度正想尋求適當方法來開教的諾貝利神父，多少受到了利公主見的影響。一六〇五年五月二十日，

諾神父在臥亞登陸後，就聽說前任教士們勞而無功，不禁十分詫異，各會口的教友，人數不多，又很質樸，差不多都是憑着葡人奴僕執事的襄助，從下層階級中逐漸勸化得來，對於教外大眾，不足資人矜式。在西洋人武力保護的地帶以外，還沒有開過異教人歸化的記錄，沿海一帶約有兩萬巴拉完（Barbas）漁民是例外。但這些人歸依聖化是因當初意在躲避回教海盜的勒索才奉教的。諾貝利神父到任後，過了一年半，才開始和上等階級接近隨和了。據一六〇六年十二月金尼閣神父的記載，他考察本地方的風俗民情，便知有兩件事情妨礙着甚多教化的進展：一件是衣服欠體面，另一件和人交接太容易。怪不得，這種民族這樣愚魯無知，不大懂得甚麼叫做樸實謙遜，却要看人有錢沒有錢，穿的衣服華麗不華麗，來估量人的生世和教義。諾神父就用盡方法，為一切人做一切的事，又改裝易服，表面上學着本地的第一流貴族，穿上了一件大紅袍，戒酒禁肉，只吃些魚蝦，蔬菜，却因此大著成效，不多時，便勸得了好幾個大家子弟歸奉聖教。

問題恰和那不出臥亞一埠，或是常駐薩爾登德島各會口許多神父們所有簡單的見解相反，不在和這些不尚謙德的人們謀融洽，有如這裏的人所說的，却在盡量謹守着印度所有家庭社會，藝術經濟上的制度。諾氏常依着適應環境的原則，努力進行，始終不渝，這原是傳教事業的基本原理。在中國開教的這位利瑪竇神父已成了這種原理的象徵。利公暮年，曾致書葡國的參贊麥斯加倫哈（Mascarenhas）說：「如今有些熱心人不贊成我們向異教人這樣傳報福音，說我們太寬縱，太緘默，傳道訓人不遵宗徒的規範，却乞靈於政治策略，採用世俗人的智謀。這些人的見解如此，我乃不得有所論列。照他們的意見，似乎我們一到中國，便該把中國人的寺觀廟宇以及種種迷信成見，一齊推翻踢倒。我對這些人的熱情表示尊敬，不過我以為他們弄錯了。經驗已使我們完全懂得明明白白啦。如果我們對這些成見下正面攻擊，就不免要惹人仇恨，羣起為難，

憤激之餘，勢必更爲固執，雖有眞道亦必充耳不聞啦。關於這些事情，巴隆尼（Baronia）氏說得好，他說：「宗徒們開教之初，即使沒有力斥異教人的神道，你們也不必引爲駭異。出谷記上說：你們不要攻斥神道，便是對異教人的神道隨衆應和，也未爲不可；不是因爲這些神道不該摺斥，却因這樣做法，非但毫無效果，反而要妨礙人心的向化。」梅達弗拉斯德（Mcapharste）論及印度傳教的聖多默宗徒，曾發表過如下的至理名言。他說：「這位聖徒見印度人崇拜魔鬼，普及全國，深入人心，就不急急攻斥，這種謬妄的舉動，不肯嚴加斥責，也不竭力尋求一種挽救這禍殃的方法。他知道這種印象和觀念積久成爲習慣，且又根深蒂固，可說得和我們的信德一般堅深，很不容易消滅。要改變這種習慣，只能用善言勸導，豈可強制得來！譬如我們要驅除廳堂裏的黑暗，當然我們決不會像打掃塵埃一樣，揮着掃帚去掃除這黑暗，我們只須點起火把，黑暗就自會退避了。我們對付異教人也是這樣，先該叩入他們的心，得他們的敬愛，然後擊起德行的火炬去光照他們，就不難使他們出暗入明，使他們自己豁然感悟，明見崇拜邪神的謬誤。」後來到了一六一九年，臥亞的教廷檢察員斷定諾貝利神父的行爲，認爲正當，在呈奉教宗欽准後，更頒佈特准條文，准教中子女和教外人結婚，中國、日本也一律施行，一六二三年亞爾麥（Armagh）主教郎巴（Pierre Lombard）又引利公的先例，正式核准諾貝利改裝易服。

不過事實上，諾貝利神父適應環境計劃還不及利公做得週到完備。利公不但像他一樣，引幾個上流人物開道歸依，再由他們去勸下層民衆同向聖化，且在這文明古國種下根苗，使日後發芽滋長，可操左券。這却是諾貝利神父不會在印度做到的。總之，一般人每稱利公爲「西儒」爲「博學鴻儒」，利公誠足當之而無愧，這是我們所亟當表白的。

(註一)參閱「教士傳」，二六九——二七〇頁。「斐列濱教史」六七——六八頁。

(註二)教宗保祿五世的通諭(一六〇八年六月十一日)明白核准除耶穌會以外其他各修會的教士亦得前往中國傳教。

(註三)利公的筆記於一六〇九年脫稿，於一六三四年才傳到印度，諸貝利司鐸想必不會看見過。

下編 西儒利瑪竇

利公來華後，看出中國是文明禮教之邦，要開教宜化，必先適合環境。廁身士林，和領導全國的智識階級相融洽，才能立足，所以他自到肇慶以後，便從事攻讀中國經書，學習中國禮法，進而與士大夫周旋晉接，和一班文人學士講學論道，二十年來，探討研求，孜孜不倦，才能逐步上升，登堂入室，先則擺脫了「下流僧道的惡名」，以西士資格，躋登士林，得南昌金陵兩地士紳的景慕，為贛中道學家所稱許；繼則入貢京師，受朝廷的禮待，萬歷皇帝的款留；終則出其「天學」，扶輿發微，使名士賢儒同深欽佩，因而聲震京華，名揚全國，朝中碩學，更尊利公為泰西鴻儒，和中國的翰林進士等景齊觀。賢士大夫交相稱譽，因此，利公得和閣部大臣，分庭抗禮，對暗縱談。這當兒，利公的地位已見穩固了，得有許多賢士名流，達官顯宦敬慕擁護，便是皇帝一朝晏駕，或者突然停止俸給，不再要他供奉，甚至不再容他留住京師，他也可以在中國棲身托足，自有這班人替他設法維持，決不致猝遭迫逐。

有人要問：中國的天主教怎樣呢？要是利公不在人世了，他的同志們，或是他的繼任人物，能不能支持下去呢？這正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我們一加研究，便知這問題看來是不能解決的，惟有利公一朝突然去世以後，才有着落。

所以這幾年中，最緊要的事情便是登記所得的成績，和設法鞏固既得的地位。我們知道自從利公到中國傳教以來，他就始終因着上峯審慎而堅定的措施，得益不淺。我們且看他所創議的事情是不是悉遵着上峯的指示；他的長上們每當他在艱難困苦的緊要關頭，是不是高瞻遠矚，信任他的主張，而給他援助，便知他們上下協和，實堪欣羨了。不但耶穌會總會長，

利公的老師亞瓜維神父，便是遠東正副省會長范禮安、巴範濟兩位司鐸，也都使他常懷着「深慶得人」的感想。他雖然是中國境內耶穌會的會長，仍須受澳門學院院長賈伐祿神父的一部份節制，不過賈院長却也和前任李瑪諾一般，對中國的傳教事業是一特別愛護的。范禮安會長決計在澳門專設學院以後，一六〇一年便收容了五十九位耶穌會士，其中二十位是司鐸，三十九位是肄業修士和助理修士，除了大部份預備派到日本工作以外，有十位是要派到中國內地的。一六〇二年已有五位司鐸六位修士奉派到日本去了，學院裏却還有五十六名會士留着。但有關中國方面的一切事情必須經過范禮安會長同意後才能決定。一六〇三年二月，范氏接到了北京方面發來的佳音，就從日本趕返澳門。

將到開會討論的時候，澳門當局要利公列席商議。但京澳相距遼遠，利公又不能分身南下。李瑪諾奉到了范會長的命令，預知有事，便到韶州專等范公來澳的消息，自己好趕去相見。利公的提議中，有一件主張李瑪諾完全免除指導中國教務的任務。范公很不以為然，教他仍供原職，位在諸同會之上，却要他隨時襄助南方三處住院的教務。這是一種很有益的辦法，因為以前利公不能親自前往，只憑通訊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范禮安又以為中國教會「已屆成年」，澳門院長對於中國教務經驗自不及內地教士們豐富，因此，他們不宜再受他節制。從此，利公也就不必再向副省會長請示了。這些管理上的措置，就穩定了以後的傳教事業，使教士們在艱苦奮鬥中，獲得保障，力謀發展。

事實上，利公晚年仍不免要遭遇種種困難；有的在中國內地發生，多數却由歐洲的商人們引起，不但澳門的葡商，還有馬尼刺的西班牙人，尤其是荷蘭國的誓反教徒，竟會彼此同謀，設法陷害，破壞在華的傳教事業。同時，東林黨和閩黨的爭鬥更見得劇烈了，每次興起風波，教士們便有的被牽入漩渦的危險。一六〇四年，一班正人君子稍見抬頭，馮應京被禁三年，

便於這一年出獄。以後幾年中，清流旋陟旋降，但萬曆昏庸，得志的還是小人。一六〇八年，神宗親信的內侍高海（？）從遼東監稅回朝，竟敢不顧國法，不依稅則，任意勒索商人，掠奪良馬，強劫貨物，作惡多端，卒致激成兵變，他又自命知兵，能統軍，却敵可是各路援師開到後，他又不敢出戰，只命封閉商市。遼東經略上疏奏劾，仍不黜革治罪，直到軍民相繼叛變後，才能職召回闕。黨這樣橫行不法，激成叛變，皇帝也無法善後，只得派員趕發餉銀，含糊了事，從此朝綱紊亂，國事日非，四十年後明代就滅亡了。一六〇九年，朝臣們又爲了李三才一事大起紛爭。三才先會凌折稅監，頗得民心，可是他植黨通賄賂，品行却也不好。他已陞了戶部尚書，他的羽黨還想捧他做宰相，於是工部郎中邵輔忠等，便相繼劾他貪僞險橫，東林黨的領袖顧憲成却說他廉直，因此鬧了好幾月，結果三才自己下了台，才能。

利公便在這樣枵腹不安的環境中專心一志，和徐光啓等一班志同道合的賢士大夫，力求溝通中西文化，先在道德學術上立下了基礎，然後把天主教教義灌輸給中國的智識份子，使他們自然而然地，漸漸走上崇正黜邪的道路。那時，他採用這種方法很受人非難，可是三百年後，到了現在，大家才知道這種方法的價值了。如果利公的主張能始終貫徹，中西兩方面的人民以後就不致發生劇烈的衝突了。但無論如何，甚多的教化已在中國立下根基，以後，只見滋長繁榮，不見枯萎磨滅。

第一章 中國海中的歐洲商船

范禮安會長見中國教務頗有進展不禁大為欣慰，便想添派十位教士加入工作；經費一層也已籌有的款，足敷四處住院的開支。那時，歐洲各國的船舶又在中國領海出現了，不是來進攻，却是要打破葡國人壟斷商務的局面。

以前，加莫恩人（Cathans）對於「露西笊尼小王國」的預言並沒有實現，當利公入覲葡王塞白斯底盞時，葡萄牙的國祚快要告終了。過了兩年（一五八〇）班葡兩國共戴一君，葡國政權落到了哈白斯堡（Habsbourg）王室手裏，大部份屬地的盛況，就此日見衰敗了。

最先和它為難的是英國，英國的海軍一出來活動，就見不得這崇拜偶像的中國民族，把遍地金銀的土地閉關封鎖。那時國際公法，還沒修訂妥善，海盜和海上的防軍分不清，那素稱「海上獠犬」的英國戰艦便不顧邦交，不遵公法，在海面上往來巡弋，四出剽掠。各國商旅都受他們的擾害，尤其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人民。這種行為當然是戰爭的先兆，因此，西班牙王便建造無畏艦隊，出師征剿，却不料結果，班王斐理伯二世全軍覆沒，一世英名就此掃地無餘。

這時候，人稱「海上蛀蟲」的荷蘭誓反教人，只靠販賣香料營生；他們在里斯本收買從印度各島運來的香料，轉運歐洲各國銷售。不料班王斐理伯二世兼攝葡國王位之後，便下令禁止這宗貿易。荷蘭人經營這種商業剛有起色，不料突被摧殘，不得不歇業回國，或則自到亞洲採運。但班葡兩國對外人忌嫉很深，把遠東航路嚴守秘密；本國人民如敢洩漏，就得受殘厲的懲罰，甚至要被處死刑。荷蘭人於是決計不顧一切艱難險阻，自去尋覓航行的路綫。他們曾兩次出發，取道北冰洋，冒險

探路，結果都葬身魚腹，徒供詩人憑吊。末了，有一個古達（Goud）人高奈利胡德曼（Cornelius Houman）在里斯本秘密活動，設法弄到了一點重要的情報，因此被葡國當局逮捕下獄。他却托人把這事原委通知本國政府，得到了贊助，繳納一筆鉅額罰金，獲釋出獄。他回國後，荷蘭商人們得悉他的秘密，立即邀他和他的胞弟弗賴特烈胡德曼組織了一個大商隊，稱為「遠方」隊，懷着極大希望，向着不定的目的地進發。這一隊計有四艘大海船，分載着二百五十人，備了全副武裝，於一五九五年從德克才爾（Texel）啓程出發。他們到了麥達加斯加小作勾留，下一年便在蘇門答臘和邦宜（Bantam）兩處先後登陸。從此，那富有冒險性的荷蘭人就前仆後繼的，在南洋羣島開疆拓土，逐漸發展，他們的勢力也就蒸蒸日上。

但荷蘭人也像當初的葡萄牙人一樣，不久就知道在南洋羣島以外，更有廣大的世界，和若望李谷登（Jan Lischoen）在歐亞得悉的詳細情形悉相吻合；他們覺得和他們的死敵西班牙人為難的最好方法不在乎在歐洲向西班牙國直接進攻，却在掠奪它被迫合併的與國，葡萄牙，遠東方面所有的商業。為實施這種政策起見，他們便和英國人沆瀣一氣，合力進行。可是英國人狡猾的外交手段是天下聞名的，因此他們倆忽而攜手同盟，忽而反臉尋釁，竟使人弄得莫名其妙。

范禮安會長曾於一六〇〇年十月二十日在橫濱寫過一封信，說：「我真不知道這些英國人究竟要我們怎樣；他們在這裏教我們惹厭得很呢。看來，他們的用意是在進攻遠東各處的海口，因為兩年來，他們總有三四艘船開到摩六甲羣島，和蒂陶爾（Tidore）今年又有十艘開到了松特（Sonde）又有幾艘開到蘇門答臘的大城（Dachen）在那裏被馬拉加的艦長加以留難。他們在松特島買了大量的辣椒，丁香，裝船回國，他們頻頻來往，使東印度羣島大起疑懼。今年有一艘英國或是荷蘭的船開到日本，在本谷（Benjo）海濱撞沉了。這艘船行駛了二十二個月，摧難喪生的有百餘人，只剩得二十四

五人獲救，船主亞丹是英國人，年紀約四十多歲，算學和航路都很熟悉。他們奉了奧郎日(Orange)公威廉諾素(Guillaume de Nassau)的命令，由聯邦政府派遣，從荷蘭和齊蘭出發而來；荷蘭政府決計取道東北，尋覓到中國，日本，摩六甲羣島的航路，因此於一五九三年，和以後兩年中，派遣了本國船舶啓程前來。他們行駛到東經八十二度就凍得受不了，不能再向前進。據那船主說，他們一定還要冒險嘗試，因為他們要向中國買藥。他又說英國人也實行着這樣的計劃，自以為取道西北(拉勃拉多)(Labrador)可以尋得較短的航路。但他們也遭遇了同樣的阻礙，不能再向前進。：神父你知道這些商人要是繼續嘗試，我們就要大受妨礙啦。願天主佑助我們！因為我看世俗中人要把我們扔在大危險中了。」

范公見這種威脅日甚一日，所以深切憂慮的緣故，有一端是因遠東耶穌會教士們向來只靠私人捐助，和王家津貼，來維持生活，支付各項費用是不够的，還得設法就地勸募籌措。這全靠時局穩定，才有把握。按照耶穌會會憲，開辦學院不妨有基金收租賦。日本的耶穌會沒有基金，所以教宗特准他們動用羅馬和里斯本的公積金，在澳門收買中國絲經，托人運到長崎販賣。以前會由羅特列蓋(P. Juan Rodriguez)和維埃拉(P. Vieira)兩司鐸，先後做過日本教會的財務經理人；真福斯比諾辣也會於一六一一年充任斯職，很得了些利益。羅特列蓋神父更見得具此長才，以致豐臣秀吉竟央他，強迫他替自己居間說合，以致後來真福斯比諾辣因此大為憤懣，深歎被人欺侮，降格到這樣的地步。而且這種事情，所冒的危險也很大呢。

耶穌會士們這樣經商營業，來貼補傳教經費，不料被其他同時代人學了樣，利用自己的餘貲作資本，經商放債，不免發生了種種流弊。范禮安深知這件事關係着傳教教會的存亡興替，曾給一位對於創建中華聖教，在物質上有過極大貢獻的

某人寫過一封信，說：「經濟是戰爭的命脈，當然也是現代傳教事業的命脈，如果經濟沒辦法，公教教會當局縱然萬分盡心竭力，非但不能在異教國家獲得進步，便是原有地位也必難以維持。：宜揚聖道這件事，也和其他人類經營的事業一般，要談發展，資本和人工缺一不可。：從事傳教的教士必須經濟充裕，才能就地培養佐理人員，開設學校，施醫給藥，興辦各種善舉，只憑他一個人就能大著成效，要比缺乏經費的多數教士有效得多。所以某大司鐸當經費竭蹶的時候，接到了添派教士的消息，曾說『要擴張天主國，多一點錢，少幾個教士，辦起來更見得好一點，』便是這個主意。這些話不應資爲口實，大家都該明白他的用意，這決不是說只要有了錢，就會有人奉教，却是說傳教全憑神貧的表樣來征服世俗，教士們必須度着清苦的生活，存心捐棄一切，才能以言行感化罪人，使他們化成真正的教友。我們知道這是千真萬確，亘古不易的道理。這些對於世間金銀財帛毫不關心的人，天主也要賜給他們財源不匱，這不是教他們弄財物來自己享用，却是要他們促進廣揚天主神國的功業。」

范禮安會長早就知道要使遠東教務順利進行，這宗教會的資產就不容忽視了。他每說：「財產經理人幾經更易，全省區就受害不淺。」他對中國教區的計劃原規定每一住院，撥付三十金元，供給三位司鐸一位助理修士的衣食。不料荷蘭人竟把他的計劃推翻了。

一六〇一年，在澳門海面上首先出現的荷蘭人，是萬納克（Van Neck）統帶的一行人。他們一共有六艘船，在德爾那（Ternac）和葡人交戰的時候已沉失了一艘，後來他們到巴大尼（Panni）的航路被遮斷了，萬納克便帶了兩艘向粵江進發，打算和中國當局訂約通商。九月二十日，約在午後兩下鐘光景，中國沿海的小島上，就有人看見這兩艘船行駛前來了。

他們的領路船遇到了中國漁船，便問漁民上川島在那裏。漁民回說向西七里便是。到了二十七日，萬納克望見一處大城市，建築得和在西班牙的城市一般，便派了幾個會講馬來話，也有會說西班牙話的人，乘着小艇登陸訪問，却不料一去不返。一天，他見山上聚集了許多人，才想起了林谷登 (Jinchoen) 的話。知道這地方有一座城市叫澳門，那裏有葡萄牙人和一個主教，他就怕起來了。但這些荷蘭人還想近岸拋錨。葡國人就派五艘兵艦出去，捕獲了一艘小砲船，和船上的水手們，荷蘭人沒法營救上岸訪問的人，白費了一番心，只得於十月二日重向巴大尼駛去。這回他們被虜獲的有二十人，十七人被葡人當作海盜斬首，其餘三人被押赴臥亞，釋放回國。

這件事就惹起了荷葡兩國間的惡感。下一年（一六〇二）荷蘭人雖然不會到澳門，可是他們聯合了英國人派出一隊聯合艦隊，在高陸茫台 (Cocoiland) 大海中，截獲了一艘在摩拉加裝貨開到日本的葡國商船。

一六〇三年六七兩月間，接連發生了三起截劫案，使澳門行商大受損失。先有一艘備運本年出產的貨船——那一年的豐收，正是空前——在新嘉坡海峽被荷蘭人海斯勾克 (Jacob Van Heemskerck) 截獲；只過得一會兒，又有一艘開到摩拉加的糧食船被擄去了。這還不算。七月三十日午時，有一艘中國船開到澳門，報告這兩起劫案時，日本的貨船正在澳門，等一天出發。據利公講：「這時候，船上官兵都已登陸了，只剩幾個水手。將近晚上，那藏匿在附近小島傍邊的埃拉末斯號 (Elanus) 和那沙號 (Nassau) 兩艘兵艦突然駛出，安安穩穩把這貨船上裝着許多貨物，連銀子連船，一齊劫去。這船上所有的東西是澳門的大宗財源，一旦被人劫去，就壞事了，頓使澳門商人失魂落魄似的，無法補救，個個唉聲歎氣，因為這回的損失共計值銀七八十萬元，耶穌會的一部份也有兩萬四千元哪。」

這件事使葡國人掃盡風光，船上的水手們深恐荷蘭人再來報復，都逃到了岸上。澳門全埠的商人目覩這回猝遭浩劫，也嚇得心胆俱裂，過了十天，依然束手無策，不敢再把貨物裝船起運。到了八月十日，荷蘭人把貨船放火燒毀後才返樟南洋，他們得了這注大財，儘夠享用，便不再向北行駛。荷蘭人認這種沒本錢的買賣，是發財的捷徑，從此以後他們每年總得幹幾遭，攔劫來往中日兩國的貨船，使在兩國從事貿易的航商大感威脅。長崎某教士曾於一六〇二年十二月一日的來信上說：「這裏的教會，實在可說得是我們憂苦中的孩子，到如今已有三年不見船來了；有的遇險沉沒；有的被荷蘭或是英吉利的海盜截獲劫去。」

這些不幸事件，使經營已歷多年的日本教務頓歸停頓，對於新開創的中國傳教事業，更是不消說得，勢必就此一敗塗地，無法挽救了。幸而這當兒，范禮安會長正在澳門，給澳門教會當局加以鼓勵，不致失却勇氣。一六〇四年四月七日范公致書總會長，略稱：「我照本會的定例向參議人員說明我所有添派人員和撥款維持在華傳教各機關的計劃，大家都表示反對，說人力財力都異常缺乏，更要求把四處住院裁撤兩處，只把北京和南京的留着；添派傳教人員，務必暫為停止。我雖則在各方面受窘迫，却仍決定不放棄任何住院，目前既難求全暫且添派三位司鐸，使每一住院有兩位司鐸，一位修士，北京一院有三位司鐸。」

亞瓜維伐總會長便在這一節旁邊，批上「同意」兩字。因此，中國的傳教事業又虧着范公竭力維護，得免中落。利公威激之餘，曾說：「他主持中日省區耶穌會多年，曾受過同樣的挫折，却不因此而稍見灰心。他把原有添人撥款的計劃略加減縮他原想一舉成功，如今只得逐步推行了。」

添派人員實在當前的急務。這件事，龍華民神父已於一五九八年十月間要求過了，以為區區日本，尚有一百多會士，借大中華，只有幾個傳教司鐸，實在太少了，很該擇體格壯健，讀得慣華文，又會譯書的人才，施以訓練，加以培植。一六〇四年春初，李瑪諾帶了三個助手重入內地，那時各處需款孔亟，澳門當局便向中國商家借得了幾筆錢濟急。這是添派的第一批人員，和葡國商人一起乘船出發到了廣州，雜在三百多艘船中，在水面上過了一天兩夜，沒有被那些仇外的本地人看出。賈伐祿院長還想派那時到澳門來造堂的斯比諸神父加入，但他原是奉總會長明令，派往日本傳教的，所以日本方面不肯放棄。又有一位後來也致命的義籍會士高登召 (*Garnille Cosanzo*) 要到中國內地去傳教，却爲了他種緣由不能如願。這當兒澳門葡國當局不願再讓異國教士進中國。

一六〇四年，澳門的商務又稍見繁榮了；下一年便有三位司鐸得入內地，但義籍會士熊三拔 (*P. de Ursin*) 却要等到一六〇七年才能加入。這回先後來華的共七人。（葡籍四人，義籍三人）却有三位不得久居中國：一位是義籍司鐸杜祿茂 (*Tedeschi*) 在韶州傳教五年後，便去世了，只有三十七歲；一位是葡籍賂入祿 (*Jérôme Rodriguez*) 一六〇九年秋初因患目疾和胃病，回澳門休養；一位是葡籍林斐理 (*de Silva*) 在華傳教九年，於一六一四年去世，享年三十六歲。其餘四位任職很久，費奇觀 (*Gaspard Ferreira*) 和黎寧石 (*Pietro Ribeiro*) 兩位是葡國人，身子都很結實，費神父傳教四十五年，黎神父三十六年。熊三拔傳教京師，一六一〇年接替了利公的職位，到一六一八年被逐回澳門後去世。王肅豐又名高一志 (*Vagnoni*) 也是意國人，却在中國幹了一番大事業，直到一六四〇年才去世。

算來那時在利公屬下的傳教司鐸，計有十二人以至十四人；一六〇六年每一住院至少有三人，遂了范公的素願，但自

一六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死了三人，又去了三人，就只剩得八位司鐸了。

范禮安會長爲謀補救這缺乏人才的弊病起見，便決計仿照日本的額我路八世備修院的辦法（註一）在澳門創辦學堂，就地甄拔人才，培植聖召，也可以造就許多未來的好教友，使他們居官供職，萬一發生教難，這班奉教官吏，也可以設法平息風波；他們平時清廉勤儉，更可以使教外人士知所矜式。無奈范公這樣的好計劃正將實施的時候，就發生了荷蘭人擄劫日本貨船的不幸事件，因此無力與辦，只得作罷。後來，澳門耶穌會當局想把這件事先辦一部份，不料依舊不能實現。

事實上，要造就當地神職人員有兩種方法可行：澳門的神長們以爲應擇年幼的中國兒童和教日本兒童一般，教他們拉丁文，才能造就；北京方面却以爲不如揀年長的讀書人，加以訓練，使當神職，要他們服從管轄是不難的。神長們於是照澳門方面的主張先行試辦，以爲這是最自然，最通行的辦法。可是十七世紀末葉的柏應理（Couplet）司鐸曾說：「六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們明白他們的光陰是虛擲了。他們在南京南昌兩處創立備修院，可是他們費盡心力，結果却只造就了六七個天份最高的青年收錄進會，當助理修士，專辦些物質方面的事情。這些事情只須化一點錢，世俗人一樣也會辦得好的。」

當十七世紀開始時代，前途的瞻望依然樂觀。亞瓜維伐總會長和范禮安省會長都主張收納中國人入耶穌會，澳門方面和在華會士們不等他們下令，便已實行這種計劃了，却不料遇到了許多重大的障礙。一六〇五年五月間，利公曾說在華四住院雖已收納了五十名左右的初試修士，修成的却極少。那時，收納初試修士入會，似乎依着下列三原則辦理：

（一）在某時期內，神長們會收錄從內地來的中國人，却就看出他們沒有恆心，因此只肯收納生長在澳門的子弟，因爲澳門是主教常駐的都市，居民大都是葡國人；教務發達，教友們熱心神業，不亞於歐洲各國的任何都市。

(二) 初試修士們必須派入內地，給傳教司鐸們服務，或教習要理，或參與機密，經過多年的試練，才得陞入正式初學院（本會文牘中往往稱他們爲「道其格」(Doctrina) 這是在日本通用的名稱）。

(三) 新入會的，雖然也該讀幾年拉丁文，但范會長憑他自己所有的經驗，擬定一條規例，不讓他們陞任司鐸。後來龍華民會向總會長表示意見，說這種辦法，要是不帶着一種不令人難堪，使人受侮的見解，在要求進會的中國人看來，是不難接受的，那時在華的耶穌會當局確曾說過中國人所以「不能陞任司鐸，是因他們在聖教會，在耶穌會中是新進，因此不能和日本人一般看待。」龍神父對這種見解力持異議，他說：「我們即使承認日本的同會昆季出身教友人家，誕生後八日便領洗，但這一點比了我們所有在澳門生長的華籍神昆並不稍見優異。日本人民大多數是異教人，通行着異教風俗，習慣，典禮等；因此，日本的昆季們，除了在本會修院中之外，一概見不到，也聽不到教友的情形，而且多理論而少實驗。他們也該派到澳門學院來見識一下，『好教他們明瞭本會的真相，了解本會司鐸們和其他信友間所有不同的地方。』」（註二）

龍神父這篇議論，和當時所行這種嚴峻的辦法，究竟得失若何，且置不論；事實上，這時期內雖有八個澳門人進了耶穌會做助理修士，晉陞司鐸的却一個也沒有，而且這些修士雖說是中華人，却已葡萄牙化了。

范禮安於一五八九年十月十日，呈請總會長准他收錄四個澳門出身的中國人進會的時候，中國內地，經利公和羅明堅兩人勸化的教友，統計不過八十人。這四個澳門人中，兩個已準備入會了，也許以前已有了一個「巴爾大薩修士」(Balthazar) 在澳門進了耶穌會咧！

鍾巴相和黃明沙兩位修士是於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在韶州開始初學的，他們在正式初學前，便已讀過拉丁文，領過

低品級，或者至少行過剪髮禮了。范公心目中，開辦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目的，無非是在培植人才，收納入會，分別派往中日兩國傳教，以爲「不這樣，兩國的教務不能管理，也無法進行」。到了一六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范公令知除上述四人外，准予再收兩名初學修士。這件事大概要等到一六〇五年才實現。但一六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利公已在北京收錄兩名華籍修士入會初學了，這便是安東尼李道和多明我孟台。一六〇六年八月十五日，費奇觀神父到了北京，利公把這兩個人交給他任用，費神父便帶他們同到南昌，到了一六〇八年三月八日，又收了鍾鳴禮、邱永賴、嘉（？）（Francesco de Laga）裴樂（？）（Ben. Pucina）四名華籍修士，其中有一個會到過澳門，攻讀哲學。這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利公計算共有四名助理修士，四名初學修士；此外，又有四五青年在北京住院中讀書，預備後來進會。因此，我們屈指算來，耶穌會在中國開教時代，本籍傳教人員，起頭就不多，以後也是這樣。

另一方面，神長們仍想開辦公學，使內地奉教人家的子弟前來就學。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瑪諾神父會因此向羅馬總會正式請求。他說：「我確知要幫助這個國家棄邪歸正，再沒有更好更有效的辦法。事實上，中國兒童凡是能讀書的，就以讀書識字爲要務，中國人又都認讀書可以發跡，置身通顯，所以我們很想使教中子弟入我們的公學讀書，只須下工夫，將來總有大一半會飛黃騰達，對於神業也會大發熱心，全體教友也就因此可以得到很穩固的保障。……我們希望賽維利諾（San Servino）樞機因病出缺後，更有一位大樞機要主持興辦這件大事業。」

亞瓜維伐總會長也很贊成這個計劃，可是他的意思要兒童們在澳門信友社會中讀書受教育，學習好風氣。利公於是婉轉開陳，說明這地方委實不相宜。他說：「其實，澳門雖則地處中國邊疆內部，這地方的居民却被認爲外國人，十分可厭，很

受人疑忌。再則在那裏營業的人，大概都是些下流人物；甚至打官司的人要治他的對頭，只消說他慣到澳門，就夠了（我曾親自看見過）。我們力避談起和澳門方面的關係。我們所冒的危險，要算從澳門來的危險最嚴重了；所以我願意神父知道這種情形，我講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利公在這封書信中，末了顧慮到目前歐洲船舶侵入東洋，對於傳教事業的危機。中國人不但疑忌澳門的葡國人，便是斐列濱的西班牙人，和新到的荷蘭人，也防得緊。一六〇三年十月三日，馬尼刺的西班牙人開始把華僑慘加屠殺（註三）一時遇害的有一萬以至一萬五千人，有人說竟有二萬人，消息傳來，教士們深恐這件事要惹起中國人的憤激，因而對歐洲人一概仇視。幸而事實上還不至如此。一六〇五年春初，利公曾有信寄到羅馬，說：「我不知道你們那裏有沒有聽到有二萬中國僑商慘遭屠殺的事情。這裏，京城裏，這件事已有許多人紛紛議論了；雖然這事發生以前，我們早已留意，不教知道我們和西班牙人相友善，却怕因此受到牽累。這回的大屠殺案沒有造成以前，曾有中國皇帝手下的某大臣，到過斐列濱，調查一個中國人傳來的謠言。西班牙人招待得很週到，對他很恭維，又送給他許多禮物，同時又給中國沿海的福建省的總督，來了一角公文。這封公函譯成華文後，便詳到北京，據說信上還寫着天主降生一六〇三年字樣。『天主』兩字原是我在教理問答中所用的名稱，幸而天主的聖意安排着除了徐保祿翰林外，誰都沒有留心到。我就囑咐他不要對人說起。再則，西班牙人把天主寫作（Dio），我們却從葡文寫作（Deu）。這就大大的幫助我們，免得被人認出他們信奉着和我們同樣的宗教。」

荷蘭人方面引起的危機，要比西班牙人方面大得多。利公在他的筆記中會講：「這幾年來，西班牙王正和荷蘭人開戰。荷蘭人對西班牙本國不能加害，便謀擾害他的屬地，因此，調派許多船隻組成艦隊，駛往印度東洋。荷蘭人雖則不很善於作

戰，却有很好的砲隊，和其他的軍事設備。他們擾害的目的達到了，他們的艦隊在遠東遊弋，就截獲了許多葡萄牙人的商船貨物。因為那時東印度方面的兵艦太少了，不敷分派，艦上的士兵又是就地招募的，一切配備也嫌不足，所以保護就難週到了。荷蘭人一出場，就掠得了許多財物，便加強了他們的艦隊，打算進攻幾處重要的港口，如摩拉加莫三壁等，近幾年竟想攻入摩拉加。他們還想和中國訂約，住福建境內通商，所用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對中國人許下重大酬報，自誇能打败日本人，澳門的葡萄牙人和斐列濱的西班牙人；一種是威脅沿海居民用炮火來使他們害怕。

利公會於一六〇五年一月間講起荷蘭人和中國通商的詳細情形，看來這是一般研究當時荷蘭人在遠東活動的史家們所不知道的。他說：「那時來了三艘船，福建的大官員便上了好幾本對他們不利的奏摺到北京。這些奏本，我都見過了，某太監以為不妨答應他們的要求，但他們終於不得不啓程他往。他們的貨物，却有許多種銷到京裏，買得好價。」

以後，荷蘭人就不時在東洋出沒，因此，澳門方面不得不謀加強防務，防他們再來攻襲。這就不免要使香山縣知縣起疑了。廣州一班仇外的讀書人，更因耶穌會在澳門建造聖保祿學院，欲求早日完工（一六〇二年王竣）曾給中國官府送了些禮物，才得到了許可，格外覺得可疑。他們懷疑這座大屋子是造來騙錢的呢？還是當作炮台用總之，這件事惹起了從來沒有的疑忌（註四）。但看不久教會當局，趁着開闢綠島的機會，在這地方設立一個本會學生們休憩的處所，以防不測，就可以知道了。

這當兒，范禮安會長正預備第四次到日本視察教務；但他並不忽略中國方面的各問題，把許多為難的事情，如喪儀問題等，審慎周詳，妥為處理。荷蘭人的擱劫行為，也使他制定一種辦法作為以後在華常法區，和傳教區的經濟基礎。這種辦法

就漸漸成爲定案。

在華的教士們未遭荷蘭人劫掠以前，早已覺得外來的接濟是靠不住了。那指定在摩拉加關稅內撥付的協款，總不能按時收到。傳教經費的來源大抵是從葡國人的商業上籌措得來，幾番遭劫後，經費就拮据得到了極度窮困的地步。那時，在中國內地籌得的款項，爲數極微，利公所得中國皇帝的供給，每年約一百元，當時這數目已算不小，可是這只够五人的生活，而北京住院中，常有十五六人呢。

教友或是教外人的餽贈，是不能想要的，教士們定下規例，一概不得收受。有時候，實在不能推却，總要答還價值更大的東西。李瑪諾神父會記：「在這些人看來，這便是天主誠命最是真寶的憑據，也正是所以證明我們不是來探他們的國情，想奪他們的江山。：他們見了我們自給衣食，不向他們乞取分文，就明白我們費許多錢，用許多人來傳教，實在是出於不得已，非如此不可。我們既然領受了在中國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費，這就可知我們一點也沒有來奪他們江山的意思。再則，他們即使奉了我們的教，我們也不問他們要甚麼；他們奉教毫無損失。教外人雖則不大懂得天上的事情，講的話却是這樣。他們只想着這個世界上的福樂。

但范禮安會長却已覺得教士們極度窘乏，教務勢必無法進行，要免除這種危險，實有急謀補救的必要。因此，他擬定一種計劃，給每一處住院籌集一千元基金，用以購買田地，所得的租息，就够供給教士們的生活費用了。因爲利公論及這件事，曾說：「中國人還不至公然攘奪他人的財物，我們的友好也都勸我們這麼辦。這樣，人家就不再盤問不休，我們的經費從那裏來了。我還聽得有幾個朋友教我們答覆這種問話時，不要說我們的銀子是從外面來，不妨竟說用硃砂煉成，（因爲許

多人相信我們有煉金術。范公對這件事，也和其他許多的事情一般，非但不因荷蘭人侵入而退縮，反乘機更求推進，但利公的繼任人，以後就不免要因這種黷武主義和經濟侵略，把基多信衆所當有的人生概念一掃而空，不住歎惜痛恨。

第二章 范禮安會長功成身死

范禮安會長在末次起程前往日本以前，曾在澳門上書總會長亞瓜維伐，說的話十分懇切動人，原書如下：

『自從我在羅馬奉了梅古里益前總會長的命令，巡閱遠東教務以來，屈指計算到一六〇四年八月已有三十一年了，我到臥亞後算到九月六日，也要滿三十年了。我先後担任職巡閱，省長職務，統轄印度日本等國教務，二十一年未嘗或輟。這封書信發出後，等回示寄到印度的時候，（按葡人當時在遠東的屬地皆稱印度，連澳門也不算是中國）中間如果天主或是總會長神父不曾另有安排，那麼，我在這裏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我會從印度到過日本三次，此刻我準備再去，如果天主許我去得成，那就是第四次了。神父想還記得有一次，我第二次到日本視察後，曾向神父請示以後的工作，還說我的這種職務，如蒙解除，這就是個大恩典咧。以後，這句話我也不提了。我常以為我的一身聽憑長上處置對於我的良心，實在要比不住要求免除重任，更好更妥當。我知道我的一身完全屬於本會，不是屬於我個人。講到工作一方面，我為本會服務不該有避重就輕，脫卸仔肩，藉此安度餘生的心願，因為休息的時候還沒有到呢；諒必神父也不肯答應的。現在我的年紀更大了，體力精力日見衰弱了，似乎已到再度懇求你的時候了，我求你不論是出於愛德，或者只算是恩典，准許我用所有幾微的餘年，收斂心神，自願我自己的靈魂不再照管他人。

『我所以要向你作此請求的理由如下（雖則我完全要遵從吾主的聖意，和神父的意旨，在我眼裏你是天主的代位人。）第一，我已說過，等管賬神父回來，我接到你回信的時候，我已過七十歲了。我年紀大了，體質力量，就不足以担负這重大

責任，必須換一位有更大精神才力，不是七十老翁所能有的人，才能應付這些沒有一定數目，又是變化無窮的許多事情。比方在風浪最險惡的海洋中，向某某地方航行，便是我分內應爲的事務。第二，各種事務連續不斷，直到今天，我還得一一過問。我處理這些事務，只有我去吩咐他人，總沒有人來吩咐我。天主仁慈會把我的熱忱傳達到羅馬，但如今這種熱忱的却已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冷淡了；我的私意漸漸得了力，我的一身就不免要愆尤叢集。所以我以爲我滿了七十歲，理該許我借雅各伯的話「願我終於歸了我的本家」，我盼望吾主在我擺脫了一切思慮之後，一定要賜給我大量神恩，使我返居原來的地位。第三，我知道天主托付我的事情這樣重要，我的神火却不相稱，在管理上已犯下了許多過失；如今我年邁力衰，我的過失勢必一天比一天重大了。古經上稱梅瑟是最良善的人，然而管理天主特選的民族尚且不免感受許多不快；我的毛病這樣多，担負了這樣的重任這多年，又怎不更覺得艱難，困乏得受不了呢？

「末了，我可以老實對神父說，天主加我恩寵，賜我辦得總算有了好收場，我心裏所有按照天主先後啓迪我，才擬定的關於印度、中國和日本各方面教務的計劃，一一實行了，（雖然因爲我才疎力薄辦得不完備，）如今剩下的新事業，應歸我辦就的，一件也沒有。」

「最後既然天主不是只對一個人，啓示一切的事情，却要隨時按他的聖意，給這人啓示這一件，給那人啓示那一件。如今對於我個人，天主已按我的能力，默導我，教我多少辦下一點事情了，所以我以爲如今已到退讓賢能的時候了，讓天主把別的事業教別人去辦吧。他們一定能爲奉事天主，爲聖教的利益而努力辦就的。」

范公上書後，又活了近二年，看見了他在中國所行的計劃，一一有了好結果。他的宗徒事業，終於大告成功。那時，利公的

書信中，在在表現着他的無限歡欣。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寫道：『總之，天主佑助我們是難察覺的；他用顯明的表記，教我們懂得他要對這中國人民展開他大仁慈的懷抱。』

無疑地，這種深切的願望，是從范公隨處派遣人員，撥款接濟，予以鼓勵得來。他添派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於一六〇四年二月間由澳門出發；這回便是費奇觀、黎寧石、杜祿茂等一行，由李瑪諾率領前來。下一年春間，黎寧石到了南京，那時駱入祿、林斐理，和王肅豐三人已在南京了。他們長途跋涉，當然不免要有一番辛苦，尤其是在路過那由太監守着的關津時候，幸而有鍾巴相修士和其他華籍修士們，陪着同來，化了一點小費，他們就能混過了。

這當兒，在華傳教的會士們好像接了血，從南到北，從澳門一路到北京，各處傳教機關，都獲得了新生氣。韶州教友們對這第一批的司鐸，更是熱烈歡迎，和歐洲的老教友一般。

據他們講：『龍華民和屬下信衆，帶了禮物，立即到碼頭上來迎接我們，還有鼓樂儀仗，列隊前導。我們到的那一天，是封齋前主日的傍晚。我們一到，便有那位奉教的官員喬治來拜訪，怪我們通知得太晚。下一天，他請我們去赴宴，我們辭謝了；他就命他的兒子維多斯把餚饌送來，維多斯年紀只有十一歲，却聰明穩重。這些菜餚是他家裏的女眷（亞納保辣路濟亞）做的；以後每逢吃肉的日子，他就天天送菜餚。聖灰瞻禮日，他送了一頓薄餐，和幾疋綢緞，我們也答了一些禮物。他很想去看看我們的澳門學院，如果范禮安會長要到內地，就派自己的大船去迎接。他不知道杜茂祿派駐韶州，就對他表示敬愛，又立即給他做一件衣服。三月六日，我們動身的時候，教友們又照樣給我們送行，表示敬意。』

於是，龍神父就有了一個助手。下一年，又添了駱入祿神父，更覺得有了力量，可以抵抗他的敵人了。前面，我們已講過曲

江縣向南詔道陳訴，反遭伸斥的事情了。和尚們見教士奪了他們的施主，奉教的死了人，又用不到他們，壞了他們的衣食，就設計破壞，使神父們不得傳教，作為報復，却又空費心機，毫無效驗。教士們知道有官府援助，便把這些事情全不放在心上。前面，我們講起過那著名的海珊（？）和尚在北京和達觀和尚同時被逐，押送南華寺看管。這時候，海珊到了詔州，一時，龍神父幾乎和佛教僧侶結下了仇恨。龍華民一定不肯先去拜望，結果海珊不得已，只好耐着氣，到詔州天主堂投刺請謁。他和龍神父略談之下，便知這位教士也是有學問的，不免覺得詫異。末了，他說：「貴教道理，和我們的道理原是相符的，不過有幾點不相同，你們也攻擊得太厲害了。」海珊在南華寺卓錫後，他的勢力就漸漸膨脹了，因此教友們便開始感覺到他的威脅。正在這當兒，北京的上諭又到了，把他押解到和中國相去更遠的海南島。虧着這些可喜的環境，雖則地方上還有些阻礙，詔州的教務，仍能立下穩固的基礎。一六〇四年，一年中受洗的有一百四十人，其中有幾個頗有聲望，其餘都是平民。這些新教友熱心誦禱，要比歐洲的信衆，更見得虔誠恭敬，他們也熱心與祭，又知道看聖書。如今詔州一屬的教友已有了八百人左右，大概住在城外。

在幾封年終報告的書信中，曾講夏坪（？）村有一個老頭兒洗名保祿，幾個新教友向神父究問降生受難，以及聖經上所有的奧理。保祿的親戚范其玉領神父到十里外的某村中，看見了五十來軸畫像，是仿照利公進呈皇上的樣本摹繪的，這真是一種驚人的發現。村人只知道聖母是天主的母親，諸王后之后，却怪這位母后怎麼有兩個年紀差不多的孩子，（耶穌抱在聖母的手裏，聖若翰跪着。）於是范其玉的一家就全體歸化了。神父也會和附近廟裏的三個和尚談論過道理，有些人答應如果皇上正式下詔，准許開教，他們就來學習。算來，那時領洗的統共有十八人。范其玉本人因為沒有兒子，娶了妾，所以

還不能領聖洗。

青松村(?)有一個老頭兒年紀已有九十歲了，他的兒子和幾個孫子，都已奉了教；他却非常固執；兒孫們勸他，他總不肯棄邪歸正。幸而這時候，他終於回心轉意了，便給他付洗，取名安多尼，過了幾天，他死了。某村中有一個婦人害了病，他的丈夫向神父求得了一點聖水去治病，果然，這婦人的病治癒了，夫妻倆就自願歸依聖教。但他們沒有把家裏供的菩薩燒掉，只拿去寄在親戚家裏，因此龍神父等過了幾天，才給他們付洗。此外，又有四家表明願意奉教。這地方新教友約有三十人，家家把偶像拋擲出屋，付之一炬。

以上，便是王肅豐神父到韶州後，大胆進行所得善果的概述，如今再講中國幹部南昌和南京兩處，教務發展的情形。這兩處水道相通，可稱爲中國人文薈萃之邦。中國東部近海的都邑，則面積不很廣大，却是人烟稠密，物產豐饒，文化昌盛，是全國最繁華，最富庶的地方。當費奇觀等教士們從韶州北上，經過梅嶺山隘的時候（一六〇四年三月十六日）中途遇雨，不得不在客寓中耽擱三四天，等候行李，却因此得和浙籍某官僚的兒子相結識，他和費公等談起教務，便表示希望他們到浙江傳教。這批新來的教士們，由李瑪諾率領，到了南昌，却不能多住幾天，李神父只讓他們認認江西人敬懼鬼神的心裏，迷信得和教宗聖良時代的羅馬人一般。他們起了九天的水路，便在聖枝主日上到了南京。李神父送到後，就遣返南昌（十月十六日以前）去協助那疾病纏綿的蘇如望神父。那時蘇神父雖然抱病，仍從那華籍初試修士孟台研習中國語文；李瑪諾回來後，南昌住院中便又生氣蓬勃了。

過了十一月二十九日，李神父給一個湖廣人付聖洗。這個新教友是因不滿釋道兩教的道理，才由他的師傅某宗室荐

來學習聖道的。更可怪的是他從和尚們那裏，得到了「大西洋傳教師」來華宣化的消息。他領洗後，便帶了幾本蘇神父的教理問答回家，神父們也答應一有便，就到湖廣去看他。

十二月十八日，又有某宗室領洗入教。他洗名若瑟，是那老秀才保祿的女婿。他領洗時他的胞弟也在場觀禮，過了兩天，也表示願意學習了。神父們爲發揮他的熱忱起見，許他等到了三王來朝瞻禮（一六〇五年一月六日）就有領洗的希望。他回說：「從前有三王，如今我們要有四個。」果然，他言出如山，來的時候，帶了一個小兄弟，一個表弟同來，連他的哥哥正是四個。神父們便用三王的名字，給他們三人取名梅吉歐，茄斯巴，巴德薩，同時又有一個小孩子預定取名埃麥努愛。因爲他喜歡親近李瑪諾神父，（李神父也取這個聖名）這些新保守家裏，有一個信佛很誠心的母親守嚴齋吃長素，又化許多錢給和尚道士，買符籙，讓他們把他牽到地獄裏。神父們就去竭力開導她，終於勸化她，使她棄邪歸正，把佛像，念佛珠連符籙等一併燒燬了，却給了她一幀救世主像，許下要教她走天堂路不走地獄路，神父到她家裏，她坐在幃幔後靜聽着。到了她領洗那一天，她就從房走出來，不只是她一人，却有六個一齊來。他們都已學習得很好了，便都按照通行典禮，給她們擦聖油領聖洗。她就命人在家裏設立經堂，她的好幾個家人便也奉教了，其中有一個是她的長媳，若瑟的妻子。那姓林的一家，這家的三個兒子便是前述的彌額爾，嘉俾厄爾，辣法厄爾仍舊熱心奉教。他們有一個朋友也是宗室，雖然只有女兒，沒有兒子，却也自願歸依，奉教後便和林家聯了姻。把女兒許配給林家的兒子。

因此，到了一六〇五年十二月初，南昌的信衆就差不多加了一倍，約有二百教友了。住院的小堂嫌太小了，容納不下，每當信衆來堂與祭的時候，就得分作三班，輪流入席。神父們命人雕刻一尊救世主像，附上一篇說明講天主教降生救贖傳教化

人的事蹟。教外人每在大門上貼着鬼怪似的符籙，在銅環上飾着狀類魔鬼的獸頭，教友們却在紅紙上印着耶穌聖母的聖名張貼。到了新年裏，神父們上街時，看見在這大多數是「埃及」人的城市中，天主的百姓們却在門上不塗羊羔的血，而寫着天主的聖名，作爲他們信奉真主的表記，便覺得非常快慰。

利公得悉了這一切的事情，深喜他從前在南昌種下的萌芽，如今已欣欣向榮了。但更使他非常欣慰的，却是南京傳來的消息，知道他的老友瞿太素如今正在金陵，終於決定採取切實的步驟，準備領洗奉教了。一六〇五年春季中，王肅豐初到南京後，講起當時教務情形。會作如下的記述：「住院在城中心，是一座美麗的廟宇。院長羅如望神父，獨自担任着傳教職務；黎寧石正在攻讀中國書，王肅豐和林斐理兩人加入後，他便和他們一起攻讀，黎神父自己預備出外傳教。有一位助理修士做羅神父的助手，又有兩三個學生，正在院裏先受試驗，然後正式初學。

有了這許多人，南京的住院就嫌不夠了。然而羅如望院長和官場中一班有力人物如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等相友善，就很容易地設法買得了一座貼鄰的房屋，擴充院址。他一天到晚很忙碌，除了應接來賓出門拜客外，還得給新來的同志們教授各種功課。但他雖則職事繁冗，仍不廢教務，因此南京的信衆（一六〇二年）原僅五十人，下兩年（一六〇三—一六〇四年）就添了九十六人，以後每年平均計算，總有百來人領洗奉教。

一六〇四年十一月，瞿太素到南京的時候，已有五十五歲了，他這回來寧，是要把他十四歲的兒子瞿式毅托給羅如望神父管教。那時教士們雖則生活艱難，羅神父却把式毅留下了。給他付了洗，取名彌額爾，又派一位師傅教導他。太素自己，却依然如故，他和教士們依舊很要好，也依舊不改他平素的行爲。那時，他正在從事編著一部闡揚佛學的书，設法籌集鉅款，刊

行問世，他的宗旨是在賣弄他的學術，想借此博得盛名。教士們呢，念他以前給聖教出過許多力，正想使他得到最厚最寶貴的酬報，不想他娶妾生了兩個兒子，還沒有立作正室，還是那麼篤信佛老謬說，實在不能不反對。然而他蒙主垂憐，終於豁然感悟了。利公會講他歸正的經過如下。

『黃明沙修士在韶州時，和太素友誼很篤；這當兒，黃修士恰巧也到南京，一見他依然沒有歸正，便對他婉言切責，責他不該這樣拒絕天主的寵召，辜負洪恩。太素給他說得心動了，便受了一本天主實義，拿回去仔細研讀，隨後他就來請求領洗，許下把他的妾認作正式配偶，並使全家奉教。他爲表示誠心向化起見，把他著作很精緻的刊版，和業已印就的書本，連三四包佛書道書，一齊帶來銷燬。他揀幾本留在家裏，預備摘錄出書中最精微的難題，請神父們解答。末了，他在聖母領報瞻禮日（一六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領了洗。那天正是封齋中的瞻禮六日，彌撒中念的新經，便是記載辣匝祿復活的那一節。念罷新經，黃明沙修士登台講道，便借此爲題，講天主降生，受難，和復活辣匝祿三種奧蹟。在堂信衆見太素表明自己也像辣匝祿一樣死而復活，無不稱奇。』

『舉行洗禮前，先由太素跪在天主台前，大發虔誠恭敬之心，叩首碰地，宣誓棄邪歸正。他的誓書中，有這樣的話：『我會從神父們學道，才知道天地人類和整個的世界，都是天主所創造宰制，都是屬於天主。其他一切的宗教都不當信從。只有天主能寬赦我們的罪過，和我們身心所有的惡行；只有他能給那真心痛悔，立志悔改的人，賜以天堂榮福。如今我求天主聖神啓迪我，使我明白各端信德道理，更求天主的母后堅固我的心。』』

太素領洗後，奉依納爵作主保。利公知道了這件事，中心欣慰莫可名言，認爲這是傳教工作上，一件極大成績，他說：『在

這開教時代，勸得這樣的人物棄邪歸正，要比許多平民的歸化有價值得多。』天主爲聖教前途賜徐文定得開聖道，也賜羅大素得救己靈，用以酬報他過去時代的功勞。

以後幾年中，南京又有幾個有名人物聞道來歸，其中有一個是姓秦的太學生。那時他的師傅李應試回湖廣原籍。他便同師傅和另一教友從北京乘船來到南京。他在路上，得悉聖教道理，到了南京，就私下來見神父，請求收納。神父們知道他的父親很重，起先不肯答應，但他後來又來懇求了三四次，神父們見他情詞迫切，便不再遲疑，給他付洗了。這時候，南京的教務安穩穩發展着，絲毫沒有受擾。後來教士們又買了一座房子，鄰居們和鄉老們便要他們當更守夜。縣官知道了，就傳這些人要去法辦，警戒他們。教士們出來替他們說情，大家才安靜了。

北京教務的進行，另有一番情景，自范禮安會長添派人員後，更有起色。一六〇四年，聖母升天瞻禮日，北京聖堂中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典禮。前幾天，費奇觀神父到了北京。他從南京出發後，路上遇到了監督漕運的太監，恐嚇他，要他離船上岸，但化了一點費，船就過去了，利公更得太監們特別幫忙，讓教士們的行李雜在貢品中，由水道直運到通州，却不料反因此遇到了意外。不幸，那幾天河漲水急，船行駛到離通州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船夫們便起了一個壞主意，大家商議好，把船弄翻了。教士們因此損失了二百餘金，又失去一幀裝金的畫像，和彌撒經。這時候，費神父已從岸路進京了，只留下鍾巴相修士，和兩個僕人看守東西。

沉失的東西撈得的很少。賽維諾樞機贈送的那部八冊大聖經，裝在錦匣裏，被鄰船撈得，想借此發一票財。鍾修士向他們交涉索還，化的錢總算不多。那時，馮應京雖在獄中，仍肯答應教友們的請求，出信託地方官查辦這些船夫和他們的同黨，

但只審出一點情由。利公等怕事情弄大了，反不好，只向他們追還一隻放着聖骨匣，和另幾樣東西的文具箱。

聖母升天瞻禮彌撒後，利公便把那部大聖經供在祭台上，行禮奉香，隨後衆教友都上前朝拜，感謝天主；因為這部聖經蒙主護佑從極遠方寄到了中國，又在災難中賜予保全，雖遭水漬，幸尚完整。後來便有許多教內外人士不住來堂瞻仰，一見這部裝璜華麗，印製精美的巨帙，不禁齊聲讚歎，這時候雖猶未識內容，却已想見經中蘊藏着的聖道，定必非同小可，決不視作等閒了。

那笛爾司鐸所著的「福音默想篇」，路過南昌的時候，已被李瑪諾留下了。利公就致書澳門要求再寄一本，這部書北京方面需要甚殷，認爲比聖經更有用處，因為有時候聖經奧義，不易用言語講明，有了這部書，就可以借助不少。

費奇觀神父進京的時候，北京新創的聖教會因着徐文定在京做官，生色不少。利公會教他怎樣對願意奉教的人講聖洗道理。文定一朝領教，一天便去勸得某姓朋友，許他害病的兒子領聖洗。當下便由利公派一個職員前去付洗。但那個朋友定要京堂教士親來主禮，答應以後不作迷信舉動。過了幾天，孩子的父親來向利公道謝，說他的兒子已死了。李應試熱心傳道，更見得惹人注意，他善與人同的心願太熱烈了，引人棄邪歸正的方法，未免有些過火。一六〇四年的聖誕節過得特別動人。利公會記：「我們除下救世主像換供倪槐修士臨募聖路加原本的一幀新聖母像，大家見了，既驚訝，又喜歡。有幾個信友竟澈夜留在聖堂裏，誦禱不輟，還有幾個恭與九台聖祭，其他的至少也與三台。來堂與祭的教友很多，絡繹往來，通宵不絕；有幾個南京的教友，這時正在京中，也就一齊來了。前三台是唱經彌撒，有風琴和奏。」

那天，神父們聽新教友初告解，有好幾個在告罪時涕泣痛悔。利公曾在寫給歐洲同會的书信中，講起有一個教友到他

跟前跪倒了，因為犯了一個罪，要求神父拿鞭子打他；實在這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大罪，不過是關於物質方面非故意的罪。利公說：「這件事，實在使我大為感動，至今我想起了，想見天主怎樣使這些新教友，心懷敬畏，不禁喜極下淚。」我們看了利公一六〇五年五月十日的書信，不難斷定他前書中所講的那個模範教友便是保祿李應試。他在這信上講：「這裏的教會還是新創，我們還沒有規定大小齋期，頒佈瞻禮單。李保祿自己向我們院裏的人問明了，一一遵行，未嘗懈怠。每逢罷工瞻禮，他總要來與彌撒，屢次告解領聖體，他也打苦鞭，做補贖。」

起先，利公因見北京住院的根基，還不穩固，所以他收納新教友的時候，不得不格外審慎，後來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比較安定了，便竭心盡力，實現他來華的職志。然而他有心建立一個堅固的好基礎，抱定寧缺無濫的宗旨，收納新教友，但求熱心，不求多；不虔誠，不守規誡的，就不要。只因那時北京還沒有公堂，他就不能大展宏猷。一六〇五年五月間，他曾記北京的教友人數比別處少，德性却很好。

依納爵小學校的教師給他送來了七八名學生；他在自己課堂裏，供起一幀救世主像，教大家一律恭敬。利公會講有一個十三歲的學生，讀書頗遲鈍，却願意奉教，但依納爵斷定他辦不到。一天傍晚，這孩子從家裏走出在路上被雷擊倒。人們把他抬回家中，昏迷了三日。後來他醒了，說他曾看見天主，有許多天神擁護着，他又聽到了這句話：「這回我不取你的命。」依納爵替他求天主，他痊愈了，他的母親就把他獻給天主。他於是領洗了，取名彌額爾，大家給他起個別號，叫做「雷打的彌額爾」。他志向很堅固，可惜壽命不長久，不到一六一〇年就去世了。

此外，利公還講過兩次顯示的靈蹟。第一次是耶穌向一位法官顯現，這位法官是教外人，却和教士們相識。先是，某教友

被仇家誣控謀財害命，他不問情由准下了。他夢見耶穌訓斥他，對他說：「我教會裏的人遭了災難，你爲甚不伸冤？」這件事大概是在一六〇四年夏季中發生的。案情審明後，這教友的父母便都歸化了。第二次是另一教友病危時看見了聖母。他見聖童貞抱着小耶穌，穿着白衣服，（所供的聖母像從沒有穿白色衣服的）向他顯現，囑咐一個老人，使他發一身大汗，醫好他的病。利公聽病人告解時，起先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奇事，後來又兩次考問他，教他仔細講出來。這個教友病愈後，便親自來堂行告解，雖則從沒有人教過他，却知道辦一個總告解，把他領洗後，一生犯過的罪，從頭到尾，一一告明。

北京教會一六〇五年的日記中，滿載着許多令人感奮的事情。封齋中，利公在小堂裏召集本屬信衆，按期講道。那時，徐文定正從原籍回來，也來聽過一兩次。他把講辭記錄下來，寫在掛屏上。其他的文士們更和他聯名請求利公翻譯聖經。利公雖知他們重視聖經蘊藏的寶訓，極願譯成中文，仍認茲事體大，決不可草率從事，只得托辭事務紛繁，一點沒有空暇來辦這件事。

四月底，或是五月初頭上，某教友把兩三箱邪妄的書籍，一大堆迷信的圖像，送到住院裏焚燬。利公說：「我們不得不教他們一定要盡這種義務，因爲我們曾見有些新保守只把他們的佛像圖書搬到親友家裏寄放着，也有幾個起初不肯爽爽快快把佛像立即損毀。」

五月八日，有一個七十七歲的老頭兒來堂與祭。這老頭兒雖然很窮，以前却不惜破費三四十元做佛事。這天他帶來了是一大堆佛像，其中有十來個是鍍金的銅佛，餘下的一小半是木偶。教中兒童們見了，高興非凡，齊來玩弄；這些玩偶便和佛書道書等一併燒燬了。這個老翁連他的家屬七八人，便合家歸化，領洗入教，利公給他取名法俾益，紀念他從前在羅馬學院時

的老院長。

五月十日，利公計北京已有信友一百餘名。這件事看來足使人驚訝，因為在首都禁教下，和大臣們的監視下，有此成績，實在是不容易的；人心的向化，前途的希望，更不必說了。一般大人物三妻四妾是不稀罕的，將來有幾個奉了教，多妻主義就不再存在了。

教士進京住下後，到如今已有四年多了，不是范禮安會長在極度困難中，籌集了五六百元買下一座屋子，他們早已不得不搬過四五次家，要去住在那卑陋而費錢的地方了。然而這種安居的生活，到了這時候，也就不得不告一段落。如今住院中有一位司鐸，（利公和龐費兩人）兩位新來的華籍初學修士（孟召和李道）還有一兩個初試，和九個僕人，添了這許多人，這座屋子就嫌不夠容納。恰巧宣武門近邊有一座住宅要出賣，地址再適宜沒有了。這座屋子佔地很廣，大小屋院有四十座，却因房子老了，又傳有鬼出現，所以索價並不很高。

利公探得了這消息便和徐文定等商議，決定無論如何，把這座屋子買下。他於是設法向人湊借得六七百元，只費了三天光陰，就和屋主接洽成交。一六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教士們遷入新宅，教友們來幫忙道賀的很多；當下利公等先在新宅中佈置一座廣大華麗的經堂，敬供救世主像，又指定一座院落，作為助理修士的初學院。後來，范禮安會長的匯款一到，更建造一座小樓房。這座房屋的舊主人，向來要地方上派兩個更夫看門守夜，利公等很願把這宗徭役免除了，但地方官定要他們照舊例辦。

這回的遷居，在北京的傳教史上，開一新生面，三百年來，河山一再易色，北京城已幾閱滄桑，可是人稱南堂的宣武門天

主堂。至今依然無恙。當時教士們曾把買賣的契約，呈報主管官廳立案，只費了五六元的手續費。以後住院的地位寬敞了，士大夫前來訪道的也就益發多了。問問他們的來意，都說是「特來領教」。那時，還有好些人專來瞻仰新奇，然而這又何妨呢。向人宣告耶穌甚多的福音，不拘甚麼方法都使得。

北京的教士們有了固定的住院，就和南京，尤其是韶州一般，開始到鄉間播散福音的種子。這當兒，有一個很有些聲望的保定人，在北京領洗奉教，便請利公派一位司鐸跟他同到他的家鄉去傳教。他住在保定府屬的一個鄉鎮上，和北京相距約二十四五里。於是龐迪我神父奉派前往。他曾在一封書信中講他一路前往，走的路全是陽關大道，兩旁綠樹成蔭，行人雜遝，車馬喧闐，頗有歐洲大都邑郊外的氣象，這個鄉鎮的居民約有一千多戶。龐公在那裏留了六天，每天宣講聖道，授洗十一人；臨行的時候，村鄉人懇切要求京裏的司鐸重來傳道。有兩三個保守，學會了要理後，到北京領聖洗。又有一個佛教支派的首領來見龐公訪道，用他領導的全體教徒的名義，許願棄邪歸正。龐公見他燒了神佛像，便給了他一幀天主像，一本「天主實義」。附近某村中，有些人知道了這回事，便差兩個人來請龐公。他們學會了聖教要理，便燒燬佛像，敬拜天主。龐迪我在鎮上遇到了本鎮某鄉紳，是某教友的朋友。此人便設下盛宴，邀請神父，又請了八九個官吏做陪客。席間主客談起天主造世的事理，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便要求他回京後，務必再來。這樣，北京的教士們，也像韶州的龍華民一樣，辛苦了數星期，就看見有新教友遠來領洗，因而感覺非常欣慰。果然，這些新歸化的並不是甚麼聞人名士，或是甚麼了不得的人物，却是些鄉野農夫，終歲稼穡辛勞，把吃飯問題當作第一要義。這些人大都不學無文，舉止粗魯，秉性率直，不講究禮貌；有些是漁夫，和漁人的教士們相彷彿，然而中國的下層民衆在佛教陰霾的籠罩下，不見天日已二千年了，如今他們一朝捨偽從真，翕然向化，真無

異撥開雲霧，重視青天，邪說謬理的悶葫蘆，從此打破了，這影響也就不小呢。從前有一位傳教士曾對他們說：「你們是值得敬愛的，因為你們中有許多人我素來是敬愛的，我在你們這地方從不會有過一分鐘想着要歸家呀。」（見胡公氏（Hugon）一四一—一五頁）便是現在也有許多歐美傳教士情願入中國籍，永遠不回故土咧。

范禮安會長見中國教務迅速發展，喜出望外，所以他一方面感謝天主，一方面寫信到歐洲，要求寄下祭台上的飾物，和經書圖像等。他最近又到過日本一行，目的在籌集四千元，分撥四處住院作基金。這時候，利公因為有一個計劃會和范公往返磋商了六個月，未能定奪，自己又不能親到澳門和他的上峯當面商定，所以他唯一的願望，便是希望這位中國教務的主持人能入中國內地，到各處視察一下。

但范會長不願貿然入境，必須先和中國內地的諸位神父從長討論後，才能決定行止。有幾位神父認這事太冒險：那時，留居澳門的郭居靜司鐸，却從憐他照辦，說利公的主意原不錯。他於是決定起程了；利公便急急佈置，使他沿途毫無阻礙。當下便由徐文定致書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央他發給一張正式通行護照，使郭居靜一行人回南京時，由地方官沿途照料，派人護送。一切事情都辦妥了，范公但等日本貨船帶到了預先籌集的銀兩就動身，却不料便在這時候得病逝世。

一天，瞻禮四，他到了耶穌會在澳門購置的綠島上去休憩，突然覺得肚子痛，兩天後，便於一六〇六年一月二十日，瞻禮六，安然去世了。他的遺命是囑咐本會同人大家戮力同心，協助在華的傳教事業，又命另派兩位司鐸，和郭居靜神父同行北上。利公會記：「大家都說天主的聖意不讓這廣大的帝國享受到這兩位天主教大忠僕，真福沙勿略方濟各和亞歷山特范禮安神父的救助。他們倆要救無數靈魂，極願進中國大門，却都在門口去世了，不能如願以償。」把范公和聖沙勿略相提並論，

真是頌揚得再好沒有了！惡耗傳來，利公感覺無限悲痛說：「范公死了，在華的教士們好比失了怙恃的孤兒。」的確，那時中國已領洗的教友計有一千數百人，能有這樣成績，未始不可以說是該歸功於范公的努力。不但耶穌會士們，看來是如此，便是其他修會中人也認這位會長不論從傳教熱忱一方面，或者從他的明智審慎一方面看來，都是無與倫比的。耶穌會神父所以得進中國內地，除了天主外，便該感謝他的功績。四年後，諾貝利神父（P. Nobili）在寫給總會長的書信中，還說：「講到他引起教外人熱心向化，和救靈魂一方面的事情，他實在是第一等能手；因為他放棄了祖國的習慣，捨己從人，事事為他人着想；這種態度葡萄牙人認為極難做到，可是據我們的經驗所得，却知這是絕對必要的。」

第三章 明史上的一頁

范禮安會長巡視中國內地教務的計劃，雖沒有躬自實行，却反因此簡接釀成黃明沙修士的慘死。范公臨死時，曾囑避派兩位司鐸和郭居靜同行北上，黃修士便在南昌奉命邁返澳門，陪送郭神父等入內地，沿途照料一切。不幸，那時廣州民衆對葡國人仇視甚深，黃修士到了廣州，被一個背叛的教友官掩捕，誣他做葡國人的間諜，因而備受酷刑，死於非命。明史上有二段關於澳門葡人的記載，我們讀了便可以知道：因着廣州人對葡萄牙人的惡感，遂使風馬牛不相及的天主教和耶穌會教士們無端被累，蒙受了極不利的影響，明史的原文如下：

『佛郎機遂得混入（壕鏡）高棟飛囊，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嘉靖）四十四年，僞稱滿刺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託，乃却之。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闊，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氏（M. Pelliot）譯述這篇史記後加以解釋，不禁大爲惶惑。原文所說的青州，顯然是指那劃歸澳門葡國人管轄的綠島，這原是澳門西北一個極小的島嶼，前面我們講起過耶穌會學院修生們遊憩的地方便在那裏。但原文所說的那座六七十尺高的寺院，又是甚麼一回事呢？伯氏說：『看來這不能是說那要在綠島上建造的小聖堂；照原文的講法，也不能是指着那一六〇二年造下的聖堂講。』後面所說的「高牆」似乎是說堡壘的城垣，不是說聖堂的圍牆。於

是伯氏的結論，假說，要明瞭這篇記載的疑點，就不得不下一番研究功夫，先就中國的志乘簡接搜檢，再從局外各方面的文件中加以尋釋。於是利公的函牘和筆記，就供我們借助，打破了這小小的疑團，證明迷信心理足使一般平民極容易受人鼓惑，一聽到無稽謠言，便信以爲真，不問情由，遽爾聚衆滋事，肇下禍端，到如今還是在所不免，怎不令人歎息痛恨呢？

當一六〇三——四兩年中——可知這是在那大聖堂工竣以後——澳門耶穌會當局開闢那遍地礁石，轟轟彈丸的小島嶼——綠島——在那裏蓋幾間小屋子，造一座小經堂，作爲澳門學院修生們遊憩的地方，不想因此引起了中國官廳的嫉視。一天大瞻禮日，正當葡國人都在那裏誦禱的時候，忽有一個信奉回教的小官員，帶了一班人，到島上縱火燒燬房屋，又把一幀聖彌爾像撕毀了。那時，有幾個日本人在島上，要想把官兵殺死，幸而有一個助理修士出來阻止了。這位修士便收拾了撕毀的聖像，帶回澳門。葡國人和耶穌會的僕人們知道了這件事，認爲重大侮辱，不禁勃然大怒，便一齊帶了棍子去找那官員尋釁。官兵見他們來勢汹汹，就逃走了。他們便闖進衙門，劫掠財物，捉住了那官解到耶穌會住院裏。後來，這件事由澳門葡當局出面調停，把捉來的官釋放了，雙方爭執移交香山縣處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

這件事已種下了使中國人誤會的根由。不料，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變故，而且這完全是歐洲人自己鬧的事，據利公講：『好像鬧了一件還不够，再來一件更可怕的事，使中國的傳教事業，澳門的居留地，以至葡國人和中國通商的權利，都蒙危受害。』原來自澳門薩亞主教去世後（一五九七年九月十五日）臥亞總主教派了一個奧斯定會的桑蒂斯做教會主持人。桑蒂斯原是被耶穌會驅逐過的人物，到任後，處理一切教務，都不能使公衆滿意，而且有幾件事情更辦得和一般利益有妨礙。於是耶穌會神父們就不得不出頭反對了。有一次，奧斯定會某司鐸竟當着他侮辱了一位方濟各小兄弟會的舉多

修士，畢修士便請求澳門學院院長賈伐祿按照聖教法規爲他辨白不料桑蒂斯竟不答應。賈院長便用他宗座代表和宗座裁判的職權，把他絕罰了。桑蒂斯也就報復，在澳門全城頒佈禁令。這禁令除了主教座堂外，不生效力，然而澳門一埠却已因此分成兩大壁壘了，不但彼此各用神權，互相爭鬥而已。這種情形，使教外人和新教友看了，真是極大的壞表樣哪！

播散謠言，設謗傳教士，使中國人民對他們和對澳門葡國當局忌嫉更深，使這火藥庫終於爆發的，便是這個的確和耶穌會以及澳門葡國長官槐斯公塞洛有仇的桑蒂斯一黨人。他濫用職權，召集澳門的教外華人，開一次秘密會議，宣佈一種令人恐怖的陰謀，說耶穌會教士們聯合了一部份葡國人，勾結荷蘭日本的兵艦密謀進攻中國，教士們在內地聚集奉教的中國人做內應；他們也要像斐列濱的西班牙人屠殺華僑一樣，先殺盡本城的中國人；他們就用聖保祿學院作營盤，由日本教友發一個暗號，他們就先奪廣州，劫掠財物，再進攻中國各地；他們的首領是郭居靜，他來來往往很忙碌，大家都認得他（註：這些人還給他起一個綽號叫「郭鐵牛」頑皮孩子們在街上見了他，就喊着他的綽號）他會講中國話，打扮得像中國人一樣，南京、北京和其他各處的道路都很熟悉；再則，葡國人內部不和，不是爲了舉多的事情。這些話無非是因桑蒂斯黨中挑撥，要破壞耶穌會的傳教事業，把耶穌會神父們攆出澳門罷了。

桑黨在澳門製造這些謠言還不够，還派人到廣州秘密宣傳，到處散佈流言。有一次，澳門的中國人竟因此大起恐慌，霎時大家瘋狂似的，爭先恐後逃出澳門，說葡國人借名防禦荷蘭人，在澳門耶穌會院左右起造的城牆，實在是一個要殺中國人的憑據。謠言傳到了肇慶，兩廣總督便下令廣州當局採取緊急措置，預防事變發生。到了一六〇六年二月間，廣州人心浮動，已鬧得滿城風雨了，便是有幾個目光準確的官員如海關監督等竭力鎮壓聞謠，却是徒然無效。廣州軍事當局便開了一

次特別緊急會議，凡是曾任武職的人都奉召參加，其中有一個和郭居靜素來相識，明知這些謠言絕非事實，自願親到澳門調查，但廣州當局仍採取各項計劃嚴密防範，下令拏捉外國人，加以拘禁，尤其是那傳天主教的「外國和尚」，各處要道派兵日夜防守，關閉各城門，只留幾處通行，分發槍械，令人民幫同防守，又把城外民房拆毀了八百餘間。廣州總兵更具疏奏，略稱關係當局，容葡國人在澳門設防，建築砲台，實爲瀕職等語。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却始終不見葡國人有甚不穩的舉動，反見澳門的洋商派人來說，東印度各島的貨船已兩三年沒有來到了，如今他們正窮得不得了，要求接濟。真相終於大白了；廣州民衆不知就裏，便怪海道無事生風，使他們飽受虛驚，並受諸多不利。海道一肚子悶氣沒處發洩，便想找個機會來表白一下。

黃明沙修士正在這時候從南昌南下回澳，帶了南京張尙書發給范禮安會長的護照，一路行抵韶州。廣州方面的事情他一點都不知道，所以他便從韶州到了廣州，住在某教友家裏。這時候，他身上大發寒熱，某教友怕他病倒了，不便久留，便告訴他范公業已去世，這時候風聲很壞，勸他早動身到澳門。黃修士聽了，便趕緊差人送信到韶州，却不敢離開廣州，要等向澳門院長請示後，才能決定。那時正當三月十九後聖主日中，他便集會了自己的家屬，和幾個教友扶病舉行聖教典禮，熱心祈禱，向信友們講道理，紀念吾主受難復活的奇蹟。

不幸他的行蹤被一個早已背教的澳門教友知道了，便來向他索詐銀錢。黃修士不肯給他，他就去向一個營官告發，說他是「澳門外國教士差來的探子，此刻正和幾個同黨匿在城裏，陰謀不軌。」營官便把這消息通知那和海道相好的判官。他知道了，喜出望外，以爲這正是給海道拿到憑據的好機會，便立即帶了兩個公差去捉拏，把病倒在床上的黃修士硬拉起

來，套上鎖鍊，連他帶來的兩個僕人，兩個小學生，和他們的舅舅一齊捕去了。

官坐堂提訊黃修士，竟和審江洋大盜一般，用酷刑拷問，把他上來棍緊箍他的手足，使他終身成爲殘廢，逼他招供。黃修士雖則以有病之身，慘遭荼毒，却勇敢忍受，侃侃答辯，決不諛服；又拿出張尙書的護照，證明自己的無辜，問官找不到謀叛的證據，又見他有來歷，怕丟了官，便想把他開釋了。豈知那索詐告發的壞蛋，一味想邀功洩恨，立敢在公堂上拉住一個小學生，問他的師傅是否買過藥；他說的藥也可以作火藥講，這句話是要哄這孩子上當。小學生先說買的是醫藥，後來差役拿尖刺刺他的指甲，他熬不住澈心的痛苦，才說是火藥；於是官役們更用種種酷刑，逼他誣陷黃修士勾結葡人陰謀叛亂的口供。問官見黃修士曾剪去一縷頭髮，就說證據確鑿，不必再審了。

下一天，差役們在黃修士行篋中搜得了西文信西洋書，以及和葡國人一般打扮的衣褲等物，便斷定他是從澳門來做探子，決不是從內地來；他的護照是偽造的。官又聽信了那叛徒的話，說黃修士有妖術，會隱身法，也曾水遁，因此他在監中押了好幾天，奄奄一息，苦不堪言，竟連一滴水也不給他喝。

海道命屬官把一應人犯解來審問，他就被押解到道衙門，在衙門口等到晚，還不見道台升堂，却見大批仇視的民衆圍着他，恨不得把他打死，想設法救他的，一個也沒有。道台坐堂，先喝命把這班人犯，除了兩個小學生以外，每一個打幾十大板。黃修士身患重病，只剩得皮包骨，教人見了怎禁得不憐憫，可是那糊塗官還把他連他的一個叫依納爵的僕人，和他的舅舅一併判定了死罪。黃修士在受審時滿現着順聽主命的態度，真教人欽佩無已，刑役們把尖刺刺他的指甲，他一味忍受，絕不喊冤道苦，只懇切勸告他的難友們，勿忘自己是教友，甘心爲主受苦。他不曾當堂斃命，真是天主的奇蹟！審罷，只見他遍

體鱗傷，血肉模糊，由人扶着回到獄中，却誰也不能去慰問一下，幫助一下。

三月三十一日，瞻禮六，一千人犯解回原審衙門，去受一番磨難。問官用嚴刑恫嚇，逼黃修士招供，說要打折他的一臂，留下其他的讓總督去訊辦。黃修士供稱自己是教友，從小奉事天主，現在進耶穌會，是利瑪竇的弟子（他不提韶州的神父們免遭牽累）。他的護照是利瑪竇代為請得，從來不懂得甚麼妖術。問官聽了，便勃然大怒，重新喝打大板。黃修士到此力盡了，便昏了過去。官怕他死在堂上，叫人把他抬回獄中，黃修士就在路上氣斷身死了。『正和吾主同時身死，這當兒，他雖然諒必滿懷神慰，却無一人在他身邊，說幾句話安慰他。』他十八歲在澳門學院讀書時，蒙范禮安會長特加拔擢，進耶穌會，棄俗精修，寄世三十三年，就被難殉職了，在會十五年，為同會諸人樹立了不朽的模範。他在世時，在華傳教的本會司鐸們，都願意得他做同伴；初學期滿後，也讀過拉丁文，雖沒有晉陞司鐸，却富有熱心盡職的精神。他死了以後，獄官奉了廣州官府命，教人把他的屍身抬到城外，草草埋葬，連腳鐐手鐐都沒有除下。

黃修士的慘死不過是全部慘劇，也是滑稽劇中，最酷烈的一幕。廣州的司法官和海道這樣屈殺無辜之後，還覺得不稱心，直到廣州總兵奉到了總督的命令，統率軍隊進窺澳門，派遣得力人員去探聽敵人動靜的時候，才發覺澳門的葡國人內部不和，紛爭不息，自己的事情尚且鬧不清，那裏會進攻中國。民衆見官場辦事如此糊塗，益發覺得不滿了，官就想把那拘押的僕人依納爵牽入南華寺和尚的舊案，免担干係。一面暗囑獄卒把他餓斃獄中，滅了他的活口，同時他行文韶州，搜查教士住院，雖然搜不到絲毫槍械軍火，也沒有絲毫犯法的證據，却仍派兵看守，監視教士的行蹤。這件事情來得突兀，龍華民神父竟一點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末了真相漸漸顯露了，廣州的官廳便出了一道告示，提出十一條款，申斥天主教教士（一）破

壞中國海禁(二)在澳門建造砲台(三)勾結日本人侵犯中國(四)担任間諜工作(五)行使厭勝咒詛等各種妖術(六)派遣黨徒和倭寇私通消息(七)做葡萄牙人和荷蘭國人的首領(八)有煉製白銀的法術(九)私入中國內地傳佈新教門，煽惑愚民，謀叛作亂(十)毀損神像，不經皇上欽准，私行傳教(十一)曾經官廳驅逐。

這些譴責教士的話，原是无稽之談，却從此可見龍華民識見淺薄，作事鹵莽，未免有些胆大妄為，而利公熟諳中國民情，到處審慎將事，以前被人認為懦弱的，現在才知道他不無見地了！但事到如今扼腕悔恨固然無裨實際，而批評得失，也殊不合機宜，目前亡羊補牢，猶為未晚，自應急起直追，力謀善後，設法跳出這是非圈，才是上策。便是龍華民神父秉性剛強，也並不爲了這些無稽謠言沮喪畏葸。這一帶地方雖則盛傳郭居靜司鐸陰謀叛亂的謠言，他却仍能鎮靜自持，更想設法代爲洗刷。他先去托人援救在廣州被捕的同志們，但未奏效，便決計親到肇慶，求見總督，表白一切。他已求得韶州知府的通行文書，準備起程上道了，虧得有幾個相好的士紳出來攔阻，勸他不可造次，說目前教難方興，風波正惡，只可托人代明心迹。他和幾個朋友商議後，便繕具稟帖，差人齎呈督署。這時候，總督查得廣州方面的實情，早已胸有成算了，他接到了龍華民的稟帖，不願傳他晉省，把這件事公開辦理，却傳諭海道，把那審理黃修士案的官員，加以申斥；責他辦事糊塗，怎把韶州教士的徒弟當作澳門人的探子？可惜龍神父請托的人到廣州太遲了，救不得黃修士，但其他的教友們，尤其是那受盡荼毒的依納爵，却終於得救了。

這當兒，韶州住院的形勢也很險惡。一天清晨，有人在大門前放火，幸而院裏的人都已起身了，一起頭，就看見把火撲滅了，毫不費事。下一天，本地的甲長向縣衙門秘密投進訴狀，誣龍神父藏匿婦女，以爲教士也像和尚一樣，不妨借此詭詐銀錢。

龍神父不等官府傳訊，先去見那知縣委任查辦的縣丞。縣丞已問過好些證人了，其中有一個是被牽涉的婦人；這些人誰都不敢妄證，都說這件事完全不知情。龍神父還是要官向原告追究證據，知縣明知這件事弄糟了，還想教原告私下拿出些錢給被告上壽，就此含糊結案。龍神父却不答應，官不得已，便判甲長誣告，罰錢了事。

這件事雖然是一種小糾紛，可是龍華民所以有這樣大面子，教本地地方的一班士劣拗不過，還是沾着利公的光。因為這當兒，前任南韶道蔣銘德（？）正從北京恭祝皇帝萬壽回來，到廣州接粵海道新任——那時海道已因黃修士案和誑報葡人謀叛，既遭粵督申斥，復受粵人攻擊，自請罷免了。蔣道和利公素來相識，晉京後，又時相過從；利公會製造一具日晷儀贈送給他。龍華民神父也和他見過面，所以他回到韶州後便去投刺晉謁。蔣觀察和他相見很歡洽，問起日晷的用法，龍神父便給他詳細講解，順便把近日情形仔細陳訴一番。他還想跟道台到廣州收黃修士的遺體，但道台看這件事不妥當，眼前不如令行知縣，先把被誣的案件審結了再說；因此龍神父得到了完全的勝利。

蔣觀察到廣州接任後，便決定先派幹員到澳門，調查葡國人備戰的虛實。這位委員以為郭居靜是耶穌會會長，便先到耶穌會查訪。神父們對他很歡迎，照他的來意引他參觀耶穌會修院，大學院，聖堂，圖書館，小學堂等，把各處都看過了。他目覩教士們清苦謹嚴的生活，便明白了這事的真相，奸人的作祟，回去向上峯據實呈報。這時候，那糊塗的法官已被撤職了，蔣觀察便派這位委員接任。新官查閱舊案才知道那背逆天主的叛徒挾嫌誣告，致令黃修士死於非命，不禁赫然震怒，命把這奸人拘捕到案，押解總督衙門，嚴加究辦。這奸人自知罪惡深重，難逃一死，竟賄通押解的差役，中途乘機脫逃，從此不敢再到廣州。於是久被羈押的教友們，和案中牽涉的幾個教外人也，也就一齊開釋了；這時候，依納爵等在獄苦不堪言，奄奄待斃，要是再

押着，就活不得兩三天了。這冤獄平反後，龍華民就能趁開市的時候到廣州，向葡商收兌匯款，轉送各住院應用，只是黃修士的遺體，還沒有交他領回。

冤獄發生後下一年（一六〇七），負責各官員，就得到了報應。前任海道，和那法官，被巡按御史查出了許多罪狀，因此革職還籍。廣州的空氣漸漸寧靜了，北京的教士們便向朝臣們鬪謠，替葡國人多方解釋，消除他們的憂慮。惟有郭居靜却從此隱在澳門，不再入內地傳教了。利公曾在呈報總會長亞瓜維伐的書信中，提起他的事說：「本會司鐸們差不多全體一致主張不教他回來，免得全部傳教事業因此蒙受危害；我也已命他留在澳門，不惹沒有事做，他雖然會說中國話，中國書也已讀得不少，但他的身子不堅實；中國方面短了他也不致有甚大礙。況且他到處用得着他効勞，我想他不要因此感覺難受，要向神父陳訴，但我看照現在的光景，他不宜再入內地，如果以後有法使他重來，我定必竭力設法，使他如願。神父們似宜寫信囑咐他安心留住澳門，因為這樣才是承行主旨哪。」

但郭神父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因為澳門的教務很少收獲，早已得到范禮安會長的許可，准他重入內地傳教了。後來南方的情形好轉了，他就向廣州當局上一稟帖，辯白自己的冤誣，曾經蔣觀察批示，說他含冤既已洗白，本人就不必再有所恐懼。觀察又在城門上張貼告示，把這批語寫上，貼了有兩個月之久。郭神父於是改換姓名，和熊三按司鐸同入中國內地（大約是在一六〇七年上半年）。他們一路行到南雄，沒有遇到意外，可是到了南雄，他雖然嚴密防備，不教人窺破行蹤，却已被人認出了，只得被人押回韶州。徽幸得很，那時蔣觀察剛到韶州，龍神父便趕緊去拜會他，送了幾件西洋東西作禮物，其中有一件是三稜鏡。觀察於是命人把郭神父迎提到案，當衆宣佈這事要由他審理。一起頭，衆人的疑懼就消釋了；他一見郭神

父，便迎上去說：『啊！郭居靜是你嗎？你不知道有人要你在中國做皇帝嗎？給你起個國號叫「天主國」嗎？』他就用這種說笑話的口吻，和郭神父閒談起來了，談着日本人怎樣遇到風浪飄流到澳門，和葡國人的加弗勒奴隸們所做的壞事情。這樣審案結果使郭神父大有體面。接着蔣觀察便向某紳士稱道郭公的德學，同時把實在情形呈報總督，總督也據以奏聞朝廷。郭熊兩人於是繼續前行，到了南昌，便得見到利公的命令，派他駐守南京，召熊三拔北上晉京。

黃修士的遺體，以前曾由龍華民一再要求歸還，却不得要領，如今便由蔣觀察下一手諭，着承辦吏行負責尋覓，發交韶州教士們派來的辦事人具領歸葬。他的面目已難辨認了，幸有鐐拷和爛剩的衣服，才能認出。棺柩運到了韶州，龍神父便舉行追思大典禮，教內外人到堂參加與禮的很不少，隨即轉運到澳門聖地上安葬。

大家但願有了這位在這開教時代首先捐軀殉難的華籍教士在天堂上做主保，教難就此平息。無如韶州的龍華民和地方上的僧侶民衆積怨已深，卒難相安無事。郭居靜的事情做幸平安過去了，過了幾個月，韶州的鄉民又陰謀作祟，想攔出韶州的外國教士，說他們擾亂治安。第一次，他們聚集了四百餘人，由和尙們從中指使，候蔣道尹公出的時候攔輿遞稟。蔣道尹斥不受理，他說：『這事情本道很明白，你們不必多言去罷！』這班人聽了却不散，反聲勢洶洶，有要暴動的模樣。道台不得已，才教他們跟到衙門裏，當堂呈遞。當下他照例批示了，立即退堂。但和尙們還在衙門外等百姓們出來，教他們到州衙門再遞一張公稟。知州得到上司的意旨，便批斥不准，一面却諭知教士們不得再容納新來的教士。龍神父去向道台伸訴的時候，蔣觀察便對他說：『你不要担心，這原是官樣文章。』然而便是這樣，已不免發生可悲的結果了。利公一六〇七年十月十九日的書信中，提起韶州的情況，表示前途希望極爲黯淡。他說：『以後，我們對於他處住院仍當依照需要儘量派遣司鐸，但韶』

州一處，神父們既須保護教友，不受教外人欺侮，又要常住着，堅固他們的信德，該做的事情實在太難了，所以我們決計暫時停派新來的神父，去到那裏。」一六〇八年三月六日，利公的信上又說：「我們想把這地方放棄了，背教的人多，奉教的都冷淡得很，仇恨更深了。」兩天後，又說：「教友們冷淡已極，收獲的希望微幾。」八月二十三日，又說：「新奉教的竟可以說是絕迹了。」

教士們到此，非走不可到了一六一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利公去世後二年，也是他初到韶州後二十三年，這地就完全放棄了。

龍華民差不多從頭到尾，目觀他自己開創的事業，逐步趨於毀滅。他雖則對中國的風俗民情缺乏深切研究，以致造成了這樣失敗的結局，可是他自有許多特異的優點，為儕輩所不及。他不能理解利公所採的方法；利公高瞻遠矚，却能深知他的為人，知道他堪膺艱巨，經過這番磨折後，必能憑着他的熱忱毅力，謀中華聖教的廣揚，因而保舉他做自己的繼任人物。一六〇六年八月十五日，利公寫給總會長的書信中，曾說：「龍華民司鐸奉范禮安會長命發願後，到如今已三年了，但我以為他更堪委以重任，應准他發四大誓願。實在，他雖然在學程上稍有欠缺，但他在會多年，自能補足了。他的學識實已超過這地方的需要，至於其他種種的資格，還在這裏的幾個顯願會士之上。如果本會在華的傳教事業，不依附在葡國人的宇下，因而似乎不容易委任非葡籍的會士做長上，那麼，我以為照他的熱忱和謙遜謹慎看來，會長一職，誰也沒有他那麼適宜。但看他在韶州這地方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了十二年，飽受凌侮，備嘗艱苦，他的功績已可概見了，自應准他發四大願：全體同會們必然要因此之大感欣慰：這件事，龍神父從沒有向我說過一句話，沒有寫過一封信，也沒有任何表示，而且我想他也決

不會有這種思想，他對於現有的職務很滿意；這更教我不得不向你陳明。」

廣州的慘案，一方面使黃明沙修士做了爲義而受窘難的福人，一方面却使龍華民神父有了經驗，在風波惡劣時，知道怎樣應付艱難，他的德行也因此而更上一層了。但我們讀了明史的記載，更可以從這件事變得到一種教訓。明史上曾說：「道家的神話，使中國人民成爲一種燃燒物，只須一星火，就可以燎原。」這句話說得真不錯。前面講的廣州事件就證明民衆的心理，確能被一種不近情理的謠傳所迷惑。比方後來一八七七年長江一帶，流行了一種剪辮子的謠言，人民便瘋狂似的奔走相告。至今還有人行使一種壓勝的邪術，和人作對，就剪一個紙人，寫上這人的八字，日夜咒詛，按時針刺箭射，據說就能要了這仇人的命。還有好些靠此營生的道婆，誣師，專門挑撥人家用這種邪術來報仇雪恨，趁此撈錢。道院裏也有出賣這害人符，和禳解符的，借此在兩方面搗鬼漁利。難怪利公在天津被馬堂搜出苦像，就被認爲妖術了。中國人都相信妖人會唸咒，甚麼事都能幹出來，這是毫無疑感的，還說誰學會了咒語，就誰都會幹。正史上也記着巫蠱詛咒殺人的事情，雖然虛無縹緲，却講得好像實有其事。因此，中國人把天主顯示聖蹟的道理看得很輕淡，幾時對他們講耶穌復活升天等奇蹟，他們便說：「這算什麼？我們還有更神奇的咧！不但白日飛昇，死而復活，還可以尸解，蛻化，變形，而且變化多端，神奇莫測！千里外的事情可以看見，東西可以攝取，一切都能做到。神仙騰雲駕霧，劍俠凌空往來，瞬息千里，裨官小說上記載的真多着，誰都知道的。」

而且這些荒誕不經的迷信神話，也不全是中國舊社會中一班愚夫愚婦的專有物。孔子自己，雖然不知道的不敢胡說，因而不談鬼神和身後事理，只教人修齊治平之學，仁愛忠恕之道，可是孔子和後世儒家，實在也很敬事鬼神，既不得真道理，便借假宗教以自慰。因此，這種荒誕不經的邪法妖術，讀書人竟也會深信不疑；這就使他們「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因

爲旁門左道原是和真宗教絕對不相容的呀！費多齊氏（Feet Scher）所著「希臘人的宗教理想，和聖經福音」一書中，講起古代希臘人，曾說：「邪法妖術總是一面呼神召鬼，一面玩一套把戲。術士們從不向鬼神祈求祝禱，表示敬愛，便是求神賜福，也是如此。說句實話，施術作法，不祝禱，也不祈求，只是召喚術士強鬼神做事，逼迫他不得不做。術士心目中的鬼，和宗教家所說的靈魂，恰是相反，宗教家所有的祈禱所行的儀式，是以依恃神靈爲原則的，多少要存着一點敬畏愛慕之心；因此舉動說辭，全是所以表現這種心情。信仰宗教的人，都是要祈求懇禱的，都有一種懇求的態度。他們崇拜神靈，明認自己的無能，如果有愛慕的心意，便有趨向這所愛的神的心意，誠心歸向，只知有神，不知有己了。術士却完全相反，他是發令召喚的，把神當作奴僕一般，可以隨意役使，簡直神是俘虜囚犯，非服從不可。」

中國的讀書人，素知妖術害人的迷信傳說，又以爲三教以外，都是旁門左道，所以聽到了宗教兩字，大多數不免心懷疑懼；但看一八七四年天津教難時，某紳士刊發的那攻擊天主教的小冊子，內容都是利公來華後，教仇們設謗聖道的作品，便可知了。我們不說中國人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宗教生活，試看淨土宗的佛門善信，便是那相信玉皇大帝的道教中人，便知此言不謬了。十七世紀中，臥亞的教士們要研究佛教經典，曾請北京諸鐸設法向清廷借閱譯經，加以考證，這是他們不明白大乘小乘根本不同所致。小乘但記佛語，不論真神，無非是一種遺世絕俗，明心見性的佛學。大乘却全是向教主呼籲慈悲的禱告，或是表明那不再獨當憂苦的依恃心。最先給我們講起佛教事情的歐洲人，是那威尼斯人馬可孛羅。他會到過蒙古大可汗的宮廷裏，又在中國到處聽人提起菩薩兩字；他曾留心搜集攙雜許多神話的民間傳說，講釋迦牟尼的事情，講他怎樣棄俗出家，傳佈教義，得成正果。馬可孛羅把他的全部思想加以概述之後，便說：「假使他是個甚多信徒，必然做天主的學友。」

馬可李羅心目中的釋迦牟尼，不但是小乘所說勘破紅塵以自救的苦行高僧，却更是大乘正果的人物，給大慈大悲的觀世音和普渡衆生的阿彌陀佛開了門路。在華開教的天主教教士們所以對佛教嚴加攻斥，無疑地這不但是因一般和尚不守清規，却也因佛教教義已滿染着荒唐迷信的色彩。利公從澳門一路進京，路上曾遇到了許多沿門托鉢的苦行和尚，不難像馬可李羅一樣，下一句聰明仁恕的斷語，却不能不斥斥這些荒唐夾雜，非驢非馬的鄉愚的佛說。平民所信奉的釋道兩教，既變得這樣荒誕不經，沒人管束的佛寺僧侶，和道院羽士們又這樣不守戒律，弄術害人，無怪一班自命嚴正而沒有深切研究的讀書人要力加詆斥，對於任何宗教概不信任了。因此，他們對於天主教當然也就一律看待，認為旁門左道。我們以為如今人們目為正人君子的純粹儒教中人，只講修齊治平之學，絕不注意身後禍福，正和薛舍龍的哲學不相上下。鮑西愛氏（Boissac）對薛舍龍的詐論正堪移贈他們。他說：「薛舍龍愛講哲學，但他的哲學對於宗教沒有多大益處；他以為神無非是虛無縹緲的，不過手段高妙的人却利用神道設教，防止民衆作惡。這話說得不着邊際，大家便以為其中隱藏着無神主義。我想這未免批評得太過分了。這種率真的否定，對薛氏是不合他的本性和平素見解的。他的主張是屬於學院派的。這就是說，照他的脾氣既然偏向着依違兩可，所以他就想設法證明自己在原則上，該是這樣。他研究哲學系統，覺得彼此衝突，這就使他懷疑莫決了。他對各派哲學家的見解，越看越覺得靠不住，因此對他們的基本哲理，就越覺得是村夫俗子之談了。那時，一班富貴中人多數是不關心身後事理的。總之，他們是伊壁鳩魯派，只重倫理，求現世幸福，主張在世時候不必敬畏神靈，死後魂散，不必憂下地獄。有時，却有幾個不甚相信身後禍福的人忽然相信了。」薛舍龍時代，羅馬智識界的思想大致如此。明季中國儒士們也未嘗不如此，宗教的偉大力量，一朝發動，便有幾個聰明人憬然覺悟，心切皈依。可是一班羣

衆，素懷成見，不免要力加排斥。中國人和古羅馬民族一般，素來馴伏怕事，又且顧慮多端，覺得人生一世，必須有神靈呵護，深信「舉頭三尺有神明」，迷信神佛的心理根深蒂固，牢不可破。這原是統治階級借神道教以鎮壓平民的策略，所以要在中國宣揚聖道。非由這班統治階級的士大夫倡導不可。利公來華後，讀了多年書，認識了許多文人學士，才能深知中國人的風俗民情。他見當時中國賢儒，服膺孔道，首重敬事上天，又講求修省慎獨功夫，勤修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認他們具有宗教思想，而且是有誠心的；只因國中教派分歧，各立門戶，互相攻訐，便傾向絕對主義，對佛老之說概加排斥，對於各種秘密教門，更一概目爲旁門左道，地方官查禁拿辦毫不留情。所以史家李葛蒲便斷定「教士們見儒教道理極少可加指摘之處，像孔子這樣的人，一生行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以爲沒有充分明瞭的事情，就不敢妄談。這樣的人所有的教誨，必然不能有多大錯誤了。所以那時耶穌會教士們，以爲儒教道理是不錯的，只說該把孔子所沒有說明，在孔子後才知道的事理，補充孔道之不足。因此，徐文定每見有人問及聖教道理，總要極力伸說，提倡天主教所以「除佛補儒」。

第四章 秘密會社的禍害

中國歷史上每講秘密會社殃民禍國的事情，邪教惑人的記載，多得不可勝道。這些秘密會社的首領，大都掛起宗教的招牌，借傳教爲名，誘惑愚民，聚衆謀爲不軌。利公來華後，三十年中，這種案件便已發生了兩起，在明史上斑斑可考。明史上記着蘇州人王森因傳白蓮教斃於獄中。王森是和利公同時代人，但那官府極害怕的白蓮教，約在一一三五年成立，早已有名了。那時，白蓮教借着第四世紀慧遠（？）禪師淨土宗佛法的名義創立，不教人窺破真相。明史說有一個叫毛某某（？）的和尚，造像立偈，自稱白蓮禪師，他坐着受教徒叩拜。教徒忌葱蒜，戒酒肉。他對異派的佛教徒很傲慢，一時從他的人很多。後來他犯了案，被官廳查辦，發配出去了。但他的黨徒仍繼續惑衆，此教至今不衰。這些話記的是一二〇八年的事，以後白蓮教的案件就屢見不鮮。天主教教士們在華傳教所冒最大的危險，便是和這些圖謀不軌的邪教相混淆。事實上，這種光景，也正屢見不鮮呢。

明史上還記着鳳陽劉天賜（？）聚黨謀襲南京的事。我們便知當時一般職在守土的官吏，對於宗教事件當然要戒備不稍寬弛了。一班熟諳民情的官吏，深知國法只能限制人民的行動，不能約束人民的思想，但他們注重的却在制定法度，令人民遵守，不在提倡宗教，使人民信仰。他們非但不勸人敬事神明，且認宗教信仰是不可靠的。他們只要人民安分營生，奉公守法，可是激發人心，使人注意靈魂的事，都很不喜歡，聚衆禮拜，當然要使他們格外疑忌了。所以天主教昭事上主的典禮，就有被他們誤認和圖謀不軌的秘密會社相類似的危險。廣州事件幸告平息，真是頗不容易的。其他三處的教士住院，也因此

漸漸起人猜疑了；多虧北京教士們聲望隆重，才不致罹禍遭難。利公對廣州和韶州兩處的風波，沒有出面料理。一六〇五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上他說：「一切事情我都留意探訪，但我相隔太遠了，在我未能予以援助以前，這件事已告解決了。而且這件事關涉政治問題，要是北京有甚舉動，危險實在太大了，比我們不能希望援助他們還要危險得多呢。雖然如此，我們仍當竭力設法，使這事不致波及他處。」

利公雖則這樣說，却因南昌和南京發生了兩件比較嚴重的事變，出面斡旋，才能安然過渡。北京和保定的教務，也多虧着他的聲譽才能進展，保定方面更因表面上天主教和秘密社會有些地方相混同，已漸漸起人疑忌了。

一六〇六年，南昌有李瑪諾、蘇如望、黎寧石三位司鐸，其中惟有蘇如望能講流利的中國話，却已病入膏肓，奄奄待斃了。李瑪諾於一六〇〇年陪送新來的教士前往南京，尚未歸來的時候，蘇神父已病倒了，足有一年，不能起床。每逢瞻禮日，四十多教友便齊集經堂中，公念玫瑰經，爲他求天主。蘇神父却不死，病反見好一點了，李瑪諾回來後，蘇如望又病倒了，便有五個女教友自願來堂爲他祈禱。但按修院規律，她們不能進院，這些女教友便教她們的丈夫代替她們。一六〇七年蘇神父的病勢毫無痊愈的希望，李瑪諾便送他回澳門，挨到八月裏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一歲。

據李瑪諾神父講：「靈耗傳到南昌，我們因修道人的地位不相宜，不願學中國人發喪舉哀，只招待朋友們喪服來吊我們，在蘇神父生前接見來賓的客廳中，搭了一個假棺材做追思台。來吊的客人們都行四叩首跪拜禮；教外人也有流淚的。有幾個教友更失聲痛哭，如喪考妣，有許多還爲他穿了幾時褐色的喪服。有些教友不知道我們爲他舉行追思聖祭，事後便來堂爲他代禱，各擎着燃着的蠟燭，公念玫瑰經。又有一個保守教友雖則還沒有經蘇神父付聖洗，可是他一聽人講起蘇神父

生前言行，便涕泣痛悼，不勝悲哀；可是有人提起他新死的兒子，他却毫不表示悲戚。」

南昌當開教時代，教內外人士對蘇公便已有這樣的哀思，這地方的教務，在李瑪諾司鐸得孟台修士的協助，繼續推進下，諒必不難獲得很好的成績了。計兩年中，先後受洗的有二百餘人，第一年（一六零六）因着廣州事件不得不格外審慎，差幸沒有波及）受洗的只有三十三人；下一年九個月中，就增加了六倍，得一百八十二人，教士們日記中更記載着幾件令人驚奇的事。一六零六年中，某教友妻難產危殆，虧着他家供了救世主像，虔誠懇禱，卒得化險為夷，平安生產，孩子一下地就死了。又有一個洗名赫肋納的女教友，夢中曾見一個可怖的魔鬼，要用繩勒死她；她就對魔鬼大喊三聲：「你這該死的東西，我是守天主誠命的奉教人哪！」說罷，魔鬼就不見了，却去弄死了家裏另一個婦女。一六零七年有一個讀書人是上一年領洗入教的，洗名伯多祿，他的妻子洗名瑪利亞，大概他們倆勸人奉教都很熱心，瑪利亞不怕鄉鄰們議論，跟着丈夫去見神父，便奉了教。那時，有一個教外婦人生下了八個孩子，却已死了六個，剩下的兩個也害着病，看來難保。她便勸這婦人讓這兩個孩子受洗。孩子們領洗後，病就痊愈了。某家母子媳婦，都做了教友，他們還沒有後嗣，便求天主賞賜一個男孩子，果然求得了。孩子的父親洗名（伯多祿）被誣殺人，便當衆跪下求天主，替他伸冤；果然過了二十天，案情就審明了，竟得昭雪。有兩個出天花的孩子，病勢垂危，領了聖洗就轉危為安，不日平復。給神父們醫病的某醫師有一個獨生子，也得到了同樣的神恩；他就把家裏張貼的符籙和一切迷信的東西一齊撕毀弄掉了；其中有一面掛在大門上的鏡子，是為使散病的魔鬼，一照見自己醜惡的形容就嚇跑的。又有一個佞佛的半瞎老婆婆害了病，孟台修士便去探望她，把所有符籙神籤等全撕毀了，給她付了洗。她的老男人和其他八個人也就一齊領洗入教；這老婆婆的病就好了。一個教外人向人訴說家裏鬧鬼，某女教友便到他房

裏做了一個十字聖號，這房間裏就安靜了，她又把自己的念珠掛在門上，鬼就到這宅子裏的別處去作祟了。末了，有一個教友用紙寫了『耶穌瑪利亞的聖名在各處張貼；從此魔鬼斂迹，合宅平安。』日記上又記一個六十歲的老名士竟不怕人笑話，領洗那一天，擎着臘燭一路回家，招搖過市。又有一個六十老翁，親自背了一口袋的偶像，拿去焚燬；鄰舍們譏笑怒罵他全不放在心上。某姓少婦不顧丈夫反對，領了洗，受了許多虐待，却仍不屈不撓，勇敢抵抗。那洗名伯多祿的女人曾向和尚和商人們答應過許多異端的事情，歸化後便一概謝絕。他們和他纏擾不清，受了許多苦，才能擺脫。一次，他來堂謁見神父，不提起有甚麼事，却帶來了六個朋友，候在門外，願學習奉教。他曾費了許多口舌，奉勸過一個患癆病的青年棄邪歸正。這個青年素來遊蕩慣了，三番兩次立志改過自新，却隨改隨犯，無法感化。他的父親却被勸得領洗奉教。隣近某村中，有一個孩子被妖魔纏擾，要求家屬擺酒演戲，伯多祿領了五個教友到這孩子的家裏，妖魔就靜悄悄的不響了。教友們都在家中供奉天主聖像，在像前點燈燃燭，晝夜無間。

這些事情不免被一班心懷惡意的人看在眼里，相機發動，等到教士在南昌買下了一座大住宅的時候，他們便借此作怪了。一六零七年八月間，教會當局打算開辦一座小規模的學院，培植教中子弟，以爲與其設在澳門，還不如設在南昌（註一）便備價一千二百元，在南昌購置一座大宅子。這個數目本來算不得很大，但在眼界很小的江西人看來，已認爲了不得了。過了兩個月（十月十一日）便有八個生員聯名向兵備道和按察司衙門，具呈控告教士們圖謀不軌。這班秀才大概是受了教仇們的鼓動，或者是因買屋時，中人賺的一筆中金還嫌不够，因而從中挑撥，才出頭控告的。司道接到了呈子，因事關重大，又無實據，批斥不准。他們誓不甘休，揚言要告到最高司法衙門，結果邀集了三百餘人在學宮裏開會，寫了一本狀子，

向南昌盧太守(?)呈訴。這位太守原和利公交好，又明知所控不實，所以暗中迴護着教士們，但外面一點不露形迹。他接狀後，只把案子擱下來，並不追究。生員們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舉行文廟秋祭的機會（十月念一日）決定上控布政司衙門，由布政發交提學使查辦。這一天，又有二十七名生員向這兩個衙門上了一個公稟，大旨如下：

「利瑪竇蘇如望李瑪諾三人，都是泰西各國的奸人，他們擅入中國內地，潛居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四省，和南北兩京，彼此互通聲氣，往返江河，竊盜財物，結納平民。他們和士大夫屢相過從，軍中官兵都是他們的朋友，甘心爲他們効死。他們禁教徒敬拜祖宗畫影，使人民滅絕天倫，背忘父母養育之恩。他們毀損佛像，各處廟宇被他們的黨徒搗毀一空，神像悉遭摧毀。這些教士們以前還住小屋子，如今却買下了一座極大、極華麗的住宅。他們傳佈邪教，愚魯的教徒，天天在他們屋子裏學習邪法，便是鄉村中，也漸漸傳染了邪說所及，士不讀書，農不耕稼，商賈不務貿易，婦女不事針黹，舉國因之惶擾不安。以前被惑的不過百數，如今却逾二萬人了，教士們分發一個胡人或是回子的肖像，說是天主降世，能使人富貴，借此誘惑人民，誠心歸向。他們簡直是人間的害物，只怕他們建造了寺院，要煽動人民作亂，和這班人不久在福建南京所幹的一般。」

這些架詞誣蔑的話，顛倒是非，混淆真僞，編得再像沒有了，所以藩台和學台看了這狀子竟會相信，便批交南昌府查辦。大家都說南昌的天主教完了，和教士們要好的人們，覺得害怕，便勸他們打退步。但李瑪諾却決計去見這三位大官僚，當面聲辯。

知府和學台見了他，待得還不差。那布政使便是利公初到南昌時的袁太守，却也做過本省提學使，是這班生員的老父，不得不給他們一點面子，便把李瑪諾和孟台兩人當作嫌疑犯，教他們穿着犯人衣，跪了一點鐘，先問原告，然後問他們問

了許多不相干的話，似乎有要嚴辦他們的模樣。生員們就得意洋洋，更陰謀請托南昌的兩個知縣，幫他們達到目的。但這兩個是下屬，不得知府的主意是不敢自專的。廬太守却在暗中替教士們開脫，向提學說明李瑪諾是利公的同志；利公在京中是極有勢力的，這件案子務須審理明白。提學於是把生員們的稟帖詳加研究；布政使知道了，也就不敢含糊了。當然，生員們所控各節，原是響壁虛構，捕風捉影的話，不難一究便明，因此，便遭駁斥。李瑪諾神父也誥誠屬下教友們，不必在住宅大門上張貼救世主聖像，只須身上常帶念珠，表明是教友就足够了。太守於是把這件案子正式審理，傳生員們到府署，示諭他們所控批斥不准；隨後，又傳到了四鄰地保等，錄取口供。他們知道這件事怎樣起因，便據實陳供，證明教士們的無辜。太守便問李瑪諾爲甚要買這麼大的大宅子，強許多人進教。末了，布政使提學，南昌府便會銜發出批示，着教士們把新買宅屋交還原主，以後不准傳教，並不得再在屋外懸掛天主像；同時，誥誡新教友，當他們和白蓮教教徒相類似，警戒他們切勿拋棄中國先王之道，去信奉夷狄之教，如詩人所謂『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一般。

這場絕大風波，結果却從寬了案，實在可說是教士們的極大勝利。我們但看利公一六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來信，便知那時他的確還表示瞻前顧後的殷憂，他說：『一切都從興盛而又歸衰落了。』這回，我們在中國消弭的真是一個極大的風波呢。南昌信衆不久便又能按時瞻禮，照常誦禱了，來堂的人更多，更胆大了，不因地保甲長的妨害而畏縮。每逢瞻禮日，教士們把信衆分作三批，輪流來堂與祭，想不到藩台學使，知府的會銜佈告，竟收了正式核准教士們居住南昌的實效。這正是利公從前所求之不得的。那送達批示的兩三個衙役首先向教士們乞取聖像，教士們爲謹慎起見，只得婉言拒絕了。他們竟把某店主手裏的聖像隨手搶去，其中有一個便要求入教，領洗後，五天就死了。後來王布政使陞任廣東巡撫，李瑪諾神父

便去送行，奉呈天主實義和要理問答各一本。他欣然收納了，還要償付書價。

教仇們費了極大心力，掀起極大風波，結果徒勞無益，不免被人恥笑，便陰謀加害。一次，有幾個宗室竟在府衙門首守候，李瑪諾出門，要把他打一頓，却被差役們喝住，才不敢行兇。教友們也想提出答辯書，駁斥教仇的攻擊，李神父却不准。生員們於是編了一本書，說明自己的宗旨無非為要保衛本國，防這些自命不凡的外國人侵犯。他們臚列諸端，作為引證：『本朝國號大明，他們却自稱泰西！皇上稱天子，他們的主子却稱為天主！他們自定曆法，不奉中國歷朝的正朔，耶穌瑪利亞的像上，繪着弓、箭、戈、矛等，各種兵器，這些便是他們陰謀不軌的先兆。李瑪諾司鐸竟被這班生員直斥為『狗』，說他『形若豺狼，滿肚子奸謀惡意』。他雖則不欲撰文答辯，激怒他們，却未嘗不想和他們當面辯駁，但他的朋友們勸他隱忍，不犯同他們計較，只得罷了。

最難堪的便是要他物歸原主。風波初起的時候，那座舊宅子早已賣掉了，買主是個皇親，買定後要立即入宅。另一方面，他決定在一六零八年三月間開辦初學院，派費奇觀做院長，四個初試助理修士也已來到了，這座狹隘的住院中，就有了七個同志，不易容納。這當兒，他們就不得不遷入客寓居住；虧着有朋友幫忙，覓得了一處臨時住所，却更見得湫隘了，極感不便。再則，新宅的賣主把價銀用散了，一時怎能收回來。末了，教士們只得又出價五百元另買一宅；這座宅子位在近城門的大街上。不料這宅子是兩房合有的，出賣後，兩方面不時來要索銀錢，再加上鄰居的纏擾，使教士們受累不淺。到了一六零八年十月念一日，這案件總算結束了，由提學使出示布告，禁生員們攻擊天主教，經新到任的總督和巡按批准備案。教友們更得免派捐款，重建那被焚燬的廟宇。李瑪諾得建安王的介紹，晉謁那致仕的某閣老訂立友誼。

南京住院雖然沒有遭受和南昌的一般的艱難，却也因起了謠言，經歷過暫時的騷動，使許多人畏縮退避，教務停頓了好些時日。這回風波，起源於劉天賜的謀叛，利公的筆記上也記着這事的梗概。他說：「一六零六年冬至節，官廳擊獲一名主犯和十五名從犯，查得這人有三千黨徒，密謀在冬至夜起事，趁這天半夜裏，本城文武官員循例齊往城外明太祖陵舉行祭祀大典的機會，要把他們一網打盡。據說這班賊黨都是下流人物，賊首開了一張名單，列入文武百官的姓名，派定手下某人殺某官，殺盡了好劫奪南京城。虧得有一個同黨，因分贓不均，便向官府出首告密。賊黨被擒獲後，在大牢裏押了好幾月，首犯和六名從犯被判極刑，凌遲後再斬首（一六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又有十名從犯站木籠縊死；有的站了十二天，有的十五天，才氣絕。」

教仇們想趁此機會，嫁禍教友，就有一個奉教的木匠，被捕下獄。這個木匠住處離堂很遠，不能常來瞻禮，便約了幾個新教友，每逢主日和大瞻禮日，跪在一幀聖母像前，同行誦禱，念要理問答，玫瑰經。他們行了幾個月，被鄰居們知道了，向他們敲詐銀錢。他們給了，就越發長了教外人的凶箠，還要他們焚燬聖像，叩拜菩薩。教友們便斷然拒絕了。下一天，黃昏時，這奉教的木匠，在路上遇到了一個教仇，被他拉去私禁在一間小屋裏，凍了一宵，等天明把他送到縣衙門究辦。神父們一知道這件事，便函請知縣作主。知縣便把木匠開釋，連一切東西都發還。這樣，因着教仇們的騷擾，加以南昌方面大起風波的影響，這一年（一六〇六——〇七）南京的教務就大為減色，受洗的只有九十三人。那時，南京住院中，羅如望仍做院長，王肅豐襄理一切。黎寧石和林斐理兩司鐸正在研讀中國語文；此外，還有三個初試修士，一個助理修士，人數也算不少了。

這些新領洗的教友中，前面我們會講起過，有一個是李應試從北京帶來的官家子弟，又有那會向和尚們請教過萬有

眞原的道理，而未得的某名醫，和那熱心傳道，勸某塾師更爲努力的商界某少年。有一個久願歸化的世家子弟，他的叔父已奉教了，他自己却被祖父禁阻着，不能如願；末了他決定擇日領洗，行禮的上一天，他的祖父已去世了。那天，他來說明自己一再遷延的緣由，表示歉仄，說時聲淚俱下。城外三四里地方，會有二十來個船夫來堂聽到了天主教的道理，深爲悅服，可是一出門就忘記了。一次，他們在經堂中念經，過了一夜；下一天一早，他們高聲念天主經，響得外邊的人都能聽見。某神父在講道時，給他們講第六誡，其中有一個便當衆承認自己向來犯着這條誡命。到如今已有十五年了。這班人有幾個要等臨死才能領洗，其中有一個七十四歲的老頭兒，領洗後兩天就死了。還有一個領洗後只活得半小時，全虧着他的姪兒留心催促，才救得靈魂。某日，有幾個教外人激兩個教友爲某姓附魔婦驅妖。這婦人自稱看見妖魔，一會兒在這裏，一會兒又在那裏，妖魔拉下他髮髻上的飾物，勢猛有聲，又在庭院中幻作失火，火勢極烈，家人們提桶担水去救火，因此鬧得合宅不安，便請和尚們來家作法，壇上供着菩薩，焚香燃燭，又貼起許多靈符，誦咒擒妖。豈知正在作法的當兒，妖怪一下就把壇打倒了，法師嚇得抱頭鼠竄而去。這兩個教友先對那附魔婦和她的丈夫，她的父親，講一番聖教道理，教他們許願棄邪歸正，然後寫了耶穌聖名，掛在屋子裏。可憐那婦人被魔纏擾多時，已瘦得只見皮包骨了，當下便見妖魔遠遁高飛，逃得蹤影全無。她的邪病從此痊愈，合家也就平安了，從此棄絕邪神，敬拜眞主。

北京方面，仇教觀念雖然漸見抬頭，却比南昌南京等處安定得多。那時，京院中常駐着三位司鐸就是利龐兩公，和新到的費奇觀神父；此外，又有一位助理修士和兩位初學修士。這當兒，費奇觀正做着初學修士的神師。後來連修士們一齊調到了南昌。利公對他倍加稱道，曾說：「他是個才高心細，大德的人，在此兩年，使我知所矜式。他前在本會讀書求學，我想他只讀

得兩三年神學，但他對於神哲人文諸學頗見優長，將來對於中國文學也必能登堂入室……我看長上們很宜准他發四大顯願，因為即使他神學沒有畢業，這並非是因他疎於才學，或是年齡資格有所欠缺。事實上，他在會十八年，却因聽命故担任了三四年文學教授，然後奉派來華。我以為詮敘他的資格時，該把他的德行和謙遜聽命看得比他沒有畢業的事實重一點。因為他在神學一門，特別是為在這地方傳教應用的神學，已有充分的學識了。」

一六〇五年年終時（十二月二十三日）東宮王妃生下了一個兒子，萬曆皇帝便對臣下沛降草恩，封贈親屬。因此，徐文定得陞翰林院檢討，他的父母也得到了誥封。這當兒，北京信衆失了一位典型人物，保祿李應試。他敬事上主，勤修諸德，滿懷神火，渴願救靈，始終不渝，在京中做着衆信友的表率。如今他要回籍奉養老母，便謝職歸田，從此不再來京了。可是他一路南下，仍利用餘暇，教那青年子弟學習要理，把他送到南京領洗，自己便回湖廣盡孝去了。

一六〇六年，北京授洗三十六人，徐文定的老父便是其中之一。那時，他已七十四歲了，因着他兒子的敦促，便在復活瞻禮日（三月二十六日）領了聖洗，聖名良。行禮的時候，文定因為在翰林院公務很忙，不克分身，沒有來參加，可是一到傍晚，散值後，就來向神父們道謝，並告訴他們陞遷誥封的喜訊。利公更收養了幾個孤兒，預備由教會撫育成成人。兩三官僚見了，便也學徐老封翁的樣。某官的兒子是個十六歲的青年，他的師傅兩年前已領洗奉教了，因此，他也受了師傅的勸導，捨僞從真，誠心拜主。又有某青年是富貴人家的子弟，一朝得聞聖道，便立志改除生平的不良習慣，預備領洗入教。他的一個僕人便也決計跟着主子學樣了。這青年回到家裏，就來信說他的七旬老母和合家大小，都已開始敬拜天主聖像，學習聖道，預備領洗。北京的教士們還願近畿一帶的人民，同沐聖化。前面我們已講過一六〇五年龐迪我到保定某鄉鎮去開教的情形了。

下一年，他便又帶了李道修士前往，給五個新教友付洗。這個村鎮，龐神父會給它題名叫聖格肋孟鎮，鄰近某村他叫它諸聖村，村裏住着唯一的教友，是北京某教友的父親，年紀已六十多歲了；他勸得多人歸化，希望本村也能成立一個會口。龐神父便到那裏住了幾天，給十三個保守教友付了洗。才回北京。京裏的那個教友便向利公一再聲請，再派教士前往。一六〇七年三月底，利公就命費奇觀神父和李道修士相偕前去，住了兩個月。他們路過附近某村時，見有幾個保守教友遮道挽留，堅請暫住。教士們因已有成約，不能答應，只得教他們到「諸聖村」相見；到了那裏，已見有許多男女孩子們在一所適宜的屋子裏等候着了。這些人一見神父來到，便急急上前迎接，婦女們也由一個爲首的率領着，前來行禮致敬。這爲首的婦人担任把各家的偶像焚燬，他們掛起一個彩綢的蓬帳，在蓬帳裏供着救世主聖像，請兩位教士日夜輪流着宣講聖道，講得力竭聲嘶才能。教友們定要供給教士們的膳食，雖經費公婉辭謝却，也不答應。費神父會親自記着當時開教的情形，說：「一班年老或是已嫁的婦女們，由我教授要理經文；男子們由李修士教授；幾個知書識字的兒童教自己的姊妹學習。村人學道的熱忱很普遍，便是那些不願奉教的也來聽講，懂得半部要理。可是有幾個人播散謠言，說這天主像是我祖宗的肖影，或者竟是我本人的肖像，我的宗旨在引人敬拜自己。也有人批評，說這是外國夷人的道理，中國人從沒有聽過過。他們不分男女老幼總是一樣的講法，更有人罵我們和婦女講話，付洗時又在她們臉上抹着油。總管八屬的京尹曾把這那教的教師加以驅逐。有些人想把我們陷害，受這樣的取締，我們就不得不稍爲抑制我們的神火。」

費奇觀又從這「諸聖村」轉入鄰近某村開教。那裏有一所經堂，他就給它定名聖母升天堂；這村子也就題名「聖母升天」村。村人們都樂聞聖道，反對的一個也沒有。有一個做官的極願皈依，可惜他有好幾個小妾，因此不能歸化。又有某

村人來請司鐸們去開教，帶來了一頓救世主像做憑證。教士們到了那裏，聽講的人比別處格外多，忙得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却只有十五人領洗入教。

費神父回到聖格肋孟鎮後，有四個老年人答應教全家大小學習要理，某讀書人也向他索取利公所著的天主實義和其他各種的著作。費神父指定「諸聖」村爲四五處小會口的中心，委托三個道理最熟悉，昭事最虔誠的教友做領袖，担任照料新教友的職務，每村又各派一人襄助，照料他，又爲教友們定下了一種互助的辦法，彼此招待外來的同志，規定每年八次，大家齊集「諸聖」村經堂，瞻禮誦禱，特別是耶穌受難瞻禮日。教友們便在三月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瞻禮舉行第一次集會，由兩個八十歲的奉教耆老指導行禮。婦女們每星期一次另自會集，也有兩個做領袖。教士們這樣分派妥貼後，又在「聖母升天」村住了兩天，給兩個教友教授權付的禮節，然後動身回京，雖經新教友們懇切挽留，也就顧不得了。費神父回到了京裏，却有幾個不怕路途遙遠，來拜望他。

總算起來，領洗的已增至約有一百五十人；這幾個村鎮中已開始呼吸到基多教化的空氣了。一天，某處廟裏迎神賽會，經過「諸聖」村向村人募化，就沒有募到分文。奉教的村人們且不說，便是教外人都推說：「這地方都信天主教。」我們只看幾件事情便知基多聖化怎樣在這些村子裏逐漸傳揚，不勝感激了。有一個素來侮罵天主的教外青年，忽然雙目失明，幾乎變成了瞎子。後來他許願棄邪歸正，就痊愈了，可是他愈後竟食言背誓，他的眼又瞎了，直到他悔過領洗後，才能重觀天日。這個青年有一個女親戚，因爲丈夫在北平下獄，便來探望；到京後，住在某教友家中，講起本村的天主教，曾說新近有九家許下全家信奉。

但教外人歸化日盛月增，不免惹起了北京人的議論，徐文定便告知利公，說有人陰謀陷害。利公便囑費神父把開教運動暫緩進行。因此，北京的教務只得靜悄悄地繼續發展着。

一六〇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徐文定的封翁逝世了，照中國風俗，相知的士大夫都得前往，向孝子吊唁。文定「在喪事儀式中，一舉一動非常注意，事事請教神父們，務使毫不違反聖教規律。」利公所記的只是如此，說的話不幸太含混了，使我們不能確知當時舉行的究竟是怎樣的儀式。神父們又說：「這種舉動，使人見了他不依照教外人的喪儀辦理，不禁大為詫異。」大殮時所用的棺槨是用堅木製成，價值一百二十元。過了幾天，教士們便在住院經堂中搭了假棺材，做追思台，四週燃着文定送來的蠟燭，爐裏焚着乳香，舉行追思大典禮；接着又行追思已亡的聖祭。文定穿了孝服。來堂恭與典禮，信眾見了都十分滿意。

一六〇七年夏季中，霖雨連綿，河水泛濫，釀成了大天災。據教士們的記載：「許多房屋被水沖坍，許多人被水淹死，或是屋倒壓死，漕船翻了有一千多艘；據說，用以重建宮廷的木材被水漂散了五百萬根。皇上發帑銀十萬兩賑濟貧民，好教他們重新蓋造住屋，免除了幾種賦稅，我們的屋子地勢較高，沒有受害，坍的一間也沒有。這在全城中真是不可多得的事，的確是出於天主的護佑。」

總之，一年後，到了一六〇八年八月底，利公來信中報告的是這樣：北京的教友有三百多，其中有許多是文士，而且很熱心。全中國信衆的總數不過二千多一點。他解釋說：「我們不能擴大勸化運動，也不能有大批付洗，因為我們不能自由行使職務，和我們相處的又都是多疑的人。他們瞪着眼睛看我們，不信任人間有這種博愛的偉大精神，肯捨棄家鄉，遠適異國，爲他

人謀福利。他們只是想自己度他人，我們不能把這件事奏明皇上，因為他誰都不讓見。因此，我們必須在靜默中設法進行，我們如果稍不留神，必致更無成就了。這種光景我們已經歷過了：韶州一處，已沒有人再願奉教了；南昌一處官廳已出示曉諭，禁止宣傳聖教了，不知以後還要發生甚麼事情呢。我們在這京城裏，如果受了甚麼恥辱，我就怕其他各處的住院，不免要受到牽累，我們的事業也就支持不住了。」

利公又說：『最大的阻礙便是中國常怕人民作亂。人民的叛亂，又每每因有人教了他們新道理，才掀起。我們是外國人，所以最是遭人疑忌。中國人最怕葡國人和日本人來擾亂本國治安。我們在這些多疑過慮的人中，不得不瞞起我們和這兩國人保持着的關係，一舉一動也得十分謹慎；便是這樣留心，還免不了人們的猜忌呢。』

利公最後這句話，就引起了人們紛紛議論。如今我們只引麥斯貝羅的評論作個例。（George Maepero: La Chine, pp. 267-77）他說：『中國人認君上的失德，臣下的濁職，是免不來的禍害；人民雖然受着極大痛苦，也是沒奈何的事。然而到了橫征暴斂，民不堪命的時候，百姓們挺而走險，強悍的就留為盜匪了；吏治腐敗至於堤埝不修，河水泛濫，就釀成災荒了。那時，民田應漂沒，無法圖存，只要有人立教結社，暗中煽惑鼓動，哄他們生前得享富貴，死後還有多少好處，他們就趨之若鶩了。中國儘有這些秘密會社，尤其是在亂世時代。自漢末黃巾而後，很有許多人借此聚眾作亂，稱霸一方；魄力大的賊寇，更有席捲河山，僭登大位的可能。會匪教首，乘機倡亂的情形，如出一轍。先有一人崛起田野間，自稱得仙佛傳授，下山拯救蒼生，信者得免劫難，間用符咒治病有效，便有無知愚民和一般亡命之徒，前來投拜門下，願聽驅策。他於是創教立會，或稱「全真」或稱「至公」或稱「白蓮」，手下黨徒先只數百人，不久便聚至千萬。一般平民迫於饑寒，間有含冤受屈的良民，胸懷異志的壯士，便

齊來歸順了。教主祖師便自定年號，大施煽惑伎倆。地方官如果精明強幹，趁早拘究，不難把教主頭目一網打盡，羽黨也就逃散了，否則黨徒愈聚愈多，今天攻陷府縣城，明天就佔據了全省；不久匪勢蔓延，更如火燎原，不堪收拾。於是教主會首就稱王稱帝，假使時機湊巧，闖黨竊政，人主庸弱無能，這班賊寇就直搗京師，兵臨城下；一朝攻破就圍困宮廷，大肆屠殺，把全城洗劫一空！到這一天，區區賊首惟我獨尊，攬得玉璽，坐上龍廷，生殺隨意，滿朝文武貪生怕死，怎敢不上表稱臣？新朝代於是乎成立！

明思宗的失國便是這樣被流寇滅亡的。賊首李闖原是陝西的小百姓，他聚眾作亂，多少也帶着一點邪教惑人的色彩。天主教傳入中國，起先自然不免要被人淆混是非黑白，目爲白蓮教一流，但後來真相終於大白，證明甚多聖化和釋道兩教的旁門左道截然不同；邪正分明，不容誤會。這實在不能說不是一種奇蹟。這樣的成功，若不是利公識見高遠，始終一貫在文化方面展開他的傳教方略，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第五章 西洋曆法的介紹人

那時，利公在函牘中，堅稱傳教事業的成敗，全看北京住院的榮辱，而在中國一班大人物看來，北京教士們的聲譽隆重，已有蒸蒸日上之概了。我們鑒於韶州南昌兩處的可恥事件，更見得利公說的不差。他來信中說：「這兩次風波，使我們更見得北京住院對其他各處的傳教機關大有效用。這不但是因我們奉皇上命，由國庫供養，在京中傳揚同樣的宗教，對內地教士們很爲有利，更因有許多大官僚和我相識，和我們都有朋友的情誼，因此，我們可以拜托他們，照料在他們治下，各省傳教的同志。」

所以，除了皇帝遙遠隱晦的保護之外，教士們還可以借重利公個人的聲望做護符。甫經開創的中華聖教所以能安然無事，全靠着這兩層的保護。我們已講過利公和中國皇帝的關係了，現在我們就該講一講當時天主教怎會沒有遭受摧殘。無疑地，當時天主教所以能達到這種境界，第一是因利公德學俱全，担任這宗徒事業，就能不偏不倚，面面顧到。他渴願爲主捐軀，二十餘年埋頭苦幹，不遺餘力。一六〇五年五月十日的一封書信上，他曾說：「至愛神父，請你爲我所求，庶幾有一天天主賜我恩寵，使我得『憑捷徑』來結束我的工作，使本會在華的教會，不亞於其他各處的教會。教士們不但要用汗，還要用血來培養，灌溉；又說：「這傳教教會還沒有產生殉道的紅花。」他不能像羅道夫，亞瓜雜伐一樣，得遂素願而死，或是分嘗着同志們的諸般痛苦。他曾寫信給馬賽拉宜家裏的親兄弟們，說：「我們做了修道人，住在這地方正如自願竄流的一樣，不但要和父母兄弟姊妹親友分離，還得拋棄了基多聖化的家鄉，住在這些異教地方，往往一二十年不見一個歐洲人。我們住在中

國有幾個從不吃麵包，不喝酒。那住在摩拉加的，只吃些樹皮粉，還有吃草根的；又有幾個在烈日下赤足往來，頭腦也要被溶化了，脚也曬得像煨石灰一樣。別處的教士們穿的都不跟歐洲人一樣。我們在中國都留着長鬚，頭髮也留長到肩背上。幾時我們遇到了要害我們的仇人，就不得不逃走；有一次我也遇到了，急忙跳窗口逃避，因此跌傷了腿，至今還覺酸痛。有幾個在海洋裏或是大江中，遇險覆舟；我也曾在河裏船翻身落水，更有遭受窘難，被仇人們槍刺箭射而死的。我們幸獲生存，却住在千百萬異教人中，朝不保夕，時時刻刻有被殺之虞。這一切，我們爲愛天主的緣故却都甘心忍受了。盼望天主寬赦了我們的罪過，救我們脫免永獄。我們雖然度着這種艱難困苦的生活，每天仍當流淚痛哭我們的罪過，等待着天主的審判。

「那麼，株守家園，得和父母親友在一起，安安穩穩度着舒適快樂生活的人們，該怎樣有所作爲呢？實在我已活不得多年了，我的頭髮已全白了，中國人怪我年紀算不得很大，怎會這樣衰老了！唉！他們不知道我的頭髮正是爲了他們才白的啊！」

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利公又有一封家信，語誠他的同胞骨肉。他說：「中國人大都睡的是板床，上面鋪一條草蓆。枕頭用糞糠稻草等東西填實做成，十分堅硬。起先，我覺得很難受，好久才睡慣了，至於只吃飯，不喝麵包，不喝酒。這個我却一點不爲難，而且如今我已習慣多年了，再要改變這習慣，也就頗不容易呢。」

一年後（一六〇六·八·二五）他又致書亞瓜維伐總會長，陳訴衷曲，說：「我的年紀已有五十五歲了（照西法計算是五十三）奉派擔任這艱難的任務，也已有二十五年，已覺十分疲乏了，我却依然身體安好。近幾年中，得見中國聖教由成立而發展，更使我感覺欣慰。然而我每因本身種種的缺失而大感痛苦，覺得我的神業退步了；深恐我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沒有修

成全德，如今年老力衰，更不能修成了。所以我要求神父在舉行聖祭和祈禱中，記念着你的不長進的神子，庶幾吾主仁慈，賜我自己盡心竭力，欲求不得的洪恩。」

謙遜剛毅是他精神上的特徵。所以他又說：「我們目前工作的效用，在播種，不在收穫，人們要估計我們在此工作的成績，不當以信友的多寡為依歸……至於我，神父接到這封書信的時候，我的年紀就要滿六十歲，轉瞬即將就木了。盼望天主賜我能為奉事天主，了却我這一生最後的一幕，用以補贖我以前所有的罪過；假使一切事情可以按着所有工作和心力做去，我可以希望得益，但一切總得按愛德做，而我又淡然自處，所以我只得歎息着，只怕冒險也是徒然。」

他處境極窮困，却對歐洲方面設法援助他的人們深深道謝，特別是對總會長神父，說：「他雖然和屬下相隔遙遠，却懷着慈父心腸，對在華教務，悉心照料；縱然天各一方，他仍懷念着我們照顧我們，好像和我們近在咫尺一般。」

利公並不把各方面的反對放在心上，他說：「在開教時代，這原是不足為奇的，我們也不因此而灰心。人們說我們的事業日見發達，但這盛況正如聖教會過去時代的發展一般，常有仇敵從中攪亂。這却使我大感欣慰，因為這裏頭，我看出天主的措施，知道天主要使這事業經久不改。」他雖然沒有把生命作祭獻，却知道自己要做一輩子的犧牲，就不能做一舉完成的祭獻了。他一身諸務蝟集，忙得連氣都透不過來，甚至不得不把和歐洲方面的通訊工作交給南京的王肅豐代辦，由龍華民協助謄錄，讓李瑪諾擔任報告南方三院的教務。

京院諸鐸雖則在他左右，却不能替他分勞。他的老同事龐迪我，有時候代他去拜客，却也幫不得多少忙；費奇觀是個專務修道的典型人物，到了一六一七年年底，就離京前往南昌，訓練初學修士去了；熊三拔那時剛到京裏，跟他漸漸學習。事實

上，京院全副重擔，差不多完全由利公獨自肩負。金尼閣 *R. Thoburn* 曾說：「他既然做『主持全部教務的會長，諸同會來信請示，就不得不親自一一裁答，又因他極愛溫和，所以他答覆的時候，下筆非常留意，指示一切，不厭求詳。那時紛爭時起，諸事煩忙，他却仍必撥冗接見新奉教的平民百姓，和他傾談一切，而且慣常求見的來客，地位越是低微，他越要和他長談久敘。』此外，他還得編譯書籍，教新來的同志們課讀到死未嘗中輟，大家想他忙得連必要的休息時間都難得。他實在是如此，然而他善能支配時間，不但有充分的時間料理他的神業，而且誦禱默想，還要費許多光陰。在依法規定的時刻以外，他總要設法忙裏偷暇，料理靈魂要務。」

一切事務中，要算酬應過從，拜客見客，最是不不得開交，其次是和全國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書信來往，更見得案牘勞形，沒有人可以替得。利公會記「京城中士大夫冠蓋往來，絡繹不絕。各省官員有的來京，述職請旨，有的升遷陛見，出京上任。每當大比之年，文武舉人來應會試，殿試的，更多得不可勝數。每一年中，必規定着一個月期限，以便外省大吏來京恭祝萬壽。文武百官誥敕，遷調，分發，引見也都有有一定月份。每年來京的士大夫總有幾千，其中和京鐸或是外省教士們相知交好的，着實不少。更有那些素慕西士盛名，讀過他們著作，或是由朋友介紹，因此來院拜訪的。所以我們就得整天在客廳裏守候來賓，縱然乏累極了，仍須勉強支撐着，打起精神，不分貴賤，一概善為招待，贏得了他們的歡心，才好向他們昭示聖道。這樣，我們就無須出外，到公共場所向衆宣講了；因為我們的客廳中，每天總有一班大人物來聽講，平民百姓是不敢跟他們一同進來的。」

利公善於應對，嫻於辭令，不但為儕輩所不及，對客高談雄辯，且足以使四座為之震驚。他的同會們曾說：「利神父在中國人所有的聲譽，簡直教人不能相信，不懂得一班大人物怎會齊來拜會他；通國士大夫怎會尊重他。……一班官僚以為歐

洲決乎找不出一個人，可以比得他。我們說，學問更好的人還有呢？但他們竟不信，據那幾個和利公共事的助理修士說，實在利公所以深得人心，全因他秉性溫良，待人謙恭有禮，和人談論言語謙和，一生盛德令人欽佩所致。」

利公每隔三四天出門訪問來賓，答謝他們的盛意，有時候，要到九十里以外。他曾說：「這種煩勞，我們的力量實所不勝。可是我們如果不願見我們的住院瀕於毀滅，或者不欲得蠻夷的惡名，就免不了要辛苦一番。所以我們依照有身份人的習慣，不得不用一個老資格的當差，穿得齊齊整整，常在門上候客接帖，每天我們要把來賓的姓名，職銜，住址等，在號簿上一一登記；如有禮物，也須註明，好教我們過三四天去答拜。有幾天，我們門房裏收下的拜帖至少也有二十多；新年裏或是大節下，更多到有百來本。」

「酬應過從雖然很辛苦，却使我們掙得了極大的聲名，來賓們差不多個個要到聖堂裏瞻仰祭台上常供的天主像，和聖母像，向聖像斂容致敬。當然，大多數是爲好奇心所驅使，要來看看我們富有美術意味的油畫，印刷精美的經典書籍，聖像，和日晷儀等，但我們却因此獲有機會，可以不住傳揚甚多聖道，攘斥佛老的謬妄；所有新教友，差不多都是這樣勸化的。果然，多數來賓因信佛可以自由得多，沒有棄絕邪妄，但他們既和我們相往來，天主自必要漸漸感化他們咧。」

利公憑着各種精巧的新製作，和這班大人物保持着親善的關係，除了天文儀器外，他還畫些扇面，做些仿照西洋圖刻的中國墨鏡，和別的西洋款式的東西，送給他們。他們觀物思人，就不容易忘掉他了。有一件著名的作品，標明一六〇六年一月六日的日期，是四幅刻像，一幅大約是摹仿日本畫家倪槐修士的賽維勒聖母像，其他三幅是根據那管爾司鐸聖經默想篇的記述，刻着聖伯多祿在水面上行走；厄瑪烏的弟子們；和天主降罰瑣多瑪人的故事，有中國文字的題款，附以羅馬字譯

音，說明圖像的意義（註一）

這些新奇的東西，竟會轉輾流入利公所不能入的宮禁中。但看那世界輿圖，到了萬曆皇帝手裏，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據利公自己講：「一天（按當在一六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前）神父們奉召急須進宮，利瑪竇龐迪我兩人便到了曆算館，太監們的住所，只見館長和其他要人們已都在那裏了。因為皇上前會傳諭，命他們用六幅絹印製世界輿圖十二份。這圖經李之藻重印後，會由神父們拿幾份分贈內侍，不知是那一個太監在新歲中，配上了幾軸畫，把這圖進呈御覽。以前，神父們從沒有進呈過，也不願意人們進呈，只怕皇上一見中國在圖上這麼小，便生氣，要說我們看不起中國人，何以故意畫得縮小了。實在許多文士們確有這種說法，他們以為我們把各國放大，把中國縮小了，不勝慨歎。但皇上把這圖仔細看了一遍，見天下萬國風俗習尚那麼不同，衷衷很為愉悅，便想多印幾份，分賜諸皇子和宗室國戚，在宮廷邸第中做裝飾。他和內侍們見圖上有利瑪竇的名字，便傳諭命他把這圖重印，無奈底版已被李之藻帶回原籍了，便是坊間的偽版也已在上一年的大水坍屋時毀壞了，只得由神父們據實回報。可是太監們不滿意，以為他們虛言搪塞，便有四個太監親自到書坊裏去查看那木版的碎片。我們於是設法弄得李保祿的八幅刊版。無如這和皇上所見的六幅版大不相同，以致太監們竟掉頭不顧。兩三天在煩惱中換過了，仍想不出一個辦法來，末了我只得自告奮勇，情願再製一幅更好的輿圖，但須寬限時日，至少要有一個月。實在，我的意思要再添上許多關於聖教方面的註解，情願自己出資刊板。太監們便據情回奏，請准照辦。但皇上不欲使我們受累，只命在宮裏照李之藻的原本刊板翻印。他們於是急急進行，世界輿圖便在宮中到處充斥了。

「那時正有許多人蔑視我們的這幅輿圖，認為空中樓閣，皇上這番舉動所有的影響，可就不小啦。尤其是因我們在這

圖上表彰基多聖道，駁斥異教道理的謬妄。這幅輿圖既然在宮殿中常掛着，我們就可以希望皇上和皇子皇族們，有一天要因好奇而究問到我們的聖道。這正是我們安排下和他們聲氣相通的唯一方法，因為他們和外界是不相往來的。再則，他們見本國比了其他各國小得多，也許要抑制一點驕傲心，進而肯和外國通聘問，不以為不屑。這同的成功，使信衆和我們的知交們大感欣慰，我們也因此希望得到一點好效果：爲了這一切的事情，願吾主受讚美！

而且教士們依舊和太監們善意來往。利公說：『我們可以隨時進宮，但我們除了修鐘，或是他種工作外，並不利用這種特殊便利。我們進宮時，穿着文士的衣履到的是特闢的地方，婦女僧道都不得進去。管自鳴鐘的太監們來院召請教士們入宮整理的時候，大抵是由驢迪我應召的。他們不時給他送些禮物，表示謝意，或者親自來院，向神父們道謝，表示和他們非常要好。一天，利公由太監官僚們陪着在城頭上巡視一週。利公記着這回事，曾說：『我看城頭上非但十四匹馬，便是七八輛大車也可以並列馳騁，路面築得很堅實：一定有一百多萬兵常川守着這城垣。民間故老還有人記得元代蒙古人侵入中國時的光景（一五五〇）。這道城牆便是那時用以圈入南郊而建築的。』利公還在這封書信中，講皇城中興建宮殿耗資三萬金的事情，他說：『我們住院門前，有許多用作柱腳的大石磴車過，鐵石的車輛碩大無朋，要用一百多頭驢子拖曳。這些石頭雖然是從近畿一帶山崗上採辦得來，可是每塊的需費已在千元以上了。』

朝臣們和太監們對利公屢示嘉惠，馴至通國皆知。因此，利公漸漸主張來華傳教的教士，很該遴選有學問的司鐸充任。例如一六〇五年五月十二日，他再度上書駐葡萄牙的副總會長說：『多年前我曾向神父提出請求，未奉示覆。如今我重伸前議，請求羅瑪方面遴派一兩位做「天文家」的司鐸或是修士，來到北京：這實在是件最有益的事情。我說「天文家」因

爲關於幾何學，日晷儀，測星儀等的事情，我知道的還算充分，也有充分書籍，可資應用。但中國人對這些不甚重視，却注重行星的方位，和軌道日月蝕計算法等。總之，他們所要的是會製定行星逐日行程表的人才。原因是朝廷年耗巨貲，養着許多人。我想有二百多人——製定曆法，設立兩個曆學館，以總其成，一個研究大統曆，一個研究回回曆。研究大統曆的人比較受人尊重，可是他們推算日月蝕每多錯誤；學回回曆的比較準確一點，却不受人重視。：我在這裏，因着我製造了世界輿圖，日晷儀，渾天儀，地球儀，和測星儀等，說明效用，已贏得天下第一算術家的名譽了。我雖則沒有天文書，看了葡萄牙人的某幾種曆本和表冊，有時候推測起日月蝕來，竟比他們準確。因此，我雖然一再聲明沒有書籍，不便糾正他們的推算方法，他們却大都不相信。我便說只要我說起的那曆算家能來，我就不難把我們的天文表譯成華文，把他們的曆法修正一下。這就可以使我們得到極大的名譽；我們也就把中國的門戶開放了，又可以鞏固我們的地位，增進我們的行動自由。這件事對在華教務很重要，我希望神父和總會長神父討論一下，可否派遣一兩位不拘甚麼國籍的曆算家，明白指定派到中國，最好指定到北京，因爲在別處是照顧不週的！派來的人務須留意，把必要的書籍隨身帶來，切勿向臥亞或是別的住院去尋求，因爲印度學院裏這種書是沒有的，便是有，也未便讓別處借用。」過了三年（一六〇八年八月廿二日）利公又上書伸說曆算一門，非常重要。他說：「世界輿圖和幾本西洋曆算以及種種新事理的書籍，刊行問世後，我們在曆算一方面，就得到了極大的聲名；大家也佩服我們，對於這一門的專長，向我們格外表示尊敬。再則，來華的西洋人能教他們各種科學，要比他們的強得多，這真是中國開天闢地以來，從沒有見過的事。」

這裏，我們不妨就利公所說不但是曆算，而且是「各種科學」的話，再討論一下。一般仰慕他的人，大都不能理會他所

有真正學術的教誨，便是他所有專講倫理哲學的著作，如「交友論」二十五言等，曾經一再翻印，爲當代士大夫所能了解的，也不在列外，不見得能細加體味。距一六〇八年三月不久以前，那「畸人十篇」終於刊行問世了，京中一班志行高潔的士大夫對這篇論著頗表歡迎；這種思想上的運動頗足以一掃當時反對教士的心理。利公會講：「有一位名儒是我們的近鄰，講學很負盛名，來受業的很不少。他原是個小官僚，却因他的賢德，奉召入京，擢陞顯職。曾有人一再約他來訪問我們；但這件事遷延了兩年，誰也不能使他所決定。我不知道「畸人十篇」怎會到了他手裏；他看了很快意，當下便來拜訪，態度很謙恭，他請我到他家裏吃飯，前後共有兩三次，以後就不時帶了朋友們來訪問。這班都是大人物。」

到了一六〇八年八月已有好些人讀了這「畸人十篇」，自願向化了。以後，這種文字宣傳便跟着時間而演進。比方一六一一年，南京有一個姓許的文士素來喜歡研究黃白術，尋求長生不老的仙丹，到如今已有多年了，後來讀了這本書，才憬然感悟，恍然於人生的短促，明白了生寄死歸的道理，只須輕視暫世的福樂，就不怕死，而反視死如歸了。他有了這種超脫的思想，就漸漸走上了自救的道路，終於捨僞從真，領洗奉教了。

利公不用籌思怎樣把他的著作大量推銷的方法，中國人愛讀文章的本色，已足以把他的思想學說遍傳全國了。他的筆記上也曾證實了這種文風鼎盛的光景。他說：「刊印書籍極便利，又極自由，人人可以在自己家裏隨意著述。中國人著書立說要比我們高興得多，因此，每年出版的新書，無論怎樣比起來要比不拘那一國多得不少。可是他們缺少科學知識，所有各種論著多少是講着不切實用的問題，有時候還要惹人憎厭。本會同人來華後，講出了許多他們所不知道的新事理。他們對於我們講的宗教科學和哲學，便覺得是聞所未聞，這就使他們認爲增廣見聞。下筆生輝的好機會，在著作中採入了我們

所有的記述，如我們遠涉重洋東渡來華時的情況，我們隨帶方物的描寫（聖像，時鐘，經籍，地圖和各種儀器）我們的宗教學術，從西洋書籍摘錄下來的片段，和冗長引據；稱頌我們的詩詞歌賦。這一切資料傳佈極迅速，真的固多，失實的也不少。將來傳諸後世，要在中國留一個大紀念，一般說來也是一種好心意。

這些書有許多已到我們手裏了，未到手的一定還要多。這班作家中，有一位是浙江人（李之藻），進士出身，也做着大官員，曾寫了一篇極妙的論文，講歐洲的事情，他所有涉及我們的寫作，比人正確得多，把神父們給他講過的話和他在我們屋子裏親眼見過的光景採入了，又把那萬國輿圖上所有的註解摘錄下來，因此，所有涉及我們的話全給他彙集成書了。但流傳最盛的是一部名「耳聞錄」和我們的一部（*Scilva di Varie Iectione*）相彷彿，不過我們的書上大都記的是事實，他的書上，不免有許多皮相之談罷了。作者志在搜奇述異，在某章中講起利瑪竇郭居靜兩人的事情，雖則大致並無不確，可是下筆時總不免有些錦上添花，言過其實。（按當時，曾有一個姓艾的猶太人，看了這部書便督京訪問教士。）

要推進這種革新觀念的運動，非有一個豐富的書庫不可。目前，利公在室中有一部摩勒多氏（*Plantin Moretus*）的聖經，算是最美麗的典籍：金邊金字，外表非常美觀，教來賓一見便知這是一部天書寶笈，蘊藏着不輕傳的聖道。一六〇八年，利公得悉南昌方面收到了幾部裝璜極精緻的聖書，如聖奧斯定全集和歐德利伍的（*Ortelius: Theatrum Orbis*）便令知南昌教士把這些書轉寄南京却命把歐氏的（*Theatrum mundi*）一書寄到北京，說這是中國的首都，問道的來賓最多；同時又致書歐洲耶穌會，索寄古羅馬會典和雕刻作品。他每每向人訴說無書的苦，例如一六〇八年三月六日他曾在公函中說：「我簡直連參考書都沒有，所有撰作，大抵只憑我所記得的來援引；再則，我不學無才且不說，只說我職事紛繁，因公酬

醉又極忙碌，竟連寫作的工夫都沒有，然而我們仍能使這班士夫人注意驚奇，他們的確堪稱爲「東方的智囊」，可是驚訝之餘，竟不知講甚麼話才好；一旦門戶開放，本會青年同志們聯袂偕來，踏着已經掃除的道路前進，其有利爲何如無疑地，將來的成效定必大有可觀咧。」這些話，他後來又重行伸述過一次（一六〇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關於我們的事情，闡述我們宗旨的，已有許多作品問世了。這一切的著述都是用極典雅的文筆撰成的，這就使各地方人士知道我們了，但我們自己刊行的作品更大的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且經各省人士一再翻印，尤其是那萬國輿圖，我看似乎每年總得翻印一次。」

可惜利公的同事中，一個也不能步他後塵，在這利用筆墨的傳教工作上，予以協助。兩年後（一六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龍華民神父繼任會長，也承認說：「只有一兩人開始用華文著述，其中要算王肅豐司鐸寫得比較好一點。」那時，他也改變初衷，請求派遣擅長曆算的教士來華了，足見他的見解已和他當初在韶州傳教時的見解大不相同。他講：「一天，住院中嘉賓滿座，有一位官員當衆聲稱「利西泰先生給我們中國人講論許多事理，使我們茅塞頓開，所以我們很感激他。」這位文士談起曆算，「不過我們不能說他曾作先知似的預言，天主聖神要我們聽了這些話記在心裏罷了——便說利先生開了傳教的道路，使異教人開明心目，看見了昭事上天的事理。」

果然，近年來人們稽考史冊，便發見了這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實，就是新中國所有文藝復興的倡導人，多虧着明末清初一班研究西洋學術的學者們的助力才能成功，而三百年前灌輸西洋學術的耶穌會士們，當推利西泰爲鼻祖，所以中國新文化運動得告成功，實出利公之賜。這件事的淵源線索極複雜，有許多地方至今還不很明瞭，所以這種種我們也不必斤斤爭持，只指出最初的幾環就算。

我們如果把利公所有對智識界的運動加以分析看看在中國社會上究竟有怎樣的直接反應，那麼，我們先該認明那些和利公接近的人們，只從他偷得了西洋學術的餘瀝。比方那貴州巡撫郭青螺會把利公萬國輿圖的材料列入他自己的著作中，取名「賓夷章」於一六〇七年刊行問世。利公一點都不知道。郭青螺先把中國古時代的輿地學說敘述一番，接着便說：利子之學和山海經暗相符合。

我們讀了郭青螺的話，便看得出在這灌輸西洋學術甫見端倪的時代，便已潛伏着最大的障礙，將來顯見得全部發展是不容易的了。幸而利公的友好和門下，不全是這樣憧憬着中國過去時代的聲威，李之藻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時就教利公好學不倦，竟是迫不及待的請領教益。在一六〇四和一六〇五兩年中，他利用黜職閒居的機會，在他的原籍杭州，向人極力稱道利公的學術，他回去的時候，帶着那萬國輿圖的刊板，又把利公的「天主實義」和「交友論」兩部著作重行刊印。他在福建做主考時，出過一個有關算術的試題，在他刊印的算學論著中，提起教士們深表敬意。一六〇五年五月間他在山東張秋縣做官，利公會送給他兩個日晷儀，一個平面，一個縱面，是為那方向偏斜，不是面對正南的城垣用之。藻師事利公不時來信敬問起居，一六〇七年他便道回杭，乘機把利公的「測量法義」重行刊印；下一年，又重印「渾蓋通憲圖說」，「不會刪易一字」，他雖然這樣用功，利公却說他對於西洋學術離升堂入室還差得遠，他不過把我們所講的集合起來，記着罷了。」

北京方面徐文定始終力謀增廣天主教聲譽，想和利公合作，用極精緻的筆法，彙譯西洋學術中最精妙的科學。經過長時期討論後，他們倆一致主張翻譯格拉維司鐸編著歐几里德（Euclid）的幾何原本。起先他們打算請文定的朋友，一

位姓蔣(?)的窮舉人起稿(大約在一六〇六年)並約京中某大員,担任致送相當薪金,以一年為期。同時利公在京院中分撥一宅四間的空屋子,供他居住,作為給羅迪我教授漢文的交換條件。於是蔣舉人先把從前翟太素在韶州時的譯稿着手修改起來了。可是文定看了不滿意,因而想起利公曾對他說過:『只有你能担任這艱巨的工作,』便決計親自指導進行,每天下午三四時,來院給他講解這中國未有的新科學。這實在是件極艱苦的工作,費了一年多光陰,只譯得開首的六卷。文定苦幹一番之後,反覺興趣濃厚,更想繼續譯竣全書;利公却認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亟待進行,勸他適可而止。且看本書問世後收效如何,再作計議。一六〇七年五月「幾何原本」脫稿了,便付刊印。文定和利公各做了一編序,篇首還印上耶穌聖名的聖號, I. H. S. 書中除了歐几里德的原文外,更有格拉維的論斷,和學理上的應用法,又加在第三卷後篇講「定半徑的圓面,和半徑加倍的圓面,兩者中間的比例」,因而論及怎樣求得圓的面積,使中國儒士們嘖嘖稱奇。利公把這書的刊板藏在院中,預備多印幾部,分贈友好,更留幾部,寄到歐洲,「好教歐洲人知道中國人是聰敏的民族;我們在這聲名文教之邦,正不知費了多少汗血,才得保持我們的體面。」

這部書問世後中國學界無不嘖嘖稱道。據說,那時一般讀書人,「不易了解,只是佩服;便是那些高自期許的碩學鴻儒,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書中惟有這一部難懂,便是仔細研究,也不能切實明瞭;這在他們,也許是破題兒第一遭。」最後這一句不是未經斟酌的話,因為這話對於後來教士們的任何著作,如鄧玉涵的「人身概況」,湯若望的「七政四餘萬年書」,徐文定的農政全書等,都不適合。新會梁啟超在他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曾論士大夫先後為教士們執筆譯述的很不少,可是使後人深感影響的,要算那「幾何原本」一書了。明末清初時代所有思想超拔的士大夫,讀了這部書便得到

了許多新學問，發見中國固有的哲學，就是說推想的方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豈是僅僅知道了畢達哥拉的學說，或是圓面的求積法就算呢？「用綜合法推論事理，正確而明白，如順水推舟，一切疑難不難迎刃而解；一經思索，全部真理便已灼然可見，始終融會貫通，毫無含糊矛盾之可言。」這部著作在有幾個學術精湛的算學家看來，也許要認為平淡無奇，殊不知簡單明白，正是它的好處，好在大家都能了解，所以天下萬國，世世代代的人，也都懂得。這正如人們說新體文是一種「強迫學生了解的幾何學」。再則，這部書明白曉暢，始終一貫地據理推斷，不容有半點含糊，使許多聰明才子讀了心曠神怡。的確，利公在十六世紀初葉，不期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播散了許多現代新文化的種子，可是這部幾何原本，却是最重要的一粒，因為這部書對於一般沒有讀過亞列斯多德的辯論法的人，可當得一部哲學的三字經。

第六章 肩摩轂接的北京城

北京城裏有一座小山，看它的地位和形勢，便知道這決不是出於天然。這座山叫煤山，據說從前某皇帝怕圍困時要苦煤荒，便大量堆積，成了丘陵。但煤山的存在只怕還是因為十二世紀中，皇城裏開鑿了許多池沼，才堆成的土山吧。煤山上有稀有的樹木：幾顆白松，旁邊還有一顆野梨樹。據說明末的崇禎皇帝，便是在這顆樹上吊死的。如今這顆野梨上有鐵鍊鎖着，算是懲罰，鎮壓着它的不祥。山頂上有五座亭榭，都蓋着那著名的琉璃瓦，金碧交輝，遠看非常美觀。北京是世界名勝之一，起自正陽門的紫禁城，向北一直到煤山腳為止，把整個北京城從南到北，劈作同樣大小的東西兩城。禁城外面還圍着兩重崇高堅厚的城垣。全城規模宏大，方位整齊，建築壯麗富麗，不愧為偌大中華的帝都，無怪到中國來游歷的歐美人士，定必不辭長途跋涉，到北京一曠眼界，才算不虛此一行；便是如今早已失却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家也覺得毫無關係。

在十七世紀開始的時代，北京更是天下聞名，萬方景仰的勝地。歐洲各國人士憧憬着地大物博的中華古國，有機會都想來看看這夢想中的境界。於是法蘭西人也要踏着班葡英荷航海家的足跡來華觀光發展了，浮文（Veyms）條約簽訂後，西班牙人終於退出了中國。後來里昂條約相繼成立，（一六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削平了暗殺皮隆（Biron）上將的叛黨，法王亨利四世以為從此可以平安無事，便乘機鼓勵法國人民發展海外貿易，和印度東亞各國訂約通商。一六〇一年春，「十字軍」號和「烏鴉」號兩艘海船，由聖貌祿港啓程出發，可是一艘在印度洋中，觸着瑪第物礁石沉沒，一艘遇到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攔截，不能繼續向東航行，便折回向中國開駛。一六〇六年，船長撒慕爾尚伯倫（Samuel de Champlain）

便在亞加第島 (Ascie) 建立了王家商埠，作爲向中國通商的根據地。

另一方面亨利四世的聽告神師，耶穌會士谷東 (Coad) 司鐸聽說利公憑着「他的才學和剛毅堅忍的精神，心切救靈的神火，卒能介紹福音於中國」，私心裏十分向慕。他原是一位神學家，却也是個酷愛人文主義的人，喜歡研究宗教問題，尤其是中國文化怎會自成壁壘，使基多教化不易普及民衆的問題。有些人說異教人的德行，因爲對耶穌基多不信仰得不到超性生命，是死的，所以這是腐化的惡行，不是德行。他反對這種見解，却說：「按諸神學，兩句話就可以解決：我們所稱爲良善，誠實誠意，偉大的精神和勇氣，以及其他種種本性的美德，雖然見之於異教們和罪人們身上，實在是救世主受難救贖的效驗。」當下便有人駁斥他，說：「這是伯拉齊 (Paganisme) 派的邪說。」他的答覆是：「聖師們論百夫長高乃依 (Cornille) 所說的話，正該移贈那憫恤貧窮的異教人：雖然他們是異教人，正因他們有這種行爲應得聖寵的佑助，使他們悔恨已罪，領洗入教。：這種仁風義舉，雖然是本性的行爲，效驗只及於人物，但我們須知基多救贖了世人以後，異教人才能有這種行爲；基多把自己的聖血合在這些行爲上，就使它成爲德行，堪受賞報了，這樣看來，這種德行，未嘗不是超性的德行。」

在脫利騰公會議以前，這種樂觀的論調，和一班拘謹的悲觀論調大相逕庭，因此使聖方濟各撒肋爵的門人，想到在歐洲恢復公教對於科學界，以及世俗教化原有的關係。近代作家蓋利顧尼埃氏 (Henry Courantier) 曾講：「一六〇六年秋季中，聖人心裏懷着建立一座大學院的主張。這個計劃一經提出，一般人個個都贊成，那時薩伏亞省區中，正多詩人，便以爲叫它「山花」學院最相宜。設立這大學院的宗旨，一則，使聰敏人得到教益；二則，使聖學欠缺的人更求深造；三則，使人人得有研求聖學的機會。該院章程中有幾節是這樣：「講話讀書的格式，須不帶學究氣味，講師當竭心盡力，循循善誘，使讀書多

而費時少。諸同學當互相敬愛：當擇其最善者而從之。開學時，方濟各先發表了一篇絕妙的訓話，第一年先開算學班教授數學，幾何原理，輿地學，和世界形勢。據着又教授航海術，和行星論，最後音樂理論。的確，這些真算是最妙，最有味的課程了。

利公在北京宣武門住院中開辦學堂，稱爲天主堂的時候，宗旨便是在使歐洲奉教國的文化中人和中國知識界樹立密切永久的聯繫。他深知士林一朝向化，全國人民自必翕然風從，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六〇七年，也和一六〇四年一般，欣逢大比之年，又見數千舉子來京應試（註二）。這一年，又當三載考績的時期，全國官員被議黜降的，約有四千人，李之藻便是其中之一，那時他還沒有領洗（註三）。這幾年來，已沒有人敢刊佈文字，毀謗聖教了；這一年却有一個新科進士，發表了一篇攻擊天主教的文章，將來要收入他的文集。徐文定看見了，便去謁見主考官，向他聲訴。他便命作者修正原文，改爲攻斥佛老。下一年五月，李之藻來京候領到任的文憑，又在京裏住了三四個月。他一生好學不倦，便又利用這機會，研究西學。那時，文定譯的六卷幾何原本剛出版，之藻便拿了這部書來請教，央利公給他仔細講解一遍。他又翻譯了格拉維司鐸所著的實用數學，連平方，立方的開方法都譯出，定名「同文算指」。中國人素來用珠算，不注重筆算，見了這新算術，不禁拍案稱奇。他更努力學習製造日晷儀和幾種測星儀，做得很準確。到了八月裏，他的「同文算指」已可付印了，又譯成了一部格拉維原著的日晷儀說，這時候，他赴任的文憑已領到了，便出京往大名府上任，把京寓中遺下的一部傢具借給教士們使用。大名離京不遠，他到任後，依舊從事編譯科學論著，步徐文定的後塵，並和文定合作透譯「圖容較義」和「渾蓋通憲圖說」兩書。

利公的傳教方法便是如此，和他同時代的史記家蓋依羅（Guarino）氏曾明白指示這種方法和其他一切傳教法

的不同，概括地說。『到中國來傳教，決不是強大的艦隊，聲勢浩大的軍隊，或是其他人類的武力所能奏效的，中國人雖不善戰，却會抵抗暴力；閉關門戶便是最好的方法。要傳揚聖道，總得憑書籍才行。』利公會說：『用不著大戰艦，也用不著政治策略，』須知他說這話的意義，是不但要和自由貿易，沒有荷蘭人心理的航商脫離關係，不使中國人感覺外國人有侵略遠東的異志（註四）而且也極力反對一切「征服精神」的嘗試，尤其是斐列濱的西班牙人在南洋各島所採的手段。所以他十分留意，和他們不相聞問，免惹是非。便是對葡國人，利公也力求省事，少往來。那時大家討論在華天主教的保護問題，各相爭持，事情很是棘手。他却避不參加，照他自己的信念和見解，顯然要贊成亞考司坦（D'Acosta）神父的方案，反對桑采芝的極端主張；但他遠在北京，僻居一隅，只得不聞不問，概不表示意見。那在印度傳教的諾貝利神父，却不能置身事外，有時候惟有依照范禮安會長的意見，駁斥反對派的見解。

這樣，利公和具有侵略色彩的歐洲人物，擺脫了一切足以招禍的關係之後，便獲得完全自由，可以灌輸經基多教化陶冶過的西洋學術使中國學術界坦然接受，而認識基多聖化的價值了。他所以能在京中得士大夫尊敬推崇，因而聲振全國名揚海外，正是爲了這個緣故。事實上，北京不僅是中國首善之區，也是東亞人才薈萃之地，雖則邊疆上關禁森嚴，仍有四方藩屬來朝貢，異邦人士來觀光，常現着肩摩轂接的盛況，日本侵略朝鮮，結果大受損失，又和中國斷絕通商。可是日本人依然崇拜孔子，篤守程朱學說，因此，日本教會方面的藝術作品，和教理書籍，也可以供利公參考借助。至於中國南疆的藩屬，安南，利公在廣東的時候，曾起過變亂，所以這時候也和安南方面有無關係，已難查考了，但大概總有幾個安南人和他相識。高麗每年有使臣來京納貢。這幾年中，利公也和他們來往，只是滿洲人那時正屢寇遼東，不通聘問，當然沒有，便是有使節來京，教

士們也決不會和他們來往的。那時，西洋人來京的格外多，大抵自稱奉本國派遣，來華聘問，利公在四夷館羈留的時候，會和這些人做過鄰居，所以熟識的很不少。便是京城裏，也有幾個特准居留的外國人，教士們偶然也會遇到。比方那印度的瑜伽僧，那時教士在通訊中，也會提起過。那時，由從海道來的稱中國爲支那，從陸地來的却稱中國爲「喀泰」(Cathay)稱北京爲岡巴利克(Kambalick)這些是元代蒙古人的名稱，猶如那時稱天主教爲「十字教」，天主堂爲「十字寺」一般，西洋人有一句俗諺，「中國如大海，百川入海就變得混濁了。」中國人經歷過種種離奇詭異的文化，如今却把它冶於一爐，烙上孔子學說的印號了。我們一考中國古代基督教的遺跡，便知這句俗諺，說得真是一點不差。

依據中國僅有的遺跡，最先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是唐代的景教。這是天主教中聶斯多略(Nestorian)的異端派。當公元五六世紀時，波斯國的首都有幾個聶派的副主教，分駐波斯灣的兩岸再推進到更遠的地方，如索古多拉島(Socotora)錫蘭島和馬拉巴(Malabar)海岸。這些遠方的教會顯然是傳教區，不是本籍教區。聶派教士更逐漸推廣他們的教務，經由新疆蒙古而進入中國的中心地帶。

看來這班傳教士，最先是取道中亞細亞，經過回蒙兩民族而入中原的，我們看了元代方濟各會士羅勃魯克(Roubin)的記載，便知當時崇信移鼠迷施詞(即耶穌默西亞)的基督教信徒們，真是可憐得很哪！「他們信奉景教，只認得基督的聖名；敬拜十字，却不知道恭敬苦像。他們的聖經是西利亞文。主教來視察信衆五十年中難得有一次。主教駐地是「西京」(似乎是大同府)。」

這班「拜十字的人」和拜菩薩的差不多。新近在黃河裏發現了紫銅的符印，有白鴿和十字形。這派教士們曾於一四

○五年親見蒙古大可汗，穿着破裂的皮外套，帶着一頂小帽子，用繩子縛在胸前，帶在頭上搖搖欲墮，好像剛從作場裏出來的打鐵匠！

十五世紀中，波斯的公教信友們因着交趾附近，據說是由聖多默宗徒勸化的教友們肯幫忙，得和遠東誦斯多略派通音訊，由海道傳達。一五〇三年（葡萄牙人東渡後）馬埃里亞（Mar Elix）宗長還派了三位主教，到印度，和爪哇至麥新（Masin）間的各島嶼。照亞拉伯文的字義講，這就是安南馬來半島和印蘇林特（Insulindo）的一部份，向北直到中國的門戶瓊州海峽為止。這班人的才學，看來和在蒙古的同志们相伯仲。他們的目的在引安南人歸化。據羅德神父（P. de Rades）講這些安南人，每天第一次跨出門，便在孩子們的額角上或是頭頂上用墨畫一個十字，為保護他們，不受魔鬼疾病的侵害。

元朝時代遠東各處和中國十五行省，除了這些十字教教徒外，還有許多希臘，匈牙利，亞爾美尼亞，盧森堡，喬其亞，亞列安等處的裂教徒，來華投效，由蒙古大可汗任用，委以軍事行政的職務。方濟各會教士們幾經奮鬥，歷盡艱辛之後，終於得在中國建堂開教了，但不久朱明崛起，光復河山（一五六八）一切教會都跟着元代的興替，同歸覆滅。

利公初到澳門時，元代基多信徒的遺跡已無從考察了。印度方面雖則還留着些模糊影響的民間傳說，以為聖多默宗徒或是他的及門弟子曾到中國傳報福音，可是元代天主教教士來華傳教的故事，歐洲人已全不記得了。只有方濟會的史乘中還約略提起過本會士們勸得蒙古大可汗歸化的事情。拉穆叔（Ramusio）在威尼斯出版的遊記彙刊，也在馬可孛羅的不朽名著以外，講着，若望勃朗賈賓（Jean de Plan Carpini）的奉使情形，及和德理（Odonic de Pordenone）來華的經過。利公諒必讀過這些記載，可是他大概不會看見過羅勃魯克筆記的英文本。一五九九年他到過鎮江，却萬想不到自己

踏着三百年前的聖地，建造過許多恭敬天主的十字架。他也不知十四世紀的元代帝都岡巴列克，也曾做過公教總主教的駐地。他三次經過的揚州，和浙江的杭州，福建的泉州，三百年前也曾有十字架，和基督多信衆，教務十分發達。

他從義大利 宇宙學家 羅采廉氏 (Russelli) 評註潑刀勒美 (Protenae) 與地學一書上，看見過這些話：『中國人是崇拜偶像的民族。然而有人說他們極敬重十字架，却不知道爲甚緣故要這樣做，或者天主要留着這真宗教信德的種子，將來到了他認爲該教他們奉事他的時候，就按他莫測高深的聖意，使真宗教產生滋長。』

一五九五年，利公在南京的時候，曾在一家古董舖裏看見一個很精緻的紫銅鐘，上面刻着幾個十字架形和希臘字。鐘頂上有一座小聖堂，堂前有一個十字架，希臘字就刻在鐘裏面。古董商說這是從河南方面得來。利公想買下，可是價錢講不通，後來再去買的時候，已被人捷足先得了。

然而利公初次晉京後，把前前後後所有的聞見細加覆核，不久就相信中國便是馬可李羅遊記中所說的喀泰。他於是上書總會長，報告他的新發見；可是他的信念直到一六〇一年二次晉京，在西夷館中和幾個回教徒相識頃談後，才確定。利公等於是急急函告印度 歐洲的同會們，教他們把萬國輿圖從速改正，因爲那時輿圖上在支那以外，另列着一個喀泰國，把他位在中國長城以北。『至於北京，圖上稱爲岡巴路，如今該澈底改正，也許該縮小，因爲北京並不如馬可李羅所說，有一百萬座橋，如今還有一萬座，看來也算不少了，而且有幾座造在江河湖沼上，又大又美麗。』

只是那時候，關於十字教教友的消息，依然影響全無。到了一六〇二年九月，『利公和鍾巴相修士，終於從西夷館的回子們那裏，探得了消息。他們講起陝西 肅州有長鬚的白種人，用的是白銅鈴，恭敬的是依桑（就是耶穌）瑪利亞。鍾修士便拿

念珠上的苦像給他們看。他們便說那些人拜的正是這個。……他們的司鐸是有家室的；他們不用藥品治愈教外人的疾病。』利公便想托那給回回使臣們做嚮導的中國馬夫帶信，和他們通音問。後來得到回書，便知回子們所說不虛，才恍然明白。馬可李羅所說的喀泰就是說這一帶地方。』

據另一記載講，利公晉京後，遇到了七八十個回回商人，他們先以為他是猶太人，後來見他肯吃豬肉，才知道他是天主教人，便向他究問歐洲方面，如葡萄牙、西班牙、日耳曼、威尼斯等，各處的情形。大概這些回回商人，便是那四夷館中的回子們。他們也知道臥亞、奧默茲，還問威尼斯是不是和北京一樣大。其中有一個自稱是亞勒潑（Alp）人對歐洲的事情最熟悉。他到中國來過好幾次，會講中國話。所以他和利公隨意閒談，通常可以用不到翻譯。有幾個是薩馬爾（Samarcande）人。聽利公向他們問起元代塔木倫王朝的事情，不禁驚訝他學識宏博，在他們本國和中國中間，離波斯不很遠的地方，有一片大沙漠，沒有水，也找不到食物。……但見一片荒沙。潑刀來美的地圖上，誤把沙漠位置在亞刺伯境內的，大概便是這一片沙漠。

這時候（一六零二年春初）利公已接得印度諸同會的來信，說他們曾於一五八九年，向大蒙古國亞克巴王朝探悉喀泰有許多教友，也有司鐸，他們行的禮儀有許多地方和羅馬公教相同。這樣，在華教士們把中國認為喀泰，北京認為岡巴列克就弄錯了。於是有關各當局，便一致主張派一位修士去實地調查這半神話的喀泰國；由西班牙、印度總督，臥亞總主教，大蒙古王分任所需的費用。耶穌會總會長便派一位很有才學兼通波斯語的鄂本篤修士（F. Berno de Goez）穿着亞美尼人的服裝，扮作奉教商人，於一六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由亞格拉（Agra）首途出發。他過了拉好兒（Lahore）和喀布爾（Kaboul）以後，便照英國人任金森（Candlison）遊記中所畫的路綫一路前行，踏上地球的屋脊，帕米爾高原

向東進發，走了一年，才於一六零三年九月走出了絕滅人烟的境界，到了鴉爾岡特城（Yarkand）再過去便是搭拉麥岡（Taksimakan）沙漠了。他在這城裏，等回回商人隊起程同往中國，就擱了十四個月。這時候，他就利用暇時，從事探訪古代天主教的遺聞佚事，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材料。

到了一六零五年七月中旬，鄂修士終於遇到了那在北京和利公相識的回人利公的筆記上說：「這些回子們便對我們曾把鐵製的自鳴鐘，八音琴，油畫像，以及其他許多歐洲的東西進貢皇上；我們住在北京，備蒙朝中大臣們優禮。他們性喜誇張，更說我們蒙皇上青眼相加，不時召對，甚至說「一切都在我們手掌之中」。我們一出門就坐着八人轎。他們講我們的身材容貌描摹得很細到，却說不出名字，因為我們的中國名字和西文名字不同。他們又拿出我們寫的一封信給我看，作為證據，這封信是他們在我們大門口檢得的，不知信中講的是甚麼事。因此鄂本篤修士就知道他們和我們相往來，又知道喀泰和中國並無區別。」

可是喀泰究竟是不是中國，鄂修士還不敢十分確定，直到他到了哈密，住了一個月（一六零五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才完全明白。一六零五年年終時，他越過長城，進了中國西陲，陝西的肅州（現在屬甘肅）又遇到了一班從北京來的回人對他講京裏的神父蒙皇上賜了許多銀子，「不是一枚一枚的數，却該用斗來量。」肅州這地方有元代天主教的遺跡，這正是利公所要調查的。利公多年來空懷着這心願，不期如今鄂修士萬里長征，竟到了這裏啦。

事實上，利公的聲名遠及邊陲，大戈壁荒漠的兩端，也會有人提起利瑪竇三字。這一年（一六零五）中國本部更有人慕名而來，給他帶來了珍貴的音訊。是年六月，聖若翰瞻禮前八天中，大約是在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間，有一個六十老翁

踵門求見。這位老先生姓艾名田，是上一年朝考中試的貢士，打算謀得揚州的教職。他是河南省會開封人，原籍還有老父和兩個弟兄。他讀了李之藻的「異聞錄」(?)知道京裏有崇拜天主的外國儒士，却不是回教徒，便以為他們和自己是同教，又聽人講他們深目高鼻，白皮膚，綠眼珠，當然一定不是中國人。他於是欣然來院拜訪，滿面春風，認我們是他的同道，覺得格外親近。(註六)

利公講：「當下我領他到經堂裏參觀，那時正當瞻禮期間，祭台上供着一幀美麗的聖母像，一面站着聖嬰，一面跪着聖若翰。來客一見便肅然致敬，說我是素來不拜肖像的，但我要尊敬我本族的祖宗。」他見經堂兩邊供着聖史像，便問這幾位是不是祭台上裏一位的十二子中的四位。彼此誤會了對方的意思，我以為他講的是十二位宗徒，便回說是的。隨後，我引他到我房裏，讓他繼續參觀。

「漸漸我看出他不是甚多信友了，却是守着古教律法的猶太人。他不知道猶太人的名稱，自稱「一賜樂業」人(即義撒厄爾人)。他認聖母是勒俾加，兩個孩子是額撒烏和雅各伯，他說的十二子是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不是耶穌的十二位弟子。他的兩個哥哥讀過希伯來文。大約是司教，我拿出伯朗丁編的好幾種文字的聖經給他看，他一看就認得出那一種是希伯來文字，不過不懂得，也念不出罷了。他對天主教並不仇視，據說猶太古律在中國是難守的，因為種種規律如割損禮，取潔禮，禁食豬肉等是行不通的，和人酬酢往來很不方便，要做官的更不行了。」這姓艾的中國猶太人，講司教們禁讀中國書，也許說得過分一點。他說自己曾因此逐出會堂，被大司教處以半擯絕的嚴罰；他對於自己教中的事情也不很熟悉，講古經上記載着的許多故事，如梅瑟時代的十二族，亞猛和馬道該的故事等。從他的陳述中，可以知道明代猶回兩族在管理上

自成一邦，各由自己的教長負責管轄。利公和這猶太人這回相見，便成了以後研究中國猶太社會的出發點。據那時採訪之所得，只知道住在開封的猶太人只有幾家，住在杭州的比較多一點，還有幾處地方也有「一賜樂業」的會堂。（參考天下月刊一九三七年第五卷二七至四零頁。）利公查明了這位艾貢生是猶太人以後，便竭力搜尋基多教化更顯明的遺跡，先則影響全無，入後便漸見端倪了。中國人素來不聞十字架，連十字架的名詞都不知道，所以耶穌會教士們借用那用以代表數目，一橫一豎的像形文字，把它叫做十字。想必這也是天主主智的安排，如今所用的這十字的名稱，以前竟也有人用過（元時有十字教十字寺的名稱）。利公提起了十字兩字，艾貢生便聯想到開封城裏有拜十字的人，山東臨清和山西境內也有他們的祖宗，和猶太人的祖宗同時從外邦流入中國；他們的經典，念起來有一部份和猶太人的經典相同（這就是古經上的聖詠）。這些拜十字的人家從前很興旺，有的做得好文章，有的練成好武藝，但六十年前中國官府見他們舉動詭異，怕他們作亂生事，當然一半也是回教徒挑撥起來的！便壓迫他們放棄教堂，不准集會，否則就得處死。據艾田說：開封的十字寺，就在那時改作了廟宇，別地方也是如此。他們只得隱匿真情，有的自稱「一賜樂業」，有的自稱回回，大多數自稱儒釋道三教。利公又說：「我便問他們爲甚要拜十字呢，他却茫然不能答對，只說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要行這典禮，只見他們吃喝的時候，先伸出指頭畫一個十字就是了。這些話，和神父們以前在他處聽到的相符合，中國也有許多地方的人會這樣說。有些人慣常要在小孩子們額角上蘸墨，畫一個十字，保佑他們不遭禍害。」

這個姓艾的猶太人又講了些關於拜十字人的事情。有一天，他帶了一個姓蔣的同鄉，來見利公，說他是十字教人的子孫。他剛得到了一個缺份，派到陝西，那裏所有元代基多信徒正該他管轄。據利公說：「我們就成了至交契友。他表示深願澈

底明瞭天主教的信道，返歸他祖宗所信奉的宗教；但六天後（按大約最晚在七月七日前）他就得出京就道，這幾天忙碌非常，因此我們不能充分教他學習聖教要理。再則，他要有偏房，一時也不能奉教，未竟之功只得留待異日。他答應在原籍和轄境兩處地方竭力尋訪十字教遺民究竟還有多少留着，尤其是要如我的心願，查明他們用的究竟是西利亞文還是希臘文，因為照我從前在南京古董鋪所見的那銅鐘上的文字看來，大概是希臘文。

北京神父們如今得到了這位朋友，期待着他調查中國元代天主教的遺跡，我們就不難想見他們怎樣滿懷欣樂，耐心等待佳音咧。他們見他每次上菜的時候總要先畫一個十字才下箸，但他們給他看一個苦像，他却茫然不識，他不知道有天主哪。他極願洗耳恭聽神父們給他講述天主聖子命宗徒們往訓萬民，到全世界傳報福音的故事；對神父所有在華復興基多聖教的計劃也熱烈贊成。利公在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不禁慨然歎道：「范禮安神父到得這裏的時候，想必已派人到那兩處地方去查訪了，我盼望天主更要使中國門戶大開，歡迎基多聖道。中國便是馬可、李羅所說的喀泰，那已是毫無疑義的了，他說喀泰有信奉基多的人，真說得一點不差，他在世的時代的確有許多呢。」果然消息傳來，更使利公等喜出望外，南京的同會們有信來京，說：「他們已查得遵守天主戒律敬拜十字聖架的竟有一萬多人，一六零六年一月間有十七人受洗學習的也不相上下，可是他們不能確定這些拜十字的人的來歷。」這一年四月間，南昌神父們的朋友，那位姓林的福建人，要到陝西去看看他做官的哥哥，臨行時也帶了幾本教理書和一幀救世主像，去查訪元代遺下的教友。」

這樣看來，一定會有驚人的發見了。那知結果竟令人大失所望！那姓蔣的一到陝西就調任，一點沒有閒工夫去查訪；到了一六零七年，利公和艾舉人相見後已隔兩年了，依然消息全無，只得派一個助理修士跟一個新奉教的開封文士同到開

封。那裏的十字教人六十年前受了酷烈的磨難，至今猶有餘恐，都不敢自承。也許因為這位修士是中國人，怕他是官府派來的探子，所以他連拜十字人用的是怎樣的文字，供的是怎樣的圖像都訪問不出。他們也不肯承認自己的祖宗是外國人，這在別國是認爲體面的事情，在中國却認爲恥辱。這樣看來，要他們吐露真情必須派一位西洋神父到那裏住上一兩年，和他們漸漸相熟了，有了交誼才行。這位神父又須懂得一點希伯來文，好托猶太人房間拉攏，因為那時十字教人大都借猶太人做幌子，避人耳目。這件事直到利公去世，龍華民繼任以後，還是不能調查明白。

最初謀和猶太人接近的嘗試，似乎比較有希望。一六零七年這個華籍修士情人抄好了古經開首和結末兩部；這是希伯來文，和我教中古經的前五部一樣。利公寫了一封書信教他帶去，而交開封的大教長信上說，利公不但在北京找得了幾部古經，還覓得幾部專講默西亞降生的新經。那大教長的回信，却說默西亞要在一萬年內才降生。開封的猶太人還教人向利公傳言，說只要他答應不吃豬肉，到開封來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就舉他做大教長。過了幾時，便有三個猶太人晉京，求見利公表示願意領洗，那時大教長已去世了，繼任人年輕無學，頒佈新教律，令屬下教友遵守，其中有一條是只許他們吃由他親手宰殺的牲畜，實在太厭煩了。他們說：『因此，我們不久就要分裂了，不奉回教，便是信仙佛。』可是結果毫無成就，便是後來一六二一年，畢方濟司鐸前往開封開教的時候，雖然想有方法，使猶太人領受福音，却依舊不能如願。

這當兒，鄂本篤在肅州病重垂危，看來性命難保了，他跋涉長途，所經過的無非是崇山峻嶺，曠野荒漠，人跡不到的境界，一路受盡了飢渴凍餒之苦，真是苦不堪言；到了肅州，已力盡筋疲，再也支撐不住了，就得了一場大病，病勢萬分凶險。他跟着回回商人隊同來，這班回教徒原是殘忍自信，又是反對天主教的，他病倒了，就得由他們擺佈。他一進中國邊境後，便寫了一

封信寄給北京神父們，但信封上想必不會寫得中國字，所以沒有寄到。到了一六零六年復活節，他又寫了一封信，托一個私下逃出肅州的回子帶到北京。也許他另外又寫了一封，因為直到九月裏，利公才得悉他在肅州病倒受苦的光景。利公得信後，便派華籍修士鍾巴相立即起程前往肅州。北京和肅州相距極遠，交通又極不便，鍾修士到達肅州時，已在下一年三月卅一日了。徵倖他還趕得上和他的同會神昆相見一面，安慰他的憂苦，給他侍奉湯藥，陪他到四月十一日，送他安死善終。鄂修士便在他的手臂中，安然逝世了。他這回奉使長征，雖則安死異鄉，以身殉職，却不是徒供犧牲，無裨實益的。這一年十月廿九日，利公便得到了他的遺著，把它編作三章，收入自己的筆記中，對於中亞洲的山川形勢，風土民情頗多開發，是很足珍視的。

司文希丁 (Svan Eddin) 曾踏着鄂本篤修士的足跡，一路行到肅州，却沒有找到他的墳墓，表示遺憾。可是後來蓋勃爾女士 (Miss Mildred Cable) 說她已訪到了(註八)

她講：「一天，正當耶穌聖誕節，我們的教友們在肅州舉行慶祝。其中有一個是歸化的回教徒，我們聽他對一個中國教友講回教在第十三月十六天中，每天要行着一種很有趣味的典禮，那時他們齊到一個外國人的墳墓上去瞻謁。他雖然不信奉回教，却只恭敬着一個天主。」我們便問這新教友(抗議派)他就這樣告訴了我們。三百多年前有一個從印度起程到北京的西洋人行到肅州就死了。中國人不肯殮他的屍身，據他們說因為拾不動他。回回們只得把他停在一邊，但官府查出他有些來歷，便命人把他好好安葬。末了，大家議定把他葬在長城外荒野中，他的墳墓至今還在那裏。」

鄂修士也像真福若望蒙高味諾 (Jean de Monte Corvino) 一樣，被岡巴列克煊赫的聲名所吸引，不辭長途跋涉而來，只可惜他沒有達到目的地，便賚志以歿了。

第七章 聖化大行

利公來華傳福音，兢兢業業，力謀完成他的使命，二十六年如一日；雖則艱苦備嘗，心力交瘁，却始終不志衰氣餒，向着目標邁步前進。也許有時候，他迭遭挫折，廢然思歸，但結果他依然戮力進行，決不拱手退讓。他一心依恃天主，順聽天主安排，所以他始終生氣蓬勃，心切志堅。到了一六零九年春初（二月十五日），他奉了副省會長巴範濟的命，繕具了一份冗長的報告，臚陳中華教務的概況，剴切說明他所有希望的緣由。這裏我們不妨把他的報告略述一下。他說：「（一）現在正當開創時代，教務的進展的確可算是奇蹟；備歷艱辛，飽受非難，這些正是神聖事業所有的常態。屈指算來，如今教友已有幾千了，南北兩京奉教的都有，他們大都是有德的士類，有很大的聲名。（二）中國人極重讀書，很容易憑理智來證明吾教的真道，只要一班大人物歸向我們，其餘的就不難勸化了。（三）用刊印書籍的方法，傳教工作就容易入手，只要我們能把聖教所有各端道理，在書中講得一點不錯，中國人自己就會把這些道理到處傳揚。奉教人民即使司鐸不能和他們常在一起，也能恒心向化。（四）中國天資聰敏，我教了他們一點算學和輿地學，他們非常感激。我們要是教他們更奇妙的科學如物理學，形上學，神修，超性的神學等，他們更將怎樣感激呢？（五）雖然有些人不承認，中國人總算是有熱心傾向的。古時候他們守着本性的戒律度生活，要比我們本國地方的人民好得多。一千五百年前，他們很少拜神佛的。他們的神道不像埃及希臘羅馬人的一樣，生前是壞人，却是有德行，做好事，造福蒼生，為後人所仰慕的人。便是他們的古代鴻儒，也在書中講他們只恭敬天地和天地的大主。我們也曾親自考察過這些書，看到書中所有相反理性的話，真是少極，却有大多數道理是合着理性的，比了我們

所有本性的哲學並無遜色。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希望他們古代的賢人，因着他們恪守性律，得蒙天主矜憐，開明了他們的心目而救得靈魂。我們還該表明自從佛教流入中國以後，中國人就不尊敬他們了。（六）中國境內很太平，我們遵照范禮安神父教，我們切記的話，注意使他們明白天主教是極反對陰謀犯上作亂的。便是如今奉教的還不多，幾時人們說某人不會奉教，便說「某人太壞了，不配奉教」；提起他們崇拜的古代名賢，人們就說：「他們要是生在斯世，定必奉教無疑。」（七）本會同人因為研究中國文章已擰得了博學賢儒的名譽；我把這一點看得比再勸化一萬人還要重，因為這正是使通國人棄邪歸正的先兆。（八）如果儒教中人不同身後禍福是真，可是他們對於道德倫理的教誨和我們的見解差不多完全脗合；所以我們用他們的教誨來攻斥釋道兩教，對他們所有違反吾教聖道的話痛加駁斥。這樣，儒教中人非但不是我們的仇敵，反成了我們的朋友了。因此有一個著名佞佛的士人會來信斥我為「污辱斯文」，說因為我會把幾個古代賢儒列入天堂的緣故。我也留意不使其他神父們跟我一樣，却仍攻擊幾個當代儒士所提倡的意見，因為他們不遵中國古聖先賢的遺教（按這是說依附程朱學說，惑於宋代理學的人。）這樣看來，中國表面上雖然似乎是一片荒土，但利公等却已在開始收穫，摘取佳果了。而且因着創業人的力量宏偉，樹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所以教務的發展，更有蒸蒸日上之勢。

利公所用的特別傳教法，有兩件事大見功效。第一，是我們已在前面講起過漢文著作；他曾因同會中能給他分勞的太少了，表示遺憾。他曾於一六零五年春初寫的書信中說：「我們可以用刊行學術著作的方法，在中國獲得許多功效。直到如今，我還是唱着獨脚戲，便是現在，能給我幫忙的，竟可以說一個也沒有。然而我仍能用這方法，使中國儒林大起反應；那麼，如果有幾個造詣更深，修養有素的人專務著述，影響所及，豈不大有可觀呢？所以我囑咐在華傳教的諸位司鐸，務必專心一志

研究漢文，當作一件正經事做，須知在華傳教事業能否持久，和這件事大有關係咧。」自然，以後教士們不無著作問世，但利公去世後，龍華民繼任他做了會長，就不得不承認文風衰落，不能媲美前人，而歎同志中惟有王肅豐一人差強人意了。第二，利公見教士寥寥無幾，來華後對於傳教方略又欠熟練，便竭力鼓勵新歸化的人自己去宣傳，藉以彌補這缺憾。其中有許多原是才學優長，或是很有聲望的人，他們一旦得聞聖道，有的往往自己還沒有領洗，（如李之藻等）却已本善與人同之旨，轉以教誨他人了。這種轉輾傳授的方法對勸化婦女實在是極重要的。金尼閣曾說：「須知我們改穿儒服，便不能像從前穿僧服時一樣可以和婦女隨便交談；只有遇到了很難得的機會，當着她的丈夫或是父母，在門首經過，或因有事上門奉訪的時候才能對婦女們略施訓誨或加指導；後來神父們得華籍助理修士們前來襄助後，這種工作就容易一點了。但便在那時候，也須當着她的丈夫，父母，或是二三正經教友在場才使得。一天，有一個新奉教的婦女請某修士進她家裏坐坐，某修士謝却了，因為他不知道有沒有男人在她家裏。這婦人就生氣，她的鄰舍便說她沒有道理。這種辦法我們決不通融，便是對於平民，男女間的界限比較寬一點，却也不在例外，中國人見我們這樣嚴謹很稱許，因此，我們享着極好的名譽。」

在華聖教會既已立下了穩固的基礎，就不難按部就班的發展着教務，仍照舊有的辦法管理着。利公雖則做了會長，却只管北京一方面的事情，把其餘三處住院讓給李瑪諾主持，自己差不多完全不過問。李瑪諾分担着這重任，和利公融洽無間，直到一六零八年才奉到總會長亞瓜維伐的命令召他回澳門，向許多和他交好的商家籌募傳教經費。這在財政一方面果然有望，對於中國內地的教務，却是個大損失。利公會上書總會長，訴說他的苦況。龍華民代替了李瑪諾的職務，要等到一六零九年終時，才能抽身到北京，和利公洽商一切。眼前，他因着不如意事相繼迭乘，只好困守韶州，欲行不得。李瑪諾去了。

以後，羅如望便把南京教務交給王肅豐主持，自己起程前往南昌，駐守傳教。人員這樣缺乏，不幸又短了兩人，在韶州的杜祿茂只害了九天病就死了。（一六零九年七月廿五日）林斐理也因病調回澳門休養。李瑪諾等這回南下，正當廣東又有事變發生，一路前行，就不免惴惴恐懼。有一個澳門教會的僕人帶了書信進內地，過關卡時小費化得不够，便給巡邏的兵卒拏下了，送到香山縣轉解廣州府究辦，挨了打，又被判終身監禁。他所帶的書信上雖然沒有甚麼犯禁的話，可是內外交通，總不免要引起中國人的疑忌。廣州知府教人把這些書信譯成華文，便批定行文韶州把龍華民驅逐出境。恰巧這當兒，他丁憂卸任，所以這案件就擱起了，沒有辦。李瑪諾和駱入祿兩人便在這風波突起，危機隱伏的時候，要護送杜祿茂的棺柩回到澳門。他們於九月八日由李道修士陪着，從韶州乘船出發，到了離廣州半里的地方，便不敢前進了，只得先命船夫護送棺柩先到澳門求援助，他們自己却躲在船底裏過了四十天。不料澳門自從七月二十五日被荷蘭人馬夕賴夫（Maclach）率領艦隊突來襲擊後，葡國人惴惴不安，商務蕭條更非昔比，加以兩年來不見東印度的船舶，他們失望之餘，便有放棄澳門，東裝歸國的意見。這時候，香山縣又禁止中國人把糧食運往澳門出售，更使他們困苦難堪。幸而八月二十六日，摩拉加的艦隊終於來到，他們才慶絕處逢生。馬夕賴夫的盜船仍在附近海面出沒，直到九月十三日才駛開；可是這一年中他一無所獲，便是要想擱劫從日本來的商船，也不能如願。這回，李瑪諾向澳門葡人乞援，正當他們自顧不暇的時候，但教士們却找得一個漁夫引路，繞道行舟，於十月二十一日安抵澳門。

外來的阻力却不會妨礙教務的進展，不過我們不該把中國和日本相比擬，以為教友總有幾萬幾十萬。看來那時奉教的至多有二千，而且這總數還得除去肇慶原有的八十多教友，因為利公去了以後，肇慶教友們也就分散了。韶州的四百多

教友也沒有多大價值，因為自從廣州事件發生後，背教的就有不少，雖經龍華民和某修士竭力維持，可是新奉教的就一個也沒有，便是老教友也不肯和西洋人來往。因此，龍華民等會想搬到南雄，（那裏有十來個教友，不時得和北上路過的教士們相見，因此仍不失熱心）只因限於經費，不克實行。

江西省會南昌的住院還因着官廳迴護，爲生員們所仇視。那裏有兩位司鐸，五位修士，其中四個不久發過初願（一六零八年三月八日）。但傳教工作只宜在暗中進行。教士們又爲謹慎起見，不曾設立公堂，却有兩座小經堂，分別敬供救世主和聖母聖像，是倪槐修士的作品。李瑪諾去後，羅如望便做了南昌院長，對教務審慎進行。一六零九年的聖誕夜，信衆虔誠與祭，「照見天堂上的福樂」。教外人士漸明白教士們的宗旨只在傳教，並不想擾亂國家，便把舊時成見放棄了。一次，曾由教友們扮演基督審判生死的戲劇。一六一零年，領洗的有一百零六人，其中有一個女教友，是某大家的太太。她的丈夫亡故了，夫族中出了四個進士。她有志信奉聖教已有四年了，却怕招物議，不敢毅然捨僞從真；這一年，她聽說華籍某修士可以教她學習聖道，便研讀教理書，請他講解三位一體，降生救贖，靈魂不死不滅等各端奧理，到了領洗那一天，羅神父便知這位修士坐了暖轎到她家裏，行授洗禮。她的兩個兄弟和一個姪兒在旁觀禮，由這姪兒給她在額上擦聖油，又授給她念珠聖牌；行禮的時候，關上大門，不使教外鄰家得見，免多口舌。禮畢，神父等便在她家進早餐。郊外某村有一個八十六歲的老婆婆要進城找神父，說去求他赦罪。無奈她的兒子攔着她，不讓她去；她覺得很難受。末了，恰有一位司鐸下鄉，路過那村子，她就趁此機會，學習道理，終於請神父付了洗。兩天後，她就去世了。有一個洗名瑪爾谷的教友，回城時候路過城脚下，撞見了盜棺賊，給他嚇跑了，却見棺材裏有一個小姑娘，還有生氣。這女孩子生前曾在堂門口聽過人講道理，要進教，她的主人却不許；如今她

竟得領了洗，才氣絕。

南京一屬聖化大行，教務比南昌更見發達。基多聖道已推廣到上海，不久更進展到杭州了。一六零八年年終時，王肅豐已做了院長，有黎聳石司鐸和鍾巴相修士襄助傳教。這當兒，徐文定護送父柩回南，始終熱心贊助教士們宣揚聖道；「視引人棄邪歸正爲樂事，要比赴官場中的宴會更高興」。他去吊他焦老師的喪，這姓焦的佞佛，責他不該信奉「夷狄之教」。文定知道他迷信極深，認爲和他爭辯也是枉費唇舌；可是他見瞿太素忘掉了當初的熱忱，依然惑於左道，沉迷於長生不老之術，却毫不遲疑，竭誠敦勸。這時候，太素正寄寓教士住院，文定便對他披肝瀝胆，強迫他做一星期的避靜神工，最後，又行一次總告解，告他自領洗後所有的罪過。後來，太素於一六一二年去世了。

文定回籍守制時，曾幾番到南京協助教士們傳揚聖道，所以教務更見迅速發展。一六零九年一年中，歸化的不下百餘人，獲得了顯著的進步。那時，便發生了幾件不平凡的事情。教外某家的女兒被妖魔困擾，不時借著商人和尙，或是美少年的形像，在她眼前出現，迷惑她做出駭人的事情，如使戚族婦女殺她們的婢女等。家屬曾請道士們來捉妖，反被妖魔笑罵痛打，不得不抱頭鼠竄而去。住院中某修士曾拿了救世主聖像，和耶穌聖號，到她家裏供起來，給全家人講授聖道，教他們把邪神偶像一齊撤除。從那一天起，妖魔就不敢在屋子裏作怪了，只在庭院裏罵人；等到那女子領洗後，更匿跡銷聲，逃得不知去向。在這時期內，南京專管轉呈章奏的四位最重要大臣之一，許晉臣毅然歸化了，洗名若望。這件事大足使朝野士大夫聞風興起。他和北京教士們相識，多年素來潛心於鉛汞之術，專事尋求長生不老的仙丹。從前他讀了利公的天主實義，和畸人十篇等書，見書中攻擊佛老，指斥迷信舉動，深感不快。可是他仍和教士們不絕來往。王肅豐到南京後，更教他算學，給他製造

渾天儀，地球儀各一具，又送給他一幅萬國輿圖；他們倆的友誼更深了。一天，許胥臣來向他道謝，談話中表示仰慕他的才德，王司鐸便說這一點知識，比了我教聖道，簡直如滄海一粟，一點也算不得甚麼，說着便謁誠教勸他，回去再把利公的天主實義一書仔細讀一下，又送給他一本專論天主創世，靈魂不滅，原祖逆命犯罪，吾主降生救贖等道理的辯道書。這便是他日後開道皈依，領洗奉教的出發點；只是要掃除迷信心理，恍然於眼鍊飛昇等左道爲不可信，而毅然捨僞從真，這却是頗不容易呢。像他這樣學問高深，又很有閱歷的大人物，要折服他當然極困難，因爲中國士大夫大抵成見很深，不信外國人的學問，比中國人高明；教士們要折服他們，還是著書立說較易收效。他讀了這些著作，明悟裏雖則豁然開朗了，但要他放棄夙昔主張，改變以前的作風，還是顧慮多端，狐疑莫決，後來仍舊是徐文定使他決定了主意。他所以遊移不決的緣故，是因有人哄騙他，使他相信人可以和去世的亡靈交談通話。他家居海濱，故宅被海寇焚燬，祖宗的畫影也盡付一炬，所以他希望用這宣告亡靈的法術，教畫工重繪，因此來問王肅豐神父。王公便說這除非是魔鬼的幻術，否則便是哄人的勾當，總是無益的邪法。結果許胥臣便派人送信給教士們，正式請求收作弟子。王肅豐等照例謝却，不敢以師位自居，只收他歸依聖教，並依他的請求，送給他一幀救世主聖像。許若望於是穿上朝服，出門恭迎天主聖像，又命人給王公賚送一席酒筵。過了幾天，他決計領洗，便帶領通班人馬，簇擁來堂。教士們見他驕從繁盛，怕人多嘈雜，不願在住院中給他授洗，答應下一天到他公館裏行禮。他領洗後，便向人訴說自己心裏覺得大大的安慰。王神父一回院，他就派人賚送一份厚禮，銀兩和緞疋。王公把他的餽贈全部璧還。他深感教士的清廉，於是親自來院，進聖堂，感謝天主的大恩典。他奉教後，不久他的母親去世了，他就了憂卸任，臨行時，因知王肅豐打算建造聖堂，便捐助了一筆款項。他動身那一天，按曆本是凶日，他却一反生平疑忌心理，毅然啓程，到了原籍，便急

急來書致候王公，有暇請他駕臨一敘。以後，他恪遵聖教規誡，太夫人的葬事，全依教規辦理，每逢大瞻禮日（如一六一零年的聖誕節等）也必虔誠誦禱，和他的同志李之藻領袖羣倫，作一方的表率。

李之藻的原籍杭州，寺院林立，佞佛的風氣素極昌盛，靈隱天竺尤其是僧侶的集中地。如今縉紳名士中有這兩位大人物首先表明崇正黜邪的態度，大足滌蕩人心，使風氣爲之一新。利公會記（一六零八年三月八日以前）：「浙江佛教盛行，浙江某名士進士出身，曾在京供職多年，如今已致仕回籍，提倡佛教，不遺餘力。他讀了我的『畸人十篇』，便寄來了一封極冗長的書信，說我這本書有許多地方果然講得很好，却勸我勿再攻斥佛教，又用極客氣的口吻，說我或許要因此致禍。我答覆他，說明我們的宗旨；我們傳揚真道，全靠天主保佑。教友們知道了這件事，便覺非常欣慰，我想這位名士要把這兩封書信刊印出來。」

上海方面宏開聖教便是利公所採傳教方法獲得成功的最好表現。十九世紀中，天主教教士們和一般有名人物極少往來，也許是因他們不懂得上流社會的風俗習尚所致。關於這一點，裴克司鐸曾論：「中國上流社會，左右下層民衆的思想意見，也許要比別的國家更見得有力。」利公深知中國國情，所以他勸得一位名士或是有權力的官僚歸認基督之後，一鄉士庶便翕然從風了。徐文定封翁故世後，他護喪回籍營葬，利公的筆記中，便乘機詳細敘述他故鄉上海的情形，說上海距離南京一百四十四里，地近海濱，常易受海寇劫掠，從日本羣島出發，二十四小時內就可以到達；全境居民約計三四萬戶，這是一片平原，「像郎巴第一樣赤裸着」，却總算是個大城市。城外農家稠密，阡陌縱橫，農產物足供三十萬人食用，年納糟銀十五萬元，糧米如數，土地肥沃，棉米豐饒，因着棉花是特產，所以有近二千織工織成布帛，供給北京。人民性喜活躍，城裏人稍爲

有一點愛多事，鄉下人較爲和平，却大都是很有明悟的，所以讀書進學的很不少。街頭雖狹窄，一班官紳却住着高廳大屋，空氣很好。上海人要比別處人壽長，往往要活到八九十歲，甚至一百歲，六十歲的人算不得享高壽。」

郭居靜司鐸自從廣州發生嚴重事變後，直等接到了徐文定的吩咐，才敢再到南京。文定的一個親戚病重時，他想親到南京邀郭司鐸去付洗。因爲那時付洗的經文還沒有譯出，他又以爲拉丁文極煩難，不敢念，所以請郭神父急急前往，可是郭司鐸還沒有動身，那病人已死去了。郭神父到上海是在一六零八年九月間；到時，徐文定親到碼頭上迎接，在他城裏的宅裏，住了三天，便搬到南門附近某官的別業，以便接見來訪的賓客。這個官員是十二年前韶州神父們的老朋友。

因此，這南門外的司鐸寓所，便成了如今偉大的上海教區的發祥地。不滿兩個月，郭神父付洗五十人，兩年中教友便增至兩百多。別的地方，甚多聖化從沒有這樣迅速傳開；這種成功，全因徐文定躬請倡導，竭力揄揚所致。他更斥貲一百元，買了一塊地，又化了二十元的裝修費。他力遵聖教禮規，辦理封翁葬事，只因郭神父領葬，修士一個也不參加，和尚道士當然攬絕。他們懷恨在心，便到處散佈流言，說天主教教友不孝敬父母。上海縣也帶了禮物親來拜會郭公；因此，便有人以爲他也已歸化了。當此開教時代，便有許多異聞佚事，足供傳說。某姓教友父子倆都害着傷寒症，却因一幀聖十字像而痊愈。第一領洗的婦人是因受妖魔纏繞甚至寢食不安，幸賴十字聖號驅魔救了她，她就棄邪歸正。某教友學道時，便把邪神像燒燬了，邪魔就與妖作怪，攝去了他的米，又把水變成墨黑，作祟了三四遭，仍是聖十字像把妖魔驅除了。文定家某僕人久病不痊，領洗後就全愈了；以後，他就自願爲聖教會服役。一件事更見得不平常，教外某家，父子同患瘡疾，鄰舍教友給他們一幀十字聖像，他們許願愈後，領洗奉教，豈知那兒子說的是假話。一天他在家裏看見一條蛇，就找棒去打，却沒有打死。他做了一個夢，夢中見吾

主對他說了兩遍「你肯相信我嗎？」他也回說了兩遍「不肯」。但吾主仁慈，重又對他說「你要是信我，我就把這條蛇弄死，不過你一定要相信我才行」。這個青年答應了，他的病也就好了。又有一個教外人，兒子已歸化了，他患了病很受苦；他的兒子勸他歸認真主，他不肯，便來堂替他在救世主聖像前，叩首祝禱。（他家和郭神父寓相距二里。）這天夜裏，耶穌就在病人前顯現出來，許下賜他病愈，他的兒子便到郭居靜司鐸寓所，向神父表示感謝。有一個老年人素來在行路往返時候念玫瑰經，如今又念聖心串經，他對人說不時嗅着香氣，和在彌撒中嗅到的一般。一六零八年初次過聖誕大瞻禮，典禮很隆重，郭神父當衆朗誦大日課晨經，三台彌撒中，每台講道一篇。徐文定一生謙謹誠篤，雖然身份崇高，却仍和衆信友同坐與祭。後來上海教務日繁，南昌初學修士方濟各賴若（Francis Xaverius）便奉派來佐郭公；但那時杭州開教事宜已着手籌備了，因此郭居靜司鐸只得暫返南京主持籌備事宜。

中國南部和中部開始有了天主教教士的足跡，都是利公行動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北京仍做着傳教事業直接工作的區域。一六一零年，保定一屬雖已有了一百四十名教友，利公却不會親去宣化，只派一位修士前往。這大概是因他旨在避嫌，不願過於惹人注目的緣故。「諸聖村」的經堂又添了一間房屋，作為教士蒞臨安居之所。隣村新教友十五人會來學習教理，另一村中，宮中某大太監的父母也來學道。

京師信衆繼續增加，一六零八年十一月三日至翌年七月間，領洗的約有九十人，到了一六零九年十二月，北京信衆總計共有四百餘人。當時的史乘會詳敘信衆的精神生活，每逢主日及大瞻禮日，來堂與祭的總是濟濟一堂；教士們便製定了瞻禮單，分發衆信友，以便檢閱，使他們易盡教友本分。一六零八年有五六個教外兒童病危時得領聖洗，其中有三個是由會

受訓練的教友代洗的。那位洗名法傳益的老伯伯，奉教後熱心敬主，已有四五年，仇人們的嬉笑怒罵都忍受了。他活到八十二歲還不怕走五六里的路，按時來堂與祭。後來，他病重了，便行告解，還要求給他送臨終聖體。神父們以為既不在他家裏行聖祭，又不能捧了聖體穿街越巷，便教人回報，說臨終聖體不是一定要領的。他聽了，却仍心不死。到了三王來朝瞻禮日（一六零八年一月六日）衆信友齊集堂中與祭時，忽見法傳益老伯伯躺在板上，叫四個人抬着進堂。大家聽得他力竭聲嘶地喊着：『給我天主的聖體呀！』個個大吃一驚。他們怕他立刻要氣絕了，利公便命把他放在自己床上，就趕緊起彌撒成聖體後，甬道上就鋪起地毯；教友們分別擎着點起的燭台，執着焚香的吊爐，排了隊，出聖堂，迎聖體到利公房裏，吾主一降到法傳益就像復活了一樣，高聲宣佈寬免一切仇人，求天主也要寬免自己的罪，就極虔誠地領了聖體。過了幾天，神父又給他行終傳聖事。他臨終時，吩咐自己的老妻和十歲的兒子，一齊領洗奉教。家人們又遵他的遺囑把照例要在和尚道士們身上化去的三四十元，哀矜窮人。他死後，某神父便到他家裏按聖教禮規做追思領葬；他的親屬和幾個教友同行送葬。一六零八年三月八日後，有一個七十歲老儒聞道來歸，更令人大為感奮。據說，他曾向魔鬼講過話，因此變成半聾。他奉教後，便做了好些詩文，頌揚各端信道，後來到金陵供職，就出京南下了。

這當兒，李之藻又到京師，不時來向利公請教算學。他家的兩個親戚都是才學優長的文士，就在這時候領洗入教。其中有一個洗名彌額爾，據說，他生下後就會講話，或者是妖魔借他的口講話，說他不是這家的人，是某和尚轉世。他小時候，只想念經拜佛，他和他的同伴（洗名日羅尼莫）一朝歸化，就不住研讀聖教書籍，在瞻禮單上找起不定期的瞻禮來，要比神父們容易；也會念拉丁經，用中國文字注音。李之藻到開州上任後，這兩個新教友就彼此互相告罪，後來彌額爾的父親來京看

他的兒子就放棄了他五十年來的佞佛積習，「棄之如敝屣」，回鄉後，又給親屬傳授聖道，但等教士一朝蒞止，就可以給他們付洗了。有一件事使李之藻非凡感動，他的一個舊僕害了充血症，沒人照顧。神父們知道了，便派人去服侍他，把房裏打掃乾淨，薰了香，龐迪我便去給他付聖洗。過了兩三天，他死了，臨死時，喊着天主聖三的聖名。

彌爾爾和日羅尼莫兩人的表樣，又引得兩個讀書人捨僞從真，他們一朝歸化，昭事虔誠，持躬謹飭，足使北京人士不難想見西洋教士來華傳道的宗旨，不能有所誤會。這兩個新教友一個洗名安德肋，家道差一點，喜歡勤行告領兩聖事，來堂時每帶他的母親、妻室和其他親屬們同來；另一個洗名路加，家裏有錢，養着一匹馬，又請有一位西席，教他的兒子，生平詭計多端，欺詐百出，誰都見了他害怕，然而他却有一樁好處，對他七十四歲的老父恪盡孝道，因此得蒙天主賜以領洗的大恩典。事實上，他奉教的經過是這樣：李之藻——他的保山——和其他信友們給他講信奉天主教，死後大有好處，奉了教並不妨礙他孝敬父親的心意。他的父親年老耳聾了。他於是自己先學教理，回去轉教給他父親。他見利龐爾公是李之藻所崇拜的人物，自己就不敢怠慢，因此，漸漸殷殷向化了。可是他要歸正，障礙還多着啦！他有兩個小妾，一個是收在家裏的姘婦，她的丈夫還活着，時常上門吵鬧，恐嚇他。當下便有人出面調停，把這姘婦送還了事。另一個妾，原是從小買來的婢女，如今便叫她的父母來領回，不索還身價銀子。他家裏滿供着木雕的偶像，有許多嵌着金銀珠寶，他就把這些菩薩一齊收拾，裝滿了一筐，送到教士院，却因誰都不敢動手，只得由教士們自行焚燬。路加本做着好些廟會道社的總董，奉教後，他的道友們就說他的宗旨是在借此侵吞經手的公款，規避交代的責任。他聽了，就憤然出席他們的全體大會，聲言他們只要查得出，他可以十倍賠還。後來他想出一個特別方法，勸合家人棄邪歸正，教人畫了一幅圖，中間繪着天主像，兩邊是他的家屬，由父母領導，和平素一

般模樣，手裏拿着念珠，頸項裏帶着一個小苦像，和一個聖骨匣，這種光景惟有奉教的才這樣。漸漸合家人差不多個個都歸化了。神父們也給了他一幀救世主聖像，是極美麗的油畫像。他拿回去供在廳堂中，在像前點了一盞常明燈，率領全家人按時誦禱。

利公久已有意要成立一個聖母會，路加奉教後，他的計劃便實現了。他先讓教友們自己草擬聖母會的章程，然後由他修改，加上了幾條關於告解誦禱的規程，和新會友入會須經老會友同意的規定。於是這中國首創的聖母會，便於一六零九年九月八日，在路加家裏組織成立了。本會的主要目的是在統一教友們的喪葬儀式，因為中國人是素來極注重喪事的。聖母會對於無力營葬的窮苦教友可以補助一部份費用，遇到某幾天瞻禮日，還要獻些蠟燭，乳香，和鮮花，供聖堂應用。每月首主日，會友們開會一次，請一位司鐸蒞會致訓，並指示推進教務機宜。成立那一天，便有四十名教友報名入會，稱爲「天主母的神昆」。他們公舉路加做會長，聖誕夜有許多會友行告解，十四人領聖體，「在這開教時代，這個數目就算不少了。」熱心的風氣，便由北京傳到南京，金陵信衆也就羣起組織這種善會，不僅有一個，却成立了兩個。第一個設在教士院，是紳士們的會，第二個是民衆的組織，設在會友家裏，由一位司鐸主管監督。這就可見利公暮年在華勞績的一班，提倡恭敬天上母皇的熱心敬禮，使北京信衆仿效歐洲本鐸區的儀型，成爲真正的天主教教會。利公一六二零年函牘上，曾說：「信友們每逢大瞻禮日，往往齊集一堂（這在中國更教人見了訝異，因爲一年中除了新年三節外，休假的日子，是一天也沒有的。）他們與祭時，也看司祭樣，鞠躬俯首。我們按照常例，給他們講解聖經和聖教要理。他們極尊重聖教禮儀，聖燭，聖灰，聖枝等，看得非常寶貴，（用這些聖物做成聖水治病。）聖主日中，他們更表現出極虔誠的態度；受難瞻禮日，公拜苦路，更見得熱情勃發。他們極

重視告解聖事，每逢新年裏，和大瞻禮日，他們總要行告解聖事，聖體輕易不准領。哀矜窮人和照顧病人的善工使一般素來缺乏憐憫心的教外人見了嘖嘖稱羨。」

講到這裏，我們不妨把當時信衆所有的經本仔細研究一下，中國教友們都是一片誠心，照頒發給他們的經本熱心禱，不加選擇，更談不到喜歡不喜歡。據我們看來，似乎啓發中國教友念經恭敬天主的第一人便是那多明我會會士類思格勒那（Louis de Grenade）司鐸；龍華民神父依着他的經本首先譯述，編成了一本週年瞻禮經，經後人隨時修訂，便傳到如今。諒必也有人喜歡，究問教士們自身的宗教生活有怎樣的精神？利公的筆記中，便有許多記載，詳述那在韶州的青年教士們生前事蹟，很有足供後人矜式的；利公的理想還是他當初修道時的理想。他講杜祿茂神父的早世真堪與歐洲最熱心的修院中人相媲美。在華耶穌會的古書樓中，藏着神修作家的各種著作，也許是那時代的會士們所置備的。其中有一部是耶穌會中一位最早的神修作家羅雪諾利（Rossignoli）的論著。我們看了真福斯比諾辣從日本橫濱寫給羅神父的信（一六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似乎利公逝世前一天，諒必也會翻閱過這本書，看看論基多信徒怎樣修成全德的那一章。信上說：「數年前，曾蒙惠賜大著，業交范公禮安珍藏在澳門，以便披閱，用作訓誨信衆的根據。」羅氏原是亞瓜維伐的老學生，和利公是同門。密良傳教士們的函牘中，每見提着另一位的名字，他們從日本或是從澳門寄發的書信，每每托他代禱又懇密良命婦依撒伯爾貝列匝加（Isabella Christina Bellinzaga）轉禱。羅神父在全心捐離世俗的理論中，常提着利公另一神學教師賈利亞第（Gagliardi）的名字，和他的主張相符合，中國信衆昭事的虔誠，正是胚胎於這種熱心論據而發揚光大的。

第八章 種下了基多教化的根

現在讀者們大概總可以看得出本書的宗旨，懷着和作者編撰本書時同樣的感想吧！他們諒必也和我們一般，對於利瑪竇的生平行事，耳熟能詳；可是史冊上所記的事績，尤其是專記遺聞佚事的裨官野乘，往往是依據道聽塗說，和事實迥不相伴的資料信手拈來的，有些人信口雌黃說：『這位耶穌會士是秉性活潑，作事巧妙，詭計多端，生就各樣才幹，能得大人物的歡心，使他得邀君王眷顧加恩。無如他對於聖學一門素鮮研究，但看他所著論真宗教一書就足見他連神學初步原理都不知道。他在歐亞專攻神學，論及宗教問題曾發表過新奇的驚人論調，證明有些事情老年人也能做得。但他所以能在中國安居無恙，其中的關鍵不在神學而在政治；中國君王認他是個和悅可親的人，教外人士知道他是個容忍他們迷信舉動的教士；官僚們知道他是個熟悉朝廷關節的政客；魔鬼呢，也認他是個忠實的代理人，在教外人中非但不加毀滅，反而鞏固他的統治，還把它擴張到信友社會中。這就無怪這麼一個托賴世俗蔭庇和世俗同流合污的人要享着極大安甯，免遭艱難攻擊了，這種艱難原是專務傳揚被釘耶穌基多，一心依靠他，只憑着他的苦難凌辱獲得神力，永矢忠誠始終不渝的教士們所應有的賞報呀！』

仇視者的評論既如上述，中立者的論調也同樣於揄揚中痛加貶斥：『從沒有人更大膽地發揮更大的毅力，運用更巧的手段，從事傳教，勉以專謀遠大為存心，又為詭譎的謹慎，世俗的交際所驅使；宗旨大得估計不來，完全藉口於為他人謀福利，便在耶穌會士們對於所用才德的性質，雖則無庸懷疑，也是這樣說法；耶穌會士們也毫不遲疑，坦然直承一切是迫於

需要，不得不爾。』(見勒維爾氏(Reville, La Religion Chinoise, p.663)「中國的宗教」六六三頁)。

其他諸人措詞比較文雅一點，但弦外之音，却更足令人傷感。湯麥(Thomas)的「北京傳教史中」(卷二七五——七六頁)有一節說：「利瑪竇確是個會傳教的人，他的心意柔順合時；那時中國人全沒有見過西洋的新奇玩意，他就看出了可以利用的全面；他人所以失敗而他獨能成功，大半是因他有了這種準備所致。這不是一種貿然的嘗試，實在是早經籌備才發動的攻勢，全不但憑巧遇。無疑地他的寫作一點沒有使人想到他是一位學者，或是一位很著名漢學家。……他能利用環境，手段極高妙。他在北京過了十年，整天忙着修理鐘表，見客，拜客，和奉教文士們合作，把各種書籍譯成華文。……只有一件事是他白圭之玷，這就是要把中國人的迷信舉動，附會上正道的意義。……他的信德是完備的，從神學一方面看來，他所受的訓練大概不見得完備。」

這些貿然下筆的評論，說的話有許多漏洞，更有許多是妄談謬論。這是在下所亟欲加以糾正的。自從筮琦文多利神父(P. Tacchi-Venturi)把利公的筆記刊佈後——其中的虛實只須把他當時的函牘和他同會們的書信加以覆按，就不難一一判明——再有人寫這樣的史記，(不如說是野乘)這就不容加以曲恕了。利公會講：「去年(一六零八)年底，我不知怎樣想起最先來華的司鐸中，如今只剩我一個在世；其餘的就誰也不知道開創時代的往時了。所以一切事情，正宜按先後的次序一一記下。我聽說我親手經歷過的事情，在別處講來，和實在的情形已是大不相同了，所以我更有記載的必要。」

這件事在十四年前早就想到了，那時却没有實行。一五九五年，利公的書信上曾說：「假使我要向神父陳報我們在華傳教時所有種種的事情，這還是用年鑑記好，不宜在通常函牘中隨時陳報，所以我不願講述這些事情，讓我在較為清閒的

時候寫一部摘要，或是一部筆記。」

事實上，便是到了一六零九年，起先利公仍因諸事紛繁，沒有餘暇彙集各住院的報告，或是他來華後所有的記錄，看來到了這一年終和下一年起首四個月中，他才有暇寫他的筆記，直寫到他去世前幾月——也可以說是前幾天——才寫完；去世後，便由金尼閣司鐸補記幾件最近的事情，敘述韶州南京上海三處教務的狀況。這部極珍貴的作品，如今直傳到我們手裏，全書共計一百三十二頁，用上等中國紙，經利公親筆謄錄，作者又在每一頁上端寫着「耶穌瑪利亞」字樣，證明他恭敬主母的熱情，和寫這本書的動機。

講利公傳教成績的記載，除此以外，再沒有講得更詳盡，更切實的了。便是他自己的函牘，和他同事們的函牘，也不能講得這樣有條理。文多利氏會論：「事實上，利氏的記述以前是出以函牘的方式，講的每每是一年中的事情。這些書信大都是寫給本會上峯，或是幾個老前輩的。按他忠誠的本性，他下筆時自必坦率陳言，決不能有所隱諱。有時候，他也寫給他的親屬故舊；他和他們天各一方，久疎音問，有的業已去世，他却以為尚在人間，便告以近况，向他們細訴衷情；如今，他追懷往事，想把自己來華傳教所有全部經過情形，從頭到底，彙集成書，送請耶穌會總會長亞瓜維過目，連這部筆記必將刊行問世，傳諸後人的假定，也顧到了。」

而且利公的筆記還反映着他靈心中的境界。文多利司鐸還說：「諺有之，「讀其文而知其人」，和這話完全吻合的著作，捨此外殊不多觀。我們試讀利氏書，聽他講述怎樣遍訪中國士大夫，和他們晤對深談，放懷討論怎樣關心教務前途的休戚；忽而滿懷欣慰，忽而憂懼交併，無異看到了他自己摹繪的肖像，想見當年利瑪竇的豐度，看出他的全副性格：正直，溫和，作

事有恒，始終不懈，略帶一點甚多信友質樸的光輝：只可惜這些美質，沒有用純粹意大利的文章格調來提高罷了。否則這部筆記就算得十六世紀最完善史乘之一。可是這一點缺憾，不足爲利公詬病。他一生忙碌，自不暇致力於詞句間；十三年前，他着手著述的時候，曾自認國學荒蕪，下筆寫意文，竟比寫漢文還要費力；那麼，他寫起來，又怎會寫得好呢？何況他和祖國遠隔三十年，絕少應用祖國文字的機會；四年前，且曾自稱於中國，或是班葡兩國的文字，下筆時比較容易，無怪他要比意大利第一流文章家相差很遠了。

我們對利公的這部史記，所注重的是他來華開教的事實，不是寫這史記的本人；我們因着書中所記傳教的事蹟，才想見這傳教的宗徒，更因這些事蹟，聯帶注意到當時中國的狀況，而知十七世紀初葉的歐洲人不會因此而致誤。利公的原著由金尼閣譯成拉丁文，刊行問世，風行全歐，而且風行得太盛了，以致出版後只過得十年，就不得不停止發刊，一怕的是中國人見本國的機密被人洩露，要遷怒『到教士身上。一六二六年七月二日，耶穌會總會長維戴萊讓神父會記：『這事怎麼辦呢？金尼閣的書如今已被轉譯了好幾國文字，翻印過好幾次了，我們惟有求天主，庶幾前途極有希望的中國教務，不致因這種鹵莽的舉動而陷於危殆。』現在呢，這種危機已不再存在了；我們不妨舊樣翻新，隨便利用這部筆記的資料本書的篇幅，都是援引利公的筆記，比照當時的函牘而編著的。

我們該把這些文件分作兩種史料。第一種，是敘述中國的情狀，這便是利公就他多年經驗之所得，在篇首作爲緒言記述的；這尤其是值得一班輿地學家或是文化史家們如利多芬（Richthofen）等備加稱道的史料。第二種，是以後的四編，專講傳教事業的發展，尤其是利公所記開教以後的情形。

利公並不忽視諸同會或是他自己每年報告書上所記的事情，或是各種特殊的意見，實在，他也並沒有記述一切，或是把各事詳細敘述的意思，『只因慣常同會們對中國事情意見極紛歧，又因寫這部書的宗旨是為供歐洲人參考，所以必須先講中國本身的形勢，沿革，風俗，民情，法律，教會等，作引子，特別注重所有和歐洲各國迥不相同的情況。這樣我們就不難懂明白，教士們進入內地，和開教時候所有不得不然的光景，不致別生枝節了，雖然我知道歐洲方面議論紛紛，却以為大家都不会不喜歡從我們探明真相。（因為我們在此已閱三十年，又會到過中國最富庶最昌盛的省份；在南北兩京中，我們和一班賢士大夫以及幾位全國最偉大的人物不絕往來，我們說着他們的話，深切研究過他們的禮儀習尚，還有那最要緊的，我們大家手不釋卷地讀着他們的書。）其他的人們（就是講述中國事情的人）從不會來到過，他們道聽途說，只從那些對於一切事情沒有和我們知道得一樣清楚的人，聽得一點消息罷了。』

這種坦率的話，自然很有價值，所以他講的事情我們自該深信不疑。利公的筆記中，並沒有典麗雋永的章句，雄辯滔滔的詞令，所有的，無非是事實，是翔實而準確明朗的記載，且有數字可憑，對於異教人的風俗見解，也分辯得明明白白，攻斥得一點不含糊。比方他傳佈天主教降罰瑣多瑪城的圖像，當然用意是在痛斥男風和狎妓的罪惡，表示深惡痛絕，使見者知所警惕。中國人讀了圖上的按語，自必大為逆耳。他這樣微詞諷諷，真要比一班不明公教教義的人濫加詆譭好得多呢。大概近代天主教教士們對中國的見解，所以和利公心目中的中國大不相同，是因他們所接近的中國社會，和利公所處的社會截然不同。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教士們，大都受種種環境的限制，只能向下層民衆宣化傳教，所接近的無非是鄉間一般窮苦的平民和上流社會極少接觸。利公和明代清初的教士們來華傳道，却從上流社會入手，常駐大都市中，和王公

大臣相周旋，所交接的大都是讀書明理，文質彬彬的縉紳士族。中國智識界自有一種不移的見地，明代士大夫欽佩利公所傳的聖道，很有許多聞道皈依，便自願竭誠贊助；可是到了滿清末葉，這班士大夫就因不滿於教士們的措施，極力反對外國人的「洋教」；這就可見利公來華開教時，汲汲於謀得智識階級的諒解不為無因了。

利公的筆記差不多直到他在去世的上一天，還執筆寫着，不但記述中國人漸漸歸向天主教的情形，也把他自己做教士的滿腔志願，盡情流露出來。我們不難從他的外行和心意中，看出他內心生活的真相，想見他的德業。然而那些和他最親近，最相契的人，却沒有澈底了解他的深意，完全明白他的苦衷！

他雖則未便向同事們說明他的深意，而且說了，他們也未必能理會，但他到了暮年末日，却也會一再聲言，說：「神父們，我嘗刻意推求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向中國人推行基多聖道，却想不出甚麼更好的方法，除非我死了才會明白。」他去死後，當時聽到這話的同事們，回想前情，無不樂為稱道。

我們切勿誤認利公說這句話，有表示灰心失意，趑趄不前的意向。這却是一種顧慮未來的預言，他左右的同事們，對他的傳教方法，始終懂得不得。漫說那道聽途說，拾人牙慧，以及那只到得印度，或在中國門外徘徊瞻顧的人是這樣；（比方一六二二年會到印度住過兩年的法國遊歷家莫歡郎（Monfrán）講利公等來華傳教的事情，也曾說：「從澳門到中國內地的只有六個耶穌會士。他們在廣州住了二十年，照本國人的習俗，留長了頭髮，和他們一般打扮，扮作本國人進內地，自以為將來永不復返，）便是那和利公等極接近的同道中人也，都是模糊影響，不能給一班信口雌黃的批評家，下一當頭棒喝。文多利司鐸曾論利瑪竇來信時，總講起他的傳教熱忱：「他也知節制自己的神火，總要處處留神，不使有一椿不經心的舉

動，破壞多年辛苦所得的效果。他雖則秉性溫和，却堅定主張最好的方法，是憑着文章學術，漸漸獲得中國人的信任，等猜忌消釋了以後，才進行勸化的工作。這種主張：就有多少公開地加以批評，或者表同情：當然，大家認這些人立意是正直的，無奈他們受了妄想的遺害。這種同情心，是出於歐洲、印度、和遠東各方面利氏的國會們。這班耶穌會士們不明瞭中國的情形，也許是懂不得——不管是怎樣的動機吧——就以爲有了充分的觀念，見他進行遲緩，不想是迫於環境，出於必不得已，却以爲至少是因這人非常胆怯，甚至滿懷恐懼所致。這位堅忍的傳教士，未嘗不知道他們這樣責難他；這些話他在中國聽人輾轉相傳，大感痛苦，却因他們的愛德，多少得到了一點寬慰。然而這真是他所受極深刻的痛苦；他一心只想從速使這偉大的國家歸向基督，要比任何批評他的人深切啊。」

他進京獲得成功後，以爲他的真心，凡是和他要好的朋友和一班和他合作的同志們，總可以對他稍爲信任一點了。豈知竟不然！我們但看一六一〇年的年報，便知道其中一封書信上，有這樣的話：「幾年來，利瑪竇設法引李之藻進教，有些人以爲他的熱忱，似乎過份了。」我們在家裏行間，看得出龐迪我便是其中之一。無疑地，李之藻是一位有力大人物，又是個極聰敏的人，但好些人却以爲這位老人，費了這許多光陰心力，勸化他，是否值得？利神父的聲名在中國已是很大了，他這麼大年紀，每天還要給一個不肯放棄妻小奉教的讀書人，教授算學，豈不是太過麼？」

這一類的批評家，雖則已被事實駁倒了一百次，還是這樣冥頑不靈的信口胡說着。人誰都有肉情，照人類的本性，豈不要教人灰心嗎？利公在中國開創了天主教，如今傳教事業日見發展，尤其是中國中部的教務蒸蒸日上，不必開教人親自去參加，這時候，豈不儘可脫卸仔肩，不管好歹，讓人接辦嗎？

利公却別有見地，依然不得不抑制着同志們遠他上峯的不耐。他在北京的成就，不但惹起了回教徒們的忌嫉，到處大放謠言，橫加詆毀，便是遠東的教士們也不問青紅皂白，妄肆譏評，把無稽謔言，信口傳述。我們知道有些人道聽途說，傳聞和事實是多麼大相逕庭啊！但看一六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利公寫給葡萄牙副總會長轉呈總會長的信，便不難獲悉究竟了。他說：「我們的事業日見成功，更有推廣的希望，因而欣慰日深，却也因此而危險日甚，費用日增了。我們在中國居住，必須經過官場核准，困難不僅在皇帝，每年供給五人的生活費只有百餘元罷咧。因為我們雖然因此得享盛大聲譽，區區之數，實在不夠我們的需用，而且將來我和龐迪我同志死了以後，便是這一點也必不再支給了。再則在過去幾年中，一班對我們不懷好意的官僚，曾三四次利用自己的權力，設法把這一項開支撤銷，有一次，他們已確信這目的可以達到了。」徐文定也曾打算奏請辭職，所以利公極盼范禮安會長來京一行，好向他請示核准。他曾把這事呈報范公說：「我們打算奏呈皇上，說我到了京裏，『不居官職，却受國家俸給，到如今已有五六年了，自愧無功受祿，理應懇辭，只求援蒙回人的先例，准我和我的同志們寄居中國。』：回回們差不多可以隨意久居中國，建造寺院，生活很自由：我們這樣做法，就可以使仇人們知道不能陷害我們，他們要撤銷我們的俸給，我們自己先已放棄了。」

但范禮安會長下一年就去世了，不會進得中國內地。所以利公的這個計劃，也就擱起了，不會行得過不多時，他也比較放心了。他的書信上曾說：「中國人以爲我們熟悉中國情形，要是把我們驅逐了，更怕我們要在外擾害他們，這要比留我們在國內更不好。」他於是不再過分憂慮傳教事業有被摧殘的危險了。他知道有一個挽救的方法，這便是直接奏聞皇上。他說，按祖宗成法，皇帝不讓他人瞧見奏本，也許後世嗣君有不遵先朝遺制的，但我們只該忍耐，等天主大顯仁慈，賜我們能設

法獲得明白許可，傳揚聖教。：只看我們因着全能天主的聖蹟，得在這裏立足，這便是我們將來一定要做成一番大事業的憑據。」

然而利公的同事中，有幾個却不是和他一般見解：他的直屬上峯，中日省區副會長巴範濟司鐸便要他極力設法，獲得在華安居的准狀，即使他和當今皇上一朝去世，在華教務也可以不受妨礙。利公奉到了這命令，曾於一六零九年二月十五日據實伸言，恭函呈覆。他說：「神父想我朝朝夜夜，只念着這件事，這真不錯。：可是這個國家和治國的方法，和全世界其他一切的國家大不相同，不但神父等遠在海外，不易明瞭，便是傳教內地，從沒有到過京裏的同志們，也不易了解所有的困難。漫說是得到，便是奏請，也難乎其難哪！為甚緣故呢？因為皇上只和宮裏的太監后妃們講話，商議一切；章奏都要先經一位大臣看過，是否合着本國體制。所以外國人久居京師這件事，如果是和中國定律絕對不合，他們向皇上奏請，更是為國法所不許了。自從我晉京以來，我曾親身經歷過，看見過這種光景了。便在今日，我還是不知道那時我的奏本會否由太監們轉呈御覽。：此外，皇帝便是接到了奏本，也必發交專管外國人的大臣核辦。這位大臣對我們並不完全友好，覆奏時，必然要說：「依照國法，該把我們遣回本國。」和我們初到時一般。：我曾從絕對確實的來源，得知皇帝不得主管大臣的題奏，連要派一個官職，賜一個榮銜都不能。這種光景在我們歐洲人看來，誰都不相信。但願神父勿聽信本會同人的話，以為我們憑太監們從中設法，便能獲得甚麼恩典。：事實上，我們初到京裏時，便有一位極肯照顧我們的閣老對我說得明明白白，說我不可以為有人答應了甚麼話，就受了人家的誑騙，太監們不能幫我們辦到甚麼事情，而且我們要是托宮外的太監給宮裏的送東西，我們就有全盤失錯的危險，一點益處都沒有。比方，四年前，我們曾設法托人轉交給宮裏某太監一宗價值幾十銀元的

禮物；近來我才曉得這些東西至今還在那人手裏呢。我既然對這種光景消息很靈通，又會聽取了有見識的重要人物的意見，我以為這件無益而有害的事情不合再去嘗試了，因為有些人遠在他方，自己一點不知道的事情，還要紛紛議論，這件事他們更要妄加判斷咧。現在，可能的只有一條路，這是徐保祿建議的，就是具呈理藩院，辭去給養，只求和別的臣屬一律看待，准居中國，依中國四書上「願受一廩而爲氓」的話，「歸耕力田」。這樣，就會發生和我們有利的好感，即使皇上不下諭旨，我們也可以安居無慮了。無如同志們都反對這種辦法。我呢，也並不傾向着我們從這國家的俸給，得來的信譽真不小啦，京裏外省都一樣！似乎宜保守着，不可放棄。但明年徐保祿回京後，我還要同他商酌，看有沒有別的好辦法。」

以後幾頁中，利公更闡發得極明白。他說：「依我的鄙見，最好的解決是這樣：我們既然在這裏很平安沒有人提起驅逐我們的話，我們絕不宜有甚麼舉動，使人相信我們有所恐懼。實在，我看得很明白，我們安居的保障根本不在皇上的愛護（他對我們究竟還記得不記得，只有天主知道），也不在官廳方面准不准（因為誰也不能擅自批准，尤其是在這京城裏，皇上的監視下）。除了天主上智的安排不說外，歸根結底，我們所以能安居無恙的緣故，是因我久居京師，誰也不能懷疑我有絲毫令人不快的陰謀，再則他們很怕我們一朝回到本國要洩露他們的秘密。……我們會聽人說，回回們要是在中國住了七年以上，就不准再回去。」

末了，利公又提起過去幾年中，好幾次各屬神父們處境艱危，險遭驅逐；可是他們還是安然無恙。他說：「因此，我預料的事情，我們已親身閱歷過了，見過事實了，將來便是我們先來的人相繼去世了，或者當今皇上駕崩了，有天主聖寵相幫，還是和現在一樣。所以我們儘讓神父們到中國各處來吧，越多越好；波斯的回教徒們就是這樣每年移入中國的。我也從沒有

發見有一條法律要把私自入居中國的人判處死刑，和有許多人所說的一般。對於第一點，我不懷疑購置田地，從事生產是件極有益的事；這樣人們就不再尋根究底，要問我們的費用從那裏來了。我們的朋友中有許多以為我們不如讓人相信我們有煉金術。南方所有反對我們的事件全因我們蒙葡國人幫襯所致，便是這裏也如此，他們很想把葡人驅逐出國永遠不許再來。南北兩京各有御史衙門，約有五十名御史糾察國事宰相也被糾參。我們所以沒有被這些人劾辦，是因見我們和許多大人物有來往，我們的名譽也極好的緣故。再則，他們見皇上待我們很好，也就不敢上本參奏了。因此，他們讓我們平安無事。我想以後只要我們不讓他們有所藉口，他們也必不來攪擾我們。」

有人問：教士們傳佈新宗教，這件事不是要惹起不安嗎？利公便回說：「這却是沒奈何的事，因為這正是我們來華的宗旨啊。我們只得聽天主安排，天主要佑助我們，即使必須顯聖蹟，天主也必不吝惜，而且我看到如今確已顯過了。至於我們一方面，我們自該格外謹慎，切勿惹人造謠生事，用好著作和攻不破的真理，向儒士們證明我們高尚的教理，非但沒有妨害，而且有益於治民，對中國是極有價值的。此外，在這開教時代，我們所當求的，不在量，而在質，當竭力多勸化幾個中試做官的讀書人，使他們憑自己的地位，消除幾個守舊份子所有對我們的疑懼心，到後來，奉教的人多了，就不難奏聞皇上，使他知道教友們和國家的治安並無妨礙，至少也必准他們奉教，不加禁止。吾主要使我們漸漸明白他的聖意，知道該用怎樣的方法來承行，最有效驗。」

這幾年中，發生了一件事，足見北京教士們確已有了穩固的地位。一六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利公在宣武門買下了新屋後，每年完糧納稅從不差過。過了四五年，一次主管衙門覆核稅單，忽然傳教士們到案追欠。利公怕主計官不但要追欠賦，

還要處罰金，只得去和素來交好的主管某大臣商議。這位大臣就傳諭屬員，說屋主是「離開他本國人極遠的外國人」，不啻依例處斷。這一下，竟得到了全部的功效，主計官就發一張永遠豁免一切賦稅的執照。這張正式文憑不但因此賦稅全免，且使教士們居住在京師成爲定案，更開了後來教會財產概免納稅的先例。

於是，利公傳教事業的基礎已經確立了，以後只須鞏固這基礎就是。一六一零年的春季中，他的事情更忙得不得閒交，那年又該會試，來京應試的舉子有五千多，各省官吏晉京陛見，述職請訓的也不少。利公乘此機會，便得和廣東的布政使和按察使會面深談，因此消除了他們對澳門葡國人所有的不良印象。有四五官員向利公請教算學，那好學不倦的李之藻也是其中之一，這時候，他從大名來京，奉調到南京供職。有許多賓客寄寓在教士院中。利公在官場中往來酬酢拜客送禮，非常辛苦忙碌。封齋開始了以後，每當黃昏進食的時候，他還不時要丟下飯碗，出去接見來賓。然而他恪守齋期的規律，進食的時候過去了，見客回來，雖然沒有吃罷飯，就決不肯再吃，或者更改進食的時刻，也不肯另外吃一點別的東西。

以後，（是年三月）李之藻害下了一場大病，常要神父修士們在他身邊，不離左右，利公就盡力照顧他，終於勸得他領洗奉教，洗名良。那時，李良已把他的兩個兒子，一個親戚，托給利公教訓了，如今又立下遺囑，請利公做執行人。他房裏常供着一幀救世主聖像，先前曾出十兩銀子作獻儀，如今又獻四十元，使利公早擬興辦的一件要事，得以剋日舉辦。那時教士們正把兩座三開間的平房改成樓房，因爲「神父們關在屋子裏讀中國書，只能從天窗裏透進太陽光，如今加高了，可以遠眺城樓，精神爲之一爽。」利公又僱工挖了一口井，把不便的地方加以修繕。聖堂實在太小了，教友們來堂與祭瞻禮，往往要在庭院中跪拜誦禱，無間冬夏。因此，利公等很想蓋造一座很寬敞的大廳堂，只因限於經費，不得不按中式蓋造。李之藻捐了這筆錢，

這計劃就可以實現了，教士們便決定改造西式，用以表示教堂和廟宇大有分別，却因限於基地，只好造得小一點罷了。利公於是把這件事委任熊三拔司鐸主辦，又因那時中國工匠還沒有蓋造西式房屋的經驗，教他一切全按建築規例辦理，務使工人們用心營造，勿令聖堂過於簡陋。開工前，也不用請求官廳核准。堂縱七十呎（吋是義大利古度制，約今零〇二五公尺）橫三十五呎，正面圍拱，壁龕和庭柱等，都從西式，正殿階高三級，使中國人見了非常稱意，為教士們初料所不及。全部工程二十天就告竣了。教友們來參觀的很多，見了都歡喜稱道。但神父們想起歐洲的聖殿巍峨，還覺得不很如意咧。

利公素來主張一切悉遵中國體制，把西洋文明的風味概加摺棄，龍華民却正相反，一味崇尚歐風。比方利公稱神為「上帝」「天」或是「天主」，偶然也用葡文的「陡伍斯」(Deus)幸而這譯音和西班牙語的「第奧斯」(Dios)不同，教士們才不致因一六零三年西班牙人在斐列濱屠殺華僑的慘案而招禍。這回蓋造西式聖堂，便把利公的成見打破了。在編纂經文的時候，也發生了同樣的猶豫。利公不願翻譯聖經，因為必須創造的新名詞實在太多了。李應試見他的兒子做輔祭童，念着拉丁經，却覺得非常欣喜。直到利公謝世的時候，每有許多鄉間的保守教友不得領洗，因為他不敢編撰華文付洗經，教人權付。還是龍華民和南京的教士們得了他的同意，創行權付制度。後來，龍神父交由金尼閣呈羅瑪的中國禮儀議案，看來不是出於他自己主張。（註一）總之，利公反對歐化的傳說無非是一種野話，而且是後來才起的，因為在一六一六年，便已有人不得不加以駁斥了。他的書籍，樂譜，建築，儀器，輿圖，和種種科學等等，都不是中國的呢，便是他的中文名字「利瑪竇」三字，也是他西文姓氏最切近的譯音；他的別號西泰，就有大西洋的意思。他利用西洋珍奇，先引人注意，後得人信任，最後又蓋造了西式教堂，在在表明他憑西儒的資格和人相見，他雖然一方面表明自己和澳門的西洋人不是一路，一方面，却

始終聲明來華的任務是在傳佈西洋的基多聖道。

北京住院所有煩劇的事務雖然是由三位司鐸分任着，可是大部份全要利公親自主持。造聖堂的時候，一天瞻禮二（五月三日），利公拜客回來，忽患偏頭風，痛得很厲害。他相信自己素來有這種頭痛病，只須休息幾小時，或是一整天就好了；豈知病勢一陣緊一陣，他就叫人去告訴熊三拔神父，說自己覺得不對。熊神父等便去向他探問，見他正在深思熟慮，不知他是在想自己工作完畢，願意去享見天主呢，還是想着在眼前情景中，要丟下他手創的事業，丟下他的同事昆季們覺得難受。這時候，李之藻的病已痊愈了，一聽到利公患病，便請那替自己看病的名醫過來診視。這位醫師斷定利公染着那時在京裏流行的時疫病，便開了藥方，服藥後却不見效。有些人說他患的是中風，有些以為這是時疫症，不過不在肺部。過了幾天，他的病勢依然不減，神父們便請來院診視的六位名醫互相斟酌，但彼此意見不能合一，只得開了三張方子聽裁取。教友們聽得了利公病危的消息，來探問的晝夜不絕。教士們把三張藥方放在苦像前，求天主賜他們選擇那最好的；末了，和朋友们商議後，一致決定從那最先診視的醫生。豈知這樣竟鑄下了大錯，服藥後病勢更凶險了，使衆人大吃一驚。利公却向衆人表示十分滿意，好像他功行圓滿了，從此得卸仔肩，引為欣幸。他的左右見他衷情欣悅，也因此解除了不少憂苦。

五月八日，瞻禮七，傍晚，他顯着滿懷欣慰的衷情向熊三拔司鐸行告解。熊神父後來曾向人表明生平從不曾有過這種心神安樂的印象。似乎利公會用心預備過，把他一己的生平作一總檢討。

下一天主日，利公便領了臨終聖體。他雖則病勢極沉重，大家怕他一起動就要出亂子。可是他仍勉強掙扎下床，還不教人攙扶，起來跪下，恭領吾主。他念了一遍解罪經，在三次拈心認罪的時候，痛心慘悔，熱淚盈眶，使在場諸人無不大為感動。到

了下午三四下鐘，他神志昏迷，嚙語大作，足過了二十四小時才清醒。他的嚙語大都講着教友、聖教會、中國人和中國皇帝歸依聖道、信奉天主等事，說：「中國已經歸化了！皇上也已領洗了！」等這一類的話。到了五月十日，瞻禮二，傍晚，他清醒了，便要求領終傳聖事。這當兒，他的神志完全恢復了，有時候聽司鐸行禮誦經，便接念應經。在場的四個同會趁他清醒時，求他以長上的資格，賜以最後的祝福。他對裴修士（P. En. Percis）許下代求天主，賜他在會有恆心。某司鐸（大約是熊三拔）向他說，同事們需要他的扶助正極殷切，這時候他拋下了他們，教他們怎麼辦呢？他回說：「我留你們在洞開的大門前，教你們立下大功勞，只是還有許多危險和許多工作呢。」另一位司鐸（似乎是龐迪我）問他怎樣他們才能向他表示最好的感謝。他說：「總要格外善待歐洲來的神父們，因為他們爲了愛德的緣故，放棄了本會的教學生活，到這異教民族的荒地來傳教，所以用尋常的善意來待他們還嫌不夠，却該加倍愛護，庶幾他們到了這裏，只得一個人做伴，就可以和在本國有許多的同伴一般。」

人們還聽得他氣衰力竭地說：「我在吾主聖心中很愛那在法國國王身邊的谷東神父，我原不認得他，却因他爲了天主的光榮而做下的事情，我決定今年要寫信給他道謝，詳細告訴他，我們在華傳教的情形。可惜現在不能寫了，就請你們代我向他道歉吧。」

他一時低聲吩咐本會同志們，一時又向來探望的教友們道謝勸勉，就這樣挨到了五月十一日瞻禮三。同事們求他留一點東西作紀念，要是合宜的話，更求他給他們臨終祝福。他於是唇齒間微現笑容，給他們祝福了，「他臉上滿現着愉快的神情，掩不住他所有的福樂。傍晚六下鐘，他吻罷苦像，和聖祖依納爵的肖像，便轉身側睡，像人輪下閉眼安眠似的，一動也不

動，到了七下鐘，這位德備功全的老神父，在華開教的大德耶穌會會士，便安然逝世，靈魂飛向天主懷中，寄世五十七年七月又五日。

他氣絕後，仍現着十分愉快的容顏，臉色依然鮮潤，看去好像活着一樣。教友們見了都歡呼，喊着：「聖人真正的聖人！」他們正當循例舉哀，號啕大哭的時候，神父們便說義人去世，要尊敬他該不同凡俗，便有幾個新教友見表修士能畫，叩請他摹繪利公的遺容。這時候，李之藻病雖痊可，却還不能起床，他一得到這噩耗，便差人通知神父們，說棺木讓他去置辦，又說：「你們不必着急，天氣雖然酷熱，老師的遺體是不會壞的。」果然利公的遺體，停了兩晝夜，一點氣息也沒有。李良於是命人選購了一具棺木，價銀十五兩。這幾天中，來吊唁的賓客絡繹不絕，大家一致稱道利公生平盛德。

似乎利公預知自己終期密邇，不久將應主召了，因為他在前幾月中，把他的筆記編完，把所有的信札盡付一炬，並把一應文件加以整理；最後，又悉心擘劃，釐訂章程，處分教務，使後來教士們知所遵循。同志們見他晚間祈禱默想，比平時更專一了。他去世前兩月，曾請同院某司鐸把他的過失提醒他，好教他改過，後來同事們又屢次聽他說這樣預言似的話：「神父們，我每想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在中國傳揚基督聖道，却總想不出甚麼更好的方法，除非我死了才明白。」他死了以後，北京教士們才明白了這話的神秘意義。四天的追思禮（五月十五至十八）行過後，便有一個教友想實行那許多儒士們當初就想到的計劃。在中國表彰美德，酬報功勳的職權，屬於天子，往往用建立牌坊的方法來紀念斯人，永垂後世。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種飾終令典，最該旌表的是忠臣、孝子、烈女、節婦。至於那澤及民間，功在國家的鄉賢名宦，更有建祠立廟的辦法，用以崇功報德；但最高的酬報，是死後入祀聖廟，配享孔子，列於「聖人」之倫，這是中國有學問的君子人所冀希艷美的止境。

因此，一般和利公交好的中國士大夫便想採取種種步驟，使他得到這種最高榮典，在不違反聖教禮規範圍內，得蒙皇帝褒揚，跨登「聖賢」之列；奏聞後，奉旨欽賜葬地。他們便在順治門外大柵欄地方，擇定墓地，於一六一一年，諸聖瞻禮日，安葬了利公的遺櫬。這地方至今成爲北京耶穌會教士的公墓。從此，中國的天主教就因着利公一生的努力立下了基礎，大有蒸蒸日上之勢了。這正應了利公預許的話：他死了以後，就有了最有効的方法，以廣揚聖教。他的死不僅是他個人德備功全的結局，也是中華聖教確立根基的保證。在那時陞任京尹的王應麟手撰的墓誌銘中，曾述及利公生前交好的許多名公，鉅卿，文人，學士，閣部，御史，督撫，司道，府縣，翰林，進士等，比比皆是。這些便是中國社會的代表人物，對於這位專究天學，博通中國經史的西儒利瑪竇之喪，大家都表示深切感悼。

結論 利瑪竇司鐸在歷史上的意義

凡是研究基多教化源流的學者們，慣常只知着眼於古羅馬帝國。可是聖教會誕生於羅馬帝國的邊陲，聖道的流傳是東西並進的。果然，西向的趨勢較為旺盛，但東漸的事實也不可完全抹殺。曾有人說：「東西兩方的分裂始於文藝復興時代。」這句話對於印度也許是對的，對於遠東，可就不很確實了；自聖方濟各沙勿略以還，傳教遠東的耶穌會教士們，沒有不想把東西兩方的連繫重行締結的。僑居北京，接近朝廷的利瑪竇神父和後來的教士們，更心心念念謀在這中國首都永久立足，好把東西兩世界，溝通聯絡，使彼此聲氣相通，聖化大行於中國。

現在中國人士思想上的演進，以為「中國自有優良有價值的文化，西洋文化的流傳是一種文化的侵略。」所以作者在本書中研究利氏和明季中國智識社會的關係格外感到興趣——這種興趣不是純屬學術方面的——也就不奇怪了。如今我們把過去時代的情景重新在我們眼前展開，凡是公教教士信友尤其是關懷一切人事價值的智識份子對此當不能不無動於中，所以作者編這位在華開教第一人的傳記，用意不僅在詳敘利氏的生平，也不在頌揚他的功業，却在伸述那足資矜式的先輩典型，使現代人士知所借鑑，把目前事態平心靜氣的檢討一下。我們還得用清醒的頭腦，就本書要旨，把利氏逝世後所有的事態的演進，加以解釋，才可以把本書作為結束。

但我們先該彙合利氏所傳的聖道，和他所用傳道的方法作簡括的說明。曾有一位，不是，也並不自命專家的作家，檢討利公生平的要節，和大事，編成綱目，（註一）很堪注意。我們就用這張表格做出發點略加修正用以闡明利瑪竇司鐸在歷

史上的意義。原書綜述利公生平要事如下：

『爲迎合華人心理起見，他（一）易僧服爲儒服。僧服使他和佛教和尚相混淆。那時，佛教勢力還昌盛，却爲士大夫所不齒。反之，儒士們到處受人尊敬。（二）不向羣衆宣教。那時中國人惡人聚衆宣講。他用談話的方式，在寓所客廳中，和人公開論道。（三）援引中國經書，證明天主教道理和中國古儒所講的道理正相符合，所以補先儒闡論之不足。所以天主教道理不是外國人的道理。（四）用高深的漢文著書立說，闡明其多聖道，作爲至高無上的智慧，至善至正的道德準繩立論。（五）利用西洋學術取得博學鴻儒的令譽，使藐視外人的心理一掃而空。

他在北京，蒙皇上優禮，深信只要使皇上歸依聖教，中國人民素宗孔子之教，自必接受基督多的宗教了。

方法：在過渡時代顯然必須竭盡潛移默導之功，引人向化。凡屬華人歷代相傳的風俗習慣，除了確屬不良的傳統習慣之外，不宜遽加斥絕，即使在歐洲人看來，不免觸目，凡是容忍的風俗習慣，就該曲予寬容。因此，利氏援引孔子遺教來攻斥儒士們所有迷信仙佛的舉動，自列於守正的儒林，反對那兼信仙佛的士類。』

就作者在本書中所有的說明看來，先該辨明利公所用的方法不止一種，却有兩種，再加細察，更看得出有三種。我們以爲「方法」兩字還不很妥貼，却該說是三個「步驟」，或是三個「階段」。利公在這差不多業已絕望的傳教事業中，憑最大忍耐心，運用他的絕頂聰明，適應當前的環境，漸漸升堂入室，達到了原來的目的。如今我們把原文稍加修正，概述如下：

第一階段 羅明堅換穿僧服用西洋僧侶的名義進中國內地後，利公也就隨和了，因爲惟有這樣才能進內地。但他利用西洋科學掙得了非常博學的名聲，廣東境內藐視外人的心理，就消除了一半。佛教僧侶不學無術，聲望毫無，深爲地方官

吏所不齒，慣常亦爲中國上流社會所摺棄；反之，儒教士林到處受人尊敬。利公便呈准上峯，脫却僧衣，改穿儒服。

第二階段 他以大西洋儒士資格，先抵南昌，繼到南京，全按儒士的習慣風尚，和人晉接。他不向羣衆宣教。那時中國人惡人聚衆宣講，地方官也怕有人借傳道勸教爲名，煽惑愚民，因此懸爲厲禁。利公便用談話的方式，在寓所客廳中，或在書院中，和人公開論道。他開始用高深的漢文著書立說，闡明基多聖道，作爲至高無上的智慧，至善至正的道德準繩，立論一般民衆皆從釋道兩教，儒士們又大都信宇宙間確有真神，他就盡量援引孔子的話駁斥他們的謬妄，並設法證明天主教道理和中國古儒所講的道理正相符合，所以天主教道理不是外國人的道理。中國經書上所不及的或是有所顧慮，不敢明言的（如天主實有靈魂不死不滅，身後賞罰等等）他便把所有隱晦可疑的章句尋譯闡明，使成確切不移的正道，所以他所講的道理，正所以補先儒闡論之不足。

這種基本的辯論所以觸啓人心，使以後中國人士讀了其他的著述，能漸漸理會他所講的基本教義，超性的德行，和聖教會所有種種的制度規例。但利公以爲自己既蒙皇上優禮，中國人民日後自有歸依天主正教的希望，所以他在未奉皇帝明文，准他宣揚福音以前，不願鹵莽從事，只爲傳教過於熱心，反蹈危機，使多年心血一旦盡付東流。

第三階段 他到了北京，不久便明白縱得皇帝贊助，依然無濟於事。幾番艱險的經歷就使他知道爲了謹慎起見，傳教民間該力避招搖。這件事有被認爲煽惑人民，圖謀不軌的危險。

以後，他就聽從了幾位賢士名儒的意見，專務著述，宣傳天主教教義。同時，他仿造歐洲各會口的辦法，設法把信衆中堅份子組織起來，使最熱心的教友成立聖母會，習行聖依納爵的避靜神工。

對於中國人所有不染釋道兩教迷信色彩的許多舊習慣，他認為在這過渡時代，只宜用潛移默導的方法引人向化，所以他只剷除那確屬不良的傳統習慣；即使在歐洲人看來不免觸目，凡是可以容忍的風俗習慣，他就曲予寬容。他並不絕對否認這些習慣原有迷信色彩，却希望把聖教禮儀補充教授之後，就可以使這些習慣澄清了，所有宗教意義，化成俗禮。

作者以為利公在華開教的經過情形，這樣分作三個階段後，就可以把天主教傳入中國後各時期中演進的全景，一覽無餘了。實在，中國天主教在各時期中演進，也和開教時代分着三個階段一般，由傳教民間，進而獲得官廳的保護，再由官廳保護進而獲得領導階級的贊助。

第一時期——明代末葉（一五八三——一六六四）

作者在本書中講過最先來華的耶穌會士們要得中國人心向，情願做中國人，入居中國內地，起初還肯以僧侶自居。利公目光遠大，認欲深入民間，必先經皇帝欽准，便憑儒士身份，和中國士大夫周旋晉接，專務著書立說，藉以傳揚聖道。利公去世後，他的同志們妄以為他既蒙皇上欽賜葬地，就不怕教外官僚從中作梗了，就毫無顧忌的隨意傳教民間，因此得到了可悲的結果。一六一八年在華全體教士悉遭斥逐。後來，他們只得在幾位奉教士大夫的指導下，重新採取利公的方略，著書闡發，和智識份子談論聖教道理，不久便又大告成功。一六二九年，徐文定奉旨修訂曆法，乘機奏請徵召大西洋曆士來京襄助。這種半官式的保護已足使教務進行大蒙福利，但是在明代滅亡，舉國鼎沸的時代（一六三三——一六四四）北京教士們的地位也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而且永曆帝正位華南，更和教士們密切聯絡，皇后太子等都領洗奉教，遣使前往羅瑪，覲見教宗，正式聘問。

第二時期 清帝順治及康熙時代（一六四四——一七二七）

清初四十五年中，揚若望、南懷仁兩教士聲勢十分煊赫，在北京樹立了正式地位，要比從前利公所有的地位更強更鞏固。那時，中國的文士們大都閉戶讀書，不問世事，清廷的權力就日漸伸張了。到了一六九二年，康熙頒佈准全國人民學習天主教的上諭，北京的法籍耶穌會教士們和他很接近，便希望他做中國的公斯當定，多虧着這種皇恩帝眷，教務得以順利發展，便是教士們內部發生齟齬（如各修會同時派教士來華，在同一地區傳教，因此有了衝突；宗座代牧的職權應由各修會教士一體承認；法葡兩國的教士時起爭執等等）在華的傳教事業仍能繼續進行，不受影響。

但康熙也和當時歐洲各國的元首一般，認自己是中國最高的主人翁，凡屬臣下都該聽他的命令。他一聽說教士們該聽命於羅馬教宗，就勃然大怒，所以教宗專使都農樞機和梅蘭巴勃主教爲了禮儀爭案，奉命來華聘問的時候，他竟不加禮待，且令押送出國。以前，這件公案雖已爭持多年，却没有牽動全局，使中國天主教受直接影響，這時候，却給專制帝皇表演絕對權威的機會了，凡是不服從他，而服從教宗的教士，概遭驅逐。但在北京供職的耶穌會士們，仍得在京照常居住，教士們就在他們的蔭庇下，往鄉村中繼續傳教。

第三時期 清廷教禁（一七二七——一八三零）

康熙死後，教士們受的束縛更大了。後來中國禮儀遭禁絕，聖教會把祀孔祭祖兩事懸爲厲禁，教士們就無法勸化儒士們，歸認基多了。北京耶穌會諸鐸如巴多明神父等，只得研究些世俗學術，供獻給歐洲的智識界。那時，天主教教士們雖則不致和從前一般，被認爲僧道一流，却另成一派人物，漸漸和社會相隔絕，又因被人在民間散佈流言，造作蜚語，教外民衆對他

們非但不再信任，更憎厭恐懼了。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歐洲接連發生了幾件大禍殃，如耶穌會遭解散，法蘭西發生大革命，拿破崙攪亂全歐，普法戰爭等，使遠東方面起了種種可悲的反響。幾位碩果僅存的司鐸，飽經憂患，歷盡艱辛，維持少數老教友的信德於不墜，也有因此捨身致命的。教友們如果公開傳習，就不免要惹下殺身大禍。

第四時期 清代末葉（一八三四—一九一一）

清政府被迫和歐洲各國訂約通商，開放租界，天主教教士們便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中國人民並得朝廷許准，得以自由學習，抗議派的「耶穌教」也就乘機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於是西洋教士的足跡遍及全國，中國一班持論偏激的智識份子，憤異族之侵凌，不歸咎於滿清吏治之腐敗，反遷怒於傳報基多福音的公教教士，竟有人說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這實在是不確的。中國不乏觀察準確，見解卓越的教外名流如胡適等，曾經研究過明末天主教傳入中國的經過情形而否認教士們溝通中西文化的功績。利公等秉善與人同的宗旨，惟求真光普照於中華，這是可以大白於天下的。當時，一般有志尋求真道真知的士大夫，見了他的爲人，聽了他的言論，就沒有一個不了解，不悅服的。利公所以能受人尊敬，得人信仰，全因他獨具慧眼，先謀接近，然後推誠相與所致。利公去世後，來華的教士們就漸漸背棄成規，各行其是了，於是彼此間有了隔閡，不能互相了解。教士和領導民衆的智識階級間有了衝突，非但下層民衆要瞻顧徘徊，不敢信從，流言蜚語也必乘虛而入，因而惹下禍端。朝廷不得已而准許人民學習，公教當局也不得已而乘此時機藉求保障。可是這就和當初的自由環境大不相同了，縱能深入民間，却難使智識階級衷誠悅服。他們腦筋裏先已留下了不良印象，勸化工作就加倍困難，直要等他們看慣了好表樣，肯自動研究之後，才有引他們捨僞從真的希望。

第五時期 民國成立以來（一九一一年起）

民國成立後，信教自由載於約法，天主教教士們就可以同時依照利公先後採用的種種方略，促進教務，中國人漸知重視西洋學術，馮慕歐風，從前文士們所斤斤爭持的祭祖祀孔的舊習慣，也就自願放棄了。再則，教宗主張把原來的傳教區漸改成常法區，所有宗座代收，或是監牧區的教務，漸漸改歸國籍主教主持。當初范禮安會長和利公所夢想的境界，終於踏上了實現的途徑。

自從利公逝世（一六一零年五月十一日）直到民國成立，中間經過了三百年。這和宗徒們奉命往訓萬民，直到羅馬帝國公斯當定皇帝頒佈諭旨，令通國人民棄邪歸正的經過時期，比起來稍為多一點，足見天主上智安排救世的神工，在歐亞兩洲初無軒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二冊

Le P.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t.II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原著者 Henri Bernard

譯述者 王昌社

編輯者 東方學藝社

上海蒲石路二三一號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印刷者 土山灣印書館

上海徐家匯

發行所 東方學藝社

Cathasia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